

基于语言文字本体的

汉语外来词研究

杨锡彭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基金项目(批准号:04YYB011)

南京大学国家“985 工程”“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

江山语言学丛书总序

南京,虎踞龙盘之地,自公元3世纪以来,文化日益发展,学术日臻发达。即以近代而论,明代的南京太学,是当时最早创建的最高学府。《洪武正韵》的主编宋濂曾任南京太学的司业,光照汗青的郑成功是南京太学第280年入学的学生。及至清代,著名学者两江总督张之洞于1902年创办三江师范学堂,延至民国时的中央大学,杰出的语言学家黄侃、方光焘、吕叔湘等先后执教于此。近五十多年来,南京大学的语言学科取得了长足进步,为国家培养了众多人才,2001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南京大学语言学科诸同志如今躬逢明时,奋发图强,出版这套丛书,以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贡献绵薄之力。

古语云:“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一本著作,一套丛书,如果是学术性的,学界同仁会提出要求:

第一,坚实。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朱熹说过:“如人要起屋,须是先筑,教基址坚牢,上面方可架屋。”时下甚嚣尘上的急功近利导致大言欺人、浮辞充斥、硬伤时见,等等,如此岂能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第二,会通。学人凡有志者必有追求。追求什么?追求的是超胜。明代大学者徐光启说过:“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就是兼收并蓄,融

会贯通。

第三,创新。超胜的正道在创新,19世纪西方著名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源于创新。”学术,唯有创新方有自家的灵魂。创新之中,最难的,也是最高的,是自主创新,亦即原始原创。

这三点,当为学人悬作标的。自我评估,我们与之距离甚远。但是,有登山的志趣,纵然未必能达峰巅,或可至山腰,但至少是在攀登中;若连登山的愿望也无,那只能老死于山麓。

这套丛书冠名“江山”,“江”者,长江也;“山”者,钟山也。

自序

汉语外来词研究迄已取得显著成绩,但还远远不够,有分量成系统的专著屈指可数。本书不敢自诩,最多只是做了点“添砖加瓦”的工作而已。不过,阅读本书或许可以感到,汉语外来词是很值得深入探索的。

外来词研究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研究路径。迄今为止,基于语言文字本体的外来词研究虽然颇有成绩,但无疑还值得深入开拓。基于语言文字本体的外来词性质、特点的研究,是以语言文字本体的性质、特点为基础对外来词进行学理分析。从学理上看汉语外来词的性质、特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汉语外来词即使有差异也不过是现象的差异,而不是基本规律、基本特点的差异。古今汉语、汉字的基本性质有很大的一致性,汉语的各种地域变体也有共同的基础和共同的性质。因此,抓住汉语汉字的基本特点,就能举一反三、纲举目张。

外来词对汉语发展、尤其是对晚清以来的汉语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对汉语词汇面貌乃至汉语整体面貌的形成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词语结构、词汇面貌发生了哪些变化?现代汉语与近代汉语的差别是怎样形成的?当代汉语正在发生哪些变化?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其中,外语对于汉语发展、变异的影响,包括通过汉语中的外来词对于汉语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汉语研究注重共时与历时的结合、普通话与方言的结合、结构分析与功能认知解释的结合、句法语义与语用的结合、汉语研究传统与外来新知的结合、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思想的结合,等等,都极大地促进了汉语研究,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于汉外语言接触中外语对汉语的影响关注得还很不够。汉外对比研究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以对比为多、为重,对外语尤其是外语通过汉语中的外来词对于汉语语言面貌、结构特点的深刻影响还缺乏全面细致的研究。显而易见,没有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就很难真正了解 20 世纪以来汉语发展、变异的动因,往往也就不能对汉语的结构特点、结构性质作出深入而切中肯綮的分析。至于当代社会语言生活中有关外来词的各种问题,更难以给予深入、细致、有说服力的回答。

因此,基于语言文字本体的外来词研究,既要研究外来词在语言文字本体意义上的各种特点,更要研究外来词通过自身的语义特点、结构形式对汉语的影响。历来对于现代汉语外来词本体的研究,比较注重外来词音、义、形之间的关系,注重外来词对于丰富汉语词汇的作用,注重外来词的汉化和规范化;但是,对于外来词对汉语汉字的影响,尤其是外来词对当代汉语词语意义、词语结构的影响,关注得还很不够。对于外来词本体的研究,也往往站在汉语的立场上,只是考虑怎样“驯化”外来词为汉语所用,而忽略了外来词的语义特点、结构特点对汉语的渗透和影响。这就给外来词的研究带来了缺憾。从语言事实看,外来词并不是“循规蹈矩”地进入汉语为汉语所用,外来词给汉语带来了外语词语的种种特点,对汉语产生种种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因此,忽略外来词的“外来”特点对汉语的种种影响,就无法真正了解外来词,也不一定能真正了解现代汉语的词语结构特点和整个词汇面貌。

就学术视野方面的原因来看,这方面的缺憾在很大程度上与忽视意译和意译词有关。意译是用汉语的既有词语与外语词相对应,或用

汉语的既有成分仿译外语词,因此用以对应的汉语词语成分的意义可能会因之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意译词并不就是按照汉语词语的结构形式构造起来的,一些意译词其实是用汉语的语词成分按照外语词的结构形式构造起来的,这就给汉语的语词意义和语词结构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基于语言文字本体的汉语外来词研究,最重要的是要扩大学术视野,既要根据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律考虑外来词的汉化和规范化,又要考虑外来词对汉语语词意义、语词结构的影响,分析外来词导致的汉语词语结构和内部形式的变异。惟有如此,才能对外来词作出比较全面、深入的语言文字本体意义上的研究。

基于语言文字本体意义上的外来词研究需要整个学界的共同探索,本书在三个方面作出了努力:

① 力图从本质特征上揭示汉语中各类外来词的性质、特点,总结外来词汉化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特点。

② 注重揭示外来词语通过自身的语义特点、结构形式施加于汉语的词语结构和词汇面貌的影响,分析外来词引发的语言变异现象以及当前语言文字应用中有关外来词的种种问题,并且作出理性的、科学的评价。

③ 展示语言文字本体意义上的丰富多彩的外来词现象。

本书的研究,是从语言文字本体的角度对外来词进行专门研究的尝试。尽管力求深入、全面、细致,但在这样大的一个课题面前,个人的绵薄之力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不过,本书倘能引起学界对于外来词研究的关注,激发学界作出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更加细致的外来词研究,则已达到了写作的基本目的。

谨以余墨,套改先贤严复先生为所译《天演论》所写“例言”中的名言,以示心迹:

一著之成,经年踟蹰。

知我罪我,是存明哲。

目 录

江山语言学丛书总序 / 001

自序 / 001

前言 / 001

第一章 绪论 / 001

第一节 外来词是文化接触、语言接触的
产物 / 001

第二节 外来词对汉语汉字的影响 / 007

第二章 外来词的性质和范围 / 019

第一节 外来词的性质 / 019

第二节 新视野下的外来词 / 031

第三章 音译与音译词 / 039

第一节 音译的性质和范围 / 039

第二节 音译是汉语吸收外来词的主要
手段之一 / 042

第三节 从文字作为语言符号的符号层面
看音译词特点 / 047

第四节 从文字所使用的符号层面看音译
词特点 / 058

第五节 从文化心理的角度看音译词
词面形式 / 068

第六节 音译作为借词手段的价值 / 073

第七节 音译的歧异与阻滞 / 086

第四章 意译与意译词 / 106

第一节 意译词的性质和范围 / 106

第二节 “意化”是汉语吸收外来词的主要
倾向 / 109

第三节 意译作为借词手段的价值 / 111

第四节 意译的歧异与阻滞 / 119

第五章 音意兼译的外来词 / 127

第一节 “音意双关”型 / 127

第二节 “半音译半意译”型 / 134

第三节 “音译附加表意成分”型 / 138

第六章 形译与形译词 / 144

第一节 形译词的性质和特点 / 144

第二节 形译词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 149

第七章 字母词 / 166

第一节 应运而生的字母词 / 166

第二节 字母词的范围、性质 / 169

第三节 字母词的价值和应用 / 179

第八章 外来词的汉化 / 187

第一节 外来词规范化与外来词汉化 / 187

第二节 外来词的汉化与汉化的外来词 / 192

第三节 语音汉化 / 196

第四节 语义汉化 / 208

第五节 语法形式汉化 / 218

第六节 书面词形的汉化 / 222

附录 英美姓名音译汉化示例分析 / 230

参考文献 / 286

后记 / 295

前言

—

外来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

从译借方式进行分类,可以分为音译词、意译词、音意兼译词(包括音意双关型、半音译半意译型、音译附加表意成分型)、形译词(即一般所讲的借形词)等类别。

从词源角度进行分类,外来词可以分为英语词源的(可可、咖啡、沙发、尼龙、巧克力、迪斯科),法语词源的(芭蕾舞、布尔乔亚、香槟、沙龙),俄语词源的(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布拉吉、拖拉机、康拜因、杜马),德语词源的(盖世太保、纳粹),日语词源的(经济、社会、干部、组合、右翼、左翼、协会),蒙语词源的(胡同、戈壁、喇嘛、搭裢),藏语词源的(糌粑、糌粑、哈达、金珠玛米),维吾尔语词源的(裕祥、阿匍、亚克西),朝鲜语词源的(金达莱、道拉基、阿妈尼),等等。

从语义上分类,可以分出哲学、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经济、工业、农业、军事、教育、艺术、民俗、生活等类别。

以时代来划分,可以分为上古外来词、中古外来词、近代外来词、现

代外来词。

此外,还可以根据外来词分布的领域来分类,根据社会分层进行分类,根据外来词分布的汉语社区进行分类,等等。

汉语外来词的研究迄今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代表性专著有:

1. 侧重于外来词与文化的关系的专题研究:罗常培(1950/1989)《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部,1950;语文出版社,1989);史有为(1991)《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吉林教育出版社);史有为(2004)《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上海辞书出版社,该著为1991年版著作的修订版)。

2. 侧重于领域外来词的专题研究:梁晓虹(1994)《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3. 侧重于外来词词源的专题研究:[意大利]马西尼(1997)《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黄河清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方龄贵(2001)《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①

4. 综论性著作:高名凯、刘正琰著《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史有为著《汉语外来词》(商务印书馆,2000)。

代表性词典有:

1. 刘正琰、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2. 岑麒祥编《汉语外来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0)。

至于外来词研究的专题论文,可谓琳琅满目,洋洋大观,无法一一

① 方龄贵(2001)虽名为“词典”,实际上是一部外来词考释著作。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下编包括“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补正”和“清代戏曲中的蒙古语”。据其“词目索引·说明”,共有见于古典戏曲的蒙古语词357条和波斯阿拉伯语词11条。这一统计数均含异体。所收录的外来词,只有“站、搭连(即‘搭裢’)、胡同、把势(又作‘把式’)、哈巴(狗)、匾食(或‘扁食’,即‘饺子’)”等少数词语见于现今汉语。

尽举。汉语词汇专著、教材也都或多或少地论及外来词。

值得介绍的是 1936 年上海天马书店出版、发行了胡行之编《外来语词典》，这是第一本汉语通用外来词的词典（相对于专科外来语词典而言）。该词典所收“外来语”包括“全译音”、“全译义”、“全输入”（即“形译词”）、“半音半义”“音义兼顾”5 种类型，共 2 762 个词（包括少数异形词），从内容上分为政治、经济、社会学社会运动、文学、哲学、国际、外交、物理、生理生物、心理、论理、伦理、宗教、教育、地理地质学、天文、体育、艺术、法学、数学、医学、军事、科学、普通名词等 24 类，“上自采取最古之输入，如‘葡萄’‘琵琶’‘单于’等词；中及印度佛教的流传，如‘菩萨’‘观世音’‘般若’‘盂兰盆’‘忏悔’等词；下则撷录最近的时语，如‘水鸟外交’‘新注入主义’‘蓝鹰运动’‘国家青年日’等”。该词典的一般体例是列出外语原词与外来词形成对照（佛教词语未能列出外语原词形式）并简略释义，具有简明扼要的特点；但也似有失之简单之处，如未能清楚地区分“全译义”与“全输入”，^①收词则有“过专门者不录”、“又过普通者亦不录”等限定，因此收词不够广泛。该词典虽然影响不大，但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②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1993 年 7 月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在当届会长姚德怀的主持下创办了词汇研究的专刊《词库建设通讯》（2002 年停刊），期间刊发了大量的外来词研究文章，除了对几百个词条进行词源考证以外，还从理论上重点讨论了“外来概念词”（包括音译的和意译的）的性质、范围，建立“汉语外来概念词词库”，有力地推动了汉语外来词的研究。^③

① 例如“景气”注明来自日语，但同样是来自日语的“日和见主义”没有注明词源：“[‘日和见主义’（社：政）即‘机会主义’或‘骑墙主义’，为看风使舵者的意思。”又如“入超”实际上属于“全输入”，即借自日语的形译词，但该词典仅仅列出了英语词源：“[‘入超’]Excess of import（经）‘输入超过’的简称。一国每年度货物输入额超过输出额，即叫做～。”

② 又，该词典收录的均为一般语词，没有收录一般地名、人名。个别的如“伊凡诺维基”，看似人名，其实是作为“普通名词”收录的：“俄罗斯人称好人儿为～”；“伊费基尼亚”（“希腊神话中的亚茄孟农的女儿”）则归入“文学”一类。

③ 关于汉语外来词研究的更多情况，参看史有为（2000）。

外来词研究有不同的角度和途径。本书侧重从语言文字本体的角度,讨论汉语外来词的性质和范围;以汉语吸收外来词的借词方式为纲,研究外来词音、义、形(文字记写之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揭示各类外来词的特点,并在学理基础上对外来词应用中的种种问题给予分析和评价;讨论外来词的汉化方式和汉化规律,分析外来词对汉语词汇面貌的影响,尤其关注外来词对汉语词语意义、词语结构的影响。^①

二

外来词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词汇(仅刘正琰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收录的日源外来词就达 890 个,其中绝大多数词语都活跃在当今社会交际中),促进了汉语的多音节化,增强了某些词语结构形式的能产性(如在日语的影响下,“名+动”构造出现了语义关系为“受事+动作”的结构形式,增强了“名+动”构造的能产性),增加了音译的新语素,增加了新汉字并促使汉语书面书写的多符号化,增加了新的语音形式,增加了异形同义词、同音词。本书指出:1. 汉语在吸收外来词时,常把多音节音译词减缩为单音节成分,但有另一种倾向迄今未能引起注意,即同样是为了符合汉语的词形特点或语音汉化的需要,外语词音译到汉语中,增加了音节;而为了表义的需要,在音译成分的前后附加汉语语素(如“酒吧”)的借词方式,也增加了汉语的复音节词。2.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音译可以产生新语素,意译也可以产生新语素。只是意译产生的新语素极少,音译则具有很大的能产性。3. 仿译的词语结构使汉

① 本书不以外来词词源研究为目标,词源的说明只是基于说明外来词音、义、形(字形)关系的需要。对于外来词的词源,本书参考刘正琰、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1984)甚多,此外也参考了各家著述和有关词典,书中都已尽可能地注明,尤其是有的例词需要说明其为外来词身份时,或对于比较少见的外来词,都特地注明了所见出处。但因不是以词源研究为目的,所以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一一说明所有外来词的所见出处,尤其是具体到某一外来词的“发明”者,更无可能一一确指。谨此说明。

语语法单位发生功能变化。例如受日语词语影响而产生的“受事+动作”的偏正结构,是“名动词”产生的重要动因。4. 使词的内部形式复杂化。在意译外语词语的影响下,一些汉语中本来没有的词语形式出现在汉语中,如“后工业化、后现代主义、城市中国、乡村中国、魅力中国”等。用汉语的实义语素意译外语词的词缀,使汉语词根与词缀的界限不清,因而模糊了汉语复合词与派生词的界限。5. 增加了词语理据的复杂性。用于音译的单字原有的意义往往在音译词词面上形成一层语义外壳,掩盖了音译词的实际意义,音译词的词义理据往往被歪曲或掩盖。6. 增加了汉语词语结构的复杂性。如来自日语的外来词“血吸虫”,是汉语词语结构形式中的异数。“取缔、积极、消极、天敷罗”等词,不能按照汉语的一般结构进行分析,其实属于单纯词。

一般的看法,意译词不属于外来词。这一观点无疑具有很强的依据,但是,值得进一步讨论。本书指出:1. 汉语在意译外来词时,所用的基本材料虽然是汉语的固有材料,却是用汉语中最小的结构单位——语素构造起来的,并不一定搬用汉语中原有的现成词语,意译也可能造成复音节单纯词,因此意译并不一定等于用汉语的材料造词。2. 意译词并不一定就是用汉语的材料按照汉语固有的结构形式创造的新词。一些意译词实际上是用汉语语素作为材料按照外语词的结构构造起来的。3. 通过意译进入汉语的外语成分,有的是真正的新成分,只是由于用汉字书写,掩盖了其外来成分的面目。4. 不联系外语原词的意义,意译的词语往往难有确切的理据。例如英语 game rules 的意译“游戏规则”与汉语原有的“游戏规则”在意义范围上不相等,在汉语原有的“游戏规则”的意义基础上无法确切理解意译 game rules 而形成的“游戏规则”的意义。5. 意译词往往有特定的外语文化的词源,如把“性感”这样的具有特定外语文化色彩的意译词看作汉语的固有成分,就很难有正确的理解和恰当的应用。6. 意译词的理据在外语,不从外来语源的角度往往不能说清楚词语的理据。7. 如果把语音条件作为鉴别外来词的

硬性标准,来自日语的形译词(即一般所讲的借形词)是不能看成外来词的。但是,包括“连音带义”说的主张者在内的学者都把来自日语的形译词归入外来词。可见,在考虑形译词是否外来词时,显然只是考虑了词源特征。这与“连音带义”说形成了双重标准。其实音译词与外语原词的语音联系只是语音上近似,因为音译词的语音其实是本族语言的语音形式,并不是外语词的实际读音,如果把“连音带义”作为给外来词定性的充要条件,并不能落到实处。如果真正落实“把外语词连音带义搬到本语言里来”,这样的词语只是外语词,而不是外来词。8. 普通话借用方言词,并不是“连音带义”地搬用,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借形(字形)借义不借音。既然可以把这样的词语称为方源词,把意译的词语归入“外来词”也是顺理成章的。9. 语言符号的价值(value)是“关系”而不是实体。某一语言符号的价值是由把这个符号与其他符号区别开来的关系所决定的。意译词进入汉语后,不但为汉语增添了具有新“价值”的语言符号,而且也改变了汉语原有词语的“价值”系统。从“价值”上看,把意译词看作外来词不是不可接受的,更重要的是从意译词对于汉语词语结构、词语面貌的影响来看,绝对不能忽视对意译词的研究。

鉴于上述考虑,本书指出:采取开放的态度看待外来词,可以把外来词定义为:在吸收外语词的过程中产生的表达源自外语词的意义的词语;由音译产生的与外语词在语音形式上相似的词语以及译音成分与汉语成分结合而成的词语是狭义的外来词,通过意译或形译的方式产生的词语是广义的外来词。从这一视野观察分析外来词,有助于分析意译对汉语的面貌产生的重要影响,揭示现代汉语词汇特点的由来,揭示现代汉语词语结构、词汇面貌的变异原因。

从汉语中的语素情况来看,绝大多数语素都是单音节的,单音节语素的绝对优势使人们习惯于每个字每个音节都有意义。这是汉语汉字认知图式(cognitive schema)的基本特点。因此,汉语倾向于采用意译的方式借用外来词。但是字面上有意义的外来词并不一定就是意译

词。如果外来词字面意义并不是词的实际意义,而是各个单字作为译音符号串联在一起时,各个单字本来的意义形成了有理组合,这类外来词就不是意译词。在习惯于字面上有意义的语言心理的支配下,汉语中出现了大量“谐音别解”的音译词。这类“谐音别解”的音译词与音译用字偏好使用形旁表示意义类属的情况一样,显示出汉语倾向于“意化”外来词的特点。汉语中各种类型的外来词,包括意译词、音译词、音意兼译词以及多数形译词,无不具有“意化”的要素和特点。因此与其说汉语倾向于意译,不如说汉语倾向于字面上有意义(意化)。这两种说法是不一样的,因为“意化”不等于“意译”。

在各种类型的外来词中,音译词是最为典型的外来词,因此是本书的研究重点。本书对于音译和音译词的性质、特点的分析,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学理认识:一是汉语汉字的认知图式,这就是赵元任(1979, 79页)所言,汉语语素单音节现象的压倒优势使人们倾向于把每个字每个音节都看作是有意义的,甚至“把没有意义的音节也看成有意义”。这一认知倾向是根深蒂固的,就这一认知倾向而言,古人今人都一样。也正是由于这一认知倾向,决定了汉语音译词词面形式的重要特点。二是汉字的性质和特点。汉字作为译音符号,必然会对音译词的性质、特点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必须作出基于汉字性质、特点的音译词分析。裘锡圭(1985)从汉字作为语言符号的符号和汉字所使用的符号两个层面讨论了汉字的性质和特点。基于这一分析看待汉语音译词,其性质、特点的分析就大大深入、细化了。三是从“重新分析”(reanalysis)看音译词音、义、形(字形)关系的变化。这三个方面的学理为音译和音译词的研究构建了广阔的空间。正是基于这三个方面学理认识的分析,构成了本书对于汉语音译词性质、特点进行研究的基本内容。从这一基础出发,音译作为借词手段的价值和音译词对于汉语词汇面貌的影响,以及音译的歧异与阻滞,自然也可以得到新的认识。

对于其他类型的外来词,本书各有侧重地进行了研究,包括:意译

和意译词的性质和范围,意译的价值和意译对汉语的影响,意译的歧异和阻滞;音意兼译(包括音意双关型、半音译半意译型、音译附加表意成分型)的外来词的类型、特点和结构分析;形译和形译词的性质、范围,形译词对汉语的影响;字母词的性质,字母词的价值和字母词的应用,等等。

本书分析了各类外来词对汉语词语意义、词语结构的影响,这方面的内容也形成了本书不同于以往外来词研究的重要特色。

本书对于外来词词例的分析,不以词源的追溯为目的,也不以展示外来词所反映的社会历史、社会文化现象为目的,而是力图展示语言文字本体意义上的丰富多彩的外来词现象。这也是基于语言文字本体意义上的外来词研究所应具有的特点。

当前外来词引进中有三个倾向、三个特点值得注意。三个倾向是:①意译“快餐化”。②音译“娱乐化”、“个性化”。③语码使用随意化。三个特点是:①汉语外来词在全球范围内大量涌现。②外来词歧异形式传播便捷。③电脑书写普及,基于拼音的文字输入增加了外来词同音异形的歧异。因此,必须注重外来词规范化工作。外来词规范化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行政”决策,但是行政决策需要考虑语用和语言文字层面的学理基础。外来词的规范化工作必须建立在学理基础上,充分发挥学理的“导向”作用。学理导向是语言文字应用导向的重要形式。学理导向的基础是外来词的汉化规律和汉化特点。外来词的汉化不等于外来词规范化,但是外来词的汉化是外来词规范化的重要学理基础。学理基础并不一定就能决定外来词的规范标准,但是,没有学理基础,“评价”就没有基础,“抉择”也就难以做到科学、理性。因此,本书把外来词的汉化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包括语音汉化、语义汉化、语法形式汉化和书面词形的汉化。

语音汉化包括音节数量的简化或繁化,以及音素及音节结构的汉语化。音节数量的简化是外来词语音汉化的表现,音节数量繁化同样

是外来词语音汉化的表现。在音素及音节结构的汉化方面,汉语音译外来词的基本方法有两种:①语音对应法,即根据语音对应规律进行谐音音译。②“汉读法”,即把外文字母按照汉语拼音字母的读音读,并转化为汉语的音节形式,尤其是结合外语词的音节切分和汉语译名的音节表达,而不管原文里读什么音,如 Dresden[¹drezdən]译作“德累斯顿”,音素组合 Dre-被分解汉化为“德”和“累”两个音节; Uganda [ju(:)'gændə](乌干达),首音 U[ju:]音译为“乌”。

对汉语音译外来词的对音规律已有不少研究,但从汉化的角度看,音译中最主要的是要考虑如何用汉语的音节切分外语词的音节结构。从语音对应规律来看,对应的音素在各自与其他音素组合以后,可能变得不对应了。例如英语的[h],一般来说是以汉语中的声母 h 与之对应的,但 Hill(人名)中的[h]要用声母 x 来对应(希尔),因为汉语普通话中没有[hi]这样的音素组合。因此,从汉语音节切分英语词的语音结构来看,最重要的是要考虑音节的对应。

在音节的对应方面,英语中一个音位学意义上的音节可能包含几个发音语音学意义上的音节,而汉语中音位学意义上的音节与发音语音学意义上的音节是基本一致的。在汉语音译外来词的过程中,音节对应主要应指发音语音学意义上的音节对应。因此,本书利用英美姓名音译实例,分析汉语在音译英语时的音节结构处理方法,并通过音译异名原因的分析,揭示了汉语音译外来词的各种方式、方法。这些方式、方法实际上也是外来词语音汉化的方式、方法。

外来词与外语原词的意义(包括附加色彩)相比,往往有一些差异。吸收外来词是为了汉语所用,外来词是为了因应汉语的语用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外来词与外语原词在意义上、附加色彩上的差别也是外来词语义汉化的表现。在语义汉化方面,最常见的是外来词比外语原词语义范围小,往往只具有外语原词多个义项中的一个义项,这是因为外来词是在对某一具体语境中的某个词语进行翻译中产生的,具体语境中

的外语原词的意义不可能是该词的全部意义。也有少数外来词比外语原词的语义范围大,分别表现为义项所指范围的扩大、新义项的增加等。引义独立成词是在译借外来词过程中发生的,包括引申原义、引借原义两种情况。外来词的附加色彩也往往不同于外语原词。基于汉语汉字的认知特点以及基于词结构的语义变化,本书分析了外来词的语义虚化、重新分析(reanalysis)等现象,这些都是汉语汉字的特点所造成的语义变化现象。本书还着重分析了外来词进入汉语后的词义竞争以及在汉语成分词义渗透下音译成分的语义汉化,并且指出,外来词语在语用过程中发生的意义“失真”(指与外语原词的意义有差别或词义范围发生变化)、“变义”(改变人们对于用以意译的词语原有意义的理解)、“变色”(改变、消解外来词所具有的外语文化色彩或改变用于意译的汉语词语原有的附加色彩),都属于外来词的词义汉化。本书还指出,外来词的语义、色彩在汉语交际中的调适过程,也是汉化的过程。意译本身自然就是汉化的过程,但意译也不等于汉化的全部。意译的词语往往带有外语原词的语义特点和附加色彩,因此也需要在使用中逐渐适应汉语的语义系统和社会文化语境。如“性感”一词,从汉语现阶段的语用情况看,正在逐渐改变色彩,但还不能说完成了这个过程。意译词在语用中逐步被汉语社会接受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外来词语义汉化的过程。

外来词语法形式的汉化包括“形态减省”和“词结构的汉化”。外来词抹去了外语原词的形态,这是一般的道理。本书着重指出,汉语中大多数复音词都是合成词,汉语词语结构的这一主要形式使得汉语吸收外来词时倾向于把外来复音词“重新分析”(reanalysis),分解出内部包含两个以上语素的合成词。音意双关的外来词,就是这类典型现象。力求音意双关的借词过程,实际上是把外来词语的结构进行“重新分析”的过程,也是对外来词语进行结构汉化的过程。半音译半意译和音译附加表意成分这样两种借用外来词的方式,本身就是汉化外来词的

重要手段。

外来词在词形方面的汉化分为“显性汉化”和“隐性汉化”。显性汉化的方式有：利用音译用字的原有意义形成字面上有意义的组合；利用汉字字符的表意性增加语义显著度；用汉语语素增加语义显著度；文字改换，主要指把日语词的书写词形转换为汉语的书写词形，其中主要是用字的改换。隐性汉化指的是词形确定的外来词逐渐得到普遍的使用或逐渐地普遍化。这是从社会使用的普遍性来判断。社会使用的普遍性是外来词被接受程度的反映。社会使用的普遍性越大，汉化的程度自然就越高。社会使用的普遍性是个隐性条件，所以外来词使用上的普遍性属于外来词的隐性汉化。

以上概略地介绍了本研究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观点，并不全面，只是作为内容索引，以便一览概要。衷心期待读者和同行专家的批评。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外来词是文化接触、语言接触的产物

外来词是在各种语言中都普遍存在的词汇成分。不同语言相互吸收外来词主要是在文化接触、语言接触过程中发生的。英语在历史上曾经和拉丁语、希腊语、斯堪的那维亚语、法语、凯尔特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德语、荷兰语、俄语、匈牙利语、波兰语、汉语、日语等语言发生过接触。在语言接触中,各种语言都从英语中吸收了大量词语,英语也从各种语言中吸收了大量词语,现代英语中的外来词已占词语总量的50%以上。近年来英语中的外来词语越来越多,英国媒体2006年4月16日报道,在前一年新增英文词语约有两万,其中中式英语(Chinglish)达到4000条。此外,新增英语词语中还有不少来自西班牙语、日本英语、印度英语,共达60多种。^①

汉语在历史发展中,与许多语言都发生过接触,如匈奴语、突厥语、鲜卑语、波斯语、梵语、蒙古语、维吾尔语、藏语、满语、朝鲜语、壮语、马来语、阿拉伯语、英语、法语、俄语、德语、日语、越南语……汉语从这些语言中吸收了不少词语,如来自蒙古语的语词“胡同、戈壁、站、蘑菇、库伦(圆形的圈子、围墙、院子、寺院)、敖包、阿尔泰(山名)”等(一些来自蒙古语的成分与汉语成分结合成词,如“好歹”的“歹”,“哈巴狗”的“哈巴”);来自满语的语词“萨其马、白(‘平白地、白白地’)^②、掳、乌拉

① 《4000个英语新词来自中文》,《环球时报》2006年4月18日第5版。

② 刘正琰等(1984, 33页)。一说满语的baibi其实也是来自汉语的“白”。但是,似不宜据此而否定来自满语的“白”是外来词。犹如“台风”来自对英语typhoon的音译,而英语的typhoon又是来自对粤方言“大风”的音译,但仍应把“台风”看作英语源流的外来词。

(草)、妞、啰嗦^①”等；来自藏语的“糌粑、氍毹、哈达、喇嘛、锅庄(舞)”，等；来自朝鲜语的“判索里(一种说唱表演艺术)、金达莱(杜鹃花)、阿妈尼(妈妈)、道拉基(桔梗)”；来自梵语的“密陀僧(mudarasingu 的音译，一种无机化合物)、苹(果)、补骨脂”；来自阿拉伯语的“木乃伊、祖母绿”，来自波斯语的“珰琅”，来自尼泊尔语的“波稜(菜)/菠(菜)”，来自马来-印尼语的“槟榔、芦荟、榴梿”，来自英语的“沙发、马达、扑克”等，……据史有为(2000)“第五章”的统计，刘正琰等(1984)所收外来词的语源共有 84 种语言，其中有 50 个词条以上的语言有 15 种，来自英语的外来词最多。

在不同历史时期，汉外民族接触、语言接触的情况不同，因而汉语吸收外来词的主要语源不同。秦汉时代汉语中有不少来自西域异族语言的词语成分，例如来自匈奴语的“骆驼”(初作“橐驼、橐驼”)、“猩猩”(初作“生生、狴狴”)、“师比”(也作“犀比”，一种上有猛兽貔形象的带钩)、“胡”(匈奴族的自称)、“葡萄”(汉代写作“蒲陶、蒲萄”)、“径路”(又作“径吕”，一种宽刃的宝刀)、“胭脂”(汉代也写作“焉支、燕支、撚支”等)、“箛”(也作“葭”，又作“箛、吹鞭、胡箛”，一种笛类吹管乐器)、“琵琶”(曾作“批把、枇杷”)、“单于”(匈奴最高首领的称号)、“阏氏”(匈奴王妻妾的称号)等，来自梵语的“狻猊”(也作“狻猊”，狮子)，来自古伊兰语的“苜蓿”(也作“目宿”)、“安石榴”(后省称“石榴”)，来自突厥语或古波斯语的“琥珀”(汉代作“虎魄”，古代松柏树脂的化石)，来自突厥语的“鼙篥”(又作“屠篥”，一种簧管乐器)，来自梵语的“琉璃”(也作“璧琉璃、璧、流离”，宝石名)，来自爪哇语的“仁频”(长绿乔木。唐代以后称“宾粮、槟榔”)。当时还出现了一批带“胡”字的描写词，如“胡豆、胡麻、胡饼、胡姬(西域出生的少女)”等。此外，还有一些疑为非华夏族语言的语词，如《尔雅·释天》中的岁阳名“阏逢、旃蒙、柔兆、强圉、著雍、屠

① 关于“妞、啰嗦”来自满语，见赵杰(2000，150页)。

维、上章、重光、玄默、昭阳”，太岁年名“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敦牂、协洽、涒滩、作噩、阉茂、大渊献、困敦、赤奋若”等。^①

佛教自汉代开始传入中国，很快为社会大众所接受，来自梵文或巴利文的音译佛教用语随之为汉语所吸收，其中既有一些佛教用语只通行于钻研佛教经典的少数人中间，如“禅（禅那，义为‘静虑’义）、偈（偈陀，义为‘颂’）、般若（义为‘智慧’）、菩提（义为‘觉’）、悉檀（义为‘成就’）、阇梨（义为‘轨范’）、摩尼（义为‘宝珠’）、摩诃（义为‘大、多、胜’）、优婆塞（信士）、优婆夷（信女）”，也有一些佛教用语进入全民语言，如“佛、塔、僧、尼、和尚、菩萨、罗汉、阎罗、地狱”；有的佛教词语改变词形融入方言，如“婆姨”。^②此外，一些意译的佛教词语悄然融入汉语的词汇系统，以至于使人不能觉察其外来面貌，如“世界、现在、因果、结果、庄严、法宝、圆满”；一些佛教词语成分与汉语成分结合成词，如“念书”的“念”来自“念佛、念经”的“念”，“缘分、因缘、姻缘”的“缘”来自佛经音译。^③

近代，由于西方传教士和商人陆续来到中国，汉语中出现了一批或音译或意译的来自西洋语言的词语，如“鸦片（opium）、火轮舟、火轮车、公司、量天尺、千里镜、螺丝钉、哔叽（beige）、银馆”等。而从19世纪中叶开始，包括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西学名著的翻译，给汉语带来了西洋语言的许多词语，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欧美文化、哲学社会科学思潮以及科学技术等越来越多地为中国社会所吸收，一大批欧美语言的词语也随之进入汉语，如来自英语的“咖啡、可可、吉普（车）、白兰地、威士

① 徐朝华(2003, 182—187页)。

② 王艾录、富珍(2003, 206页)：“婆姨：初作‘优婆夷’，为梵语音译词。佛教有‘四方之众’，即在家男女二众和出家男女二众。男女二众又有二：出家男众称‘比丘’（和尚），出家女众称‘比丘尼’（尼姑）。在家男女二众又分：在家男众称‘优婆塞’，在家女众称‘优婆夷’。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佛教正式传入我国开始，黄土高原一直是佛教文化最昌盛的地区，这里的妇女都被称为‘优婆夷’。简称‘婆夷’，后作‘婆姨’。”

③ 参王力(1980, 中册)，梁晓虹(1994)。

忌、的确良、呲叽”，来自俄语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布拉吉(连衣裙)、裂粑(面包)、卢布、杜马(议会)”等，来自法语的“沙龙、香槟(酒)、干邑(Cognac 的方言音译)^①、芭蕾(舞)、贝雷(帽)、蒙太奇(电影艺术用语)、“剪辑、组合”义)、布尔乔亚(小资产阶级)、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苦迭打(政变)”，来自德语的“奥伏赫变(义为‘扬弃’)、纳粹”，等等。从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至 20 世纪上半叶，大批日源外来词进入汉语，如“干部、积极、消极、俱乐部、景气、取缔、取消、引渡、警察、财阀、财团、主观、客观、特权、特务、议院、仲裁、左翼”等。改革开放以来，外来词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涌入汉语。正是在吸收各种语言的语词成分的过程中，汉语词汇日益丰富、不断发展。虽然有一种估计认为外来词在汉语词汇中所占比例还不到 1%，^②但若考虑意译词等，数量就相当可观了。仅刘正琰等(1984)收录的外来词就达 1 万余则(不包括意译词)，其中借自日语的词语就达到 890 个(实际上还有一些日源词语未收录)，虽然日源外来词中有少数词语当今已成死词(如“苍铅、腓脏、氛围气、水素”等)，不仅在社会生活中不用，而且连最大型的通用词典也不收录，但是绝大多数日源外来词迄今仍活跃在汉语交际中，并且是极其常用的词语。

历史上随着民族接触、文化交流，汉语吸收了许多语言的语词，也对许多语言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国内其他民族的语言受到了汉语的重大影响，而且中国周边国家的语言，尤其是东亚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语言，也从汉语中吸收了大量词语。

① Cognac 今亦多见译为“科涅克”，科涅克是法国夏朗德省的一座古镇，用这一地区种植的葡萄并在当地发酵、蒸馏和贮存所得到的白兰地，称为科涅克，这是一个以地名命名的酒名(犹如中国茅台酒以产地贵州茅台命名一样)。至于“干邑”源自何种方言的音译，广州话“干邑”的读音[kənjik]似可参考(比较：Cognac 的读音[kounjek])。又，本书中方言词语注音参考了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1989)的注音，但因汉外语音对比主要是音段结构的对比，所以一般只注音段形式，不标调。

② 曹聪孙(1995)。

日语中有大量来自汉语的词语。据野村雅昭(2004),2002 年日本小学馆出版的《新选国语词典》(第 8 版)卷末统计数字显示,在该词典所收日语词汇中,“和语”(日语中原有的词语和利用原有词语而构造起来的词语)占 33.8%，“汉语”(借自汉语的词语)占 49.1%，“外来语”(用片假名标记,主要借自欧美语言)占 8.8%，“混合语”(由日语成分与外来语言成分组合而成的词语)占 8.3%。据野村雅昭(2004)的统计,该词典中的汉语词和包括汉语成分的“混合语”(在“混合语”中,包含汉语成分的达 97%之多)加起来共占所收词语的 57%左右。

关于朝鲜语/韩语中的汉语借词所占比例,周荐(1997)进行过分析:“前两三年《参考消息》报上曾披露过,有外籍人士著文估计说现代高丽语^①中有 60%—80%的词语单位来自汉语。从李相殷氏的《汉韩大字典》所收条目上看,这一说法并非夸张之词,因为该字典 80%以上的汉语条目都是直接用朝鲜半岛上的特有文字比照着摹音转写下来的。”

至于越南语中借自汉语的词语,则占越南语全部词汇的 70%左右。^②

从这些借词现象可以看出历史上中国文化对这些民族、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随着当今中国社会的开放、发展,汉语逐渐走向世界,汉外文化接触、语言接触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深入,大量的汉语语词为异族语言所吸收,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这些语言的面貌,^③同时,汉语也从英语等语言中吸收了越来越多的词语,从而丰富了汉语的词汇。

① 指朝鲜语/韩语。该文主张用“高丽语”统称实际上是同一种语言的“朝鲜语/韩语”。参见本书第三章第六节。

② 据武氏春蓉(2002)。

③ “中国约有 2.5 亿民众学习英语,加上日益上升的全球影响力,意味着中国人每天都在制造英文新词。根据报告,逐字翻译的中式英语‘很久不见’(Long time no see),还有从广东话吃点点心的‘饮茶’直译过来的 drink tea 等,现已成为标准的英文词组。”(《中国式英文正在改变英语》,《环球时报》2007 年 1 月 15 日第 6 版)

语言接触的实质是文化接触。语言接触虽然有外来军事侵略、军事占领导致的强迫接触,但更多的还是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科学、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正常交流过程中发生的接触。美国环球语言监察机构主席帕亚克就全球英语词汇数量急剧增加的新情况发表谈话说,当今英语词汇来源的多元化证明世界不同文化融合速度正在加快。^①文化接触、文化融合促进语言接触和语词借用,反之,如果两种文化发生冲突,相互排斥,语言接触、语词借用也随之受阻。这方面有一个现实的例子。

西方语言和文化对伊朗有很多影响,伊朗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使用一些来自西方语言的词语。但是,伊朗总统内贾德于2006年3月颁布新政令,要求清除波斯语中的西方外来词汇,波斯语中所有西方词汇都应由波斯语言和文学学会翻译的对应词语代替。所有政府部门、媒体、新闻出版机构和学校都须使用由官方语言监督机构推荐的波斯语替代词汇,特别是在书面文字中。伊朗波斯语言和文学学会表示,这一政令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近年来政府致力于把英语词汇从波斯语中予以消除的努力之一。伊朗的语言学术研究机构已经为2000多外来词语找到了波斯语的替代词,例如, fax(传真)由“远距离书写”代替, chat(聊天)用“短的谈话”代替, helicopter(直升机)用波斯语表达就是“旋转的翅膀”,来自意大利语的 pizza(比萨饼)则变成了“弹性面包片”,等等。伊朗历史上首次清除外来词语是在前国王巴列维在位时期。当时,巴列维命令波斯语言和文学学会为来自阿拉伯语的词语找到波斯语的替代词汇。但是,此次官方认为需要替换的外来词语中,绝大多数都来自西方语言,而需要替换的来自阿拉伯语的词语则几乎没有。伊朗官方的解释是,因为阿拉伯语是《古兰经》的语言。^②由此可见,伊朗清除西方外来词语,其根本原因在于排斥西方文化。

① 《4000个英语新词来自中文》,《环球时报》2006年4月18日第5版。

② 《伊朗清除西方外来词》,《环球时报》2006年7月31日第5版。

第二节 外来词对汉语汉字的影响

李葆嘉(2003,自序)认为:一部中国语言史就是一部东亚民族诸语言接触互动史,一部华夏汉语发展史就是一部华夏汉语同化异化史,一部汉语方言史就是汉民族不断迁徙和周边民族汉语化的融合变迁史。在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过程中,外族语言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马西尼(1997)对 1840—1898 年间汉语中的外来词词源进行研究,冠以“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之名,并且在“作者原著序”中说:“现代汉语词汇不仅仅是 20 世纪初那场文学运动中语言实验的结果,而且事实上它的发展还得益于汉语的传统基础以及 19 世纪新词的作用。”所谓“19 世纪新词”,指的是外来词。王力(1980, 525 页)讨论鸦片战争以后汉语词汇的发展,径直把现代汉语新词的产生归于汉语所受外来影响的范围:“现代汉语新词的产生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尽量利用意译;第二个特点是尽量利用日本译名。”由此可见,外来词对汉语的词汇面貌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综观外来词对汉语词汇面貌和汉字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词汇

王力(1979)说:“拿现代书报上的文章用语和鸦片战争以前的文章用语相比较,外来的词语恐怕占一半以上;和‘五四’时代的文章用语相比较,恐怕也占四分之一以上。谁还能觉察到呢?它们和汉语原有的词汇已经水乳交融了。”

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所指称的事物、行为、概念,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高名凯、刘正琰(1958, 114—138 页)所统计的外来词类别分布来看,主要是有关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词语:政治 115 条;文学艺术 94 条;币制 83 条;哲学 75 条;经济 73 条;度量衡 73

条;化学 64 条;文化、教育、出版、体育 53 条;社会 49 条;医药 48 条;宗教 46 条;物理 42 条;军事 41 条;法律 39 条;心理 26 条;生物(动植物) 24 条;机器 21 条;日用品 19 条;交通 18 条;建筑、房屋、住所 15 条;数学 14 条;纺织 13 条;衣着、服饰 12 条;地质、地理 10 条;生理 10 条;外交 7 条;语言 5 条;其他 132 条。(共 1 221 条)

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项中,涉及日常生活的寥寥无几,大多数词条都与政治及社会生活有关。

史有为(2000, 161—163 页)对刘正琰等(1984)所收外来词从语义类别上进行了统计分析,统计的外来词总数为 7 704 条,共分 14 个类别,统计结论是:“汉语社群最关心、需要或比较关心、需要的是这些方面:政治、广义的经济(包括工业)、广义的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卫生)、生活和生物自然。”

在史有为(2000)的统计中,生活类的有 977 条,在总数为 7 704 条的外来词中所占比例约为 12.68%。与高名凯、刘正琰(1958)的统计相比(两者的语义类别划分不太相同,外来词词目的总数量也很悬殊),生活类外来词似乎所占比例更大一些。

但是,不能把史有为(2000)的统计与高名凯、刘正琰(1958)的统计相比而得出结论说,刘正琰等(1984)生活类外来词所占比例大表明外来影响对当代社会的日常生活有进一步的渗透和扩大。虽然高名凯、刘正琰(1958)与刘正琰等(1984)有时间先后的关系,但是刘正琰等(1984)所收外来词包括了自古至今的外来词。

从当今外来词的分布情况来看,外来词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进一步扩大,包括政治、军事、国际关系、经济、哲学、科技、音乐、美术、文学、体育、娱乐、饮食、穿着,等等,几乎无所不在。^①外来词极大地丰富了汉

① 从外来词各种语义类别的分布比例看当代社会生活所受外来影响,有待于编纂新的外来词词典基础上的统计分析。需要指出的,这一类分析所依据的外来词应当包括译词。因此,这是一项困难的工作。

语词汇,促进了汉语词汇的发展,改变了汉语词汇的面貌。

二、促进汉语语词的多音节化

印欧语的词大多是多音节形式,因而采取全音译而形成的外来词大多数是多音节的。多音节音译词增加了汉语中的复音节词。为了符合汉语词语的词形特点,或便于作为构词成分参与构造词语,多音节音译词常常减缩为单音节成分,这一点各种著述都已论及。但有另一种倾向迄今未能引起注意,即同样是为了符合汉语的词形特点或语音汉化的需要,外语词音译到汉语中,增加了音节。先以人名的音译为例:

1. 单音节人名到了汉语中变成了复音节人名。单音节外语人名在汉语中大都要分化为两个音节,例如 Boone[bu:n]在汉语中的音译形式分化为 bu 和 en 两个音节(布恩);Darnley 中有两个音节,但汉语音译的译名分化为三个音节“达恩利”。

2. 由于用语音形式上是一个音节的汉字作为音译符号,外语人名的一个音素在汉语中也往往汉化为一个独立的音节,这就增加了音节。如 Kurt(库尔特),不仅 Kur 分化为两个音节(库尔),连音缀-t 也汉化为一个独立的音节 tè(特)。

3. 为了语音上的汉化,外语词中不独立标记音素的一个字母甚至也汉化为一个独立的音节。例如 Truman(杜鲁门),外语原名开头的两个字母 Tr-只标记一个音素[tr-],但在音译中按照字母的写法,把字母 T(不独立标记音素,换句话说,根本不标记音素)独立表示为一个音节,字母 r 按照汉读法^①变成辅音[r],与之后的 u 结合成[ru],并汉化成汉语的 lu 音节。原名只有两个音节,译名是三个音节,与原名相比,译名增加了音节。

这些方法不仅用于人名的音译,也用于国名、地名和一般语词的音

^① 请参第八章。

译,例如:Trinidad and Tobago,特立尼达和多巴哥;Detroit[də'troit],底特律;gene[dʒi:n],基因;Benz,奔驰;tank,坦克;clone,克隆。

吸收外来词促进了汉语语词向复音节化发展,不仅仅是音译过程中的音节对应方面的原因。由于音译词只是记录外语词的语音形式,这与汉语汉字在字面上可以看出词义的习惯不符,因此音译外语词往往附加汉语语素,以指明词的意义类属,这也促进了汉语语词的复音节化,如“卡(car)+车→卡车,啤(beer)+酒→啤酒”。复音节音译词附加汉语语素之后,增加了三个以上的音节数量的词语。

三音节词在“五四”之前就已很多,“五四”以后,三音节词骤增,原有的三音节词语也逐渐词化。^①在这方面,音译成分附加汉语语素构成的新词对于促进汉语词语多音节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关于汉语词汇逐渐向复音节化发展的原因,马西尼(1997, 145页)认为“来自西方语言的那些借词,是促使汉语向多音节化方向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王力(1980, 343页)则认为复音节化的原因一是语音简化,二是受外语影响;同时认为:“即使语音不简化,也不吸收外来词,汉语也会逐渐走上复音化的道路的,因为这是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之一。不过,由于有了这两个重要因素,汉语复音化的发展速度更快了。”

三、增加了新语素,推动了汉语成分的语义发展

吕叔湘(1963)指出:“北方话的语音面貌在最近几百年里并没有多大变化,可是双音词的增加以近百年为最甚,而且大部分是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有关的所谓‘新名词’,可见同音字在现代主要是起消极限制的作用,就是说,要创造新的单音词是极其困难的了。”

现代汉语中造词的主要方式是合成或缩略,即用两个以上的语素

^① 刁晏斌(2006, 15页)。

组合成词,或把词组缩略以后构成新词。除了用既有普通话音节记录方言成分从而创造了新词以外,^①很难通过既有音节自身的变化或构造新音节来创造新词的语音形式。汉语普通话的基本音节数量只有430多个,加上声调的变化也只有1370多个,音节的负担很重,同音现象很严重,因而很难利用既有音节创造新的语素。但通过音译,汉语中出现了许多新的语素,包括单音节和复音节语素:

单音节语素:

吧(bar)、秀(show)、酷(cool)、磅(pound)、卡₁(car)、卡₂(card)、操(满)、菠(尼泊尔)、苹(梵)……

复音节语素:

沙发(sofa)、吉普(jeep)、咖啡(coffee)、的士(taxi)、巴士(bus)、杜马(Дума)、巧克力(chocolate)、迪斯科(disco)、歇斯底里(hysteria)、奥林匹克(Olympic)、阿司匹林(aspirin)、卡布奇诺(Cappuccino,奶沫咖啡)、布尔什维克(большевик)……

这些新语素,除了少数名词性单音节语素只能与汉语成分组合成词(如“菠、苹、卡₁”)以外,大都可以独立成词。

音译而来的复音节语素,有的减少音节数量后形成单音节语素,如:的士(taxi)→的(打的、面的、摩的)、巴士(bus)→巴(大巴、中巴)、迪斯科(disco)→迪(蹦迪、迪厅),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音译可以增加新语素,意译也可以增加新语素。如意译英语 dry 而产生的汉语语素“干”(干啤、干红葡萄酒、干白葡萄酒),意译英语 Watergate case 中的 gate 而产生的“门”(“丑闻”义,如“情报门、伊朗门”等),就是汉语中原来所没有的新语素。只是意译产生的新语素极少,音译则具有很大的能产性。

形译也为汉语增加了新的复音节语素。通过借用书写形式的方式

① 如用“撮”(cuō,撮一顿)记录而逐渐普遍化使用的北京口语词。

从日语中借来的词语,如“积极、消极、景气、取缔、取消”等,日语原词是用汉字写成的日语固有词,这样的形译词表面上看是有结构的,其实无法分解。汉语中的这类形译词其实都是复音节语素。^①

借用外来词不仅为汉语增添了新的语言成分,也使汉语原有成分的语义得到了发展。特别是意译,使汉语原有语言单位(包括语素、词)增加了义项,推动了汉语语言单位的语义发展。^②

四、增强了某些词语结构的能产性

“名+动”构造的词语自古有之,但是在吸收日语词语的影响下有了显著的增加。其中最重要的是语义关系为“受事+动作”的偏正结构(如“理论学习、汉语研究、食品储藏、汽车修理、废品回收”等)。从句法关系看,汉语中语义关系为“受事+动作”的“名+动”构造不同于日语“宾+动”构造的动宾结构,而是偏正结构,但这类“受事+动作”的偏正结构是受日语的影响而形成的。“名动词”的形成也与这一结构密切相关。^③

英语中有一类表示使役关系的派生词,词结构中有 en-、-en、-fy (-ify)、-ize(-ise)等词缀。这些词缀构成的派生词的意义有些在汉语中可以找到对应的分析型表达法,有些却找不到。在某些不能使用词类转化的方法(如“使丰富→丰富”)的情况下,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在形容词后边加“化”来表达这种使役关系。^④这种方法在汉语词语结构中的类推,不仅在形容词性成分后面可以加“化”,而且也产生了一大批在名词性成分后加“化”而构成的词语,如“机械化、中国化、电气化、语法化、现代化、戏剧化、名词化、双音节化、离子化、妖魔化、情绪化、戏剧化”等等。这样的词语结构形式具有很强的能产性,一般辞书根本不来

① 参第六章第二节。

② 参第四章第三节。

③ 参第六章第二节。

④ 许余龙(1992, 143页)。

及或无法尽收这类词语。这类词语的功能也很复杂,都可以独立作为动词用,但大多数前置于其他名词性词语时,只能做定语,个别的可以与后续词语构成使役关系,如“妖魔化中国”,意即“把中国妖魔化”。诸如此类对译英语派生词而产生的词语结构形式,具有很强的能产性。

五、使词的内部形式复杂化

在意译外语词语的影响下,许多汉语中本没有的词语内部形式出现在汉语中,“后工业化、后现代主义、文化中国、魅力中国、城市中国、乡村中国”之类的词语的内部形式,^①是在对外语词(包括词组)的仿译过程中产生的。意译外来词语的结果,使得汉语词语的内部形式趋于复杂化。

汉语中领属关系的短语,语义组合形式是“领属成分 + 从属成分”,而仿译英语而形成的名词短语,如“助理国务卿、助理导演、助理制片”之类,其语义组合形式为“从属职位 + 领属职位”。这类形式的词语,有的已经转变为限制关系的偏正结构,如“助理研究员”之类;而“助理导演、助理制片、助理国务卿、助理教练”之类,则形成了汉语前所未有的“从属成分 + 领属成分”的语义组合形式。^②

六、增加了词语理据的复杂性

音译是把语素汉字作为音节符号来使用,但用于音译的单字的原有意义往往在音译词词面上形成一层语义外壳,掩盖了音译词的实际意义,这就使得音译词字面意义与音译词的实际意义不相符合,导致音译词的词义理据被歪曲或掩盖。如“密陀僧(梵语mudarasingu的音译,一种无机化合物)、爱斯不难读(Esperanto的音译,世界语)”等音译词的字面意义与词义就是无关的。至于沿用已久的音译词,则需要深入

① 词的内部形式指“词义在词中的表现方式”。见刘叔新(1985)。

② 参第四章第四节。

考察词源,才能还其本来面目。如“沐猴”的“沐”的得名之由,望文生义,有猴子喜欢像沐浴那样洗脸之说。据张永言(1988)考证,“沐”实为藏缅语成分 muk/mjuk(猴)的音译。^①

“马车”是马拉的车,但“马路”并不是走马的路。“马路”之“马”其实是英语人名“约翰·马卡丹”中的一个音节。这种新型道路最初为18世纪英格兰人约翰·马卡丹发明,故名“马卡丹路”,简称“马路”。“皮猴儿”之“猴”是古英语 cowl(有风帽的大衣)。“牡丹江”的“牡丹”为满语“穆丹”的音转。^②“锐舞”的字面意义看起来是指一种舞蹈,其实是一种音乐。“锐舞”两个字是 rave music 中的 rave 的音译, rave 的原义是“狂骂、叫嚷、咆哮、呼啸”等义。在“锐舞”音乐中当然可以舞蹈,但所谓“锐舞”的意义并非字面意义,而只是 rave 的音译。^③ 这些词的字面意义都歪曲了词的真实理据,但在交际中每每可见把音译词音译用字的字面意义当作词的真实理据的。如“三文鱼”的“三文”是英语 salmon 的粤方言口音音译,有人说这种鱼身上有三条纹,所以得名“三文鱼”。这就属于望文生义,把音译用字的字面意义当作了词的理据。

周振鹤、游汝杰(2006, 140页)指出,苏南、浙北、赣北、皖西一带的地名“句容、无锡、余干、余姚、乌程、芜湖”,其中的冠首字“句、芜、无、余、乌”等可以确知是古越语的发语词,但是整个地名的意义已不可考。其中有的地名后世不知其所由来,往往望文生义,妄加解释,如以为“无锡”其地本来产锡,至于汉代已采尽,故名。这就上了汉字的当,曲解了地名的命名理据。

七、增加了汉语词语结构的复杂性

来自日语的外来词“血吸虫、宅急送”,其内部结构不同于汉语词语

① 这类构词现象的词例还有“香颂歌曲、湄南河”等。见第三章第六节。

② 这几个词的词源解释见王艾录、司富珍(2002, 205—207页)。

③ 杨锡彭(2003c, 71页)。

的既有结构,使汉语的词语结构形式出现异数。此外,日语源流的外来词中,有一类是不能按照汉语词语的一般结构来进行分析的单纯词,也须引起注意。

一般来说,汉语中的复音单纯词主要是联绵词、拟声词(如“哗啦、劈啪、哧溜、咕咚”),音译复音外来词当然也是复音单纯词。来自日语的外来词,音译的(如“榻榻米”之类)自然属于单纯词,而原词是利用古代汉语的词语赋予新的含义而形成的词语,以及利用两个汉字构成的双音词,其意义按照汉字的意义也是讲得通的,都可以划归合成词。但是还有一类形译词(即“借形词”),日语原词是用汉字记写的日语固有词,如“取缔、积极、消极、天敷罗(加面粉炸制的荤素食品)”等,按照汉语汉字的字面意义来理解,格格不入。其实汉语中这些形译词中的单字都没有独立的意义,换句话说,这些词语其实都是复音单纯词。但是各种专著、教科书都没有把这类形译词列入复音单纯词。这类词语貌似合成词,但又不能按照汉语的既有结构方式进行分析,给汉语词语的结构分析增加了复杂性。

在意译英语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类乎词缀的构词成分,如“反-(anti-)、后-(post-)、超-(super-)、前-(pre-、ex-)、可-(英语成分为后缀:-able、-ible)、-主义(-ism)、-学(-ics)”等,^①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在大量增加了附着性成分与中心成分结合而成的词语的同时,也使汉语复合词与派生词的界限愈加模糊。究其原因,在于用来译记英语词缀的汉语成分都是实义成分,也就是实语素。这样的语素参与构成的词语,一方面与汉语中复合词或词组的内部形式有异,用汉语既有复合词或词组的语义结构来比照,往往显得不尽相同(如“超速度、超水平、

① “反、后、超、前、可”等本来都是汉语中的固有成分,汉语中本来也有这些成分参与构成的词语,但是在意译外语词的情况下,这类成分的语义、功能都发生了一些变化,由这些成分参与构成的词语也大量增加。至于说“反、后、超、前、可”等何以见得分别是“anti-、post-、super-、pre-、-able 或 -ible”的意译,可以作为证据的事实是,用汉语写成的英语语法著作、词汇著作都是如此对译的。

超文本、后现代主义、后冷战^①之类),因而不得不把这样的成分往词缀上“靠”;另一方面,这样的成分与“-子、-儿、-头、老-、阿-”等意义虚化的附加性构词成分不同,都有一定的实义。这就形成了介于词根与词缀之间的成分——类词缀,导致复合词与派生词的界限不清。

杨锡彭(2003b)讨论了汉语中词根与词缀的区分问题,指出有关标准并不能把汉语的词根和词缀清楚地区别开来。这一问题如果从来源看,原因就比较清楚了。二十多年来,现代汉语的研究提倡打通共时与历时、普通话与方言的研究,以古证今,以方(方言)证普(普通话),取得了卓著的成绩,但对于汉语所受外来影响的关注还是远远不够的。“类词缀”的问题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八、增加了新汉字并促使汉语书面书写多符号化

为了记录音译的外来词,汉语创造了一些新字,其中化学元素名最多,如“氘、氚、氦、氨、氟、铀、钍、铀、钍、钍、钍、钍、钍、钍、钍”等。此外,还吸收了一些外国汉字,如日语汉字“腺、吨、耗(毫米)、秆(即公里或千米)、糰(厘米)、甞”(其中“耗、秆、糰、甞”现已为规范所淘汰),来自越南的汉字“枷”(zhī,地名用字,槟榔,越南地名)、“瀼”(xù,地名用字,瀼仕,越南地名)等,来自柬埔寨的汉字“喷吓”(Gòngbù,喷吓,柬埔寨地名),来自泰国的汉字“呵”(kē,呵叻,泰国地名),等等。^②一般只是专字专用,用于记写专名。

随着外来语言在汉语中的影响日益扩大,汉语中的字母词越来越多,汉语书面交际中的书写符号也越来越复杂化。不仅有完全用英文字母书写的外语词,而且有英文字母书写的外语成分与汉语成分混合形成的词语(如“X光、IBM公司、VCD机”之类)。意译词、音译词、字

① 例:“进入后冷战时期以来,世界各国都在经历着新的变局。日本也不例外。”(《日本进入大转型时期》,《环球时报》2006年12月8日第11版)

② 参胡新化(1999)。

母词的交互使用,使得汉语的书面书写符号呈现出复杂化的局面(如“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字母词的使用展示了语言交际中纷繁复杂的符号现象。

九、增加了异形词、同义词、同音词

由于不同的音译造成的异形词,如“爱滋(病)”(台湾地区)、“艾滋(病)”(大陆)、“爱之(病)”(新加坡),形成异形词。目前在中国大陆范围内产生的异形词比较容易规范,但涉及不同言语社区的异形词,则难以统一形式,需要通过不同言语社区的相互沟通才能避免交际障碍。

吸收外语词造成与汉语中原有的词语形成的同义词,如音译的“巴士、的士”与汉语中原有的“公共汽车、出租汽车”。

由于用汉字作为音译外语词的音节符号,既有的汉字记录的语言单位与音译外来语词成分形成同音关系,是汉语同音词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借自蒙古语的“站”(jam)与汉语中原有的“站”、英语 meter 的音译“米”与汉语原有表示“稻米”的“米”形成同音关系,而用同一个汉字记录的不同外来词之间也往往形成同音关系,如“卡车、卡片、卡路里、卡式录音机”中的“卡”字,其实分别是英语词 car、card、calorie、cassette 的音译。^①此类例子不胜枚举,由于用于音译的字原本就是汉语中的语素字,所以记录外来音译成分的字都会跟汉语原有的语素字形成同音同形(字形)的关系。^②

十、增加了新的语音形式

历史上音译的“佛”字,于今成了普通话中 fo 这个音段唯一的字,“成吉思汗”的“汗”读作 hán 则是音译突厥语的结果。“冒顿”读作

① 参胡裕树主编(1995, 223 页);刁晏斌(2006, 258 页)。

② 为音译而造的字(如“气、锺”等)或外来汉字(如“吨、腺”等)是例外。

mòdú,“龟兹”读作 qiūcí,而不是按照这些字的本来读音读,都是音译外来语言成分的缘故。

在现代汉语中,音译外来词也会导致汉语增加新的语音形式。刁晏斌(2006,46—48页)分析了现代汉语语音发展中的语音增减变化,其中就有因吸收外来词而发生的语音增加的实例。如“打的”的“的”读作 dī,这个读阴平的“的”就是汉语原有的“的”字因音译 taxi 而产生的新的语音形式。再如“拜拜”(bye-bye)的“拜”读作 bái,汉语中原有的“拜”读作 bài,阳平读音的 bái 是“拜”的新读音(汉语中原本有 bái 这个音节,如“白”的读音);“娜”本读 nuó,见于“婀娜、袅娜”等词中,音译外国女子名字时“娜”读作 nà,nà 是新读音(汉语中原本有 nà 这个音节,如“那”的读音)。沈孟璎(1999,217页)曾指出,“茜”本读 qiàn,指一种草本植物,借用外国女子名字时读 xī,xī 是因音译而产生的新读音。

此外,法国“戛纳电影节”,“戛”字实际上并不按照词典的注音念 jiá,而是念 gā(包括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都是念 gā)。如果按照对音,应该写作“嘎”。倘若写作“戛”而读作 gā,就增加了“戛”的语音形式,也就是说“戛”成了多音字。

“伽马刀、伽马射线”,“伽”字读作 gā,是因音译希腊字母 γ 的读音 gamma 而产生的新读音。^①

从以上举例分析可以看出,外来词对汉语汉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深入研究外来词对于汉语汉字的影响,有助于了解词语面貌、结构特点的形成,有助于了解现代汉语的发展和变异。

① 历史上用“伽”记录的外语读音,有的保留了下来,如“伽蓝”中的“伽”读作 qié;有的随着北方话的语言变化规律改读 jiā,如“伽倻琴”的“伽倻”是朝鲜语[ka ia]的音译,“伽”今读 jiā。用“伽”记录 gamma 中 ga 的读音(此读音还有音译英语 gal、表示重力加速度单位的“伽”等),应与“伽”字的方言读音(如吴方言)有关,方言读音起了引进外语读音的中介作用。当然,方言读音也与保留古音有关。

第二章 外来词的性质和范围

第一节 外来词的性质

一、外来词的定义

对于外来词的定义,各家著述不尽相同。

“外来词,也叫‘借词’或‘外来语’,一种语言从别种语言里吸收来的词语。”(《辞海》)这是对外来词“顾名思义”的定义。在这个定义中,“语”、“词”不加区别,这是符合汉语实际的。汉语中的“词”与短语的界限难以真正划分清楚,一般所说的“外来词”中也包含着难以分辨是“词”是“语”的单位。因此,没有必要考虑“词”、“语”之别。这个定义简洁明了,通俗易懂,但仅仅根据这个定义还难以识别外来词。因此,在该定义下面对外来词的类型作了说明:“汉语里的外来词,有译音的,如‘苏维埃’、‘沙发’;译音加表意成分的,如‘卡片’、‘芭蕾舞’;半译音半译意的,如‘浪漫主义’、‘冰淇淋’;直接借用的,如‘场合’、‘手续’等。”在上述举例中,不包括意译词。

“外来词是在本族语言的语音、语义、文字等系统的制约下,从外族语言中吸收过来的词。”^①这个定义紧扣外来词的词源特征,同时强调“本民族语言的语音、语义、文字系统的制约”,据此可以把外来词与外语词区分开来,如近年来汉语交际中出现的 office、WTO 之类的英文字母词,就不属于外来词,而只是外语词。^②外来词“外来”之名,是从词

① 黄河清(1994a)。

② 见第七章。

语产生的来源而言的,但外来词也是本民族语言词汇系统的成分,起码应该具备本民族语言的语音形式。高名凯、刘正琰(1958, 13 页)用“外来词”和“借词”这两个术语对外来词和外语词做过明确区分:“外来词是外语来源的词,而借词则是借用外语的词;词还是外语的,只是借来用而已。”

对外来词定义最为完备细致的是史有为(2000, 4 页):“‘外来词’,也叫‘外来语’,在某种意义上可同‘借词’相当。在汉语中,一般来说,外来词是指在词义源自外族语中某词的前提下,语音形式上全部或部分借自相对应的该外族语词、并在不同程度上汉语化了的汉语词;严格地说,还应具备在汉语中使用较长时期的条件,才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外来词。”仔细分析,这个定义对外来词的定性包含以下要素:

- ① 词源是外语的词。
- ② 语音形式上全部或部分与外语词有对应关系。
- ③ 具有汉语语言成分的特征。
- ④ 经过了较长时期的使用,已经是汉语词汇系统的稳定成员。

这个定义对外来词的词源特征、词形特征都作了明确的定性表述。根据这个定义确定的外来词范围,最符合对于外来词性质的一般看法。但是根据这个定义,外来词只包括音译词以及音译成分参与构造的词语,大多数借自日语的外来词(借形借义不借音的形译词,即一般所说的借形词)是不能算做外来词的(“榻榻米”之类的音译词是例外)。①此外,意译词当然也不包含在外来词范围之内。

① 史有为(2000, 130 页)指出:“中日两国对汉字都有自己的音读,但由于各自的读音来源相同,有着血缘联系,也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因此同西方原词词音相比,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不地道的‘准’音形兼借形式。”如“瓦斯”(日语 *gasu*)、虎列拉/虎列刺(霍乱,日语 *korera*)、俱乐部(日语 *kurabu*)”,等。但是,除了“奥巴桑、榻榻米”这样的音译词,其他通过借形借入的日源外来词,即使是日语音读汉字记录的词语,汉语在借用时也是不考虑读音的,因此即使语音上相似,也与“音借”无关。至于日语训读汉字记录的词语被汉语借用,在汉语中的读音与日语原词的读音是没有相似性的。

二、意译词是否属于外来词

关于外来词的范围,最焦点化的问题是意译词是否属于外来词。意译词在语音形式上大都与外语原词没有关系,因此对于意译词是否属于外来词,一直有不同的看法。然而,尽管大多数著述、教材认为意译词不属于外来词,但在讨论外来词时都要分析意译词。王力(1979)认为把现代书报上的文章用语和鸦片战争以前的文章用语相比较,外来的词语恐怕占一半以上;和“五四”时代的文章用语相比较,恐怕也占四分之一以上。单就音译词或含有音译成分的词语而言,是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这个外来词数量的估计,显然包含了意译词。

较早讨论外来词的著述往往将意译词纳入外来词。罗常培 1950 年出版的《语言与文化》把意译词归入“借字”。罗氏把“借字”定义为“一国语言里所孳杂的外来语成分”,并且把“近代中国语借字”归纳为四种:(甲)声音的替代,包括:(1)纯译音的,如“燕梳、士担、引擎、沙发、咖啡、可可、雪茄、朱古力、烟士披里纯、德谟克拉西”等。(2)音兼义的,如“马神、裂粑、德律风、可口可乐、爱斯不难读”等。(3)音加义的,如“冰激凌、卡车、卡片、白塔油、佛兰绒”等。(4)译音误作译义的:爱美的。(乙)新谐声字,如“袈裟、苜蓿、茉莉、铝、钙、氮”等。(丙)借译词,如“我执、有情、因缘、大方便、自我实现、超人”等。(丁)描写词,如“胡葱、胡椒、胡麻、胡瓜、胡萝卜、安息香、波斯枣、荷兰水、荷兰薯、荷兰豆、西米、西红柿、番茄、番枳、洋火、洋取灯儿、洋烟卷儿、火水、火柴”等。^①在这四种“借字”中,包含了“描写词”等一般所说的意译词。

孙常叙(1956, 307—308 页)用“译词”这个术语专指意译词,而用其他形式从别的语言里借来的词语都叫“借词”,包括借形(词的书写形式)借义不借音的日源外来词:“在现代汉语词汇里,有不少词是从别的

^① 罗常培(1989, 27—30 页)。

民族语言里借来的。这些借来的词，积成了民族语言词汇中的外来语词汇。外来语词有两种：在外来语词汇中，有些词是直接从别的民族语言借来的，基本上照样使用，这是借词；有些词是经过汉语的翻译，用汉语的造词材料和方法，把它改造成我们民族语言——汉语的新词，这样的是译词。”从表述上看，“借词”和“译词”虽然不同，但都属于“从别的民族语言里借来的”，都是“外来语词汇”，并没有明确地把意译词排斥在“外来语词汇”之外。

吕叔湘 1942 年出版的《中国文法要略》说：“一个语言常常从别的语言里输入许多词语，尤其是事物的名称；汉语里也很多这样的例子。译语有两种，译意的和译音的。译意的词，因为利用原语言里固有的词或词根去凑合，应归入合义复词，而且也不能算是严格的外来语。译音的词，浑然一体，不可分离，属于衍声的一类。”^①这一表述虽然认为“译意的”“不能算是严格的外来词”，但也是把“译意的”词语归入“外来语”中的。

明确指出意译词不是外来词并详加阐释的是高名凯、刘正琰 1958 年出版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高名凯、刘正琰（1958，8—9 页）指出：“外语的词有它的语音部分，也有它的语义部分，这两部分都是外语的词的不可缺少的要素。把外语中具有非本语言所有的意义的词连音带义搬到本语言里来，这种词才是外来词，因为它是把‘音义的结合物’整个的搬了过来。如果只将外语的词所表明的意义搬了过来，这就只是外来的概念所表现的意义，不是外来的词，因为我们并没有把外语的词（‘音义的结合物’）搬到本语言里来，只是把它的概念所表现的意义搬过来罢了。”周祖谟（1959）也认为意译词不是外来词。

这一看法有很强的依据。语言符号是音义结合体，从这一基点来看，意译的本质是用本族语言成分记写外语词的意义，而不是把外语词“连音带义”搬到本语言中来，“外来词”的“外来”之说自然就无从谈起。

^① 吕叔湘（1982，13 页）。

历来不承认意译词是外来词,大抵根据的都是这一原理。

但是,一直有人对将意译词排除在外来词范围之外提出质疑。邹嘉彦、游汝杰(2001, 167—168页)主张“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借词,不仅以语言学的视野而且也以社会和文化的视野来研究来自外语的词汇,不管它是语音上的借用或是语义上的借用。从这个观点出发就不必考虑借词与外语原词在语音上是否相同或相似,这样做有利于研究语言与文化更广泛的关系”。

其实,即使是从语言学视野看,意译词是否属于外来词,以及外来词是否一定要具备连音带义搬过来的特征,都值得进一步讨论。

1. 意译外语词语并不就是搬用汉语中原有的现成词语。

意译所用的基本材料虽然是汉语的固有材料,却往往是用汉语中最小的结构单位——语素构造起来的,并不就是搬用汉语中原有的现成词语。换句话说,按照汉语的结构方式构造起来的词语不一定是汉语中原有的。意译词的词形,如“微软”(Microsoft)、“热狗”(hotdog)之类,是在翻译外语词的过程中形成的,没有意译作为原动力,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整体性词形。

诸如DJ的意译“唱片骑士”看起来是有意义的,其实并不是合理的语义组合。而“微软”这样的意译词,表面看起来字面上是有意义的,其实是不能分解的,或者说“微”与“软”之间不能形成合理的语义组合。由此看来,通过意译产生的新词,有的虽然包含两个以上似乎有意义的音节,其实并不能按照字面意义进行分解或加合,因为其理据并不建立在汉语的基础之上。如果基于组合中看组合成分的意义有无这一原则,“微软”之类甚至只是囫圇一团不可分解的单纯词。^①

2. 意译词并不一定是按照汉语的固有结构构造起来的。

不同语言的词语构造有相同的一面。一些看起来是汉语固有结构

^① 杨锡彭(2003c, 93页)。

的意译词,其实也是外语原词的结构,如“蜜月、代沟、黑板”等,就是直接仿照外语词的结构而译成的。这类意译词反映的是汉语词与外语词结构相同的一面,也就是说,按照外语词的结构意译形成的词语正好与汉语词语结构相同。不仅复合词的仿译往往如此,外语原词是派生词的意译词,如“独裁者(dictator)”之类,其实也是按照外语原词的结构构造起来的,只是由于跟汉语的词语结构相同而使人以为就是汉语本来的结构而已。

不同语言的词语构造也有差异的一面。那些面貌上明显带有外语词结构特点的意译词,给汉语带来了新的词语结构方式。在意译外语词语的影响下,许多汉语中本没有的词语结构形式出现在汉语中,“后工业化、后现代主义、后冷战、城市中国、乡村中国”之类的词语的内部形式、结构方式,没有对外语词(包括词组)的仿译过程是不可能产生的。仿译英语词 *subconsciously*(*adv.*) 或 *subconsciousness*(*n.*) 而形成的“下意识”也是汉语本来没有的结构。^① 因此,很多意译词实际上是用汉语语素作为材料按照外语词的结构构造起来的。

3. 意译创造新的语言成分。

通过意译产生的语言成分,有的是真正的新成分,只是由于用汉字书写,掩盖了其外来成分的面目。如“干啤、干红葡萄酒”的“干”是翻译英语 *dry* 而来,意思是“不甜的或无果味的”,一般指无糖或低糖的。英语中的 *dry* 有多个义项与汉语中的“干”(gān)相对应,但“干啤、干红葡萄酒”中“干”的意义是汉语语素“干”(gān)所没有的,汉语中表示这个意义的“干”也不是从原有的“干”义上引申出来的。^② 因此,“干啤、干红葡萄酒”的“干”实际上是汉语通过意译而得到的一个新语素。由于借着汉语中既有的“干”字记写,其外来面貌、外来性质让人难以觉察。

① 参第四章第四节。

② 这类情况是用与外语原词甲义项相对应的汉语词来记录外语原词的乙义项,而外语原词的乙义项是用以意译的汉语成分原来所没有的,这种“张冠李戴”的结果是形成了以用于意译的汉语成分的物质形式(包括读音、书写)为外壳的新成分,这个新成分与原有的成分只有同形的关系,而没有意义的关联。诸如“干红葡萄酒”中的“干”,以及表示综合性商业中心的“广场”,都是此类成分。

当然,gān 这个语音形式是汉语的材料、汉语的音节,但如果据此否认其外来性质,由此类推,汉语中哪有外来词?(见下)

还有一种意译创造的新语词,这就是用汉语既有的语词意译外语词,汉语语词原有的意义逐渐蜕化、脱落,从外语词语中借来的意义成了这个词的意义。例如汉语中原有“思维”的意义是“思念”,“思维往古,而务以求贤”(《汉书·董仲舒传》)。汉语用“思维”一词翻译佛经,表示两个意义:①思量某具体的对象而能辨别之。②在特定禅定状态下而定某种思想。这一“思维”更接近现代心理学上的“思维”,指进行分析、综合、推理等高级思想活动。①在现代汉语中,表示“思念”义的“思维”已不复存在,因此不能认为现代汉语中的“思维”就是汉语原有的“思维”,这种情况犹如借自日语的“文化”是不同于汉语原有的“文治、教化”义的新词,这个“思维”也是因意译佛经而产生的新词语。

4. 不联系外语原词的意义,意译的词语往往难有确切的理解。

根据汉语语词成分的意义理解意译词,往往格格不入,如英语 game rules 的意译“游戏规则”与汉语的原有的“游戏规则”并不相同:

① 雅虎中国总裁谢文离职 业界称他太看重游戏规则(“网易”网·科技频道·互联网,2006年11月27日新闻)

② 在香港新经济最为灿烂的十数年中,包括霍英东、李嘉诚、包玉刚等在内的传统经济富豪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新经济彻底改写旧时的游戏规则之前,老富豪们究竟该站到哪一边。(《霍英东终结传统经济富豪时代》,《作家文摘》2006年11月21日第10版)

这个“游戏规则”的意义显然不同于汉语原有的“游戏规则”,汉语原有的“游戏规则”只是“游戏+规则”,即“游戏”(“嬉戏、玩耍”等义)的规则而已。黄庆萱(1993)指出“游戏规则”的“游戏”有“竞争”义,不同于汉语原有的“游戏”。《现代汉语词典》(2005)把“游戏规则”释为

① 梁晓虹(1994, 72—73页)。

“比喻在带有竞争性的活动中普遍遵守的规则”，已很仔细，注意到这个意译而形成的“游戏规则”不同于汉语中原有的两个词“游戏”和“规则”的相加，但仍然是隔靴搔痒的，按照这个释义仍然不能得到对于“游戏规则”的确切理解。

意译词既然是因译借外语词语而产生的，不联系外语词的意义，意译词的意义往往就难以得到确切的理解。意译词的释义如能参照外语原词的意义，往往可以迎刃而解，收事半功倍之效。查《新英汉词典》(2000)即可知道，英语 game 的意义有：游戏；运动；竞赛；(美俚)行业/职业；等等。在这些义项中考辨，“游戏规则”中“游戏”的意义与 game 的“行业/职业”一义最为吻合。按照“行业/职业”义来理解“游戏规则”中“游戏”的意义，最为确切。所以，上例中“游戏规则”的确切理解应是“行业/职业规则”。

5. 意译词往往具有特定的外语文化的底蕴，不能基于汉语文化来理解词义。

意译词有特定的外语文化的底蕴，词义的外语文化底蕴使得意译词往往具有明显的外来色彩。如“天使”(Angel)，不了解西方文化背景，充其量也只是了解其表面意义。又如“性感”，意为“性别特征突出、明显，对异性富有魅力”。这个意义是建立外语文化基础之上的。如果从汉语原有的文化语义背景来理解，“性感”这样的字眼是人们讳莫如深的，过去有些英汉词典对“性感”的外语源词的解释就是“色情的、引起色欲的”。此类词语的意义根植于西方文化的土壤，如果当作汉语的固有词语，就难以有正确的理解和恰当的应用。

6. 意译词的理据在外语，不从外来语源的角度往往不能说清楚词义的理据。

“洗钱”一词来自英语的 wash money 的仿译。从表面上看，用汉语语素“洗”和“钱”复合形成“洗钱”一词也可以比喻译自“洗钱”一词的意义(指通过金融或其他机构将非法所得转变为合法财产的过程)。但

是,虽然可以从字面上得到对词义的正确理解,但终归不能了解词义的真正理据。其实英语的 wash money 有特定的语源。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芝加哥一个黑手党金融专家买了一台投币式洗衣机,开了一家洗衣店。他在每晚计算当天的洗衣收入时,把其他非法所得的钱加入其中,再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这样,非法所得就成了合法收入。^①

秘鲁、厄瓜多尔一带的渔民用 El Nino(厄尔尼诺)称呼一种异常气候现象。厄尔尼诺现象又名“圣婴现象”。“厄尔尼诺”是西班牙语 El Nino 的音译,而“圣婴”则是 El Nino 的意译。之所以命名为“圣婴”,是因为这种气候现象通常在圣诞节前后开始发生。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理解“圣婴”,理解的也仅仅是字面上的意义,对于其命名理据就不能知其所以然了。

汉语中的外来词“黑马”是对英语 dark horse 一词的意译。从汉语本源意义上看,“黑马”也就是“黑色的马”。但是,“黑马”一词现多用于比喻出人意料的获胜者,显然,“黑马”的意义并不能从汉语本源意义得到了解,也不能仅仅从字面意义上理解“黑马”的含义。其实,英语中 dark horse(黑马)一词源于一本 19 世纪的英国小说《年轻的公爵》(The Young Duke, 1831)中一处对赛马比赛的描写,比赛中一匹不起眼的黑马在最后关头赶超了两匹夺冠呼声最高的良种马。英语中 dark horse 一词的专义由此产生。不了解这个词源,也就只能被动地接受、理解“黑马”的意义,并不能真正理解用“黑马”这个词来比喻“出人意料的获胜者”的原因。

没有外来语源的说明,只能就字面上的意义来拟测词义的理据,而这种拟测的结果可能“歪打正着”,但也可能似是而非,或有歧解,还可能不得其解。例如“傻瓜相机”,字面意义似乎是“傻瓜”也会使用的相机,或傻瓜一样的相机(功能简单)。其实这两个解释都不够确切。“傻瓜”

① 据《北京青年报》2006 年 4 月 26 日所载文章。

一词是英语 foolproof 的意译, foolproof 有“简单而容易使用的”等转义。“傻瓜相机”其实是自动或半自动照相机,“简单而容易使用的”只是就操作而言,相机的功能其实并不简单,“傻瓜相机”并不“傻”。不从“外来”的源头进行分析,这类词语的理据难以落实,对词义也难以有确切的理解。

7. 外来词的语音条件只是相对条件。

如果把语音条件作为鉴别外来词的硬性标准,来自日语的形译词是不能算做外来词的,因为形译词并不是把日语词“连音带义”搬过来,而是借形(词的书写形式)借义不借音,或是“连形带义”一起搬过来。但是,大多数著作、教材都把形译词列入外来词,显然在考虑形译词是不是外来词时,并没有以音义结合的标准来衡量,而只是以词形的词源特征为依据。

严格地说,所谓“连音带义”地借用外语词语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语言符号的音义结合具有任意性,不仅如此,不同语言如何切分语音的连续体形成一个个能指、如何切分概念的连续体形成一个个所指,也是任意的(即约定俗成的)。因此,不管是能指还是所指,都是特定民族思维、文化基础上的产物。从这个角度看,把外语中的语词“连音带义”地搬到本族语言中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即使是音译词,其语音形式也并不是外语的,不管是语音材料还是音节结构,都是汉语的。例如“车胎、轮胎”之“胎”读作[t'ai⁵⁵],是英语 tyre ['taɪə]的音译,但是“胎”的读音完全是汉语的读音,并不是英语的读音。所谓音译词,由于受本民族语言语音系统的制约和改造,与外语原词的语音联系只是语音上近似,因为音译词的语音实际上是本族语言的语音形式,并不是外语词的实际读音;而用“汉读法”译成的译名与外语原词的语音之间,往往语音相差较远,例如 Titan(['tʰaɪtən]希腊神话巨神)译为“泰坦”,语音上比较相似,但用汉读法译成的“提坦”,^①语音差距就比较大了。汉读法的译名与

① 见《新英汉词典》(2000)“Titan”条。

外语原词甚至毫无语音近似的关系,如 John[dʒɒn](人名)与汉语译名“约翰”之间,就很难说有多少语音近似的关系。如果把“连音带义”作为给外来词定性的充要条件,并不能落到实处。如果把外语词连音带义原封不动地搬到本语言里来,那样的词语就只是外语词,而不是外来词。

任何一种语言吸收外来词,总要用本民族语言的语音系统对外来词的语音形式加以改造。因此即使是音译词,也很难说语音形式就是纯粹外来的。音译词虽然仿照外语词的语音形式来记写,但所用的材料还是汉语的,是汉语中固有的音节结构材料。例如“巧克力”,“巧”、“克”、“力”三个音节都是汉语固有的,并不是外语词的音节单位。“巧克力”之所以是音译的外来词,主要还是“巧”、“克”、“力”这三个音节组合在一起缘于音译英语 chocolate。

所以从词的形式上看,是不是外来词,需要着眼于整个词形是不是由于吸收外语词而产生的。意译词尽管语音形式不是仿拟外语词的语音形式而形成的,但词形是基于外语词而产生的;特别是大多数仿译词,是直接对译外语词的结构成分而形成的,词形的基础是外语词,甚至结构也是外语词的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很多意译词的词形是由于吸收外语词而产生的。

8. 应广义地理解外来词。

普通话从方言借入的词语可以称之为方源词。所谓方源词是就其来源命名的。普通话借用方言词,不一定“连音带义”搬过来,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借形(字形)借义不借音。但这并不影响把这样的词语看作方源词(有的著作、教材将借自方言的词语直接称为方言词)。方源词之名是就其来源说的,其语音形式是普通话的语音形式,这与从外语中借用词语并无本质的不同。既然可以把这样的词语称之为方源词,为什么不能把意译外语词语而产生的词语看作“外来词”呢?

9. 必须注意译词的“价值”。

语言符号是音义的结合体,但是,语言符号的价值(value)是“关

系”而不是实体。索绪尔比喻说,国际象棋中的某个棋子的“价值”不是由这个棋子的实体决定的,而是由这个棋子在象棋的系统中与其他棋子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①“一条街道为什么能够从头到尾重新建筑而仍不失为同一条道路呢?因为它所构成的实体并不纯粹是物质上的。它以某些条件为基础,而这些条件,例如它与其他街道的相对位置,却是跟它的偶然的材料毫不相干的。”^②语言符号的价值也不是某个语言符号的实体所决定的,而是由把这个符号与其他符号区别开来的关系所决定的。从这一角度看意译词,虽然赖以存在的语音材料是汉语的,但从音义结合的符号整体上看,其“价值”不等于汉语中原有的单位。换句话说,这样的音义结合的符号与汉语中原有的同形符号的价值不同,是不同的语言符号。如译自英语 plaza(“集市场所”义)的“广场”,不但为汉语增添了具有新“价值”的语言符号,而且也改变了汉语原有的“广场”在汉语系统中的“价值”,使汉语原有词汇的语义“价值”关系发生变化。所以,仅仅从实体上看意译词,就会把意译词混同于汉语原有的同形的语言符号,认为意译词是由汉语的材料按照汉语的结构创造出来的。如果从“价值”的来源上分析意译词的性质,把意译词看作“外来”的语言单位,就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了。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将意译词完全排除在外来词之外,是不合理的。

不过,对意译还需要仔细分析。“意译”一般有三种情况:一种是翻译,即采用汉语词表达外语词语的意义,但这些词语及其意义是汉语中本来就有的,并不是借用了外语词以后才有的,如“桌子”,虽然可以用来翻译英语的 table,但“桌子”是汉语既有词语,并不是外来词。^③二是

① 索绪尔(1982, 155—156页)。

② 索绪尔(1982, 153页)。

③ 高名凯、刘正琰(1958, 7页)将这类情况归为“意译”的一种,并且指出这种意译的词语不是外来词。

仿译,如“蜜月、黑板、代沟、互联网”等。三是重新命名,^①即根据外语原词的词义,用汉语的成分构造词语来表达,如“维生素(Vitamin)、激光(laser)、天使(Angel)、扬弃(Aufheben)”,都是因为借用外语词而产生的,其词形是新的,词形是在意译外语词的过程中产生的。

如果基于“外来词是外语来源的词语”这一基本性质,第一类词当然不能看作外来词。后两类词(仿译、重新命名)是通过借用外语词才产生的,需要与其区别开来,尽管后两类词所用的语言材料是汉语固有的。

第二节 新视野下的外来词

一、狭义外来词与广义外来词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意译词是用汉语的材料按照汉语的结构造成的词语,因此几乎把意译词等同于汉语自造的词语,而不考虑意译词的外语源流这一因素。这一倾向的直接后果就是很少关注意译和意译词,更不用说深入考察和研究了。然而意译和意译词对汉语词汇面貌、词语结构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可以说不了解意译和意译词,就不能真正全面地了解现代汉语词汇面貌是如何形成的,也不能真正了解现代汉语词语结构、句法结构的变异和发展,不能深入了解意译词词义的复杂情况以及意译词造成的词义变异现象。^②

采取开放的态度看待外来词,应考虑把意译词纳入外来词的范围。但这必然会引起许多并没有太大意义的争论。因此,有必要谨慎处理,把意译词与音译和包含音译成分的外来词区别开来。鉴于这一考虑,

① “重新命名”说受到黄河清(1995a)的启发。黄河清(1995a)指出:“‘维他命’是在 vitamin 这个语音模式中,选择适当的汉字重新命名的,其命名根据是‘维持(他)人的生命’。”我们以“重新命名”专指“根据外语词的词义,用汉语的语言材料构造词语来命名”一类的意译。

② 参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

可以把汉语中的外来词分为狭义外来词和广义外来词。

(1) 狭义外来词

狭义外来词专指音译词,也包括含有音译成分的语词(音意双关的借词、半音译半意译的借词、音译成分附加汉语表意成分构成的词语),尽管这样的词语中的音译成分往往只具有语素的性质,只是在词结构中充当一个成分,但这样的成分出现在词语结构中,就使整个词形不再是纯粹汉语源流的词语形式,而具有了外来的性质和面貌。这一范围内的外来词,历来都是无争议的。

(2) 广义外来词

广义的外来词包括两大类:①借形(字形)借义不借音的日源词汇的形译词。②意译外语词而形成的词语,包括通过仿译和重新命名这样两种方式产生的词语。

二、作为广义外来词的形译词

日语词汇来源的外来词,音译的如“榻榻米”之类,当属狭义外来词。除了少数原词是日语固有词语的形译词(如“取缔、积极、消极”之类)以外,大多数日源外来词的词义和词形(词的书写形式)跟汉语用本民族语言材料翻译外语词而产生的意译词并无本质不同,也就是可以按照汉语汉字的意义来理解整个词的意义。王力(1980, 528页)指出,汉语利用日本译名“不应该认为是汉语向日语‘借词’。这些词并不是日语所固有的,它也不过是向西洋吸收过来的,就一般说,日本原有的词我们并不需要借,因为只有新概念才需要新词,而新概念并不是日本原有的词所能表示的。日本人创造了一些新词来表达西洋传到日本去的那些新概念,我们只是利用日本现成的翻译,省得另起炉灶罢了”。换句话说,日本的译名与汉语自己创造的译名并无本质不同,因为“日本人翻译西洋的新名词就是用汉字翻译的”。按照这一看法,大多数日源外来词其实等于汉语意译词。

许多日源外来词的性质确实跟汉语自己意译的词语差不多,^①不过,这是就这些词的特点而言的,并不能把这些词语看作汉语“自产”的词语,因而否定这些词语是从日语中借来的。在语言接触和语言借用中,词语的传播过程可能是“语言₁→语言₂→语言₃→……”,也可能是“语言₁→语言₂→语言₁”,鉴定外来词不能以最初的词源为标准,而应“从创造外来词的这一阶段的历史发展来看”。高名凯、刘正琰(1958, 14页)指出:“有的时候,外来词所根据的外语原词,它的来源可能就是本语言的词,例如:法语的 budget[byd'ʒɛ]是从英语的 budget['bʌdʒət]来的,意思是‘预算’,但是英语的 budget 却是从前从古法语的 bogète[bɔ'ʒet]搬过去的,不过古法语 bogète 的原意是‘钱包’罢了。又如汉语的外来词‘福晋’是从满语的 fujin 搬过来的,而 fujin 却又是从前从汉语的‘夫人’搬到满语去的;汉语的外来词‘台吉’是从蒙语的 taiji 搬过来的,而蒙语的 taiji 却又是从前从汉语的‘太子’搬过去的。不过从创造外来词的这一阶段的历史发展来看,我们却必须承认法语的 budget 是英语来源的外来词,汉语的‘福晋’是满语来源的外来词,汉语的‘台吉’是蒙语来源的外来词。”

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看法,刘正琰等(1984)把“台风”仍然看作外来词。众所周知,“台风”来自英语 typhoon 的音译,而 typhoon 是汉语粤方言“大风”的音译。如果着眼于最初的源头,“台风”似乎是汉语固有的词。但是,“台风”不同于“大风”,“台风”既然是译借英语的 typhoon 而形成的,看作外来词也是很自然的,更何况其中的“台”完全是音译成分,并不是汉语中原有的成分。^②

同样的道理,大多数日源外来词的日语原词,或是利用古代汉语的

① 仔细分析日语中用汉字翻译西洋语言所形成的借词,不能不感叹翻译者对于汉字意义的理解是非常准确和精密的,如德语 Sinnlichkeit 的意译“感性”、英语 movement 的意译“动态”等等。正因如此,日语中出现的用汉字翻译西洋语言所形成的词语犹如我们自己意译的词语。有的日本人意译的词语能够取代汉语翻译先辈所译词语在汉语中流通至今,其原因也是不难理解的。

② “台风”的“台”最初写作“颱”,“颱”是为音译而创造的新字。

词语而赋予新的涵义,或是用两个汉字构成复音词,汉语引进这样的词语,是把整个词从日语中搬进来的,而不是汉语自己创造或从汉语历史发展中直接继承了这些词语。更何况从日语中引进的词语,有的虽然是借用汉语既有词语翻译欧美语言的语词,意义却跟汉语原有词语不一样。

汉语中原有的“文化”意思是“文治、教化”,与“武功”相对而言。汉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补亡诗》:“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而现代汉语中所使用的“文化”一词,是从日语中借来的,日语借用汉语原有的“文化”一词翻译英文 culture(原义是“耕作、栽培、饲养”),汉语又从日语中借入这个“文化”(ぶんか),表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现代汉语词典》,2005)“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特指社会意识形态。”(《辞源》)可见,从日语中引进的“文化”一词与汉语中原有的“文化”意义并不相同,因此日源“文化”并不是汉语中原有的“文化”。

再如“铁血(政策/宰相)”,“铁”和“血”都是汉语中原有的,但汉语中原来并没有一个义为“武力”的“铁血”。日语用“铁血”二字直译英语的 blood and iron,使“铁血”这样的汉字组合表示“武力”义(特指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所实行的铁血政策)。①显然,“铁血”这样的词语是不能看作汉语原有的词语的。

汉语原有的“引渡”义为“引导人渡过‘水面’”,引申义为“指引”(引渡迷津),但借自日语的“引渡”表示“甲国应乙国的请求,把乙国逃到甲国的犯罪的人拘捕,押解交给乙国”。(《现代汉语词典》,2005)

孙常叙(1956, 313 页)指出,“道具”是汉语原有的词,本是佛教用

① 刘正琰等(1984, 344 页)。

语：“释氏要览中说：‘道具，中阿含经云：所蓄之物可资身进道者，即是增长善法之具。’菩萨戒经云：‘资生顺道之具。’天台别传说：‘衣钵、道具，分为两分。’可见把‘道具’当作工作必需的工具和什物来用，是从资助学道的意思引申扩大出来的。”但是，“舞台用具”义的“道具”是来自日语的，并不是汉语原有的，因此，应视为来自日语的外来词。

一般而言，一个词从 A 语言到 B 语言再到 C 语言，在 C 语言中，这个词被看作来自 B 语言，而不是来自 A 语言。同样的道理，一个词从 A 语言到 B 语言又回归 A 语言，回归的这个词也应看作源自 B 语言。

日语源流的外来词，大都是借形（书写形式）借义不借音，按照音义结合的标准，并不符合外来词的特征。然而正如前文所说，这样的词语的词形来自日语，就具有外来的性质。由于跟狭义的音译词不同，借形（书写形式）借义不借音的日源外来词，应该划归广义的外来词。

三、作为广义外来词的意译词

汉语中因意译外语词而产生的词语也是广义的外来词。意译词的词源毕竟是外语，词形也是在借用外语词的过程中产生的，不仅表达的概念来自外语，而且结构也不一定是汉语中原有的。意译词既然是因借用外语词而产生的新词，把意译词看作广义的外来词也就不是乖舛的。

如今常有意译词和音译词甚至再加外语词并行出现的情况，如“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三种词语形式经常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尽管词形不同，词义却是相同的，且同出于一个词源。如果把意译词排除在外来词范围之外，就难以对这样的词语对应关系加以说明。

更须注意的是意译词对汉语词语的内部形式、结构、意义的影响。诸如“下意识、城市中国、后现代主义”^①之类的意译词使汉语词语的结

① 参第四章第四节。

构方式、内部形式形成了复杂的局面。忽视意译词,就可能忽视这类词语对汉语结构的影响。而生硬的意译使得汉语原有语言单位的意义发生变异的情况也可能被忽视,如近年来英语“集市场所”义的 plaza 被与 plaza 另一义项对应的“广场”所意译,造成汉语中原有的“广场”一词产生扭曲性的义项增加。倘若把意译词排除在外来词范围之外,就可能忽视意译对汉语语言面貌的这种影响。当然,意译词对汉语词汇发展的主要影响是积极的。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影响,都是不应忽略的。

多年来忽视意译和意译词还有一个后果,就是尽管说汉语借用外来词以意译为主,但都缺乏具体的实证分析。谁也说不清楚汉语中到底有多少意译词,意译词与音译词的比例如何。因此,说汉语倾向于意译,也只是学理上的论证,只是基于汉语汉字认知习惯的定性分析,而没有实际的统计数据的支持。谁也不能拿出具体的统计数字来说明汉语中的意译词比音译词多乃至多了多少,因此也无法根据一个确切的比例说明汉语在借用外来词时有意译的倾向。日本 2002 年出版的《新选国语词典》可以在卷末以精确的统计数字显示“和语”、“汉语”、“外来语”、“混合语”四种词汇成分所占的比例,^①国内编纂出版的各种词典由于“先天不足”(学界对外来词研究得不够),几乎不可能对各种外来词的词源一一作出说明,尤其是意译词。一方面认为汉语借用外来词以意译为主,另一方面又忽视意译词的研究,这虽然可以理解(认为意译词是用汉语的材料按照汉语的结构构造起来,似就不必专门研究),但终不免有点悖谬。这一状况亟须改变。

当然,汉语中的意译词情况很复杂,把意译词看作外来词有可能使外来词的范围失控。有些意译词,如“黑板”这样的仿译词,在汉语中沿用已久,已经完全汉化,毫无外来色彩了,归为外来词,似乎难以接受。

^① 野村雅昭(2004)。

但是,即使是音译词在汉语中经过长期使用也会褪去外来色彩,呈现出与汉语固有词语毫无二致的汉语面貌来,如来自梵语的佛经音译词“塔”、来自尼泊尔语的“菠(菜)”、来自英语的“(车)胎(tyre)”、“抛(光)”(抛, polishing 的音译)”^①。无论外来成分如何汉化,都不能不承认它们是外来词。

虽然意译词是用汉语的材料构造起来的词语,然而词形是在翻译外语词的基础上产生的,词的结构、理据也往往必须联系外语词源才能说清楚,所以把意译词看作广义的外来词有利于解释这类词语的结构和理据,包括“黑板”这样的已经完全汉化的仿译词。

四、外来词的新定义

综上所述,对外来词的定义有必要突破传统的界定,扩大外来词的范围有助于扩大学术视野,更加广泛深入地研究外来语言要素对汉语的深刻影响。因此,可以对外来词作出如下新定义:

外来词是在吸收外语词的过程中产生的表达源自外语词的意义的词语,亦可称为外来语、借词。由音译产生的与外语词在语音形式上相似的词语以及音译成分与汉语成分结合而成的词语是狭义的外来词,通过形译或意译的方式产生的词语是广义的外来词。

“外来词”这个词也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专指“吸收外语词的过程中产生的表达源自外语词的意义的词语”,在这个意义上,“外来词”是专门术语;另一个意义则泛指外来的词语。澄清这一区别是必要的,否则一些通常的说法,如“汉语吸收外来词”、“外来词的汉化”等,就有疑义,显得不大通。^②

“汉语吸收外来词”、“外来词的汉化”等说法十分通俗、普及,是很

① 见刘正琰等(1984, 270页)。

② 关于“外来词的汉化”,高名凯、刘正琰(1958)称之为“外来词的创造”,这是很严谨的(见第八章第二节),但从“从俗”的角度看,“外来词的汉化”是十分通俗、方便而常见的说法。

有用的。因此,尽管作为一般语词的“外来词”与作为专门术语、具有专义的“外来词”同形,在语用中,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很清楚的,并没有概念混乱的问题。语言中这类专门术语与一般语词同形的情况是很常见的。

作为专用术语的“借词”也与“借用词语”意义上的“借词”同形。当然,两者的词性、结构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名词,后者是动宾短语。这在语用中也不难区别。

第三章 音译与音译词

第一节 音译的性质和范围

音译是通过记录外语词的语音形式来借用词语。高名凯、刘正琰(1958, 8 页)对音译的解释是“把外语中具有非本语言所有的意义的词连音带义搬到本语言里来”。“连音带义”说是值得讨论的。音译的本质是借助声音替代的方式从别的语言里借用词语,而不是把外语词连音带义地搬进来。

赵元任(2002, 605 页)说:“平常一个语言甲借语言乙里的一个词就是取乙的某词改用甲的音系里的可能的音当一个新词来用。例如英文 *inspiration* 中文叫‘烟士披里纯’。借了外来词以后不但音会改变并且意义跟用法不一定跟原来一样。”这一解释是比较准确细致的。

王力(1954)说:“严格说起来,音译不能算是译,也只是采取接受原形的方式,不过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所以好像是‘译’了。”音译既然是一种借词方式,其名称也许用“音借”更准确,即通过声音替代的方式从别的语言里借用词语,或利用本族语言的语音形式记写外语词的语音形式以借用词语。但是“音借”顾名思义似乎只是借用语音,与通过语音形式的替代从外语中借用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的这一本质特点不相符合,表义似乎也不够明确。考虑到“音译”这个术语已经约定俗成,所以沿用这个术语是比较适宜的。

通过音译的方式借入的词语叫音译词。关于音译词的范围,似乎无须讨论,其实不尽如此。以下都是无异议的音译词:

坦克(tank)、沙发(sofa)、咖啡(coffee)、咖喱(curry)、马达(motor)、莱塞(laser)、扑克(poker)、休克(shock)、克隆(clone)、柠檬(lemon)、吉普(jeep)、槟榔(pinang)、丁克(DINK)、巧克力(chocolate)、吉卜赛(Gypsy, gypsy, Gipsy, gipsy)、迪斯科(disco)、歇斯底里(hysteria)、厄尔尼诺(El Niño)、奥林匹克(Olympic)、阿司匹林(aspirin)、卡布奇诺(Cappuccino, 奶沫咖啡)、香格里拉(Shangri-La)^①、布尔什维克(большевик)

上述音译词具有以下特征:

- ① 处于组合中的每个音节每个字都没有独立的意义。
- ② 字面上的特征是:单字本有的意义在组合中不能形成合理的语义组合并进而形成一个整体意义,每个字都只是音节符号。
- ③ 各个字各个音节之所以组合在一起,是记写外语词读音的缘故。
- ④ 各个字各个音节组合成一个整体,表达一个源自外语词的意义。
- ⑤ 是汉语词汇中的成分,形式上具有汉语的音节结构,用汉字书写(亦可用汉语拼音书写)。

但是,“可口可乐”(Coca-cola)、“奔驰”(Benz,以德国内燃机汽车发明人 karl-Friedrich Benz 的姓氏命名)等是不是音译词,就有不同看法了。因为这类词的字面有意义,整个词面形式也是个合理的语义组合,因此不少人认为这类音译词兼顾了意义,借词方式是“音兼义”或“音意兼译”。罗常培(1989: 28 页)把“可口可乐(Coca cola)、爱斯不难读(Esperanto 世界语)”等看作“音兼义”的借词。^②甚至有人认为这类词都是意译词。

其实,诸如“可口可乐、奔驰、爱斯不难读”的字面意义都属于“谐音别解”,^③因为这些词的字面意义都与这些词的实际意义根本不相干;

① Shangri-La 是出生于英国、1944 年后侨居美国的小说家 James Hilton(1900—1954)1933 年所作小说《失去的地平线》中的地名,后被作为世外桃源的代名词。见刘正琰等(1984, 371 页)。

② 罗氏把“德律风”(telephone)也看作“音兼义”,其中的“义”就很勉强了。

③ 对于“谐音别解”的定义,请看第五章第一节。

否则,“尖头鳊”(gentleman)、“爱死”(AIDS)之类的语言游戏的“产物”都属于“音兼义”了。字面意义的产生,或者说对字面意义的理解,都不过是“循音赋义”。^①这种“循音赋义”,也是一种“重新分析”(reanalysis,不改变表层表达形式的结构变化),是汉语汉字的认知图式(cognitive schema)的“本能”反映。

不可否认,在音译外语词时,虽然单字是作为音节符号使用的,但是由于绝大多数汉字是语素字,因此在选用音译用字时,难免会有“循音赋义”的作为,比如用“可口可乐”,不用“可卡可腊”,用“奔驰”不用“奔滋”。“可口可乐、奔驰”的字面意义都属于“循音赋义”。下面的例子也说明了音译用字的选择并非无来由的:

值得一提的是,“甘地”的名字是戴季陶翻译的。“甘地”原称“摩诃塔摩”(Gandhi Mahatma),戴季陶把他介绍给国人时,取其名而译为“甘地”,以显示他甘于从地狱中救世救人之宏愿,译得精当,沿用至今。(《作家文摘》2006年7月25第2版。)

“甘地”之义“甘于从地狱中救世救人”毕竟不是 Gandhi 的原义,而是译者之意。对于这样的意义,读者不一定有相同的理解,因为在汉语中“甘地”并不具有这样的意义。

“循音赋义”也可能只是读者之意。例如“克隆(clone)”是个纯音译词。但是,硬性分析,“克”和“隆”似乎都有意义。“汉语中原本就有‘克隆’一词,《汉语大词典》解释为‘繁荣昌盛’,这就是作为汉语本体词的‘克隆’一词的含义。作为学科意义的‘克隆’指的是‘无性繁殖’,英汉词典大都将 clone 译作‘无性(繁殖)系、纯性、克隆’。现代生物技术早已展示,clone 这种无性繁殖技术具有将动物朝着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方向发展的潜力。所以,clone 与汉语本体词‘克隆’在意义上是有共通之处的,当初用‘克隆’来译 clone 的理据是十分明显的,它也算得上

① 黄河清(1994a)。

是一个‘美意音译词’。”^①这么分析，自然也只是读者之意，与音译词的实际意义其实是无关的。

罗常培(1989, 29 页)所列“近代汉语里的外国借字”中的“声音的替代”共有四目，其中一目是“译音误作译义的”：

译音误作译义的 例如“爱美的”一词原是 *amateur*，意思是指非职业的爱好者。可是有人望文生训把“爱美的戏剧家”误解作追逐女角儿的登徒子，那就未免唐突这班“票友”了。

这种“望文生训”，自然也属于读者的“循音赋义”。罗氏把“译音误作译义的”与“纯译音的”、“音兼义的”、“音加义的”三目并列，其实“译音误作译义的”一目与“音兼义”一目中“可口可乐(Coca cola)、爱斯不难读(*Esperanto* 世界语)”之类的词语，性质是相同的，都属于“谐音别解”。

总之，借助声音替代的方式从别的语言里借来的词语，只要用作声音替代的单字的意义以及单字意义组合而成的整体意义与外语词原义无关，就不能看作“音兼义”，而只是音译。史有为(2000, 105 页)把这类词称之为“谐音译”，杨锡彭(2003c, 69 页)称之为“谐音别解”。^②不管是“谐音译”还是“谐音别解”借用词语，都属于音译借词。

第二节 音译是汉语吸收外来词的主要手段之一

王力(1954)认为汉语借用外来词，“意译是正常的办法，音译只是变通的办法”，例如“咖啡、沙发”的适当意译不容易找，所以才用音译。但是，世界上各种语言相互吸收外来词都是以音译的方式为主，音译是最普遍的、最基本、最常用的吸收外来词的方式，为什么汉语是例外呢？

① 吴世雄(1997)。

② 史有为(2000, 127—128 页)指出这类现象不能归为音意兼译，而只是谐音音译[分为“谐音(音)译”和“谐音音译”两类]。愚见以为“谐音音译”或“谐音(音)译”似可进一步区分，因此把字面上形成有理组合的音译称为“谐音别解”，以跟字面上是无理组合的谐音音译区分开来。至于“谐音别解”与“音意兼译”或“音意双关”的区分请参看第五章第一节。

其实,汉语用音译的方式吸收外来词也是“正常的办法”,不仅汉语中存在着许多音译词,而且从借词的实际过程看,好些外语词只能通过音译的方式来借用。^①不过,如果从汉语吸收外来词的倾向来看,把音译看作只是“变通的办法”也是有道理的。这主要跟汉语汉字的认知习惯有关。汉语中绝大多数语素都是单音节的,单音节语素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使得人们习惯于每个字每个音节都有意义,即使是没有意义的音节,也要让它变得有意义。^②因此,一般认为,汉语从外语借用词语倾向于意译。

从汉语史的情况来看,不少最初采用音译的外来词后来为意译词所替代。陈原(1983, 293 页)说:“现代汉语的借词存在着一种倾向,即抗拒音译转写,而乐于接受部分音译或全意译。例如‘德谟克拉西’用了几年,转为‘民主’;‘莱塞’用了多年,转用‘激光’;‘怀娥铃’(violin)和‘披雅那’(piano)已被弃置,转为‘小提琴’和‘钢琴’。”^③

好些音译词不能长期存在而被意译词所替代的原因,在于音译词的音节之间缺乏意义串联,不能形成以语素音节为基础的字面意义的组合,尤其是音节数量多的音译词,对于习惯了每个字、每个音节都有意义的中国人来说,既不利于记忆,也不便于称说,因而为意译词所替代,如:

empire(英拜尔)→帝国, lawyer(劳叶尔)→律师, college(哥理支)→学院, university(优尼维实地)→大学, bank(版克)→银行, town(拓温)→镇、市镇, city(锡特)→城市, religion(鲁黎礼整)→宗教,^④ dumping(屯并)→倾销, boycott(杯葛)→抵制, guild(基尔特)→同业公会; parliament(巴力门)→国会, coup d'état(苦迭打)→政变,

① 参本章第六节。

② 赵元任(1979, 79 页)。

③ 马西尼(1997, 163 页)指出,“德谟克拉西”(democracy)这个音译词是在仿译词“民主”之后产生的。因此,“民主”这个词的借入历程是“意译-音译-意译”。

④ 上述音译译名例出严复所译《原富》,见周定一(1962)。

dictator(狄克推多)→独裁, Aufheben(奥伏赫变)→扬弃, sabotage(萨波达举)→怠工, picnic(匹克匿克)→野餐, insperation(烟土披利纯)→灵感……^①

这些音译词字面上缺乏意义关联,有的音节数量也很多,很不符合汉语汉字的认知习惯。如果有表义更明确的汉语成分可以用来译借这样的词语,对汉语来说,也是“得其所好”的事。

但是,采用音译的方法吸收外语词,是语言发展中的普遍现象。从汉语吸收外语词的历史来看,音译改为意译和意译改为音译的事实都存在,后者如“名学/论理学→逻辑、徽章→图腾、安乐椅→沙发、回教徒→穆斯林”等,就是经历了由意译到音译的转变过程。^②从数量上看,历史上外来词中音译词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根据周荐(1991)的统计,在刘正琰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所收“一万余则”外来词中,音译词达6 213个,占该词典所收外来词(包括音译词、半音译半意译词、音译附加表意成分词、形译词)的半数以上。从这一事实来看,音译是汉语接受外来词的主要形式之一,应该是无疑的。

汉语倾向于用意译的方式从别的语言中借用词语,但是,意译也多有捉襟见肘之窘、穷于应付之难,所以也往往不得不借助于音译。其实,作为借词手段的音译、意译各有利弊,并不就是此优彼劣的对立。音译有缺点,但是意译也有缺点。^③音译、意译的优劣、长短的比较往往只能就“词”论“词”,也就是就具体某个词的译借比较而言。从借词的一般规律来看,一种语言从别的语言中借用词语,仅仅用音译或仅仅用意译都是不够的。因此,音译作为汉语从外语中借用词语的手段之一,既是常用的,也是必不可少的。把音译的词语“巧克力、咖啡、威士忌、

① 以上例见周定一(1962)。在东南亚和港台地区,一直使用“杯葛”这一音译词。《现代汉语词典》(2005)收录了源自音译英语 boycott 的“杯葛”,注为方言词。

② 史有为(2000, 188页)。

③ 参第三章第七节“音译的歧异与阻滞”和第四章第四节“意译的歧异与阻滞”。

“白兰地”留存至今而没有为意译词所替代的现象看作汉语词汇发展的“例外”，^①既不符合语词借用的一般规律，也不符合汉语借用外来词的基本事实。

有一种看法，“汉语的书写系统(汉字)排斥音译，这是由汉字的和汉语本身的结构导致的。在汉语书写系统改用拼音文字(或与拼音文字共存)以前，现代汉语借词的这种倾向不但不会改变，而且只有愈来愈烈”。^②

从汉语汉字的认知心理看，说汉语接受外来词倾向于意译，自然是可以成立的，但因此说汉语排斥音译，也不太符合事实。历史上的外来词，如佛经翻译中就有大量的音译词，改革开放以来，大量音译词在汉语中出现，并且出现了新的音译词与沿用已久的意译词并存的情况。^③随着对外开放的急速发展，甚至连音译也都不能满足借用外来词的迫切需要了，于是汉语中大量出现了英文字母词。

从各种语言借用外语词的事实来看，文字系统与借词方式也并非是对应的关系，采用汉字这样的文字系统并不一定只是采用意译来借用外语词，采用拼音文字记录的语言也并不一定只是采用音译来借用外语词。赵元任(2002, 606页)举德语意译外来词的例子说：“还有一种借法是不用外国话的音而把外国的复合词的各部分直译过来杜撰成为一种新词，这就成为所谓借译词，西文叫 calque(原来是跟着脚印儿走的意思)，英文也叫 translation borrowing。例如 telephone 中国旧叫法是‘德律风’，那是直接借词，可是德文叫 Fernsprecher，这里的 fern 翻译 tele-，-sprecher，粗略翻译-phone，所以就是借译词了。”这里所说的借译(calque)，就是一般所说的仿译，属于意译的一种。

① 陈中绳(1997)。

② 陈原(1983, 293页)。

③ 如 laser，早先有音译的“莱塞”，后来为意译的“激光”所取代，但改革开放以后，由港台引进的音译形式“镭射”进入大陆，与意译的“激光”并行使用。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1993)《“外来概念词词库”总说明》也指出,一般认为汉语倾向于意译与汉字的表意性有关,这个看法不一定全面。从其他语言借用外来词的情况看,有的语言,如英语,倾向于音译;有的语言,如德语,倾向于意译。德语 Kindergarten(幼稚园;幼儿园),英语直接采用,但是丹麦语和挪威语却采取意译。

一般而言,语言之间相互借用词语,采用音译是最方便的,不仅采用表音文字的语言相互借用词语是这样,即使就汉语借用外语词的情况而言,音译也是最便捷的方式。但是,如果可以意译,不仅汉语把意译作为吸收外语词的主要手段之一,即便是采用表音文字的语言相互借用词语,也可能采取意译。例如西非的科特迪瓦共和国(Côte d'Ivoire),汉语最早采用的是意译“象牙海岸”,其他各种语言也都采用意译。^①后来包括汉语在内的各种语言都改用了音译,原因是国际机构实行以各个国家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在字母表中的顺序排列,不同语言意译的“象牙海岸”一词的开头字母各不相同,使得象牙海岸在国际机构中国名排列的位子变动不定。在征得联合国同意后,从1986年1月1日起,这个国家的名字在各种语言中一律改为音译。^②

这些情况都说明,并非采用拼音文字的语言从外语中借词时一概采用音译,汉语吸收外来词也并非只是意译。当然从汉语汉字的认知特点来看,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更习惯于每个字每个音节都有意义。所谓汉语倾向于采用意译,只是相对而言。这是汉语汉字的认知特点所决定的。但是“倾向”的另一面并不就是排斥、拒绝。音译不仅是各种语言借用外来词的主要手段,而且也是汉语借用外来词的主要手段之一。

① 一说英文 Ivory Coast(象牙海岸)的形成是因为说英语的人不会法语 Côte d'Ivoire 的发音,所以把 Côte d'Ivoire 意译为英文的 Ivory Coast(象牙海岸)。见《何必那么在乎译名》,《环球时报》2005年12月14日第11版。

② 《科特迪瓦,从“象牙海岸”走来》,《京华时报》2006年11月3日第77版。

第三节 从文字作为语言符号的 符号层面看音译词特点

汉语音译外来词的书写符号是汉字。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文字系统,最显著地体现了汉语语言单位的特点。一般认为汉字是语素-音节文字。所谓语素-音节文字,有不同层面的解释。一是从文字作为语言符号的符号层面看,大多数汉字都记录了一个语素,在语音形式上一个汉字对应一个音节。二是从文字所使用的符号层次看,汉字的字符包括音符、意符和记号。音符属于音节这一层次上的符号,意符和记号是语素这个层次上的符号。^①汉字的特点决定了汉语中音译外来词的特点。

一、从汉字所反映的语音形式看音译词的特点

用表音文字记录的语言,相互借用词语往往通过文字的直接搬用,这种文字书写形式的搬用实际上就是音译。不同语言的语音系统不同,为了适应于本族语言的语音系统,在借词过程中往往要有语音的“折合”、“对当”,这种语音的“折合、对当”可以通过文字书写形式上的“折合”、“对当”来完成。相对于印欧语系的语言相互之间的语音差距来说,汉语采用音译方式吸收印欧语的语词,借词的语音与借源语词的语音差距似乎更大一些。这主要和汉语与印欧语之间的差异有关。

不同语言的语音差异首先显著地反映在最小音义结合体(语素)的语音形式上。在诸如英语、德语、法语、俄语等印欧语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在语音形式上与音节没有对应关系,语素的语音形式既可以是一个音节,也可以大于一个音节(如 nation、basket),还可以小于一个音节(如 homey、spooky 中的-y)。适应记录语言成分的需要,英语等印

^① 裘锡圭(1985)。

欧语采用音位文字记录。汉语的情况则很不相同。汉语中的语素以音节作为基本的语音形式单位,汉语中绝大多数最小音义结合体在语音形式上表现为一个音节,且不能小于一个音节,^①因而在语音形式上与音节对应的汉字能够用一个整块的形式记录汉语中的最小音义结合体。汉字在语音形式上与音节对应,因此用汉字音译外来词时,实际上是以一个个语音形式是音节的符号切分外语词,这就使得汉语中的音译外来词在语音形式上以音节作为最小的语音形式。外语词中的一个音位,音译到汉语中来,也成了一个音节。例如 Los Alamos 的汉语译名为“洛斯阿拉莫斯”,其中的-s 到了汉语中语音结构成了 sī,成为一个独立的音节,用汉字记写则需要与音节对应的一个字:斯。

不仅如此,汉语(普通话)的音节结构也与诸如英语等印欧语的音节结构有很大差异。汉语的音节结构比较简明,声母在前,韵母在后,辅音韵尾只有两个(-n、-ng),绝大多数辅音只能出现在元音前面,没有两个辅音连续排列的情况。辅音与元音的组合方式也很简单、整齐,各种音位在音节结构中有固定的位置。因此,汉语的音节只有 430 多个,加上声调的区别,也不过 1 370 多个。相比之下,印欧语的音节结构却复杂得多。以英语为例,大多数音位在音节中都可以相当自由地进行搭配组合,如辅音不仅可以连续出现,而且在跟元音组合时既可以出现在元音前,组成大量汉语中所没有的音素组合(如 ki、fi、tran-),也可以出现在元音后,形成辅音音缀(包括辅音丛),因而英语音节结构比汉语要复杂得多。据潘文国(1997, 152 页)的估计,英语的音节数量达到 10 000 个左右。

汉外语言在音节结构上的差异,决定了在语音形式上记录了汉语

① 只有词缀“-儿”是例外,词缀“-儿”是音位语素,其语音形式为[-r],[r]表示附加在前一音节末的卷舌动作,不自成音节。词缀“-儿”念起来不自成音节,写下来要用一个汉字表示(大都不写)。音译中的“儿”字大多数都是记录一个音节的“儿”,其语音形式不同于词缀“-儿”,如“伊妹儿”中的“儿”。

音节的汉字作为语音符号音译外语词时,难以做到跟外语词在语音上一一对等,要作较大的“折合”。因此,汉语中的音译词与借源语言原词的语音往往只是近似,完全相等的情况即使有也是极为少见的。即使音节结构相近乃至相等,贯穿于汉语音节结构的声调也是许多外语词语音节结构中所没有的要素。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有些是有声调的,但汉语在音译这些语言的语词时要做到声韵调都相同,也殊非易事。比如“糌粑”是藏语[tsam⁵⁵pa⁵⁴]的音译(字形中的意符不过是出于表示义类的需要),念作[tsan⁵⁵pa⁰],与藏语原词对照,不仅音节结构不尽相同(比较[tsam⁵⁵]和[tsan⁵⁵]),声调也不同(比较[pa⁵⁴]和[pa⁰])。汉语和藏语同属于一个语系,尚有如此差异,汉语与别的语系的语言之间的语音差异自然可以想见。所以汉语音译词与借源语言原词在语音上的关系只能是一个“近似”的关系。

不同语言的语音系统是不同的,由于音节结构不同,在音译过程中需要根据本族语言的语音结构系统对外来成分的语音形式进行调节。这样的调节其实正是本族语言的语音系统对外来词的语音形式进行“同化”改造的过程。请看汉语对音译外来词进行音节改造的实例:

4月22日,“古阿姆”组织首脑会议在摩尔多瓦首都基希讷乌举行。……1997年,在西方的支持下,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4国总统决定成立一个非正式地区联盟。联盟以四国英文国名的第一个字母冠名(GUAM),简称“古阿姆”。(《环球时报》2005年4月25日第2版)

GUAM是缩略语,如果按照字母念,过于烦琐,颇为不便,也难以有确定的汉语语音形式。用汉字音译,实际上是用一个个的汉语音节对外语词进行音节切分。对GUAM的音译有不同的音节处理方法,比如音译成一个音节,可以近似地译为guān(“关岛”之“关”就是西太平洋岛屿Guam的音译),但一个单音节的音译成分比较难以独立成

词,也不便表述(Guam 音译为“关”,还必须附加一个表示意义类属的汉语语素“岛”,才能明确表义,也便于称说)。如果切分为 GU 和 AM 两个音节,AM 这个音节又是汉语中所没有的(当然也可以近似地译为 AN)。比较起来,把 GUAM 切分成三个音节 GU(古)、A(阿)、M(姆),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其中的鼻辅音 M 本来就是可以自成音节的,所以在音理上也很自然。

类似的例子是不少的。例如人名 Truman(杜鲁门),其中的 Tru 在汉语音译时被处理成两个音节。人名 Strong(斯特朗)的音译也是如此处理的:S,斯;t,特;rong,朗。

诸如此类的音译词的形成实际上反映了汉语音节结构对外来词音节结构的改造,或体现了汉语音节韵律的制约。这种改造和制约其实正是汉语语音系统对外来词进行“汉化”的过程。

马西尼(1997, 153 页)指出:“在外来词的吸收中,外语词语的语音常常是吸收的对象。我们所说的音译词(phonemic loans)是指:在一种语言中,词义和语音借自外语的某个单词的词,其中词义通常是外语单词所具有的几个意义中的一个,而语音则是按照接受语言的语音系统加以改变而成的。对于语音,我们将看到,由于汉语语音系统的不兼容性,使得来自西方语言的音译词在吸收过程中历经艰难,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它们的传播。”这一观点是需要辨析的。

首先,不同语言的语音系统都是不兼容的(音素以及音素组合都不尽相同)。语音系统不同,音译过程中语音的折合、调节就在所难免。所以,汉语在音译西方语言的词语时有语音差异的障碍其实不足为奇。

其次,语词借用的诱因是社会生活的需要,一种语言的语词是否得到借用和广泛传播,主要取决于该语言的文化影响力,取决于该语言中具体语词的文化影响力,取决于借入词语的社会的需要。一种语言的文化影响力越大,借入语词的社会所需要的程度越高,语词被借用、被接受的可能性就越大,传播速度就越快,传播的范围就越广。除此之

外,并无其他原因能够左右语词的引进和传播。

不同语言在语音系统上的差异当然不能真正影响音译词的借入,音译词传播速度的快慢和传播范围的大小与语音系统差异的大小以及音译是否困难也并无直接的联系。源自汉语的 Confucius(孔子)、源自日语的 tsunami(海啸)、源自阿拉伯语的 Koran(古兰经)等早就进入了英语,就语音系统而言,不仅存在差异,而且往往差异很大,例如日语词 tsunami 开头的音节 tsu 就是英语中本来所没有的。^①

二、从汉字作为语素文字看音译词的特点

汉字在语音形式上对应一个音节,但汉字音节并非纯粹的抽象的音节,而是具体的音节,绝大多数汉字都记录了汉语中最小的音义结合的语言成分(语素)。因而用汉字作为音节符号音译外语词,实际上是拿一个个语音形式上是一个音节的语素符号作为纯粹的音节符号来使用。但是在音译词中用以音译的单字除了具有表音作用以外,单字原有的字面意义也往往起作用。汉语汉字的认知习惯是每个字每个音节都有意义,所以即使是音译,译者也往往要精心选择音译用字,力求在字面上显示出与词义有关或无关的意义来。这使得汉语音译词的真实面貌往往若隐若现,音译的性质往往被掩盖。因此,判别音译词需要拨开字面意义上的迷雾,才能一睹真面目。在识别音译词时,辨明词源就显得特别重要。不明词源往往就不明其义,甚至会产生误解,从字面意义来理解音译词的词义,或者执泥于字面意义而不了解音译词的真实词义。

汉语中许多音译词,从字面上都可以“抠”出意义来。望文生义,“猫匿”是“猫的藏匿”。其实“猫匿”的意义跟猫根本不相干,否则就不

① 在《新英汉词典》(2000)中,以 tsu 这个音段开头的词语仅有 4 个,都来自日语:Tsugaru,津轻海峡;tsunami,海震、海啸;Tsushima,对马(岛);tsutsugamushi,恙虫病。

能解释“猫匪”也可以写为“猫腻”。“猫匪”或“猫腻”其实是来自波斯语 ma'ni 的音译借词,意义为“私弊、隐情;搞鬼,使假招子”。^①因此“猫匪”或“猫腻”都只是一个复音节音译词,字面意义跟真实词义根本不相干。“猫腻”与“猫匪”异形同音同义,是同一个音译词的书写异体。

“坦克(tank)”是个音译词,“坦”没有意义,“克”也没有意义,“坦克”作为一个整体,只记录一个最小的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但是,望文生义,“坦克”也可以分析出意义来。“有人将‘坦克’(tank)、“休克”(shock)列入纯音译之类。‘坦克’能‘坦’地‘克’敌;‘休克’中的‘休’即‘止’也。所以它们在字面上可能因为含有意义,或许是‘循音赋义词’。”^②“循音赋义”是汉语汉字的认知图式(cognitive schema)使然。汉语汉字的认知习惯是每个字每个音节都有意义,即使是没有意义的字或音节,也要使它有意义。^③更何况作为“坦”、“克”本是汉语中两个有意义的语言成分。但是,在“坦克”这个词中,“坦”和“克”都只是音符号,单个的字是没有意义的,两个音节作为一个整体才表示一个最小的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如果不在组合中考察音译用字的意义以及外语原词的意义,而是将音译用字单独抽出来加以解释,那样的意义与音译词的实际词义是无关的。

“基尼斯、吉尼斯、健力士”都是 Guinness 的音译译名,表面看起来,“健力士”跟“基尼斯、吉尼斯”是不同的,因为“健力士”字面上有意义,字与字在语义上是可以组合的,但其实还是音译,因为字面意义跟 Guinness 的原义无关。澳大利亚城市 Sydney 的译名有“悉尼”(中国大陆)、“雪梨”(台湾地区、海外华人社区),也都是音译,尽管“雪梨”字面

① 见陈刚(1985)。对这个词的词源也有不同的看法。徐世荣(1990)认为“猫儿腻”是阿拉伯语-回语“玛尔腻”或译音“马儿密”的变音,也可以写作“猫儿溺”。无论如何,“猫儿匪”属于音译词当无疑问。

② 黄河清(1994a)。

③ “循音赋义”完全取决于音译者的“意愿”。英语 ester 的音译“爱斯他”(刘正琰等 1984, 17 页)也可以写作“爱死他”,但似乎不值得这么写,因为“爱斯他”只是“酯,一种无色的液体”。

上似乎是有意义的,但 Sydney 不是“梨”,“雪梨”的字面意义与 Sydney 没有关系。美国康奈尔大学所在地 Ithaca 音译为“依色佳”,胡适先生将其译为“绮色佳”。“绮色佳”似乎是个陈述性的表达(绮丽景色佳),字面上是有意义的组合,但意义组合形成的单位已不具备地名的特征,也并非原词的意义,“绮色佳”也只是音译词。

音译词的字面意义常常导致语词理据的误解、曲解。江南一带有一种民居,房顶上有个“老虎窗”。从字面上探究“老虎窗”的意义,就有“老虎窗”的得名是因为这样的窗户像一只老虎踞于房顶上的说法。其实“老虎窗”是英语 roof window 的半音译半意译(roof 音译为“老虎”,其语音理据应是吴方言的读音;“窗”是 window 的意译),跟“老虎”毫无关系。至于“老虎灶”的得名之由,还不得而知,应该跟“老虎窗”是不同的。

音译词的理解是需要了解语源的。除了已经大众化了的音译词,好些音译词,不了解得名之由,即不了解音译形式与外语原词的对应关系,往往就不了解意义。

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值得注意,就是音译字在字面上虽然不能形成合理的语义组合,但在应用中人们却可以断“词”取义,只是依据音译词中的部分用字的字义来理解、使用音译词。例如英语词 Jumbo 原义为大型喷气式客机,引申义为“庞然大物;特大的、巨大的”等。Jumbo 在汉语中的形式一为“珍宝机”(“珍宝”是 Jumbo 的音译,其音节对应情况是:Jum,珍;bo,宝。“机”为附加的汉语语素),一为“巨无霸”(其音节对应情况是:Ju,巨;m,无,“无”的粤方言读音声母为 m;bo,霸)。就字面上看,“巨无霸”是无理组合。可是在应用中,人们并不在乎全词的字面意义组合,而是断“词”取义,即只取“巨”、“霸”二字的意义,用来泛指“庞大、特大、巨大、强大”的事物,如:

巨无霸汉堡包、巨无霸吊机、巨无霸公司、巨无霸唢呐、巨无霸书城、巨无霸鞋城、巨无霸浮船坞、巨无霸码头、巨无霸移动硬盘、巨无霸

电机、巨无霸海轮、巨无霸大桥……

商业巨无霸、游戏巨无霸、电脑巨无霸、广告巨无霸、体育巨无霸、空中巨无霸、海洋巨无霸、钢铁业巨无霸、电信业巨无霸……

Jumbo 的原义有“巨大的、庞大的”等义,对于汉语使用者来说,却不一定了解这个词的意义。但“巨、霸”的字义对词义的辨认起了诱导的作用,使得人们可以望文生义,“歪打正着”地理解和应用“巨无霸”这个词。

三、从语素音节的非语素化看音译词字面意义的消解

汉字虽然是语素音节文字,但汉字也可以成为纯粹的音节符号。把具体的音节符号(语素音节)抽象为纯粹音节符号的手段是组合。在用汉字作为音节符号音译外来词时,一旦汉字组合在一起不能形成有意义的组合时,汉字就成了真正的音节符号。也就是说,当汉字组合在一起不能形成有意义的组合的时候,单个汉字的意义就消失了。如“沙”本身是有意义的,“发”本身也是有意义的。可是,“沙”和“发”组合成“沙发”时,“沙”与“发”之间不能形成有意义的组合,“沙”和“发”两个单字的原有意义也就消失了。在“沙发”中,“沙发”是两个音节组合成一个整体,充当一个最小的音义结合单位的语音形式。

AIDS(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这个英文缩略语,在汉语中的最初译名是“爱滋(病)”,在新加坡华语中的译名是“爱之(病)”(在台湾地区还有“爱死病”的译名),无论是“爱滋(病)”还是“爱之(病)”,字面上都形成了有意义的组合。从“爱滋(病)”改为“艾滋(病)”,避免了字面意义的误解(“爱滋病”的字面意义可以理解为“由爱滋生的病”)。在“艾滋(病)”中,“艾”和“滋”成了真正的音节符号(当然或许也会有“由‘艾’草滋生”之类的“望文生义”)。可见,单个汉字的意义消解取决于字与字之间的关系。诸如“克隆(clone)、沙发(sofa)、朋克(Punk)、巧克力(chocolate)、迪斯科(disco)、歇斯底里(hysteria)、阿司匹林(aspirin)、布尔什维克(большевик)”之类的音译词,字面上都是无理组合,其音译的

性质都是比较明显的。

字面意义的有无也取决于语言、社会、历史等各方面的知识，也就是一般所讲的读书识字的程度。如“成吉思汗”由两个音译成分“成吉思”和“汗”组合而成，“汗”为古代突厥语 qaγan(古代突厥族对最高统治者的尊称)的音译形式“可汗”的缩略。如果不了解这个词源，仅仅从字面上看，很难看出是由“成吉思”和“汗”两个部分组成的。

来自蒙古语 xota(口语作 xot)的音译“浩特”，义为“城市、村寨、营子、居民点”，但一般人还是把“呼和浩特、锡林浩特、二连浩特”之类的蒙古语地名看作囫圇一团的整体。就连“呼和浩特”的简称也是“呼市”，其构造是截取“呼”字再附加汉语成分“市”组成的。

在捷克斯洛伐克解体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之前，一般人也并不知道“捷克斯洛伐克”其实是由“捷克”和“斯洛伐克”组合而成的。

如果说还有一些人知道“捷克斯洛伐克”是由“捷克”和“斯洛伐克”组合而成的，那么知道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名称其实也可以分解的人就更少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是西班牙语 Buenos Aires 的音译，意为“好空气”。除非了解其西班牙语源，否则就只是把“布宜诺斯艾利斯”看作囫圇一团的译名。

米格战斗机，“米格”二字是前苏联战斗机设计师米高扬和格列维奇的姓名首字母缩略语的音译(МИГ，英文写成 MiG 等形式)，除了专业人员，一般人都会把“米格”二字看作一个整体，而不知道“米格”二字是两个设计师名字缩略语的译名。

“阿马科月球石”(Armalcolite)，“阿马科”字面意义是难以据“字”分解的，谁能想到“阿马科”其实是三个人名的缩略语音译呢？^①

① “阿马科”因美国宇航员 Armstrong、Aldrin 和 Collins 而得名。“阿马科月球石”是这三位宇航员从月球上采集回来的月球石。见刘正琰等(1984，8页)。

诸如“呼和浩特、锡林浩特、二连浩特、捷克斯洛伐克、布宜诺斯艾利斯、米格、阿马科”之类的译名，都只宜看作一个整体。尽管从语源上看内部是有结构的，但从汉语音译形式上看，都无法在词面上形成有意义的合理结构。这类音译形式，犹如拟声词“噼啪、哗啦、咕咚、哐啷”，虽然其中的每个音节都可以独立用来摹拟声音，但“噼啪、哗啦、咕咚、哐啷”都应看作一个囫圇一团的整体，否则就可以把这些拟声词看作复合词；但是看作复合词，结构是难以分析的。^①

比较起来，“维萨卡”(Visa card)、“扎啤”(a jar of beer)、“苏打威士忌”(soda whisky)的意义就比较清晰，这主要是由于“卡、啤”作为音译成分沿用既久，在汉语中已经扎根，再用于跟音译成分组合时，其意义就比较清晰，使得人们不至于把“维萨卡、扎啤”看作囫圇一团的音节串了。而“苏打”、“威士忌”虽然也是音译词，但在汉语中沿用已久，不仅可以独立成词，也作为构词成分构造了不少词语，如“小苏打、苏打水、苏打饼干、威士忌酒、金牌威士忌”等词语，因而结构和意义都是清晰的。

四、从非语素音节的语素化看音译词词义的“重新分析”

由于音译用字本来都是有意义的，因此人们往往根据音译用字的意义对音译词的意义作出解释，或引申使用，这就把非语素音节的音译用字“语素化”了，由此产生了“重新分析”(reanalysis)。这样的重新分析也是音译词应用中的常见现象。例如：

我在历史所工作的时候，党委书记伊达常把一个词挂在嘴边，叫做“八九维克”，就是说，你做不到十分的布尔什(十)维克，也应该做到八九分。按照这种逻辑，张申府大概只能做到“三分之一维克”。(《晚年张申府》，《作家文摘》2006年9月29日第6版)

① 至于拉丁美洲国家 Trinidad and Tobago 的译名“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其中因有汉语成分“和”，结构自然是清晰的。

“布尔什维克”是音译词,其中的每个音节都没有独立的意义,每个单字原有的意义在音译组合形式中都消解了。但是由于其中的“什”字原有的意义,在语用中把其实只是记音的音节也“意义化”了,由此产生了“八九维克”、“三分之一维克”之类的表述。在“八九维克”、“三分之一维克”中,“维克”也语素化了,成了“布尔什维克”的替代性成分。

还有利用异读字形成的“重新分析”,例如 dancing girl 音译为“弹性女郎”,“弹”字异读,读作 dàn,正好译 dancing 中的 dan-,而读作 tán,又可跟“性”形成“弹性”(tánxìng)的语义组合形式。^①

赵元任(2002, 623—624 页)也有这类举例:“例如 Sandwich 叫‘三名治’(‘名’是因为 w 唇音的影响),这里的‘三’字完全是音译。可是近来有人管三层面包的 three decher 叫‘三名治’,于是就有人提议管平常两层面包的 sandwich 叫‘二名治’,那么丹麦式的一层面包上头加菜的应该叫‘一名治’了。不过这还是说着玩儿的猜想,还没有听见人说过叫过或吃过二名治、一名治呐。”

既有有意识的“重新分析”,也有下意识的“重新分析”。下面是因误听而下意识地“重新分析”的一个例子:

刘玉生赶紧解释说:“我不是说房子……我是说,加入 WTO 以后……”妻子打断他的话:“什么‘大不了跳楼’?我还没活够呢,为啥跳楼?”刘玉生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你呀!除了柴米油盐,还知道什么?是 WTO,就是世界贸易组织。”(李肇正《安得广厦》)

王忠亮(1995)举过一个例子:俄语的 воскресенье(星期日),音译过来近似汉语的“袜子搁在鞋里”。这一理解完全是音近造成自然联想而产生的“重新分析”(reanalysis)。在这个因音近而产生的“重新分析”的基础上,还创造出“星期天休息——袜子搁在鞋里”这样的俗语。

还有一种“重新分析”,即音译外来词的构成音节作为音译词的代

① 这种异读的巧合也可能与方言口音有关,在方言中“弹”字声母为[d],例如吴方言上海话、苏州话。

称与汉语成分组合,久而久之,原音译词的音节都实现了语素化,本来囫圇一团的音译词内部也就产生了结构。如“蘑菇”是来自蒙古语的音译词,“蘑”、“菇”本来都没有独立的意义,两个音节囫圇一团,但“蘑”、“菇”分别作为“蘑菇”的替代性成分在跟汉语成分的组合中,构成了“鲜蘑、口蘑、松蘑”、“草菇、金针菇、平菇”等词语,久而久之,“蘑”、“菇”各自有了独立的意义,“蘑菇”也就由复音单纯词变成了并列结构的复合词。

第四节 从文字所使用的符号层面看音译词特点

一、从汉字的字符看音译外来词的特点

表音文字所用的字符只是音符。^①表音文字的字符在语音形式上有的与音位对应(如拉丁字母),有的与音节对应(如日文假名),有的是混合型的(如朝鲜文/韩文所使用的자,자是由记录音位或音位组合的两个到四个字母组成的,자在语音形式上与音节对应),还有写下来是记录一个音位的记音符号,念起来实际上是一个音节的阿拉伯文字。^②

汉字所使用的字符既有音符,也有意符,还有记号。汉字字符的特点使汉语音译外来词具有不同于其他语言中音译外来词的形式面貌。

汉字的音符(声旁),其作用是表音。由于语音的变化,现代汉字中的音符有的已不能准确表音。从音符与语音形式的对应方面来看,有的音符与音节对应(如“茉莉”中的“末”、“利”,“葡萄”中的“葡”、“萄”),有的音符对应于韵母(如“谁、睚、维、唯、堆、推”中的“佳”)。汉字的形旁具有表示意义类属的作用,人们习惯于借助声旁来辨识读音,借助形

① 裘锡圭(1985)。拙见认为,表音文字的字符除了音符以外,也用记号,如 write 开头的 w,既不表音,也非意符,只是在书写形式上区别同音词的一个记号。当然,这个 w 可能是古英语书写的残留,在古英语中可能是记录语音的。但在现代英语中,纯粹只是个记号。

② 参杨锡彭(2004)。

旁来辨识字的意义。在外来词的记写方面,也是如此。但是,音译用字的字符在表音、别义方面的作用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

“猩猩”是来自匈奴语的借词。在《山海经》中,“猩猩”又写作“狴狴、生生”。在现代汉语中,只有“猩猩”一种词形。与“生生”相比,“猩猩”有反犬旁,显然更能以形表义。可是跟“狴狴”比,“猩猩”的笔画更多,字形更复杂。为什么“猩猩”留了下来,而“狴狴”却消失了呢?可以解释的原因是:“猩猩”中的音符“星”表音更准确、更合理。所以,在选择音译用字乃至为音译而造字时,人们总是力图准确反映外语原词的语音。

但是,有些音译的外来词,语音与外语原词似有较大距离。比如清代官名、满语的 *hiya*, 汉字译名写作“辖”,是“侍卫”一类的官员。“辖”的声旁“害”在现代汉语中的读音是 *h* 声母,可是“辖”念作 *xiá*。比较 *hiya* 和 *xiá*, 可以看出它们的声母是不同的。这归因于语音的历史变化。众所周知,现代汉语声母 *[ɕ]* 的来源之一是齐撮呼的声母 *[x]*, 由于历史音变,原来跟外语原词在语音上有明显联系的音译用字,根据现代读音,却已看不出语音联系了。

汉字中的形旁具有表示意义类属的作用,人们习惯于借助形旁来辨识字的意义。这种习惯极其深入地影响着人们的用字认字过程。例如“啰嗦”是个叠韵联绵词,^①其基本义是“(言语)繁复”。“啰嗦”二字其实都只是记音的音节,“口”字旁只是刻意加上的。在手写文本中,人们习惯于写成“啰嗦”。在使用电脑时,如果采用的是基于字形的输入法,也往往要从“口”字旁入手拆字输入。这往往是下意识的,其原因就在于写字人觉得“啰嗦”跟言语有关,应该加“口”字旁。《现代汉语词典》(1983)列出的词形是“罗唆”和“罗嗦”,《现代汉语词典》(2005)改成

① 一说“啰嗦”是来自满语的音译词,见赵杰(2000, 150页)。这两者并不矛盾。所谓联绵词,其来源很复杂,有的很可能就是来自异族语言的音译词。

了“啰唆”，同时加注：“也作‘啰嗦’”。这个词形的更改，应是照顾到人们对于汉字的认知习惯的原因。

由于汉字形旁的特点，人们在选取音译用字时，也习惯于把作为音译符号的字加上形旁（意符）以表示意义类属，从“目宿”到“苜蓿”的变化就是如此。有“热带水果之王”的“榴梿”，其名称来源有个广为人知的传说：

热带水果榴梿，有着“来自地狱的气味和来自天堂的味道”，据说是当年三宝太监郑和率船队下西洋，在南洋群岛发现的。因其口味鲜美，令在海上漂流已久的郑和一行乐不思蜀，留连忘返，因此，郑和为其取名为“留连”。后来植物学家取其谐音，改为榴梿。（《环球时报》2003年5月16日，第8版）

其实“榴梿”一词只是印尼语 Durian 的音译，原义为“有刺的”。^①“木”字旁不过是好事者的刻意所为。“榴梿”也作“榴莲”，不过“榴梿”带“木”字旁，在表示意义类属的作用方面比“榴莲”更合理一些，所以海内外都以“榴梿”作为正式词形。

从历史上的情况看，好些早期一词多形的音译外来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往往是那些音译用字带有合理形旁的词形逐渐战胜其他词形而流传下来。例如“茉莉”是来自梵语的音译外来词，原来还有“末利、末丽、末罗、抹莉、抹厉、没利、摩利”等词形，但流传下来的仅仅是

① 这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新加坡中文硕士班孙爱玲同学（印尼华人）告诉我的。马来-印尼语中的元音前面的 D，在华人中读音复杂，其中因为闽南话[t]声母的音值与浊声母[d]的音值比较接近，所以把马来语 Durian 的 D 读成 l 声母，于是就有“榴梿”的译名。又，一般把马来西亚和文莱苏丹国所使用的官方语言称为马来语，马来语与一般称为印尼语的语（在通用于马六甲海峡地区、特别是廖内岛的马来语基础上发展而成）之间虽有差异，但有很大的共同性，因此可称为马来-印尼语。所谓马来语与印尼语其实是一种语言，由于人为的原因分为不同的名称：Bahasa Melayu（马来语）和 Bahasa Indonesia（印尼语）。正因为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三国所使用的官方语言有很大共同性，所以三国成立了简称为 MABBIM 的语文协调组织（Majlis Bahasa Brunei Darussalam-Indonesia-Malaysia，意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达鲁萨兰语文委员会”），负责制订拼写、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共同标准，以协调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三国语文的差异。

“茉莉”。“茉莉”的“草”字头不仅有表示意义类属的作用,而且“茉莉”二字都有“草”字头,可以在字形上表示出“联绵”之义。“袈裟”借自梵语,历史上曾有“迦沙、迦沙野、迦沙曳、迦沙异”等不同形式,但只有“袈裟”留了下来。诸如此类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汉字的声旁虽然只是表音的符号,但其形体在表义方面也有作用。“葡萄”是来自古代西域大宛语(一说古伊兰语)的音译借词,又作“蒲陶、蒲桃、葡陶、蒲萄”。跟“蒲陶、葡陶、蒲桃”相比,“葡萄”的形旁更一致,更能以形显义。从声旁的形体看,“葡萄”比同样有草字头的“蒲萄”所使用的声旁在字形上更相近,因此更能表现出“葡萄”意义上的“联绵”特征。在跟“蒲陶、蒲桃、葡陶、蒲萄”等词形的竞争中,“葡萄”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其原因可以从字的形体比较中看出端倪。

但是,音译用字中的字符表义合理的不一定合用。如果字符形体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不通俗,人们也会趋易避难,而不在意字符的合理与否。

“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来自满语 ula 的音译。“乌拉(鞋)”则是东北地区冬季穿的、用皮革制成的鞋,因鞋里垫以乌拉草得名。“乌拉(鞋)”又写作“靽鞢”。《现代汉语词典》(2005)以“乌拉”作为主要词形,并注“也作[靽鞢]”,而“靽”字条目则注以“[靽鞢](wù·la)同[乌拉(wù·la)]”。按理说,“靽鞢”中有形旁“革”,比“乌拉”更能以形表义,可是,为什么以“乌拉(鞋)”作为主要词形,而“靽鞢”仅仅是次要的形式呢?可以理解的原因是,“乌拉”比“靽鞢”笔画少,字形简单而且更通俗。

如果某个特定形体的音译用字太冷僻,不能重复使用,往往也会被一个字符并不合理的同音字所代替。英语的 shirt 在方言中的借词形式有“恤衫、襖衫”等词形。刘正琰等(1984)以“襖衫”作为正条。但是现在“恤衫”逐渐流行开来,“襖衫”却不见踪影。从形旁的表义作用来看,“恤”字更合理,但是这个字太生僻,电脑字库中也难以找

到。“恤”字的字符虽然不合理,但是它出现在“抚恤、怜恤、体恤”等词中,更常见,更常用。反正只是记音字,用“恤”记写 shirt 其实也不离谱。对于“体恤衫(T恤衫)、恤衫”,望文生训者也是可以找到一番说道的。

音译用字在音译词中只是作为音节符号来使用的。但是,由于汉字习惯上通过字符来表示词义,因此在用以音译的同音字中,那些字符最符合音译词词义的单字最有机会作为新的语言成分“寄生”之所。日本释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有“岚风”一词。何亚南(1999)根据汉译佛经文献的材料指出,“岚风”之“岚”是梵语(或巴利语)的汉语音译词“随蓝、旋蓝”之“蓝”的同音替代字。“岚”的本义是“山中蒸腾的雾气”,“由于它经常出现在‘毗岚’等表示‘迅猛风’义的音译词中,加上字形又从‘风’,这样就使它逐渐获得‘大风’之义”。从此分析来看,作为音译外来成分的“岚”与汉语原有的“岚”实际上是同音同形(字形)的关系,犹如英语 polishing 的音译“抛”与汉语原有的“抛弃”的“抛”之间的同音同形(字形)关系。“岚”在众多的同音字中能有此“新生”机遇,不能不说与其字符的形式有关。

二、从字符的性质看汉语音译词与日语音译词的差异

汉字在语音形式上与音节对应,所以从语音形式上分析,可以把汉字看作音节文字。但是单个汉字大都记录了语素,因此大多数汉字从音节的性质上看,都是具体的音节,也就是记录了语言成分的音节,而不是纯粹的抽象的音节。即使用作音译符号,单字原有的意义往往也不会消失。

日文假名是真正的音节文字,其特点在于假名是纯粹的抽象的音节符号。虽然在文字作为语言符号的符号这一层次上,一个日文假名可能记录一个音义结合的语言成分(如とち,两个假名记录了两个最小的音义结合体,用日语汉字记写,就是“土地”),但是更多的情况是一个

假名只记录一个多音节词中的一个音节的读音,不具备独立意义,如がいこく是四个音节,但只记录了两个最小音义结合体,用日语汉字记写,就是“外国”(がい,外;こく,国),其中每个假名都不单独表示一个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在字符这个层次上,日文假名只记录语音形式,不表示意义。这就使日文假名作为记录外来词的符号时,具有了跟汉字不一样的特点。主要的差别在于汉语中的音译外来词在字面上可能形成与外语原词根本无关的意义,而日语音译外来词则不可能有这样的意义“别解”的情况。由此,用汉字作为音节符号音译外语词与用日文假名作为音节符号音译外语词,特点不尽相同。

一直有人认为,日文假名比汉字更适合用来音译外语词。锦文·斯坦博格(1997)说:“从‘质量’上来说,自本世纪初以来日语中的外来语绝大多数为音译词,而中文中的外来语绝大多数为意译词。这种‘质量’上的区别与中日语的语音结构及文字系统的许多不同之处有很大联系。日语中表音的片假名系统很适应直接音译,片假名方方正正的形状在日语文章中又很醒目,这些原因从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片假名外来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飞速增长,这种增长持续到了目前多少有些失控的趋向。……相比之下,中文只能依靠汉字来表达外文词汇的发音及概念,直接音译多有困难或造成误解……”

汉语中的音译词的书写采用的是汉字,音译词在书写形式上缺乏特别的标志,而且由于把语素字当作音节符号用,单字原有的意义使人们往往有望文生义的误解。加上汉语用字的习惯是把记录音译词的文字形声化,这就使得音译词的外来身份模糊不清。因此,辨认汉语的音译词,往往需要词汇知识、历史文化知识。例如“商籁体、味美思、回丝、鹑鹑、乐果”,从词形上看,很难看出它们跟汉语的固有词有什么不同,其实都只是音译词:

商籁体(英语 Sonnet),十四行诗,欧洲一种格律谨严的抒情诗体。又作“商籁”。

味美思(英语 Vermouth),苦艾酒,一种用苦艾等香草调味的白葡萄酒。

回丝(英语 waste),废料。如在纺织生产中专指不能成为正品的纱线,用来擦拭机器的棉纱头。又作“威士”。

鸸鹋(英语 emu、emeu、emew),又作“鸸鹋”,鹤。

乐果(rogor),内吸性有机磷杀虫杀螨剂。

即使是半音译半意译的外来词,也往往因为音译用字的字面意义与整个词义严丝合缝般地贴切,使得人们几乎不了解其外来的性质。如“本票”,其中的音译成分“本”的外来面貌几乎是看不出来的。其实“本票”是英语 bank cheque 的半音译半意译(意译则是“银行支票”),“本”字为 bank 的音译,“票”字是 cheque 的意译。

比较起来,日语中的外来词在书写形式上有一目了然的效果。日文假名包括平假名和片假名,日文中的外来词都以片假名书写。因此,在日语书面语中,片假名书写的音译外来词在形式上跟用平假名和日语汉字书写的日语成分之间的区别是清清楚楚的。同时,日语假名是纯粹的音节符号,^①作为音译符号使用时,没有汉字那样的字面意义,更不会像汉字那样把音译字本身所具有的意义附会到音译词上去。从这些方面跟汉字进行比较,日文假名显然更适合作为音节符号来音译外来词。正因如此,日本明治初期的外来词,有用汉字音译的,有用汉字意译的,有用片假名音译的,也有解释说明的,还有音意结合等方法。

① 表示拨音的ん并不表示一个独立的音节,只表示一个音素(n),这个ん附在其他假名后面,共同构成一个音节。表示促音的っ也是不发音的,它只表示出现在它前面的音节的一个发音特征,也就是“一个短促的顿挫”。拗音是い段假名和复元音ゃ、ゅ、ょ拼成的音,写下来是两个假名,但其实只是一个音节。拗音和拨音组成拗拨音。拗拨音写下来是三个假名,但也只构成一个音节。拗音和促音构成拗促音,拗促音写下来是三个假名,但是只构成一个音节。所谓长音是把一个假名的元音拉长一拍。长音也用一个假名表示。用一个假名表示的长音实际上是不自成音节的,它只不过表示前面的音节发音上拉长一拍。(杨锡彭 2003c, 30—31 页)曾见把日语どうもの罗马字拼写 doumo 音译为“多务魔”,把ありがとう的罗马字拼写 arigatou 音译为“阿里嘎多务”,其中的“务”就是误把表示长音的符号 u 记写成一个音节实体了。

但日语借用外来词的方式后来逐渐变成只是音译,主要就是因为使用假名比较便利。^①

但是,日文假名说到底在语音形式上也是音节(有人说日文假名与 mora 对应,而不是与音节对应。在这个理解上,mora 是和音节相对而言的节律概念,也就是音长的概念。有的日语教科书说日语是“音拍语言”或“mora 语言”,意思是假名与 mora 对应,这只是节律意义上的分析),在音译外语词时,也是用语音形式上是一个音节的符号去切分外语词的音节结构,因此日语中音译外来词在语音形式上的最小单位也是音节。从用音译借用印欧语音节结构复杂的语词成分来说,日文假名与汉字的功能是一样的,都是用一个整体音节的符号去“对付”印欧语错综复杂的音节结构。什么是“对付”?“对付”就是“应付”加“将就”,就是“凑乎”。在这方面,假名并没有更适应于音译的长处。由于英日语音系统不同,用形式上是一个音节的假名切分诸如英语这样的多音节语言的音节结构,就不免穷于应付。如英文的 comeback 在日文中的音译词为カムバック(“重返,恢复原位”义),英文中的 come 为一个音节,日文表达为两个音节(カム),英文 come 读音中的音缀[-m]不带元音,但在日文表达中却是一个包含元音的音节ム;英文 back 的音缀[-k]不带元音,日文中的ク却是一个包含元音的音节。不同语言的语音系统是不同的,所谓“译语无正音”^②并不仅仅适用于汉语音译外来词。

近一二十年来“片假名英语”(katakana-eigo)在日本泛滥,不仅日本人往往不懂,也让英语社会的人莫名其妙。如把 strong([strɒŋ])切分为三个语音段落“s-/ t-/rong”,读作 sutaron,其中英文中只标记一个

① 参周玉琨(1997)。

② 鲁国尧(1996):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杀虎张’条:‘张万户兴祖……后以国言赐名拔突,拔突即拔都,都与突,字虽异而声相近,盖译语无正音也。’……‘译语无正音’说对后世颇有影响,顾炎武《日知录》卷九有‘外国之音皆无正字’条,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九有‘译音无定字’条,卷十六‘题讳填讳’条自注,‘译音无正字’”。

音素的 *tr*- 被拆分开来, 分别自成音节和作为一个音节开头的辅音。^① 至于英语词语在日语中的译名, 更是用语音形式是音节的假名来切分、对应英语中的音素, 如 *Ham*(火腿) 音译为 *hamu*, *restructuring*(重组) 音译为 *resutura*, *England*(英格兰) 音译为 *engu-rando*, *ice cream* 音译为 *aisukurimu*。“片假名英语”对日语词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由“片假名英语”形成的日语外来语词汇越来越多, 在青年人的交际中尤多。产生“片假名英语”和“片假名英语外来语”的原因就在于日语语言成分的音节结构与印欧语系的语言是不同的, 在语音形式上与音节对应的假名能够胜任记录日语语言成分, 但以之切分印欧语的语音结构, 所遇到的问题与用汉字音译印欧语基本上是一样的, 并无所谓更适宜音译之说。

至于说日语中音译词数量极大, 则主要还是社会原因。“当 19 世纪中日两国都与西方接触的时候, 日本的最初反映比中国积极得多。伴随积极态度而来的是更加宽泛的文化上的兼容性, 反映在词汇输入上就是大量音译词的产生。这与中国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中国只是近几十年来才更加积极地与西方接触。汉语里的音译词较少也可以说明这一点。”^②从历史上看, 情况的确是这样的。近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中国社会的对外开放、对外接触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 越来越频繁。汉语中音译词大量增加, 甚至连音译也不能满足大量吸收外来词的需要, 以至于出现了大量的字母词。可见各种类型外来词语在数量上的比例既与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有关, 更与社会原因有关。

① 这与汉语音译时的习惯做法是相同的, 如 *Truman* 音译为“杜鲁门”, *Truman* 中的 *Tru*- 被拆分为 *T*- 和 *ru* 两个部分, 再用汉字“杜”和“鲁”分别记写。之所以用“杜”记写英语原名中的字母 *T*- (*T*- 并不是独立记录语音要素的字母), 与方言语音有关, 否则不会用声母为 *d* 的“杜”字来记写英语原名中的字母 *T*-; 而 *ru* 译成“鲁”, 则是因为汉语习惯上用 *l* 声母替代英文字母 *r*- 来选择音译用字。不过, 中国人说英语时一般都不采用这样的读音方法。

② 邹嘉彦、游汝杰(2001, 172—173 页)。

晚清社会的状况,决定了汉语吸收外来词主要是通过书面翻译,外来词的引进、消化、吸收也只是极少数知识分子的工作,带有很强的专业性。书面翻译中要考虑便于理解,更易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在翻译时就不得不煞费苦心,甚至于“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翻译者的文化水准也决定了字斟句酌地进行意译的可能性。

当今社会,教育普及,懂得外语的人越来越多,同时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对外交往也空前地频繁和密切。如果说外来词的引进和吸收主要取决于社会的开放程度,那么在改革开放以后音译词的大量出现则是由于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外语普及程度越来越高,外来词的引进、吸收也已成为大众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然所谓大众化也是相对而言的,即相对于极少数翻译者来说的大众化)。人们接触外来事物、吸收外来词语已不再像晚清时代那样依赖于翻译家的翻译,而是大众亲力亲为的活动。无数个“翻译者”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参与外来词的引进、使用,语词的翻译、引进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工作”。

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如何确切表达外语词的意义,是没有那么讲究的,或因无暇顾及,或根本不多加考虑,或因语文水平的限制无法确切表达。与“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意译相比,^①音译无疑是最方便的借词手段。而且,外语词往往先在口语中夹杂着使用,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句内语码转换”或“语码混用”,如果遇到需要书面表达的场合,省事的方法就是按照外语词的读音差不离地记录下来,甚至连音译也懒得考虑,就直写外语原词(如 e-mail)。讲究的“翻译者”各据美意,赋予音译词似有似无的字面意义,如“伊妹儿(e-mail)、雅虎(Yahoo)、雅思(IELTS)”;或字面上有意义,但字面意义与词义根本无关,如“托福(TOEFL)”等。不讲究的,则随意音译,只要“致用”即可。这就是改革

① 当代社会用“意译”的方式借用外语词,也早已不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般地斟酌,而往往是“囫囵吞枣”式的、制作“快餐”式的,因此产生了许多语义别扭的意译词。参第八章第一节。

开放以来音译词越来越多的根本原因。

第五节 从文化心理的角度看音译词词面形式

一、音译用字蕴涵习俗心理和褒贬态度

语言符号负载着文化信息。绝大多数单个汉字都是有意义的,因此记录了意义的单个汉字自然包含着社会文化心理。例如汉语地名历来注重避污秽、避忌讳,因此有一些字眼不太雅观的地名后来都改变了用字,也就改变了词面形式和词义。北京的一些胡同原名比较粗俗,使用谐音的方法改为比较文雅的新名,如“母猪胡同”改为“墨竹胡同”,“哑巴胡同”改为“雅宝胡同”,“猪尾巴胡同”改为“朱苇泊胡同”,“牛蹄胡同”改为“留题胡同”,“屎壳郎胡同”改为“史可亮胡同”。^①台湾的基隆市,“基隆”之义其实并非字面上的意义,也没有“根基隆重”的意思。“基隆”实为闽南方言“鸡笼”的同音记写。用字的改换,习俗心理应是动因。

用字的习俗心理也反映在外族语言成分构成的地名音译上。东北的“吉林”(省名、市名)来自满语的音译“吉林乌刺”的减省,“吉林乌刺”早期写作“鸡陵乌刺”。从“鸡陵乌刺”到“吉林乌刺”再到“吉林”的变化,除了减省字数以求更为经济之外,用字的更换自然应是为了避秽求吉。音译用字虽然只是当音节符号用,但汉字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必然浸透着民族文化色彩,具有文化心理的底蕴。

马来西亚全国华语规范理事会 2005 年 4 月 8 日作出决议,将东海岸的 Kuala Terengganu 州的华文译名由“瓜拉丁加奴”改为“瓜拉登嘉楼”,以合当地华社民意。该州的简称“丁加奴”也相应改为“登嘉楼”,州名的缩略形式“丁州”则改为“登州”。Terenggaru 的官方译名一直

^① 常敬宇(1995, 196 页)。

是“丁加奴”，在华人报刊、地图及各种华文印刷物中广泛使用，但该州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华人社团不喜欢“丁加奴”中的字眼“奴”，一直采用“登嘉楼”之名，已有长达 30 年的历史。坚持多年，终于“正名”。

音译的译名往往被赋予褒贬色彩，因此从字面上也可以看出人们的褒贬态度。Benz 译为“奔驰”、Cocacola 译为“可口可乐”、Pepsi Cola 译为“百事可乐”，Google 译为“谷歌”，字面上都有赞美的含义。“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瑞典”等国名，用以音译的字眼都是很有美意的。而把 fallacy(义为“谬误、谬见、谬论”)音译为“发拉屎”，^①贬斥之意则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译名用字的选择也未必就需要如此当真。草率的译者对音译用字信手拈来，因此音译用字也未必就包含某种褒贬用意。不过，既然国人这么讲究字面意义，音译用字选择不慎，也就难免受到诘问。Africa 被译成“非洲”。既然中国人这么讲究词语的字面意义，非洲朋友入乡随俗，自然有理由对“非洲”这一译名表示不满：“中国人为什么把 America 译为美洲，却把 Africa 译为非洲？”

二、不同习俗、不同文化背景的用字心理并不相同

音译用字的习俗心理是复杂的。不同社会习俗、文化背景、语言环境，对于音译用字的习俗心理不尽相同。例如一些在中国人看来是有问题的字眼，马来西亚华人却并不在意。所以，并不能根据中国大陆人的用字心理来考虑马来西亚华人的用字行为。

马来西亚到处都有“茶餐室”，说是“茶餐室”，大都只有咖啡或奶茶，没有真正的中国茶。英文叫做 coffee 的饮料，茶餐室大都写作“咖啡”，但也常见写作“嗑呖”。“嗑呖”是 coffee 的方言音译（一说是马来语 kopi 的音译，但马来语 kopi 也是对英语 coffee 的音译转写）。这

① 刘正琰等(1984, 94 页)。

个“嗑叻”叫人看了多少有点不舒服,特别是那个“叻”字。“嗑叻”作为音译,加上“口”字旁表示跟“食物、饮料”等有关,这是马来西亚华人坊间用字的习惯。^①但也许是顾此失彼,只顾以形表义,似乎忘了“叻”这个字眼是跟“唾沫”有关的表示唾弃或斥责的拟声词。不过马来西亚华人并不一定如此理解。在当地学院上课时,我跟学生讲了“叻”字的本来意义,课堂上那些 20 岁左右的学生都很吃惊。

地名的音译用字也是如此。马来西亚沙撈越州诗巫市,其名得自伊班语。前任中国驻沙撈越州府古晋总领事吴德广先生在一篇《诗巫印象》的文章中说:“砂劳越的朋友告诉我,很久以前那里遍地长满野生红毛丹,伊班语叫它 Buah Sibul,故称诗巫。”(吴德广《一个外交家眼中的砂劳越》)^②“诗巫”是 Sibul 的闽方言音译。“诗巫”之“巫”尽管只是音译,在中国人看来,用字也不太好。不过不能以己度人,因为“巫”在马来西亚未必是不好的字眼。常见当地报刊报道有人生病不去医院,喝浸泡着符咒纸的水以祛邪驱魔;还有人登山失踪(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树丛茂密,即使山不太高、地不太广,也极易迷路),连政府的救援队也遍寻不果。失踪者家属请来“天师”,“天师”神通广大,口中念念有词,掐指一算,居然算得失踪者此时正在山间某处、状态如何,何时会在山间某处,而后一行人跟随“天师”急切奔向某处以期会面。虽然总是“空山不见人”,可是其后有人失踪,类似的事情又会重演。类似的“巫事巫情”在马来西亚屡见不鲜、司空见惯,“巫”想必也就不是什么不好的字眼。可资证明的是,“巫”先后作为 Malaya(马来亚)和 Malaysia(马来西亚)首音节的音译,都已沿用很久,大家都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华人把友族马来人称为“巫族”、“巫人”,把马来文称为“巫文”,把马来西亚执政党的名称简化为“巫统”,历史之久,已无从考

① 马来西亚华人小吃摊档大都把“包子”的“包”写成“饱”,而“大包子”就叫“大饱”。

② 中国通行的译名形式为“沙撈越”。以往马来西亚华语大多写作“砂劳越”,也有其他多种译名形式。2005 年 4 月 8 日,马来西亚全国华语规范理事会作出决议,将其词形定为“砂拉越”。

证始于何时,但从未听说友族提出抗议,否则指不定闹出什么种族风波来。“巫”字如此平常,地名“诗巫”有“巫”也就一点都不碍眼。可见由于文化习俗不同,并不能用一种文化习俗的“眼睛”看待另一种文化习俗的事物和现象,因此也不能用中国人对“巫”的理解来看待“诗巫”之“巫”的字面意义。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语言的社会,各种语言的接触乃至交融极其深入、广泛,因此对于音译用字一般人只是当作读音符号而已,从实际情况来看,马来西亚华人对于音译用字,远不像中国人一样讲究字面意义,这与中国人总是浸泡在汉字文化中而马来西亚华人一直生活在多元文化的语言环境中是大有关系的。虽然马来西亚华人也有华族文化、华文文化的基本背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人对音译用字的字面意义也是很讲究的,但从社会语言应用的一般情况来看,音译用字大都只是当作记音符号而已,并不是那么计较音译用字的字面意义的。“嗒呷”沿用已久,并未见有什么质疑,就是一个证明。

其实在中国也有因语言环境不同而对音译用字字面意义关注程度不同的情况。fashion show 在香港的译名是“花生骚”,“花生”作为 fashion 的音译,字面上的意义已使人有莫名其妙之感,而“骚”的字面意义恐怕就大煞风景了。也许“骚”字在香港并非北方话那种含义,抑或“骚”字在香港只是被看作音译成分,人们并不照实理解其字面意义。但是“骚”作为 show 的音译,在内地人看来是有违文化心理的。这也许正是台湾对 show 的音译“秀”成为风靡大陆的时髦,而香港的“骚”不为内地所取的原因。

三、译名的人文心理

音译用字的文化心理,还体现在外国人名 的汉字音译上。汉语的人名用字,往往很注意体现性别色彩,因此从姓名用字上往往即可辨别

人的性别。这种姓名用字上的性别意识也反映在音译姓名的用字上。如对外国女性姓名的音译用字中,常常使用的字眼有:

玛(玛格丽特、玛丽)、丽(丽莎、艾丽丝、奥德丽、朱丽叶)、娜(娜娜、安娜、海伦娜)、茜(茜茜、露茜)、妮(安妮、妮可、妮娜、莫妮卡)、莎(玛莎、阿加莎、莎莎)、莉(阿米莉亚、西莉亚)、丝(阿格尼丝、苔丝)、黛(阿黛尔、黛娜、黛米)、茱(茱丽娅、茱迪)、蒂(布兰蒂、夏洛蒂)、芬(斯蒂芬、芬娜)、琳(凯瑟琳、琳达)、娅(马西娅、索菲娅、塔妮娅)

当然,也可能在音译中有意淡化姓名的性别色彩,如美国国务卿 Rice 就译为“赖斯”,不在音译用字的性别色彩上做文章。

但是,就汉语汉字的文化心理而言,人们一般还是习惯于在音译人名的用字上体现出性别色彩。这里有一个实例。景德祥(2005)说:“去年9月底,笔者为《世界知识》提供了一篇关于德国大选的文章。发表前编辑来电话说,文中德国联盟党女总理候选人的名字不应为‘梅克尔’,而应该是‘默克尔’,还说这是新闻出版部门规定的‘标准译法’,没有办法。于是乎,文中所有‘梅克尔’全被改为对于笔者来说‘不堪入耳’的‘默克尔’。为什么‘不堪入耳’?因为这位德国女士的德文原名是‘Merkel’,更为准确、文雅而带有女性特色的音译应该是‘梅克尔’,而不应该是什么‘默克尔’。但是,‘默克尔’已是‘标准译法’,无可奈何。”

汉字字符中的形旁(意符)具有表示词义类属的作用。一般而言,没有人愿意姓名用字中带有反犬旁。过去一些使用反犬旁的国内少数民族名称的用字早已改用别的汉字。这一汉字心理也影响到懂得中文的外国人。冯志伟(1994)提及他接触过的一些懂得中文的犹太民族的学者,言谈之中,对于“犹太”这一音译译名(希伯来文的单数形式是 Yehudi,汉语历史文献中有“悠特”的音译译名)有带反犬旁的“犹”字感到不快、不满。虽然这仅仅是“望文生义”,但也并非毫无来由。其实还不止如此,“犹太”在字形上与同为音译的“犹大”很相似。但“犹太”这一译名

沿用已久,要改也难。所以,音译用字的选择也要有对字符的考虑。^①

第六节 音译作为借词手段的价值

一、音译是最快捷、最简便的借词手段

音译不仅是各种语言借用外语词的基本方式,而且往往是首选方式。人们在接触外来新事物、新概念之初,往往无暇细细推敲,或因不能确切理解外语词的含义,或找不出本族语言中意义相对应的语言成分来意译,为了赶紧“拿来”,就采用音译。从历史上的情况看,汉语引进外来词往往先采用音译,这正说明音译最快捷、最简便,往往是人们在借用外语词时优先采用的方式。

社会越是开放,对外交流越是频繁,音译词的数量就越多。大量外来事物、概念、现象涌入国门,来不及字斟句酌,音译无疑是最方便的手段。刁晏斌(2006, 269 页)指出,在现代汉语发展的第四阶段(改革开放至今)常用的音译词有“伊妹儿、海洛因、摩斯、舍宾、欧佩克、尤里卡、丁克、朋克、奥菲斯、麦当劳、比特、动漫、因特耐特,英特尔、雅虎、雅思、赛博/柏、喔克曼、秀”等。其中大多数音译词(如“伊妹儿、摩斯、奥菲斯、动漫、因特耐特,英特尔、雅思、喔克曼、秀”等)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汉语外来词词典》(刘正琰等编)中还没有收录,是近20年来才出现的。

音译不仅在汉语史上是借用外语词的主要方式之一,而且也是今后仍将继续使用的主要借词方式之一。

① 姚德怀(1998):“现在我们看到,《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乙未年六月号(即道光十五年、1835年)上已经出现了‘犹太人’这一译名。……可知‘犹太’这一译名是在约1823年—1835年间出现的,而首次创用‘犹太’这一译名的极可能就是郭实猎。”“郭实猎(原名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有多个译名:郭实腊、郭士立、郭甲立、郭施拉、吉士笠等,又有笔名‘爱汉者’。……郭氏1803年生于普鲁士(现属波兰)。”《辞海》:“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一译‘郭实腊’,德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

二、音译创造全新的词形,满足求新的语言心理

一般而言,借用外来词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本族语中所没有的事物、观念、现象,但是实际情况并非仅仅如此。求新求异是人的正常心理,语言使用也是这样。由于意译是用本族语言的既有语词来翻译外语词的意义,或用既有的语词成分构造新词,所以意译创造的新词在语词形式上似乎不太新鲜。音译则可以创造从声音到书写上的全新词形,满足人们语言使用上的求新求异的心理。因此,即使是汉语中已有词语指称的事物、概念、现象、行为,求新求异的社会心理也会使一些人乐于采用新的音译词形式,以区别于原有的词语形式。如意译的“激光”一词在汉语中沿用已久,原来也有音译词“莱塞”,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借用港台的音译词“镭射”,在俗文化中流行一时。汉语普通话中原有“公共汽车、出租汽车”等词,但又从方言中的音译词引入“巴士、的士”。

三、音译是最有效的借词手段之一

音译是最有效的借词手段之一。事实上由于不同语言的语义系统、文化背景不同,意译每每捉襟见肘。唐代玄奘法师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①秘密故。如“陀罗尼”。②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③此无故。“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④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⑤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①这“五不翻”实际上就是意译难以应用的五种情况。

20世纪初,胡以鲁虽然坚决反对随意“借用”(即“音译”),主张“义译”,但也认为“事物固有比字属名以定其号而终不可题号者,则无妨从其主称”的音译办法。他以为不妨音译的包括下列10类性质的词:①人名……虽有音缘,不取义译……②地名……尼达兰义为洼地,不能

① 参周定一(1962)。

称尼达兰为洼地。③官号各国异制，多难比拟……④鸟兽草木之名……此土所无而有义可译者，仍不妨取义，如“知更鸟”、“无忘草”等是也。无义可译则沿用拉丁旧名，然亦如葡萄、苜蓿取一二音以为之，俾同化于国语也。⑤金石化学之名亦然……⑥理学（此指物理学——引者注）上之名最难译……似专名而义含于其名者则宜慎重；称“爱耐而几 energy”曰“储能”，称“伊太 ether”曰“清气”，漫加状词，殆未有不谬译者，“爱耐而几”固有储有行，“伊太”在理想中，无从状其清浊也。“爱耐而几”或可译作“势”乎？“伊太”则“伊太”而已矣。⑦器械之属……无可译者……⑧玄学上多义之名不可译……⑨宗教上神秘之名不可译……⑩史乘上一民族一时特有之名不可译，如法律史上罗马人之自由权、市民权、氏族权，称曰“三加普 Tria caputa”，不能译“加普”曰“资格”……⑪

不同语言的词汇有不同的语义系统、文化背景，采用意译的方式借用外语词，即使译词与外语原词意义相近，也往往无法做到贴切、圆满。外语词指称的事物、概念、现象等往往是本族社会中所没有，根本没有相应的固有语词来指称，因此音译往往是不二选择。例如“幽默”一词来自英语 humour 的音译，曾经分别有人主张译为“滑稽”、“语妙”、“油滑”、“谐穆”等，还有“有情滑稽”②，都难以确切表达 humour 的意义，最后还是音译的“幽默”通行开来了。③ logic 曾被意译为“辨学、论理学、伦理、名学、理则、理则学”等，④但只有“逻辑”、“逻辑学”沿用至今。

有一种门锁在方言中叫“司必令锁”，“司必令锁”是英语 spring lock（弹簧锁）的半音译半意译。这一锁名迄今仍在用，尚无其他名称（在

① 参周定一（1962）。

② 见胡行之（1936，90页）。

③ “幽默”一词，来自英语 humour 的音译，但是有些著述、教材说“幽默”是意译或音意兼译，以其见于《楚辞·九章·怀沙》“陶兮查查，孔静幽默”。实似是而非，《怀沙》中的“幽默”乃“寂静无声”的意思，与译自英语的“幽默”是不相干的。也有人认为“幽默”意谓“隐藏着很有意思的信息”，既不确切，而且也只是主观解读。其实，“幽默”和曾有的“西鞅”一样，都只是音译。

④ 例见周定一（1962）。据刘正琰等（1984，216），“论理学”应是日语创造的译名。

北方,这种锁叫“暗锁”),但《现代汉语词典》(2005)未收录。如果意译成“弹簧锁”,是缺乏专义的,难以把这种弹簧锁跟别的弹簧锁区别开来。

有学者认为,中国形象的代表“龙”在引入以基督教文化为主流的西方世界时,误译成了《圣经》中代表魔鬼、撒旦的 Dragon 一词,导致中国“龙”的形象被误解和歪曲,因此建议把“龙”在英语中的译名改为 Loong。^①

凡此种种,都说明意译有捉襟见肘之处,音译是译借外来词必不可少的手段。从词在不同语言词汇系统中的价值(value)看,采用音译的方法译借外语语词甚至是“最保险的做法”:

借用外来词最保险的做法是全部照抄(包括语音)。现代日本人以及西方人多采用这方法。但中国人限于自己的文字和文化很不习惯全部搬用,然而翻译是很难的。我常说“上海的‘早饭’≠北京的‘早点’≠英语的‘breakfast’”,如果写“等号”那就只能是“≈”(大致相当于)。北京人的“粥”在上海人看来只是“米汤”。所以北京人的“早点”里光喝“粥”是不行的,还要有“干”的(如油饼、馒头等)。每个词在各种语言中处于它自己的语言系统中,而且不同语言在划分语义场时并不相同(这跟文化背景有关)。我认为不同语言中的词应该按其本义来理解,靠翻译是不准确的。这正是语言的复杂性和它的美妙之处。吕叔湘先生说翻译是“穷对付”,我很同意这一经验之谈。^②

可见,音译作为汉语借用外来词的方式,具有特定的功能,是意译等借词方式所不能替代的。

四、音译使外来词词义“专化”

音译可以使外来词词义“专化”(specialization)。^③ 这样的“专化”既

①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络版)“中国新闻”,2006年12月17日。

② 赵世开(1995)。

③ 词义专化(Specialization)通常指词受到上下文的限制缩小了外延,本书借此术语表示音译名具有特定的指称意义(designation)、消解原词的附加意义(connotation)和限定用法意义(usage)。

有特殊的修辞效果,同时也创造了具有专义的新词。

我们应该感谢那位将 *chanson* (法语,“歌曲”的意思)译为“香颂”的高人,这种传神的译法将法国流行乐区别于其他流行乐的“色、香、味”特质巧妙地传达了出来。(任波《听法国香颂,浪漫而忧伤:邓丽君、蔡琴、徐小凤都是典型的香颂风格》,《环球时报》2005年5月20日第20版)

chanson 如果意译为“歌曲”,只是个通名,并不是特定的指称,而“香颂”这一音译名作为法国流行乐的专称,不仅把法国流行乐与其他音乐区别开来,也把法国流行乐与其他国家的流行乐区别开来了。

音译这一外来词词义“专化”的手段,不仅创造了可以独用、具有专义的汉语新词,而且消解了外语原词的意义,使之可以仅仅作为区别性成分,与同义的汉语词语成分组合在一起,构成新的词语,如“香颂歌曲、香颂音乐”。就“香颂”所记录的外语原词的意义来说,“香颂”就是“歌曲”的意思,但是“香颂歌曲、香颂音乐”的语义构造并不是“歌曲+歌曲”、“歌曲+音乐”,因为汉语译名“香颂”已经不等于法语原词的意义。类似的例子有很多,例如把 *Bahas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语)译为“巴哈萨印度尼西亚语”^①,*Bahasa* 义为“语言”,但在“巴哈萨印度尼西亚语”中,“巴哈萨”只是一个区别性符号。还有泰国的“湄南河”,“湄南”在泰语中就是“河”的意思。请看“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的解释:

昭拍耶河(泰语:แม่น้ำเจ้าพระยา),在大中华地区俗称湄南河,是泰国最主要的河流。“昭拍耶”在泰语中的意思是“河流之母”,而“湄南”其实是泰语河流的意思。^②

音译的词义专化作用于此可见一斑。由于音译具有词义专化的作

① 赫德森(1990, 43页)。

② 南京大学中文系马来西亚中文硕士班同学雷贤淇提供了这一词例。关于“昭拍耶河”与“湄南河”的异名,来自 <http://columbia.thefreedictionary.com> 的资料说明,“昭拍耶河”(Chao Phraya)又称“湄南昭拍耶河”(Mae Nam Chao Phraya or Menam Chao Phraya),由此可见异名“昭拍耶河”、“湄南河”的形成原因。

用,用音译还可以避开同名。例如“祁连山”,“祁连”是匈奴语的音译,义为“天”。^①“祁连山”即“天山”。青海甘肃交界处的“天山”借助于音译的“祁连”与新疆“天山”区别了开来。

由于音译译名具有词义专化(Specialization)的作用,因此译借外来词时,有些不宜采用意译的外语词,采用音译来译借是比较适宜的。尤其是专名,往往只能音译。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种情况:

1. 国名、地名、人名宜用音译。

Canada(加拿大)源于美洲原住民语言的 Kanata 一词,意为“村庄”。Canada 一词源自“村庄”,但现代 Canada 并不是村庄,因此 Canada 作为国名只能音译。“耶路撒冷”是希伯来语 Irshalom 的音译,“耶路”(Ir 的音译)的意思是“城市”,“撒冷”(shalom 的音译)的意思是“和平”,^②如果直接意译为“和平城市”,也就失去专义,不具区别性。“西双版纳”是来自傣语的音译,“西双版纳”意思是“十二”,“版纳”意思是“盆地”,直译就是“十二盆地”,意义也是不够“专化”的。在蒙古语中,内蒙古自治区的“包头”这一地名的意思是“有雄鹿”,“巴彦诺尔”的意思是“富饶的湖”;^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县,是古龟兹国之地,“库车”在维吾尔语里的原义是“十字路口”或“通衢”。这些地名用意译都难以形成有专义的地名。

如果地名中的专名是人名或地名就是个专名,自然就无法意译,如新加坡有 Verasamy Road(维拉三美路),其中专名部分的 Verasamy 是一位印度裔医生的名字;^④新加坡地名“樟宜”(Changi)是以南洋一带特有的一种树名来命名的,就只能音译。

地域名称如果采用意译,可能会有不同的译名。Africa 的音译全

① 刘正琰等(1984, 283 页)。《辞海》认为“祁连”在蒙古语中义为“天”。

② 黄晴《我亲眼看到的以色列》,《环球时报》2002 年 11 月 21 日第 10 版。

③ 张清常(1978)。

④ 黄友平(2006)。

名是“阿非利加”。“阿非利加”在拉丁语中意为“阳光灼热”，在梵文中则是“印度西边的大陆”的意思，在腓尼基语中还有“富饶肥沃的水果之乡”的含意。Canada(加拿大)一词的原义，除了“村庄”以外，还有一说，义为“最北的地方”。只有采用音译，才能避免此类译名歧异，同时也使意义“专化”，形成专名。

汉语中意译的外国地名、国名也是有的，如“牛津”(Oxford)、“冰岛”(Iceland)等，但比较少，大抵是因为音译的形式太长，意译有利于缩短词形，同时外语原词是复合词，结构清晰，便于意译。相比之下，下例中“尼日尔河流经的土地”就难以形成一个词化的国名：

尼日利亚意为“尼日尔河流经的土地”，它的灿烂文明、石油财富、民族性格甚至社会纷争都源于这条大河。（《尼日利亚，大国之路不平坦》，《环球时报》2007年1月9日第7版）

英语中的国名、地名、人名等，首字母要大写，与首字母小写的同形同音词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不能根据首字母是小写的同形同音词来意译地名、人名、国名。比如人名 Rice，与义为“米饭、稻子”等义的 rice 并不是一回事，正如汉族人的姓“羊、牛、马”的意义与指称动物的“羊、牛、马”等词的意义不是一回事。英美姓氏 Younghusband(音译为“扬哈斯本”)若意译就成了“年轻丈夫”，姓氏 Longstreet 直译则是“长街”(音译是“朗斯特里特”)，因此都只宜音译。

2. 产品名称、商标名往往只能音译。

产品名称、商标名称本身的命名理据复杂，有些是无理据的，如 Sony 的命名，只是因为音节响亮、悦耳，并无实义。对于这样的名称，除了音译，别无他法。互联网搜索引擎之名 Yahoo 源于义为“泛指人面兽心的人”的 Yahoo，Yahoo 典出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夫游记》中具有野兽习性的人之名。^① 互联网搜索引擎 Google 之名，从

① 刘正琰等(1984, 379页)。

googol 变化而来。googol 的意义是 10^{100} ，也喻指“巨大的数字”。Google 作为互联网搜索引擎的名称，是有隐喻理据的。但 googol 变成 Google 之后，本来有意义的一般名词变成了具有专义的公司名，这样的公司名就只能音译了。Google 公司将 Google 汉语译名定为“谷歌”，虽然有“循音赋义”的意味，其实也只是音译。

音译的产品名称、商标名称因某一商品的流行、长盛不衰而变成某类商品的代名词，这样的现象并不鲜见。产品名称、商标名称一旦变成某类商品的代名词，就为本族语言增添了新词，这也是词汇发展的一个途径。“可口可乐”是 Coca-cola 的音译，已在汉语中立足，而“可乐”似乎也有成为此类饮料的代称的趋势，“××可乐”之类的饮料名时有所见。“寇丹”（指甲油）是英语 cutex 的音译。“寇丹”（Cutex）本来是商标名，后来成为“指甲油”的专名。

3. 特有的专名宜用音译。

特有的专名，大抵属于玄奘所说的“此无故”，也就是汉语社会本来所没有的事物、现象、概念等。这类外语词，只宜音译。

马来西亚勋衔 Tun、Tan Sri、Datuk，并不能比照汉语历史上“公侯伯子男”等爵位来意译，马来西亚华语中的译名采取的是音译：敦、丹斯里、拿督。这些译名已经通行开来，即使在中国报刊书籍中提到这些勋衔，也只能照搬马来西亚华文的音译。刘正琰等（1984，251 页）收录了“那督”，释义为“老人、王子”。“那督”与“拿督”同为马来语 Datuk 的音译。现在“拿督”作为勋衔，不分年龄，不分职业，只要因某种原因被看作为社会作出了贡献，都可以获封。

诸如“沙发、咖啡、柠檬、吉普、槟榔、巧克力、比萨（饼）”之类的词语都具有专义，这些词语所指称的事物都是汉语社会原来所没有的，因此无法用汉语中原有的现成词语或构造新的词语来对应。如“比萨（饼）”是意大利食品 pizza 的音译，pizza 这样的“馅饼”馅在饼上，与中国一般人理解的馅在饼里的“馅饼”是不同的。目前通行的是 pizza 的音译“比

萨”附加“饼”字构成的“比萨饼”，音译避免了释义式意译的困难。

“敖包”是蒙古语 obuga 的音译(口语为 oboo)。“敖包”是蒙古族人做路标和界标的堆子,用石头、土、草等堆成。“敖包”也有祭祀功能,旧时蒙古族人把敖包当神灵的住地来祭祀。倘若意译为“堆子”,既没有区别于一般堆子的特征,也失去了“敖包”特有的文化底蕴。

“夸克”是英语 quark 的音译,是“一个假设的带电核粒子,被认为是已知的粒子如质子和中子的基本构成部分”。英语的 quark 本身就是对爱尔兰出身的英国小说家 James Joyce 在 *Finnegan's Wake* 一书中所创造的新词的随意使用。^① 这样的词并无命名理据,但还有典故,而许多专业术语的命名依据根本无从知晓,也难以准确翻译。因此,诸如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里的术语,大都只宜音译。有人认为与意译相比,音译的专门术语是国际化的,其实除非直接写原文,只要用汉字写下来,尽管隐含着英汉对照,也算不得国际化。专门术语用音译,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往往没法意译或不宜意译。

五、避忌

所谓避忌,即为了获得更好的表达效果,采用音译以避免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禁忌。

朝鲜半岛分裂为北南两个部分以后,北南双方分别把半岛称之为朝鲜、韩国,半岛居民也分别把他们所使用的语言称之为朝鲜语和韩国语。朝鲜语和韩国语用英语来称说,都是一个词,就是 Korean。为了避免因使用此一称谓不用彼一称谓而可能出现的非学术性的麻烦,也为了把这似乎已是两种语言的现象重新定位为一种语言,周荐(1997)建议采用英语 Korean 的汉译“高丽语”来指称朝鲜半岛上的这种单一的民族语言。这是个有益的建议,尽管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中国的朝

① 高名凯、刘正琰(1958, 193页)。

鲜族说的也是这种语言。改称高丽语,朝鲜族所使用的语言该如何称说,以及族名该如何称说,都需要考虑),却很有参考价值。因为现实情况是,不管是在书面交际中还是在口头交际中,这一尴尬都是存在的。

六、音译有利于缩短词形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的意译形式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不管是英文原文的形式还是汉语的意译形式都太长,不便称说。这个组织的英文缩略语形式为 OPEC, OPEC 在汉语中的音译形式是“欧佩克”。就当今汉语的书面情况来看,OPAC 比较少见,而“欧佩克”已很常见,如:

记者昨日从外电获悉,阿联酋已开始根据欧佩克协议削减石油日产量 10.1 万桶以减少供应量。可见,10 月 20 日多哈会议上,欧佩克成员国同意“自 11 月 1 日起每日减产 120 万桶”的协定已经付诸实施了。按照分析师们的观点,欧佩克此举似乎意在使美国原油价格保持在每桶 60 美元左右,同时使欧佩克一篮子参考价格保持在每桶 55 美元。(《欧佩克托油价,还得看天色》,《国际金融报》2006 年 11 月 2 日第 6 版)

有人认为在“石油输出国组织”之外出现“欧佩克”这样的音译词,是汉语外来词中特殊的例外。^①其实这类情况很常见。犹如汉语中在已有“出租汽车、公共汽车”的情况下,依然吸收 taxi 和 bus 音译形式“的士”和“巴士”。出现这类情况,主要与词形的长短有关。“欧佩克”只有三个音节,比“石油输出国组织”少四个音节。“的士、巴士”都只有两个音节,比“出租汽车、公共汽车”少两个音节。正因为音译形式比较短,所以在“石油输出国组织、出租汽车、公共汽车”之外,又出现了“欧佩克”、“的士”、“巴士”等音译词。

语言交际的经济原则总是促使人们把长而使用频繁的语词形式加

① 陈中绳(1997)。

以缩略,以便于称说,省时省力。对于汉语中长而使用频繁的词组,一般是采用缩略的方法化繁为简。对于外来词语,用较短的音译形式代替较长的意译形式也是很有效的。

七、音译为汉语增加了命名方式

如计算机软件公司,采用英文 soft 作为公司名中的专名,若直接意译,或不伦不类(软公司),或没有区别性(软件公司)。而采用专名音译,形成诸如“苏富特(公司)/速福特(公司)”之类的公司名,则可以形成有区别性的公司名。这样的命名方式具有简单、经济的特点,并且隐含着英汉对照,为汉语增添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命名方式,近年来为不少商业机构、公司(尤其是外资或中外合作、合资公司)所采用。改革开放以来汉语交际中音译词语大量增加,此类音译名称几乎触目皆是,许许多多的公司名、商品名或商标名都采用这样的命名方式,这类音译词语在音译词中占有不小比例,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一道新的语言景观。例如“海尔(Haier)、海信(Hisense)、捷安特(Giant)、四通(Stone)、纳爱斯(Nice)”等等。

这样的命名方式由于用得太多,受到不少批评。但是,这样的命名方式本身却是有价值的。不过,近年来许多新建住宅小区采用音译的洋名来命名,诸如“香榭丽舍花园”、“枫丹白露之家”、“阿尔卑斯别墅”之类,甚至干脆就是“香榭丽舍”、“枫丹白露”、“阿尔卑斯”之类的音译名称,与中国社会的居住文化、人文环境不合,显得不伦不类。

八、音译是新语素的主要来源

现代汉语中新词语的产生,无非是原有语言成分语义范围的扩大、缩小、转移,或用已有的成分构成新的合成词(其中主要是复合词,汉语中附加式派生词的构词能力较弱)。此外,还从方言中借用词语。但方言毕竟也是汉语的地域变体,所以从方言中借词也是在汉语地域变体

的材料基础上孳生出来的语言成分。通过意译借用外语词(包括仿译、重新命名),也还是用的汉语材料,虽有直译造成的新语素(如意译英语 dry 形成的“干红葡萄酒”中的“干”),但数量很少,一般而言,意译难以给汉语增加全新的语言成分。通过音译借用外语词,则为汉语增添了具有全新语音形式的语言成分。因此,通过音译借入的语言成分,是真正的“新”成分。用既有汉字作为音译符号(如“拷”作为 call 的音译,“秀”作为 show 的音译,“酷”作为 cool 的音译,等等),都创造了新语素。复音节音译词本身是复音节新语素,复音节音译词减缩音节数量后形成的单音节形式,也构成了新语素(如“美利坚”减缩为“美”,“奥林匹克”减缩为“奥”)。

为了音译,人们还创造新字来记录外语成分。特别是化学元素名称的音译,不仅为汉语增加了新的语言成分,而且为记写这些音译名称创造了新字。汉语早有创造新字用以音译外来语言成分的先例,如早期佛典翻译中就产生了一些新造字。人们在创造这些新字时,根据汉字的造字规律,应用传统的“飞禽安鸟,水族著鱼”的方法,既考虑到与梵文的对音,又注意到汉字的表意特点。^①近现代在翻译化学元素和化合物名时更是进一步发挥了这一传统,创造了一大批新字,如“气(pro-tium)、氖(neon)、氦(helium)、钷(promethium)、钋(polonium)、镅(Californium)、镈(Carane)、钯(Palladium)、锆(Zirconium)、氨(Ammonia)、锗(Nobelium)、锂(Lithium)、铑(rhodium)”,等等。新字的创造从书写形式上展现了音译外来成分的“新”面貌。

音译词的借入不仅为汉语输入了新的词语,也增加了汉语的构词材料,扩大了汉语的构词基础。音译词借入以后,通过音节数量的删减等方式,形成新的词根形式,构造了一大批新词。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中,音译外来词音节数量减缩后作为构词成分构造新词的现象是

① 陈秀兰(1999)。

很普遍的,如东汉佛经翻译进入汉语的音译词,有的缩略后不仅独立成词,而且作为构词成分构造了不少新词:佛陀→佛:佛法、佛庙、佛寺、佛经、佛器;魔罗→魔:魔鬼、魔法、魔掌、魔杖、魔障、魔爪、魔术、魔幻;塔婆→塔:石塔、木塔、灯塔、宝塔、塔林、塔台;僧伽→僧:僧侣、僧徒、僧尼、僧人……

在现代汉语中,以外来词音节之一作为构词成分构造的新词也很多。如 taxi 音译为“的士”,以“的士”音节之一的“的”作为构词成分构造了“打的、面的、摩的、板的”等新词;“巴士”是 bus 的音译,以“巴士”的音节之一的“巴”为构词成分构造了“大巴、中巴、小巴、厂巴、校巴”等词语。

“麦克风”是 microphone 的音译,现在与“麦克风”并行使用,而在以往一个时期内占据主要语用位置的是“扩音器”。虽然意译词“扩音器”的表义更为明确,但是从构词的角度考虑,要从“扩音器”中提取替代性语素作为构词成分构造新词则很难。而以“麦克风”音节之一的“麦”作为构词语素,构造了“耳麦”等新词。

近年来从台湾地区借入了音译成分“秀”,以“秀”作为基本构词成分,构造了“模仿秀、时装秀、政治秀”等一大批词语。此外,以“吧(bar)、啤(beer)、酷(cool)、派(pie)、奥(Olympic)”作为构词成分构造的新词则更多。(见刁晏斌 2006, 102—103 页)

那些没有缩略成单音节但词形较短的音译外来词,也具有强大的构词能力。近年来,直接由整个音译词直接充当构词成分而构造的新词语,数量也是极为惊人的,如“克隆→克隆技术、克隆羊、克隆牛、克隆猪……;纳米→纳米科学、纳米技术、纳米材料……;迷你→迷你裙、迷你装、迷你车、迷你词典……”^①

如果说汉语新词的主要源头是音译外语词,那是片面、武断的,因为汉语中很多新词是用汉语的材料按照汉语的结构方式合成起来的。

① 刁晏斌(2006, 101 页)。

如果说汉语中新语素(最小音义结合体)的主要源头是音译外语词,则是公允之论,是符合事实的。

第七节 音译的歧异与阻滞

由于汉语汉字的特点,汉语采用音译的方式借用外语词也有其他许多语言借用外语词所没有的问题。赵元任(2002, 1 页)在谈到汉语音译西方人名的困难时说:“用中国文字译西文的人名本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诸君自己作文或读人家文章的时候,大都是有经验的。其中种种困难的地方,例如(1)西字太长:Christopher Columbus 作克列斯托否哥仑亨斯,(2)各处读音不同:无锡人译 Ohio 为瓦海瓦,北方人读起来变作 Wahhiwah 了!(3)用字又须避用不雅观的字:某君曾经译 Massachusetts 为麻杀朱色紫,(4)一音可用多字:今天 Kelvin 叫恺尔文,明天忘记了又译作开尔坟。”这些问题,不仅是音译人名时遇到的困难,也是音译一般外语词时所要面对的问题。事实上音译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归纳起来,大致上可以分为歧异和阻滞两种情况。

一、歧异

人译人殊,造成了音译形式的歧异。

1. 音节段落的划分不同导致音译词词形歧异。

不同语言的音节界线是否可以变动,对这种语言的结构性质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印欧语语词的音节界线是可以变动的。如英语常用语 Come on,在连读中音节结构实际切分为 Co/m(e)on。汉语的音节结构音位和音位之间的结合却是非常紧密的,声母、韵母抱合在一起,具有辨义作用的声调包裹着整个音节,形成一个语音块。^①

^① 钱乃荣(1990)。

用记录“语音块”的汉字音译外语词,往往需要把外语词的音节段落重新划分。音节划分不同,形成的音译词在形式上也就不同。例如 Los Alamos 的汉语译名一为“洛斯阿拉莫斯”,一为“洛萨拉莫斯”,产生不同音译形式的原因在于音节结构的段落切分不同,后一译名中的“萨”是音节界线移动产生的音节,是前一译名中的“斯阿”合并的结果。Los Angeles 的汉语译名“洛杉矶”,其中“杉”这个音节也是音节界线移动的结果。对于语音结构复杂、内部音素繁复的外语词,不同的译者可能选择音节内不同的音素或音素组合作为汉字音节的替代之处,其结果造成同一个外语词在汉语中的音译形式不同,包括音节结构不同、词形长短不一。

Republic of Vanuatu,大陆译为“瓦努阿图(共和国)”,台湾译为“万那杜(共和国)”,由于音节切分的不同,形成了不同音节数量的译名。人名 Walpole,其汉译音节组合有“沃波尔”和“渥尔波”两种形式,“沃波尔”对 Walpole 采取的音节切分形式是 Wa(l)/po/le,“渥尔波”对 Walpole 采取的音节切分形式是 Wa/l/po(le),不仅音节组合形式不同,用字不同,音素省略不译的情况也不相同。

赵元任(2002, 624 页)指出:“中文里的音节跟字数对于翻译外国名字很有影响。中文很少单音节的名字,所以往往把外国的单音节译成两个。例如 Dean 翻成‘第安’,好像姓‘第’名‘安’似的。地名如 Bonn 就叫‘波昂’。”对于这类情况,一方面要看到,这是汉语的节律对外来词的调节,是汉化外来词的手段,^①另一方面,音译过程中音节界线的移动或对音节的不同分割确实会造成音译词的词形歧异。

2. 语音要素以及语音组合的选择不同造成音译词形式歧异。

在用语音形式与音节对应的汉字作为音译符号音译外语词时,是

① 陈中绳(1997)认为把“John Doe”的“Doe”译成“多依”的译法令人啼笑皆非,主张译为“赛约翰”(“约翰”从俗),以在最大限度地接近原音的前提下求统一。其实“Doe”译成“多依”,虽与外语原词语音有较大差异,却是符合汉语节律的译法。

细大不捐地尽可能完全地音译,还是选择外语词的部分语音段落进行音译,往往有不同的选择。有的外语词,音译到汉语中,音节几乎是对应的,如“马来西亚”与 Malaysia,“马来亚”与 Malaya,在音节结构上就是基本对应的。历史上 Malaya 的译名有“马来亚、末罗瑜、末罗游、摩罗游、木刺由、没刺由、马来忽、木来由、没刺予、麻野儿、巫来由、穆拉油、无来由”,^①音节数量很一致。但是,更多的外语词音译到汉语中,音节数量是不一样的,词形也因此不同,如 Singapore,汉语的音译形式除了有“新加坡、星加坡、星嘉坡”等用字不同但音节相等的异名以外,还有音节数也不同的历史译名“新加坡拉”。

梵语 mahāsattva(意为“大有情、大众生,行济度一切众生的人”)的汉语音译词,少的三个音节(摩诃萨、摩呵萨),多的达到五个音节(妈哈萨督呀),也有四个音节的(摩诃萨埵)。马来西亚前首相 MAHATHIR,中国的译名是“马哈蒂尔”,马来西亚华文报刊则写作“马哈迪”,不仅用字不同,音节数量也不同。意大利城市 Florence 有“佛罗伦萨(现在比较通行的形式)、佛罗伦司(朱自清《欧游杂记》)、翡冷翠(徐志摩诗《翡冷翠的一夜》)”等不同词形的译名,音译用字不同,音节数量也不等。现在正在风靡的网络日记 Blog(Weblog 的简缩),中国大陆的音译形式为两个音节的“博客”,台湾地区的音译形式则是三个音节的“部落格”,马来西亚华语的译名是“部落客”,也是三个音节。

周荐(1991)对刘正琰等编纂的《汉语外来词词典》所收 6 213 个音译词进行统计分析,这些音译词长的达到 8 个音节,短的只有一个音节。其中单音节的占 5.04%,双音节的占 40.72%,三音节的占 31.82%,四音节的占 14.69%,五音节的占 5.83%,六音节的占 1.56%,七音节的占 0.29%,八音节的占 0.05%。这一统计展示了音译词在音节数量上的基本面貌。其中,有不少长短不一的音译词是同一个外语

① 俞忠鑫(1995)。

词在汉语中的不同译名。

3. 汉读法音译和语音对应法音译造成译名不同。^①

Greenwich, 原来的译名有两种形式:“格林威治”和“格林尼治”。前者是按照原词字母的“汉读法”来音译的(即把外语词的字母改换为汉语的拼音字母的读音读),因此原词中不发音的 w 也被汉化成汉语的一个声母;后者采用的是语音对应法来音译的,即尽量谐音。Greenwich 在汉语中的音译,原来以“格林威治”为主,现在以“格林尼治”为主。

赵元任(2002, 844 页)对 Chicago 译成“芝加哥”的译音不准提出批评:“外语词和专名的音译和意译常常会出错,有时错误会根深蒂固地保留下来,成为语言的一部分。Chicago 译成‘芝加哥’,显然是把开头的擦音错发成塞擦音的缘故。有些文学气息比较浓、求实之心不太够的作者,想把它改成‘诗家谷’而没有成功,因为它不能使人联想起那坐落在大湖旁边的并无诗意的大都会。不过,那个大湖的名称 Michigan 的音却是发对了,所以译成了‘密歇根’。”又,该页注①:“可是《辞海》还是作‘密执安’,原译者大概是把‘安’念成 ngan 的。试比较‘安徽’转写成英文 Nganhwei。”

其实 Chicago 译为“希加哥”和“芝加哥”,只是在音译时分别采取语音对应法和汉读法而形成的差异。把 Chicago 译为“希加哥”,采用的是语音对应法,尽可能谐音,因此“希”与 Chicago 开头的音位组合 [ʃi] 的语音对应很密切;而“芝加哥”的译名采用的是汉读法。^②正是音译方法的不同,造成了译名形式的不同。从谐音关系上看,“希加哥”更接近原词的语音,但这并不能说“芝加哥”是译音错误,因为汉读法是汉语音译的常用方法,用汉读法译成的译名是很多的。^③

① 关于汉读法音译和语音对应法音译,请参看第八章有关语音汉化的分析。

② 把 Chicago 译为“芝加哥”,似与威妥玛式拼音的书写形式有关。威妥玛式拼音把汉语声母 [tʃ] 记写为 ch。

③ 请参看第八章有关语音汉化的分析。

4. 对同音字、谐音字的不同选择造成词形歧异。

汉语普通话的音节结构简单,因此同音现象很严重,同音字很多,在电脑上用基于“智能 ABC”的拼音输入法随手打一个音节 xian,就有 48 个音节结构相同的字;打出 di 这个音节,有 39 个音节结构相同的字;而根据《现代汉语词典》(2005),di 这个音节,如果不计声调的区别,一共有 65 个字(其中包括少数同形同音字,如“底₁、底₂、底₃”等;也有一些生僻字一般不作为音译符号)。这些音节相同的字声调并不相同。可是,由于外语词是没有声调的,所以音译时采用相同音节结构的字并没有声调的制约。因此,用汉字作为音节符号音译外语词时,不同译者译出来的词形往往不一样。历史上同义异形的译名举不胜举:

沙发、沙法、梳化(英语 sofa)

苏打、苏答、沙达(英语 soda)

胭脂、烟支、燕支、焉支、燕脂、烟肢、燃支(匈奴语)

唢呐、锁哪、锁呐、锁纳、锁捺(波斯语 sona)

袈裟、迦沙、迦沙野、迦沙曳、架沙异、迦沙异、迦罗沙曳(梵文 kaṣāya)

威士忌、威士吉、威士基、威士开、喊司忌、喊士忌、灰司克(英语 whisky 或 whiskey)

巧克力、巧克利、巧古力、查古列、查古律、朱古力、朱古律、朱古叻、勾古力、诸古力(英语 chocolate)

这其中,有的词形歧异是由于方言译音造成的(如“梳化、朱古力”等),或因对音位组合的谐音不同(如“苏打”和“沙达”,当然也与方言口音有关),也有很多词形歧异是由于选用不同的同音字而造成的。谐音的不同,以及同音字的选择不同,造成了人译人殊的复杂情况。2003 年“非典”肆虐,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简称为“非典”的传染性疾病命名为 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 的音译,新加坡写作“沙斯”,香港写作“沙士”或“沙斯”。SARS 的不同音译用字,造成

了异形词。诸如此类的译名分歧在大陆和台湾之间是很常见的,如圭亚那首都 Georgetown 有“乔治敦”(大陆)和“佐治敦”(台湾)的异名,苏丹首都 Khartoum 有“喀土穆”(大陆)和“卡土穆”(台湾)的异名,斯里兰卡首都 Colombo 有“科伦坡”(大陆)和“可伦坡”(台湾)的异名。^①

5. 用字心理不同造成音译词词形歧异。

一般而言,人们在选择音译用字时倾向于结构简单、易写易读的常用字。但是,由于汉字是语素文字,所以在选择音译用字时,人们还会顾及音译用字的字面意义,其中的用字心理是各不相同的,音译用字的选择也往往基于不同的用意。例如:

当大多数人把发源于西方的 BLOG 写作“博客”时,只有郑渊洁写成“勃客”,他说,取名前他特地查了汉语词典,发现还没有收录“博客”一词。“既然没有规定,我想写哪个就写哪个。我就用生机勃勃的勃。”(《郑渊洁:没有单位的职业作家》,《作家文摘》2005年5月19日第6版)

E-mail 的汉语音译形式,目前大陆最通行的是“伊妹儿”,台湾也有人用“伊媚儿”。鲁国尧(2005)对这两个译名颇不以为然,主张采用“伊美尔”：“我认为‘伊妹儿’、‘伊媚儿’是青年人使用的词儿,当然,如今改革开放,中老年人中不乏喜欢她们特殊意味的人。也许是我保守、守旧,因而对新事物、新词语不易接受。我是教师,我是年过花甲的高校教师,所以在使用电子邮件跟朋友、学生通信时,我不愿意使用‘伊妹儿’,尤其是对女性,特别是对年轻的女学生,更不便于使用这词儿。教师就是要为人师表,对女学生,出语要严肃庄重,岂可用这种‘轻’、‘软’词儿?”

E-mail 的汉字音译,如果在 yi、mei、er 三个音段的范围内选择音译用字,在电脑上用基于“智能 ABC”的拼音输入法打出 yi 这个音段,有 110 个字可以选择;mei 这个音段有 41 个字可以选择;er 这个音段有 14 个字可以选择。按照这三个音段的顺序每次在这三个音段的同

① 见朱广祁等(2000)附录 2“台湾与内地专名译名对照表”。

音字中分别选取一个字用来音译 e-mail, 其可能有的音节组合数量是惊人的。即使减去笔画繁多的字、冷僻字等, 排列组合的数量也是很大的。就选字的理据、心理而言, 一定因人而异, 人译人殊。所以, 音译词的用字(即音译词的词形)需要在“从俗”的基础上, 由语文标准化管理部门或有关机构考虑习俗、文化等方面的因素统一作出规约, 以避免应用混乱的现象。

2005 年 6 月中下旬, 新加坡《联合早报》连续发表十几篇文章, 讨论一个英文名为 Bayfront 的地铁站的华语译名。缘起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将 Bayfront 音译为“贝弗兰”, 受到媒体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的批评, 认为这一译名是“不折不扣的敷衍”, 甚至是“语言暴力”, 从而引起一场不小的辩论, 并且成为《联合早报》社论话题, 被提到尊重华文的高度。讨论中有文章认为“语言暴力”的说法有点过火, 同时认为, 提出华文译名的话题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公众不愿意再出现像“乌节”、“惹兰勿剎”这类“令人莫名其妙”的译名, 而希望给 Bayfront 起个像“圣淘沙”一样的典雅美名。

一位资深翻译家提出“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译名“海湾舫”。他认为, 读者一看到这个译名, 就能立刻联想到一幅海湾美景的画面: 旖旎怡人的海湾风景, 在碧水上游弋的画舫。新加坡陆路交通局致函《联合早报》说, “贝弗兰”是利用街道指南的现成翻译, 应该更谨慎地考虑华文译名。同时表示, 接受这位翻译家提出的译名“海湾舫”, 作为该地铁站的暂时译名。

对此公众展开热烈讨论, 有人认为, “舫”是取 front 的谐音, 但“舫”的意思是“船”, 特别是小船, 如游舫, 画舫等。以“船”作为地名或为地铁站命名, 并不恰当, 因此主张用“坊”代替“舫”。“坊”是市街村里的通称, 有地域的含意, 更适合作为地名。以“坊”为名的地名, 早就出现在中国。在新加坡地名中, 也有“莱佛士坊、珍珠坊、唐城坊”等。

有人认为地铁站的译名应求大众化、通俗化。照英文原意, 既然是

指在海湾前的地铁站,不如就称它为“海湾站”。

有人主张将 Bayfront 译为“飞浪湾”、“浮浪湾”、“翡浪湾”或“碧浪湾”,理由是以“湾”为地方命名者,不胜枚举。在中国大陆有“南泥湾”,在台湾有“澎湖湾”,在香港有“铜锣湾、筲箕湾、柴湾、荃湾”等。

有人建议把 Bayfront 的华文译名完全意译为“海湾墘”。“墘”的意思是水边,读“前”。老一辈的华人,对“墘”这个字是不生疏的,因为以前驳船码头(Boat Quay)一带就叫“溪墘”,闽南话叫 khoi gi,而红灯码头以及海滨公园一带则叫“海墘”(hai gi)。

有人认为 Bayfront 这个地名,可以直译为“海湾前”。因为“海湾前”更具有地名的区别性特征。

有人认为不必绕着“海湾”转圈子,可以径直译为“贝浮湾”。就发音而言,“贝浮湾”与 Bayfront 接近,是从“贝弗兰”脱胎而来,符合地名的音译要求。而字面意义,则像贝壳浮在海湾。滨海湾附近有浮尔顿酒店,还有像榴槿壳一般的滨海艺术中心,在外国人眼中,就像贝壳。

讨论中的各种观点见仁见智,提出的各种译名各有所据,各有美意。不管是采用音译还是采用意译或者半音译半意译,概括起来,就是如何做到“信达雅”,至少在字面意义上差强人意。对于如何做到“信达雅”,各种意见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这方面的观点人言人殊,很难取得一致。在确定规范译名时,只能是“我辈数人,定则定矣”。当然,应尽可能做到既实用(例如地名应具有明显区别性的地理特征,用字通俗,易读易写,没有歧读,与原名语音联系明显,等等),又能寄寓美意,反映社会文化底蕴,与人文环境协调,适应社会大众的文化心理。

6. 音译用字异读造成音译词读音歧异。

音译用字要注意避免异读字。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南美国家 Peru 的汉语译名“秘鲁”,对照原名 Peru 的读音就可以知道,其中的“秘”应读作 bì。由于“秘”在汉语中有两读,且最常见的读音是“秘密”中“秘”的读音 mì,所以“秘鲁”经常被人读作 mìlǔ。

来自阿拉伯语 *murr* 的音译词“没药”，其中的“药”是汉语附加成分（犹如“啤酒”中的“酒”），“没”则是个音译成分（犹如“啤酒”中的“啤”）。“没”应读作 *mò*，但 *mò* 这个读音只出现在诸如“沉没”之类的合成词中，“没”作为常用单音词的读音是 *méi*，人们最熟悉的读音是 *méi*，因此往往把“没药”的“没”读作 *méi*。但是读作 *méi* 就显得很奇怪，似乎产生“没有药”之义，这多少有点不着调。《现代汉语词典》（1983）把 *murr* 的两个汉语译名“没药”和“末药”作先后排列，同时并举。但是人们还是比较熟悉“没药”这个词形，而对“末药”比较陌生。如果写作“末药”，使人产生的疑惑却往往是：这是不是就是“没药”？先入为主、“常”入为主的心理是很有意思的。

奥地利总理 *Schüssel* 的音译为“许塞尔”，此译名与德语原词的语音关系比较密切，其中的“塞”准确的发音是 *sè*，但由于“塞”字是个多音字，往往被电视播音员误读为 *sāi*。^①如果把“塞”改作“瑟”字，就不会有这样的误读了。

二、阻滞

包括语音联系上的阻滞和语义理解上的阻滞。

1. 方言音译造成音译词与外语原词的语音联系不彰。

汉语方言分歧严重，同一个单字不同方言区的人往往有不同方言口音的读音。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东南亚一带的华人姓名。东南亚一带的华人祖籍大都为中国南方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不同地区。由于方言背景不同，即使同姓，读音也不同。早年华人登记入籍，当局用拼音文字记写姓名，由于华人移民的口音不同，也由于注册官员的记音不同，同一个姓往往被拼写成不同的形式，甚至因此有一家人父子、父女的姓名拼写不同的情况。尤其是报生纸（出生证）的姓名登记，由于

① 景德祥（2005）。

方言口音的影响,加上政府行政人员的随意记音,同姓往往拼写也不同,而姓名一经登记,很难更改。^①如“陈”姓,拼写形式有:Ding(闽南话背景)、Chan/Chin/Ching(粤方言背景)、Tan/Tang(潮州话背景)、Cheng/Chen/Chin(客家话背景);“杨”姓,拼写形式有:Yeoh/Yeow/Yeo(闽南话背景)、Yong/Yeong(粤方言背景)、Yeoh/Yeo(潮州话背景)、Yong/Yung(客家话背景);“王”姓,拼写形式有:Ong(闽南话背景)、Wong(粤方言背景)、Heng(潮州话背景)、Wong(客家话背景);“黄”姓,拼写形式有:Ooi 或 Oi(闽南话背景)、Wong(粤方言背景)、Ng(潮州话背景)、Ngiew(客家话背景)。^②由此可见汉语方言语音的复杂性。

由于方言口音的影响,人们在日常书写中,经常因方言口音的“导引”写出方言记音字。马来西亚有一种食品叫“卤巴”,“卤巴”其实就是“卤肉”,“巴”是闽南话“肉”的读音的记音字。在上海高校食堂或菜市场,常见把“菠菜”写成“布菜”、“大排”写成“大扒”、“方腿”写成“方肽”,“布菜”、“大扒”、“方肽”中的“布、扒、肽”都是方言记音字。这种方言记音字记录的词语甚至可能成为通用词语。如“圆珠笔”是英语 ballpoint pen 的仿译词,最初的词形是“原子笔”,^③“原子笔”中的“原子”跟“原子弹、原子核”之类的“原子”毫无关系,只是“圆珠”二字上海话口音的记

① 据南京大学中文系新加坡中文硕士班同学黄友平告知,他的姓拼写为 Ng(闽南话背景),他弟弟在香港工作,“黄”姓拼写为 Wong(香港粤方言语音拼写);他的夫人也姓黄,出生于印尼,印尼闽南话“黄”姓的拼写为 Oei。他的襟兄姓吴,拼写为 Ngo,襟兄的父亲姓拼写为 Goh,弟弟的姓拼写也是 Goh,妹妹的姓则拼写为 Wu。Wu 为华语拼音。新加坡 70 年代曾有一个时期采取华语拼音拼写姓名为主、英文姓名为辅,但若如此,新生出的人华语拼音的姓与父亲、兄姐的方言拼音的姓又不一樣。新加坡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经采取华语拼音姓名、汉字姓名、英文拼音姓名(拼写方言读音)同时并用的方式,现在一般以英文姓名为主,附加华文姓名。

② 此段材料来自南京大学中文系马来西亚中文硕士班同学孙耀宗的调查。

③ 王艾录、司富珍(2002, 175 页):“‘原子笔’:本称‘油溶笔’,为英国驻匈牙利记者莱兹·比洛所创。后来被美国冒险家密顿·雷诺在芝加哥非法生产并大量出售,为逃避国际专利法的追究,他谎称此笔是利用原子能制造的,永远写不完,从此‘原子笔’之名广为流传。”如果“原子笔”的词源如此,那么“原子笔”就不是 ballpoint pen 的仿译,而是另有英语源词。

音字。^①《现代汉语词典(补编)》收录了“原子笔”，注为“圆珠笔的旧称”，但很长一段时期内，在社会语文生活中“原子笔”是与“圆珠笔”并行使用的，只是规范词典没有收录“原子笔”而已。

方言口音无疑会对音译词的词形产生影响。在用汉字音译外语词时，同一个外语词可能有不同的音译用字，这些音译用字的不同往往缘于音译者的方言口音不同，因而从普通话的读音来看，音译词与外语原词的语音对应关系往往是不清楚的。例如英语 cement 的译名“水门汀”(即“水泥”)，用普通话读，难以理解为什么 cement 会译为“水门汀”。只有从上海话“水门汀”的发音看，其间的语音联系才比较清楚。还有一个“水汀”(暖气)，也是来自英语 steam 的上海话音译。只有用上海话读，才能发现音译外来词“水汀”的音译用字的语音理据。汉语中近现代音译词大都是从方言渠道引入的，或由于翻译者的方言口音，导致音译用字与外语原词之间产生了语音联系，这与今天用普通话读音看音译用字与外语原词语音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从普通话的语音来看，也就很难理解其中的音译用字与外语原词在语音上的联系。

研究空间图形的“几何学”，“几何”源自拉丁语 geomaria 的翻译，一说是 geo 的音译，另一说为徐光启推敲译名时，先用“形学”，后觉不妥。一连想了十多个汉字，后从“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中的“几许”想到了“几何”，于是创造性地译为《几何原本》。^②但从有关资料看，音译的说法是比较可信的。徐氏系明代上海县徐家汇人。从今上海话“几何”的读音看，“几何”的读音与 geo 语音联系是极其密切的。但从普通话的语音来理解，很难把“几何”的读音与 geo 联系起来。

① 杨锡彭(2003c, 99页)。另有一说，圆珠笔发明之时，美国刚在日本扔过原子弹，引起世界震撼，为了广告效应，这种笔就取了“原子笔”之名。这一说法不免有臆测或演绎的意味。又，关于“原子笔”的用例，姚德怀(1997)提供了一个时间较早的用例：“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12月18日《申报》第12版云：‘原子笔商人竞争激烈’，‘原子笔在上海市场上，已经有几种牌子了……’可知，1946年上海已经有‘原子笔’这个名称了。”

② 印晓红、黄河清(1994)。

英语 chocolate 的汉语译名有“巧克力”、“朱古力”等不同形式,只有联系粤方言读音才能理解“朱古力”的音译理据。sofa 的音译译名有“沙发”、“梳化”等,“沙发”的语音理据必须联系上海话的读音才能理解,而“梳化”作为 sofa 的音译,其语音理据则必须联系粤方言语音才能找到。“克力架”(cracker, 饼干)、“曲奇”(cookie 小甜饼)的读音也必须联系粤方言语音才能了解译名形成的缘由。如“曲奇”在广州话中的音节结构是[k'ukk'ei],其与英语 cookie 的对音关系是比较清楚的,但从普通话的语音看,难以对应。

在海内外华人语言社区,常常由于语音背景不同而产生译名分歧,因而用一种口音读,难以理解另一种口音的译音。印度城市 Bombay,中国通行的译名是“孟买”,用普通话读,跟原词的语音对不上;用闽南话读,才能看出语音理据。与此类似,印度的 Bollywood,中国译为“宝莱坞”,但新加坡的译名是“孟莱坞”,“孟”与外语原词 Bo 的语音联系只有从闽南话的读音才能找到线索。新加坡华文地名“武吉知马”是马来语 Bukit Timah 的音译,用闽南话读,译音的来源很清楚,尽管闽南话读音与马来语原词的读音只是相近。而用普通话读,则很难找到“武吉知马”与马来语 Bukit Timah 的读音关联。

东南亚一带的音译华文地名的形成,大都有方言语音的特点,如新加坡地名“明古连(街)”(Bencoolen Street)、马来西亚槟城地名“直落巴巷”(Teluk Bahang)、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地名“米拉务”(Mealaboh)(此地 在 2004 年年底印度洋海啸中受灾严重),泰国首都“曼谷”(Bangkok),不联系闽方言语音,就无法理解这些华文地名的语音理据^①——明古连(Bencoolen):明,厦门话文读为[bnj];古,厦门话读作[ko];连,厦门话文读为[lien]。直落巴巷(Teluk Bahang):直,厦门话

① 在这些地区,闽南方言都是强势方言。但是,闽南方言内部也有相当大的语音分歧。当地地名的华文转写到底属于闽南话哪一地点的语音,已无从查考。这里仅提供上述地名华文的厦门话读音作为参考(只比较音段结构),已可看出转写这些地名的语音理据。

读作[tit];落,厦门话文读为[lɔk];巴,厦门话读作[pa];巷,厦门话读作[haŋ]。米拉务(Mealaboh):务,厦门话读作[bu]。曼谷(Bangkok):曼,厦门话读作[ban];谷,厦门话读作[kɔk]。

老挝首都在中国的名称是万象(Vientiane),在新加坡华语中,老挝的首都是“永珍”,“永珍”这一译名的语音理据在闽南话里才找得到。这样不同的译名,简直给人两不相干的感觉,但所指竟然相同。

对于历史上的西洋地名音译,还必须注意外国传教士所起的作用,其中包括传教士学习汉语的地域不同而形成的方言口音对地名音译的影响。周振鹤、司佳(1998)指出:从16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中叶,西方耶稣教会派遣来的传教士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了很多工作。19世纪初又一批新教传教士奉命漂洋过海至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商贾贸易之余从事报刊宣传工作,试图用自己语言对世事万物作出诠释。马礼逊、郭实猎、雅裨里等人所使用的英语、德语属日耳曼语系,与200年前耶稣会士所用的拉丁文的读音有较大差别,因而对地名的译音较之200年前也大异其趣。加之200年间欧洲自身政治地理的变化、国名的更替,还有因传教士学习汉语的地域不同所引起的方言与官话的混淆,更是给本已人译人殊的西洋地名罩了一层雾障。

人们常常纳闷,为什么Portugal会译成“葡萄牙”。其实联系闽南话的读音(如厦门话“牙”的文读音为[ga]),“葡萄牙”作为Portugal的音译,其中的“牙”的来历就清楚了。周振鹤、司佳(1998)指出:“葡萄牙在中国长期被称作大西洋国,利玛窦译作波尔杜瓦尔,与其拉丁读音相当符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始译作葡萄牙,其官话读音与葡语或英语读音都不相对应,但用闽南话读与原音却无二致,疑是传教士受闽南话影响所致。《东西洋考》中还有葡萄库尔一词,保留由波尔杜瓦尔蜕变的痕迹。此国名在汉语中始终未曾以英语的读法出现。”

2. 冷僻字造成误读。

有一个历史上音译佛经中常常用到的音译字“诃”,如“般摩诃若”

(“大慧”义)、“摩诃曼陀罗”(“大白莲花”义),应读 hē。这个字现代很少用,一般人都不知道怎么读。如果懒得查词典,“白字读半边”,多半会把“诃”读作 kē。按照可能的读音查词典,也往往先到 ke 这个音节中去查。诸如“摩诃般若”、“摩诃曼陀罗”之类的佛经词语,人们不熟悉,也不常用,但是俄罗斯作家“契诃夫”之名中也有这个“诃”字,人们也常常把这个“诃”读作 kē。^①“诃”这种读音上的尴尬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由于“契诃夫”的译名沿用已久,犹如“秘鲁”的“秘”一样,已无法更改了。

3. 不同的音译用字影响外来语素同一性的判断。

汉字具有区别同音语素的作用。比如 jué 这个音节,是“决、诀、抉、角、觉、绝、倔、掘、崛、爵、嚼、攫”等字的读音,不同的单字在书写形体的差别分化了语素。但是,汉字也有对语素同一性的“分离”作用,也就是本来具有同一性的语素,由于采用了不同的单字记写,变成了毫不相干的不同成分。音译外语词的过程中就有这一现象。

在音译外语词的过程中,同音字的选择往往是因人而异的,其结果不仅造成了音译词的一词多形,也往往对音译外来语素的同一性的判断带来极大的干扰。如“冰激凌”中的音译成分“激凌(cream)”,一般著述在讨论语素的组合能力时,多有认为“激凌”属于“一用语素”的,即认为“激凌”的组合指数为 1,只出现在“冰激凌”的组合中,不具备与其他语言成分进一步组合的能力。其实,cream 的音译形式还有“结涟、忌念、忌廉”等音译形式。“忌念、忌廉”在方言中是独用的,意义为“奶油”。“冰激凌”也有“冰结涟、冰淇淋”等异体形式。但是,由于用字的不同,本来有同一性的语言成分,而失去了形式上的同一性,以至于直接影响了人们对于音译外来语素的构词能力和语素性质的判断。

① 契诃夫(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 1860—1904),俄罗斯作家。“契诃夫”是 Чехов 的音译,“诃”与 x 对应,因此“诃”应读作 hē。

如果用以记音的汉字相同,不同的成分也可能被看作同一个成分。如“麦淇淋”是英语 margarin(e)的音译,其中的“淇淋”与“冰淇淋”(“冰激凌”的异体)中的“淇淋”书写形式完全相同,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同一个语言成分;其实是不同原词的音译,根本不具有同一性。

通过音译借用外语成分导致音译成分与汉语原有成分形式相同的情况有不少,因此需要仔细辨析。“成吉思汗”的“汗”是译名“可汗”的缩略,借用“汗”字记写,造成与汉语原来有成分的书写同形关系,尽管读音不同,但常常被误读为“汗水”的 hàn,这样一来,就把两个“汗”混同了,而且四个音节也成了囫圇一团的整体,看不出由“成吉思”和“汗”两个部分组成的结构了。

查建英小说《献给罗莎和乔的安魂曲》中有一段描写:

玩槟果游戏的时候,罗莎和乔就可以肩并肩坐在一起了。这是他俩都百玩不厌的游戏。因为要用点儿心思动点儿脑筋,又用不了动不了太多。轮到自己叫“槟果”的那一刻,总能涌上那么一股新鲜的兴奋。玩腻了就随时可以扯扯闲篇儿。玩槟果游戏的人从没有互相怄气的。

“槟果”是什么游戏?查刘正琰等(1984, 46页):“宾戈,西方(特别是美国)流行的一种纸牌赌博,又作‘冰高’。英 bingo。〔可能为拟声词〕。”

由于用字不同,来源相同的音译词在书写形式上被区分为不同的词形。因此,在一个汉字音译词还没有定型或普遍通行开来之前,使用汉字音译词往往得随文注出外语原词。否则即使是同一个词,由于书写用字不同,也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

由于汉字有区别同音语素的作用,因此人们并不一定把用于音译的单字看作纯粹的音节符号,所以译名一旦确定了标准形式,形成既定词形,在书写时就必须按照既定的词形书写,否则就会给人以“两不相干”的感觉。例如意大利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的名字不能写作“大芬琪”,“欧洲”不能写成“鸥洲”。“亚洲”(Asia)开头的 A 读音[ei],这个读音现在一般用 ai 音节的字译记(如“艾、爱”),但“亚洲”的译名形式

沿用已久,所以不能换用不同的音译用字。

人名 Keats 现在一般译作“基茨”,但 19 世纪英国诗人 Keats(Jone Keats)还是保留既有的译名“济慈”。Dickens 现在一般译为“迪肯斯”,以便与 19 世纪英国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区别开来(当然“迪肯斯”的译音也更接近原名的发音);Hawthorne 现在一般译为“霍索恩”,但 19 世纪美国小说家 Nathaniel Hawthorne 必须沿用已有译名形式“霍桑”;Galsworthy 现在一般译为“高尔斯沃西”,但 19 世纪后半叶至 20 世纪上半叶的英国作家 John Galsworthy 的译名,还是保留沿用已久的“高尔斯华绥”。

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当人们习惯于某个译名的既定词形后,一旦遇见某个不同的词形,往往就不能理解,如大陆人习惯了美国总统 Bush 的译名“布什”之后,遇见台湾地区的译名“布希”、香港地区的译名“布殊”以及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的译名“布斯”,往往不知所指。港台地区和马来西亚的华人对大陆的译名往往也感到莫名其妙。

有些不同历史时期的译名,由于记音用字的不同而失去形式上的同一性,从而产生谜团。如历史上有个鲜卑族,于今中国 56 个民族中已无鲜卑族,但是,锡伯族是拓跋鲜卑的直系后裔。^①“鲜卑”、“锡伯”的差别只是历史上先后译名的差别。^②

对于外来音译成分在形式上与汉语固有成分形式混同的情况,词典大都以分立条目的方式处理。如“车胎、轮胎”之“胎”来自英语 tyre 的音译,又作“带(车带)”。音译的“胎”与汉语原有的“胎”(人或哺乳动物母体内的幼体)同音同形(字形相同)。《现代汉语词典》(2005)给予了分条处理,通过分辨不同的词源,把不具同一性的两个语素区别开来。

① 《辞海》1936 页。

② 锡伯族名,是由鲜卑音转而来的。在汉文历史文献中,曾有“矢韦、室韦、矢比、西契、西北、席百、席北、席帛、锡卜、什伯、喜伯”等不同的译音和写法。见嵇南、吴克尧(1996, 5—6 页)。

“酷”作为英语 cool 的音译,《现代汉语词典》(2005)已收录(释义为“形容人的外表英俊潇洒,表情冷峻坚毅,有个性”),并且单列单字条目,注明英语词源,以与汉语中原有的“酷”(“残酷”;“程度深的”)区别开来。译自英语 pie 的“派”(一种西式的带馅的点心)与汉语中原有的“派”,在《现代汉语词典》(2005)中也做了分立条目的处理。^①

但“抛光”(即擦光,用涂有细磨料的软轮打光物体表面)之“抛”来自英语 polishing 的首音节音译,与汉语中原有的表示“扔、投掷”等义的“抛”仅仅是同形(字形)同音的关系,不具有同一性。《现代汉语词典》(2005)未将“抛光”义的“抛”单列单字条目,而是把“抛光”这一词条列在表示“扔、投掷”义的“抛”单字条目之下。这就把两者混同了。

几十年前的篮球比赛,场外的人常常高呼:“xiù!”“xiù 一个!”在语境中,这个词的意义是清楚的,即“投篮”,但一直不知这个 xiù 字怎么写。读刘正琰等(1984),才知道这个 xiù 其实是英文 shoot 的音译,写作“秀”。现在汉语中又有了个 show 的音译“秀”,两个“秀”当然不是一回事。

现在年轻人口中有个“破”字(在一些刊物上也时有所见),其意义、用法与词典中“破”字的意义用法都不尽相同,如“我的英语很破”、“我的电脑很破,该换一台了”。这个“破”字其实是英语 poor 的音译,用法、意义取自英语 poor 的“粗劣的、蹩脚的、不好的”义,与汉语中原有的“破”只是同音同形的关系。汉语原有的“破损”义的“破”(如“破房子、破衣服”)也可以说“房子很破”、“衣服破了”,但音译英语 poor 的“破”字并非“破损”义;汉语中原有的“破”也有“讥讽东西或人不好”之义,似与音译的“破”意义相似,如“破电影”,但这一意义上的“破”一般只做定语,例如“破电影”一般不说“这个电影很破”;“踢的什么破球”,不能改说“球踢得很破”。可见,“我的英语很破”、“我的电脑很破”中的“破”并不是汉语中原有的“破”,而是表示“粗劣的、蹩脚的、不好的”义

① 刘中富(2001)对 1996 年 7 月修订第 3 版《现代汉语词典》收释外来词语源的问题进行过讨论。

的 poor 的音译。

还有一个“当”(down), 诸如考试不及格或在有竞争性的活动中被淘汰叫“当”; 从互联网上下载文件、图片叫“当”(是 download 缩减形式的 down 的音译)。

诸如此类的音译成分与汉语原有成分在形式上(读音、书写)的混同的情况, 需要语言工作者辨明语源, 留下记录, 不仅便于应用, 而且可为后世存照。

附带说一下,《现代汉语词典》(1978; 1983; 2005)等规范性词典在收词方面有规范化的考虑, 因此不具备全民性的外来词、非通用性的外来词(尤其是音译词)一般都不予收录。英语 fitting 的音译“飞”, 表示“精细地切削一个机件时, 使其尺寸与配合机件能正确地吻合。通常指手工业配合工作”。这个词一般词典都不予收录, 但这个词在工厂里是个常用词。还有英语 taper 的音译“退拔”, 指“机件横剖面向一端逐渐缩小的一段”, 也是工厂里的常用词。诸如这样的词语, 除了刘正琰等(1984)予以收录并给予释义以外, 一般的辞书都未收录。不仅《现代汉语词典》(1978; 1983; 2005)这样的中型辞书不予收录, 大型辞书如《辞海》、《辞源》也都不予收录。甚至篇幅达到 5 千万字、共收词语 37 万 5 千余条的《汉语大词典》也不收录。此外, 一些方言性的外来词, 如“司必令锁”等, 不仅用得广泛(尤其是在江浙沪一带), 而且汉语中也无恰切的原有词语可以替代, 但现有辞书也不予收录。^①

辞书收词的这类“缺位”现象, 既不利于词汇的积累, 也不利于语言的应用。人们在语言生活中遇到这样的词而不明其义时, 是难以查询的。辞书编纂中的这个老问题, 应该引起重视。

4. 音译用字在意义上缺乏联系, 不能形成合理的语义组合。

纯粹的音译词, 只是由表示读音的音节串联在一起, 表达一个整体

^① 刘正琰等(1984, 321 页)收录了“司必令”。

性的词义。太多没有意义关系而只是纯粹表示读音的汉字组合在一起,难读难记,不能适应汉语汉字的认知习惯。我们在阅读汉译西方小说时,对于一连串没有意义、纯粹只是记写读音的字组成的人名、地名,都有难读、难记的经验。这就不便于称说,不便于使用,形成理解和使用上的阻滞。

在东南亚一带的华文报刊上,常有“杯葛”一词,就字面看,难以理解“杯葛”的词义。在语境中读解,似为“发生矛盾、纠葛”之义,但又似是而非,犹如雾里看花,难得其解。其实“杯葛”是英语 boycott 的音译,准确的意思是:抵制;联合抵制。这个词义是无法通过字面意义的组合而得到的。

粤方言词“燕梳”实为 insure(保险)的音译。在香港, fashion show(时装表演)全音译为“花生骚”。望文生义,“燕梳”、“花生骚”都使人莫名其妙。Fashion 在南方和港台曾经还有一个译名是“花臣”,字面意义上也难以理解,但“花臣”的字面意义似乎比“花生”要“陌生化”一些,因而也就不至于像“花生”那样让人一下子“陷”入字面意义而不能“自拔”。

“牛轧(糖)”,又作“鸟结(糖)、牛根(糖)”,是一种奶油花生(杏仁)糖,“牛轧、鸟结、牛根”都是法语 nougat 的音译。拘泥于音译用字字面意义,就难以得到正确的词义理解。

5. 谐音别解造成词义理解偏误。

“密陀僧”,从字面意义上看似乎是密陀宗僧人,其实是一种无机化合物,“密陀僧”三个字只是梵语 mudarasingu 的音译,字面意义与词义完全不相干。“没爹虾罗”是马来语 mutihāra 的音译,义为“真珠”。^①“没”读 mò。但是“没”的字最常用意义是“没有”的“没”,因此“没爹虾罗”就有了某种字面意义上的“虾”(虾罗)的误解。

^① 刘正琰(1984, 246页)。

“猛犸”是现已绝种的古代巨象，其遗骸曾在北美、欧洲和亚洲发现。“猛犸”这个名称是音译的外来词，即英语 mammoth 的音译，又作“曼摩司”。望文生义，很多人以为“猛”是个汉语成分，“犸”是一种动物，其实，“猛”没有意义，“犸”也没有意义，“猛”、“犸”两个字合起来才表示一个最小的意义，也就是说“猛犸”在意义上是囫圇一团的，跟“曼摩司”的性质相同。

第四章 意译与意译词

第一节 意译词的性质和范围

一、意译的性质

汉语借用外来词,“意译”是常用的方式之一。所谓意译,顾名思义,就是根据外语原词的大意来译。“意译”也写作“义译”,意思虽然差不多,但还是有一些差别。“意”、“义”浑言不分,析言有别:“意”作“意思”讲,“义”作“意义”讲。因为意译只是根据外语原词的大意来译,所以“意译”比“义译”更确切一些。

所谓“原词的大意”应该如何理解?伍铁平(1994)指出,要区分词义(meaning)、词的客观所指(referent)和词的命名根据(motivation,或译“理据”)。黄河清(1995a)据此阐释说:“Vitamin 和‘维他命’的词义和客观所指都是一样的,但是它们各自的命名根据却不一样。”因此,意译词的意义应是来自外语原词的词义,而不是来自外语原词的命名根据,也就是说,“重在原词的词义或其所指的事物。一般不大顾及原词的命名根据是什么。例如,‘本生灯’(Bunsen Burner)中的‘灯’,它是根据 burner 的词义或其所指对象翻译的,因为,如果根据 burner 的命名根据,那么它的仿译词应该是‘燃烧物’。”

二、意译词的范围

1. 意译词的词源特征。

意译是用汉语中的语音语义结合体(词、语素等)做材料记录外语词的意义,意译词是通过意译的方式借用外语词而产生的外来词。因

此,诸如用汉语的“桌子、书、走”对译英语中的 table、book、walk 之类,“桌子、书、走”并不是意译词,因为“桌子、书、走”所指称的事物、行为等都是汉语社会原来就有的,“桌子、书、走”这些词也不是通过翻译 table、book、walk 等词才产生的。

意译词主要应是仿译词,如:

代沟(generation gap)、马力(horsepower)、黑板(blackboard)、黑马(dark horse)、足球(football)、篮球(basketball)、热线(hotline)、热狗(hotdog)、圆珠笔(ballpoint pen)、软件(software)、硬件(hardware)、硅谷(silicon valley)、游戏规则(game rules)、口袋书(pocket book)、互联网(Internet)、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超人(superman)、超级明星(superstar)、超级市场(super market)、冷战(cold war)、情商(emotional quotient)、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至于根据外语词的意义采取“重新命名”的方法构造的新词,如“随身听(Walkman)、直升机(helicopter)、维生素(vitamin)、扩音器(microphone)、水泥(cement)、激光(laser)、天使(Angel)、集装箱(container)、扬弃(Aufheben)、胶卷(film)”也是因为借用外语词而产生的,其词形是新的,亦应归入外来词之列,属于广义的外来词。

2. 字面上有意义的外来词并不一定是意译词。

有一些外来词被看作音意兼译的外来词。例如下例中的“克他命”:

在今年3月升级为A级受管制药物的克他命(ketamine)仍是最受本地嗜毒者“欢迎”的合成毒品。在今年上半年,因滥用克他命而被捕的嗜毒者有124人,占总被捕人数的28%,高居榜首。(《克他命仍最受“欢迎”,被捕服食者人数最多》,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络版“新加坡新闻”,2006年9月7日)

诸如此类的外来词还有“爱斯不难读(Esperanto 世界语)、客来而忙(地名 Claremont 的音译,见罗常培《语言与文化》自序)、爱滋

(AIDS)”等。这类词是什么性质？一般来说，没有人把这样的词看作纯意译词，大多只是看作音意兼译。但“音意兼译”这一名称意味着既是音译，也是意译。

汉语中的绝大多数语素都是单音节的，单音节的绝对优势使人们习惯于每个音节、每个字都有意义。因此，即使是音译，人们也常常力图把音译的汉字“咀嚼”出意义来，虽然带有语言游戏的味道，但因为更容易记忆，所以人们乐此不疲地“循音赋义”。但“循音赋义”得到的字面意义属于谐音别解，与外语原词的意义无关，因此只是“谐音别解”，而不是“音意兼译”，更不是意译。例如“尖头鳊、竞得尔曼、尖头满、真特门”都源自 gentleman，尽管“尖头鳊”字面上形成了有意义的组合，但字面意义并不是 gentleman 的词义，因此，“尖头鳊”与“竞得尔曼、尖头满、真特门”一样，都只是 gentleman 的音译。

3. 文字形体符号上“意化”的外来词不是意译词。

汉字的字符有音符、意符，音符表读音，意符表示意义类属。音译外来词的文字书写，往往先采用音符来记录外语词的读音，然后加上意符，“以形表意”，如“目宿”到“苜蓿”的变化就是如此。这类文字形体上的“意化”（意义化）是汉语通过书写符号的形体对外来词进行“汉化”的重要方式，但书写符号形体上的“意化”不等于“意译”。无论是“目宿”还是“苜蓿”，都是以纯粹的音节符号，通过记录外语词语音的方式记录音义结合的外语词。换句话说，在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符号的符号层面上，“目宿”、“苜蓿”中的单字都只是记音符号，不具有独立的意义。书写文字形体上的“意化”属于文字所用符号层面（即字符层面）的“意化”，与意译无关。文字形体符号上“意化”的外来词，也不属于意译词。意译是用汉语中既有的词语来翻译外语词。“苜蓿”这个词是无法意译的，因为汉语中本无相应的词来指称这种植物。

第二节 “意化”是汉语吸收外来词的主要倾向

一般认为,汉语吸收外来词时倾向于采用意译,因为意译更符合汉语的心理,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所以历来人们都认为意译比音译更加适合汉语吸收外来成分。马西尼(1997, 169—170 页)说:“意译词和仿译词与汉语本族词之间还有两个共同特征:词的音和形之间有着一种语义上的联系;语义单位的连接体是根据词素组合规则决定的。因此,汉语总是倾向于用意译或仿译的方法来创造新词。”由于这一倾向,在外来词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音译词为意译词所替代。

胡裕树主编(1995, 252 页)说:“在汉语词汇的发展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当外来词输进来以后,往往开始产生借词,后来另造新词来代替借词。例如‘习明纳尔’后来改成‘课堂讨论’,‘哀的美敦书’改成‘最后通牒’。‘瓦斯弹’改成‘毒气弹’,‘康拜因’改成‘联合收割机’,‘麦克风’改成‘扩音机’等等。”香港中国语文学会(1993)《“外来概念词词库”总说明》一文也认为:“然而,汉语则不同,它对外来概念词的吸收,往往先是音译,后又逐渐改成意译,这已成了多数汉语外来概念词的演变规律。”

从汉语吸收外来词的情况看,确实有好些外来词首先是音译词,后为意译词所替代。但是外来词形式的嬗变,并不一定总是沿着“音译——意译”的道路发展。黄河清(1995b)说:“五四运动到现在,可能确有一批外来词是从音译发展到意译。可是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如明季清初和鸦片战争前后,不少外来词一开始就是意译的。这些意译词多为来华传教士所创立,因为他们懂汉语。这类意译词很多,而且大部分现在还在使用。到了五四运动前后,有些词反而音译了。例如,在19世纪中叶,北京同文馆的美国总教习 W. A. P. Martin(丁韪良),在他的一部译著《万国公法》中用‘民主’来译英语中的 republican。后来

可能是受了他的影响(因为《万国公法》在当时是很有名的),有人用‘民主’来译 democracy。可是到了五四, democracy 反而被音译为‘德谟克拉西’。所以这个词的嬗变过程应该是:意译——音译——意译。”

从汉语中的语素情况来看,绝大多数语素都是单音节的,单音节语素的绝对优势使人们习惯于每个字每个音节都有意义。这是汉语汉字认知图式的基本特点。从这一特点来看,音译是别扭的,一连串没有意义的音节字面上缺乏意义关联,既不便于理解,也不便于记忆。因此,从汉语的习惯来说,汉语倾向于采用意译的方式借用外来词,应该是有依据的。

但是,许多字面上有意义的外来词其实并不是意译词。如上所说,诸如“克他命(ketamine)、爱斯不难读(Esperanto)、客来而忙(Claremont)、爱滋(AIDS)”之类的外来词其实都不是意译词,而只是音译词,这些音译词字面上是有意义的,但字面意义并不是这些词的词义,也不是外语原词的意义,而是各个单字作为音译符号串联在一起时,各个单字本来的意义恰好形成了有理组合。从这一类词的情况看,说汉语倾向于意译,其实是不准确的。汉语的认知图式只是习惯于字面上有意义,便于记忆,便于使用。因此与其说汉语倾向于意译,不如说汉语倾向于字面上有意义,也就是使外来词在字面上“意义化”(简称“意化”)。这两种说法的性质并不相同,因为“意化”不等于“意译”。

正是在这样的语言心理的支配下,汉语中出现了大量字面上有有意义的“谐音别解”音译词形式。这类“谐音别解”的音译词与音译用字偏好使用形旁来表示意义类属的情况一样,其特点概括起来说,就是汉语倾向于“意化”外来词。意译也是“意化”的形式,而且是最重要的形式,但是“意化”不等于意译,“意化”既包括意译,也包括偏好谐音别解、偏好使用以形表义的形声字的倾向。

总结以上所述,有三点认识:

(1) 意译是汉语吸收外来词的主要方式之一。

(2) 音译词多有谐音别解现象(往往被误认为音意兼译)。

(3) 音译字常用形旁表示意义类属(但不是意译)。

汉语中其他类型外来词,包括“音意双关”的借词(基因 gene、引得 index、绷带 bandage、媒体 media、乌托邦 Utopia、弗晰 fuzzy)、“半音译半意译”的借词(新西兰 New Zealand、冰激凌 ice cream)、“音译附加表意成分”的借词(car+车,卡车;beer+酒,啤酒)以及大多数的形译词(常识、分配、改编、进步、商业、右翼、组合、组织),无不具有“意化”的要素和特点。

一言以蔽之:“意化”是汉语吸收外来词的主要倾向。

“意化”是汉语吸收外来词的主要倾向,各种“意化”的方式都可以看作汉语汉化外来词的重要手段。

第三节 意译作为借词手段的价值

一、更符合汉语汉字的认知习惯

汉语中的大多数音节(写下来的大多数字)都有独立的意义(联绵词中的单字以及复音节拟声词中的单字是例外)。汉语汉字的认知图式使人们习惯于每个字每个音节都有意义。对于复音词词义的理解,人们也习惯于通过字面意义的加合、引申来完成。所以,除了那些不便意译或无法意译的外语词只能用音译以外(如“沙发、咖啡、柠檬、吉普、槟榔、巧克力”),如果有音译和意译两种形式可以选择,意译的形式往往比音译的形式更易被接受。尤其是音节数量很多的音译词,既不利于辨认,也不便于记忆,很不符合汉语汉字的认知习惯。历史上许多音节数量较多的音译词,不是音节数量被减省,就是为意译词所替代。即使意译词的音节数量跟音译词的音节数量差不多,人们也往往宁愿选择意译词的形式。

意译词音节数量跟音译词音节数量相同的:

习明纳尔(семинар)→课堂讨论

莱塞(laser)→激光

水汀(steam)→暖气

意译词音节数量比音译词音节数量少的:

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灵感

德谟克拉西(democracy)→民主

狄克推多(dictator)→独裁者

奥伏赫变(Aufheben)→扬弃

意译词音节数量比音译词音节数量更多的:

康拜因(комбайн)→联合收割机

正因汉语汉字习惯于字面有意义,所以在佛经的翻译中,对于一些汉语原来没有的概念,汉语往往习惯于用意译的方式来吸收词语,王力(1980, 523 页)以“世界、现在、法宝、庄严、因果、圆满”等词的借用为例,说明意译词很容易和汉语原来的词汇融为一体。王力(1980, 596 页)还指出:“在佛经的翻译中,意译的胜利,也表现了汉语的不可渗透性:宁愿利用原有的词作为词素来创造新词,不轻易接受音译。”虽不能说在佛经的翻译中意译取得了战胜音译的胜利,也未必能说汉语有不可渗透性,^①但说汉语倾向于“利用原有的词作为词素来创造新词”还是很有道理的。

从佛经翻译所形成的译词看,其中的音译词居多,但是进入社会一般词汇的佛经译词有许多是意译词。这也反映外来词的借用形式受到外来词应用语域的制约。在佛学领域,音译的方式是首选,从玄奘法师的“五不翻”可以一窥缘由。但在大众语言生活中,意译词更为适用。换个角度说,意译词更容易为大众语言生活所接受,更容易进入一般词

① 赫德森(1990, 78 页)指出,不存在不能借用的语言要素,甚至连语言的形态屈折系统都是可以借用的。

汇,音译词与汉语大众的认知习惯毕竟是不相适应的。

二、意译的方式凝练、概括、经济

helicopter 当然可以音译,但音译的形式可能比较长(全音译可以有 5 个音节),也不能反映这类飞行器的起降及飞行特征,而意译词“直升机”则比较形象、直观地实现了这样的语义表达。film 在方言中有“菲林”音译形式,相比而言,“胶卷”的语素意义虽有不够专化的地方(在语用中逐渐得到专化),但“胶卷”一词的内部形式从质料上(胶)、包装形式上(卷)更能反映这类摄影材料的特点。Internet 的音译形式有“因特耐特”,而意译词“互联网”则能比较确切圆满地反映这一信息系统的性质和特点。对 Walkman 采用重新命名的方式创造的“随身听”,反映了这类便于随身携带的可以录音放音的器材的特点。Vitamin 的音译形式是“维他命”,字面上虽有意义,似乎也能反映其性质特点,但是字面上的意义是有点扭曲的,而意译词“维生素”则表义更准确、形象。再如:

① 去年初,国际权威投资分析公司高盛证券一份剖析全球经济报告,震撼全球,引起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回响。……在报告中,所谓的金砖四国(BRICs),是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把这 4 个国家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串起来之后,称之为 BRICs,中文译名为金砖四国。(马来西亚《中国报》网络版,“十分专题·亚洲经济·金砖四国崛起,颠覆全球经济”,<http://fw123.blogspot.com>)

② 这项民调出来后,印度只有少数媒体报道了此事,而且没有任何评论。与此前印度媒体热情报道“印度竞争力领跑‘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相比,是另外一种态度。(《中印百姓对未来很有信心》,《环球时报》2006 年 10 月 13 日第 2 版)

缩略语 BRICs 在读音上与意义为“砖”的 bricks 同音,采用意译,

在语义上更能表达四个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经济价值特征,而音译形式是不具备这样的语义表达作用的。

正因为意译有相对而言的长处,所以一些既有意译形式又有音译形式的外来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意译形式流传下来,而音译形式仅仅“保留”在古代。例如梵语 *udambara* 的意译“无花果”流传至今,而 *udambara* 的音译“优曇钵、乌曇跋罗、优曇钵罗、优曇婆罗”以及波斯语 *anjir* 的音译“阿狙”、拂林语 *Tin* 的音译“底珍”都被历史淘汰、弃而不用了。^①

三、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

1. 意译为汉语增添了新词语。

王力(1979)说:“拿现代书报上的文章用语和鸦片战争以前的文章用语相比较,外来的词语恐怕占一半以上;和‘五四’时代的文章用语相比较,恐怕也占四分之一以上。”其中,意译词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当代汉语中,新的意译词仍在不断出现,如“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就是近十几年中出现的新的意译词:

在美国科技界,外籍人才中早有“玻璃天花板”之说。即外籍人才在就业、升职等方面,都面临着看不见的阻力。(《歧视困扰美科技发展》,《环球时报》2005年5月6日第12版)

意译词为汉语引进了指称外来概念、现象的词语,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词汇。意译词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入汉语,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一一指明哪些词是意译词,也无法统计汉语中到底有多少意译词,许许多多的意译词与汉语原有的词汇融为一体,使人不察。诸如“收音机(radio)、电视(television)、冰箱(ice box)、洗衣机(washing machine)、扩音器(microphone)、水泥(cement)、集装箱(container)”之类的意译

^① 高增良(1979)。

词,词形面貌都与汉语自造的词语毫无二致。对于意译词,词典一般也都不注词源,如《现代汉语词典》(2005)收入的英语 vision 的意译词“愿景”就没有注明词源。因此,我们已经很难一一指出哪些词语是意译词;至于意译词在现代汉语词汇中的总数以及所占比例,更是难以确切统计。

2. 意译为汉语增加了新语素。

因意译而产生的表示“丑闻”的“门”,是因意译而产生的一个新语素。这个新语素的产生源自美国的“水门事件”。水门大厦是位于美国华盛顿的一座综合大厦,是美国民主党全国总部所在地。1972年6月18日凌晨有5个人因潜入水门大厦安装窃听器、搜集民主党内部竞选策略的情报而被捕。这一事件导致理查德·尼克松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以政治丑闻而辞职的总统。水门事件(Watergate case)以后,每当一国领导人遭遇执政危机或执政丑闻,便通常会被国际新闻界冠之以“门”(gate)的名称,如“伊朗门、拉链门、虐囚门、情报门”等等:

①“伊朗门”:里根政府企图以“暗中向伊朗军售”的方式换回美方人质,并以军售款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资助伊朗提高对抗伊拉克的军力,使当时仍在进行的两伊战争继续打下去。此事曝光以后,被称为“伊朗门”事件。

②“拉链门”:当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身陷莱温斯基性丑闻,被称为“拉链门”。据报道克林顿经常和莱温斯基在办公室里行男女之事,媒体便将最具隐喻性的道具“裤裆拉链”作为这一性丑闻的代名词,称之为“拉链门”。

③“情报门”:在美国对伊拉克开战前,布什和切尼曾宣称确信伊拉克拥有生化武器并打算重启核计划,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美国在攻占伊拉克以后始终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4年2月8日,美国总统布什、副总统切尼都对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发表了讲话,修正了早先美国对伊拉克开战的理由,称萨达姆可能制造过违禁武器。而据一位负责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首席专家透露,美国指责伊拉克拥有生化以及核武器等问题“几乎全部是错误的”。各种舆论压力促使布什同意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彻查战前情报问题。这就是所谓的“情报门”事件。

④“虐囚门”:美英联军虐待伊拉克战俘事件。2003年美英军队占领伊拉克以后,在伊拉克境内发生了一系列美英军队虐待伊拉克战俘的事件,被国际媒体称为“虐囚门”事件。

“门”作为“丑闻”的代名词在汉语中有进一步扩大使用的趋势。但凡某人或某团体所做的一些地下的非法的或隐秘的事情被曝光后,人们就引用“水门事件”这个典故将其称为“某某门”,如有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的“电话门”事件,美国某著名公司的“电话门”事件,国内房地产行业的“暴利门”事件,此外还有“邮件门、跳水门、广告门、短信门、质量门、劳工门、婚礼门、特工门、秘书门、蝴蝶门、可乐门、剽窃门”等等,不一而足。

3. 意译为汉语语言成分扩大了语义范围。

意译不仅为汉语增加了新语素,也为汉语既有语素增添了新的义项,扩大了汉语语素的结合面。如“辣妹”之“辣”是 the Spice Girls 中 Spice 的意译,spice 原义为包括“胡椒、生姜、豆蔻”等带有辣味的调味品,由于 the Spice Girls 演唱组表演时的装扮、表演风格的特点,“辣”字有了“性感、奔放、大胆、激情”等含义,因而除了“辣妹”以外,又有了“辣舞、辣歌”等词语。汉语原有的“辣”也有“热烈”的意义,但意译而来的“辣”字显然义项更复杂,其中的“性感”义是汉语原有的“辣”字所没有的。

英语中的 Ms. 和 Mr. 用于地名或行业等名称前指具有代表性的女子或男子,如 Ms. Asia(亚洲小姐)、Mr. Football(足球先生)。汉语中通过意译也引入了这样的意义和用法。“世界杯”、“考比伦杯”中的

“杯”都是英语 cup “奖杯”义在意译,是汉语中原有的“杯”所没有的。“奖杯”义是从“杯子”义引申出来的,但这一引申过程是在英语中完成的,汉语中的“奖杯”义的“杯”在借用了英语 cup 的“奖杯”义以后也增加了这一义项。

意译为汉语原有词语的语义发展提供了重要渠道。意译英语 green 义项之一(符合环保要求的,无公害、无污染的)的“绿色、绿”,在汉语中构成了“绿色食品、绿色大米、绿色水果、绿色产业、绿色产品、绿色标志”等词语,甚至还出现了“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绿色饭店、绿色村镇、绿色房产、绿色医院、绿色商场、绿色人才”等新词语,^①其义已不是汉语中原有的“绿色、绿”的意义(像草和树叶茂盛时的颜色)。由于意译的原因,“绿色、绿”都具有了英语中 green 新产生的“无公害、无污染的”意义。例如:

据英国《独立报》2月14日报道,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近日表示,要使新西兰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最早减少到零,把新西兰建成世界上最“绿”的国家。(《新西兰要成“最绿”的国家》,《环球时报》2007年2月15日第5版)

外语词的语义发生引申、转喻等变化,汉语中与之同义的成分借助于意译而随之发生语义变化,是汉语语言成分语义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汉语语言单位随着同义的外语成分的语义的引申、转喻等变化而发生语义变化,这一语义发展的形式似乎还没有引起注意。从意译中的这类情况来看,应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4. 意译使语法单位的功能发生变异。

在意译英语的过程中,一批汉语既有的实义语素用于意译英语词结构中的词缀成分,如“反-(anti-)、后-(post-)、非-(un-、dis-)、超-(super-)、前-(pre-)、可-(英语成分为后缀:-able、-ible)、-学(-ics)、-者、-员、-家

^① “绿色人才”指从事环保工作的人才。

(-er、-or、-ist、)-性(-ity)”等,在词结构的作用下,意义趋向虚化,形成了介于词根与词缀之间的成分——“类词缀”。类词缀使得汉语的词根与词缀的界限趋向模糊,也使汉语的复合词与派生词的界限趋向模糊。

5. 意译为汉语增加了新的词语结构形式。

“后工业化的”是 postindustrial 的仿译词,这样的词语结构是汉语原来所没有的。诸如此类的词语还有“后现代主义、后印象派”等。而“博士后”这样的名词性词语也是直接意译英语的 post-doctor 才产生的。近年来在各种媒体上出现的“文化中国、魅力中国、科学中国、乡土中国、文明中国、城市中国”之类的“名+名”组合,都是在仿译英语词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类“名+名”组合内部的语义结构是不一样的。此举一个从属关系的偏正结构的例子:^①

正如《环球时报》9月12日第11版《向世界展示“魅力中国”》的文章所说,通过推介中国的大众文化,“向世界展示‘魅力中国’”,确实是必要而紧迫的。(《靠什么打造魅力中国》,《环球时报》2006年9月26日第11版)

其中的理据、结构和整体意义,不从意译这一角度是难以说清楚的。

赵元任曾经指出汉语中有不少词语组合乃至“整个儿的语句”都是汉语中本来没有的,“借译的现象当然不限于复合词的各部分,也有整个儿的语句借译的。比方‘高峰会议’,中国本来没有这个话,是从 summit conference 译来的。有时候有些话听多说多了根本就忘了是外来的,例如‘换句话说……’或‘换言之……’是从 in other words……来的”。^②

赵元任(2002, 622页)还提到汉语词受到外语词影响而发生的功能变化。如汉语的“理想”是名词,英语的 ideal 也可以当形容词用,受

^① “从属关系的偏正结构”的分析见下节。

^② 赵元任(2002, 606页)。

意译的影响,汉语也跟着说“最理想”。“还有 publish 翻成‘出版’,一点没有什么外国的意味。但是现在通行把 publish a book 翻成‘出版一部书’,那么‘出版’既然已经是一个动宾结构了,应该等于一个不及物动词,现在又加上一个宾词‘一部书’,那就又变成及物动词了,这就是受了 publish 可以当及物动词的影响。”尽管今天“出版一部书”这样的表述已经毫无外来色彩,但这样的汉化过程非经历者是不知道的。

第四节 意译的歧异与阻滞

意译虽有这样那样的长处,但是,意译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用音译的方式借用外来词所存在的问题,意译也都存在。与音译一样,汉语用意译的方法借用外来词,也存在歧异和阻滞这两类问题。

一、歧异

1. 一词多形。

英语 ice lolly 的意译形式有“冰棍、冰棒、冰糕、冰条、冰箸、冰枝、冰燭、棒冰、雪糕、雪枝、雪條、霜條”。^①pilot 在汉语中最早的意译形式是“引水人”,后又有“领港、引水者、引航员、引水员”等形式。^②Internet 的译名有“国际电脑网络、全球电脑网络、全球资讯网络、英特网、交互网、国际网际网络、国际互联网络”,等等。^③Broadband, 中国大陆译为“宽带”,新加坡译为“宽频”^④:

据知,无线宽频(broadband)服务订户装置无线路由器后,若不更换密码,在使用无线路由器上网时,其他在他住家附近使用电脑的人也

① 朱建颂(1999)。

② 黄河清、姚德怀(1997)。

③ 李锐华(1996)。

④ 现在中国亦有“宽频”一词,不过意为“宽带视频”。

可盗用这个设备,跟他同时上网,这可能影响他上网的速度。(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络版,2006年11月11日“新加坡新闻”)

2. 意译造成同形词,引起语用上的歧异。

有的意译词,表面上看起来是汉语中既有的词语,但其实语义、功能都不一样。“强人(强盗)”和“强盗”中的“强”意义相同,是汉语中原有的。但“商界强人、事业的强人”中的“强人”是来自英语 strongman 的意译,跟汉语中原有的“强人”根本不是一回事。

不仅如此,意译还会使汉语原有词义发生变异,以至于造成使用上的歧异。“晚安”从字面意义上,只是晚间的问候语,并不是道别语。但用“晚安”意译 Good night 后,“晚安”已不能作为一般的问候语,而成了晚间的道别语。

3. 导致词语内部形式、结构方式的歧异。

诸如“文化中国、魅力中国、助理国务卿、助理导演”之类的仿译词,在增加了汉语词语的内部形式的同时,也使汉语词语的结构关系和内部形式增加了复杂性。

“文化中国、魅力中国”之类的词语,其内部结构是“名+名”,本是汉语既有的结构方式,然而汉语既有的“名+名”组合,表示领属关系的成分组合形式是领属性成分在前,从属性成分在后,如“中国文化、中国魅力”;而“文化中国、魅力中国”之类的组合,把从属性成分前置,领属性成分后置,这就使汉语“名+名”组合出现了“从属性成分+领属性成分”的内部形式。从结构的变换来说,汉语表示领属关系的偏正结构可以加“的”(中国的文化、中国的魅力),但“从属性成分+领属性成分”的构造中不能加“的”,因此,虽然都是偏正关系,但一种是可以加“的”来强调前置成分领属性的结构,一种是不能加“的”的结构;同时,在“从属性成分+领属性成分”的构造中,从属性成分有“属性化”的语义变化倾向。结构上的变化和语义成分的性质变化,使得汉语领属结构的结构形式和内部语义形式出现异数,导致了汉语词语结构方式和内部形式

的复杂化。

陆俭明(2004)把汉语中领属性偏正结构的语义类型细分为 16 小类。诸如“校长助理、总经理助理”之类的“职位领属”关系,似可纳入其中的“称谓领属”的小类。与汉语已有领属性偏正结构的形式不同,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受英语影响的“从属职位+领属职位”的名词短语,如“助理国务卿、助理导演、助理制片”之类,其形式为“从属职位+领属职位”。这类形式的词语有的在汉语中沿用已久,如“助理研究员”,实际上已不属于领属关系,而是限制关系,与“副研究员”相同。近年来出现的“助理教授”大致与此相同。而“助理导演、助理制片、助理国务卿、助理教练”之类,则形成了与汉语原有的领属关系形式不同的从属关系的短语形式。这类短语是仿译“assistant~”构造的英语词语而形成的。这给汉语增添了一种新的领属关系的短语形式,这就是从属形式的领属关系。汉语领属关系的结构形式由此趋向复杂化。

还有一种前置成分是名形兼类词的结构,如“精彩中国、时尚中国”等。这类“名+名”结构因前置成分是名形兼类词而有结构性的歧义,一类是修饰和被修饰的结构,一类是从属成分和领属成分形成的结构。^①

“乡村中国、城市中国、戏曲中国、小说中国、电影中国”之类的词语是另一类受外语词语的影响而产生的词语形式,其语义构造为“~~中的中国”(乡村中的中国、城市中的中国、戏曲中的中国、小说中的中国、电影中的中国)。

赵元任(2002, 622 页)举过一个“结构性借语”的例子——“政变在越南(coup in Vietnam)”,指出这样的词语形式主要限于书名、文章标题等。近年来新出现了诸如“雅虎中国”之类的词语,也是源自对英语

① 目前语用中出现的“名+名”构造的词语,内部语义关系很复杂。如中央电视台节目中有“文明中国”的栏目,从其内容来看,“文明中国”的内部语义关系与“美化城市”相同,意即“使中国文明化”。

短语组合的直接对译。此类构造的机构名、公司名越来越多。对英语短语组合的仿译使汉语的名词性词语出现了原本所没有的结构方式和语义构造。

“共产国际”也是仿译外语词语而形成的,这个词大概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在汉语中出现并逐渐流通起来的(“共产国际”是 1919 年诞生的),此外还有“第一国际”(First International)等。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国际”之类的词语是极少的。改革开放以来,一些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由对这些公司英文名称的仿译开始,汉语中出现了一些“~~~国际”的机构、公司名称。一些中国企业逐步国际化后,也常以“~~~国际”的方式命名。中国中央电视台 CCTV International 频道的汉语名也有省略形式的“中文国际”。

用汉语的实义语素意译英语的词缀所形成的成分(如“后、超、前、可、反、非、性”等),这些成分都具有一定的实义,功能上也介于词根与词缀之间,因此有所谓“类词缀”之说。“类词缀”使汉语复合词和派生词的界限趋向模糊化。就“后现代、超现实主义、反导弹、非物质性”等词语的内部语义关系来看,分析成偏正结构并无大碍,甚至比分析为派生词更符合语义认知。这类词语的出现,使得汉语的词根和词缀的界限趋向模糊,复合词和派生词的结构界限也就难以明确地区分开来。

二、阻滞

所谓阻滞是指意译过程中的语义传达不畅、失真,具体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 仿译可能造成实际无理据的组合。

仿译是按照外语词的结构采取语素对译,有的仿译词在字面上形成的是有理据的组合(如“代沟”对 generation gap 仿译,“黑板”对 blackboard 的仿译),有的却是表面上看起来有意义,其实是无理的字面组合形式。如 Microsoft 的汉语仿译形式是“微软”,“微软”二字其实

是无理的汉字组合。^①

2. 意译词字面意义并不一定直接反映词义。

一般的看法,意译词是汉语固有的语词成分构造起来的,因此意译词的词义比较容易理解。其实意译词的字面意义并不一定直接反映词义,也就是说,把意译词的字面意义组合起来并不一定就能理解词义。老卒(1993)提到一篇有关食品介绍的文章里用到一个译名“橡黄素”,作者是学药学的,但不知道“橡黄素”为何物,向一位学部委员(现称院士)请教,竟然也不得其解。

仿译词“热钱”(Hot Money)的意义似乎从字面意义上就可以理解,其实“热钱”之“热”既不表示“温度高”,又不是“发热”的“热”、“眼热”的“热”、“热门”的“热”、“加热”的“热”,也不是“足球热、旅游热”之“热”。根据词典的现有释义并不一定能理解“热钱”的意义,把字面意义组合起来也不一定就能确切理解词义。^②

3. 意译总难准确、全面。

有一些意译而来的词语,与同形的汉语原有词语的意义颇不相同,按照汉语原有词语的意义来理解,既不确切,也会有偏差。如“游戏规则”是英语 game rules 的音译,其意义并不等于汉语的“游戏”和“规则”的相加。英语中的 game 不仅有“游戏、竞争、比赛”义,还有“职业、行业”义。因此,意译而来的“游戏规则”往往是“职业规则”、“行业规则”的意思。但是汉语原有的“游戏”一词只有“娱乐活动、玩耍”等义。如果仅从汉语原有的“游戏”义来理解译自英语 game rules 的“游戏规则”,就很难把握“游戏规则”的真正含义,在应用中也难有确切认同。

有的外语原词有两个以上的意义,但在意译中简单地采用与其义项之一相对应的汉语词来意译另一个义项,结果产生语义扭曲的意译

① 参杨锡彭(2003c, 91页)。

② “热钱”(Hot Money),又称“逃避资本”(Refugee Capital)、“游资”,指为追求最高报酬、最低风险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迅速流动的短期投机性资金。

词。如英语中的 plaza 有“广场、集市场所”等义,近年来许多大型购物场所的命名,把“集市场所”义的 plaza 译为“~~广场”,使人不解。现在在这个意义的“广场”似有积非成是、约定俗成的迹象。

赵元任(2002, 844 页)讨论过类似的现象:“在翻译外语词的时候,外语里有甲、乙两个意义的词可能等于汉语里只有甲义的词,当外语词用于乙义的时候,这个汉语词也会用来表示它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乙义。……例如‘微妙’这个词通常只表示 delicate 的‘精致’‘灵敏’等的意思,用于社会或政治形势就讲不通。但是由于英语的 delicate 还有这种用法,所以现在我们在报上也看到‘微妙’用于这个引申的意义。”^①

朱原(1998)指出:“……外来事物的翻译是很难的。严复关于翻译难的名言‘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就是说的外来语翻译的艰难。除信达雅之外,现代科技名词由于学科的系统性和互相交叉,又需要有严格的系统考虑,要彼此呼应。近 20 年来新外来语的翻译成绩很大,不乏佳译,但是也出现了乱译。其中比较多见的一个现象,是把英语多义词的次要义项简单地用主要义项来译,从而造成混乱或费解,如把 formula 1 racing cars 译成‘一级方程式赛车’(formula 在这里指‘根据赛车的大小、发动机的容量等对赛车的分级’,与数学上的‘方程式’无关),把 philosophy of grammar 译成‘语法哲学’(philosophy 在这里指‘原理’,与哲学无关)。”

还有意译不当造成文化冲突的情况。如“扫黄”“黄色小说”中的“黄”、“黄色”来自英语 yellow 意译。古德明(1993)说:“十九世纪的时候,美国《纽约报》为了跟《纽约世界》争读者,推出了一个叫做《黄孩儿》的漫画专栏,结果对手讥为媚俗、低级,‘黄色报纸’一时间成为‘下等报

① 赵元任(2002, 844 页)对 delicate 的“精致”、“灵敏”义有个注释:“其实这些意义在今天已经很少使用了,可见这个词的演变超过了作者保留的语感。”

纸’的同义词。当然,这个‘下等’并不表示淫秽;把黄色当作淫秽,是近代中国那些崇拜外国词语,却对外国词语一知半解的所谓文人干的好事。”石琪(1993)也说:“我多年来反对把‘黄色’用作淫秽的代名词,今日西方也没有这样‘辱黄’,全世界偏偏仅仅身为炎黄子孙的中国人对黄色极其贬低,实在是自取其辱。”问题虽不一定有这么严重(“扫除黑社会”的“扫黑”,“黑”与黑色人种无关,因此对于黑色人种来说并不是什么“辱黑”),不过翻译者简单化地按照 yellow 的意义翻译,引起意外的纠纷,也是值得汲取教训的。^①

4. 意译生硬。

意译往往采用语素对译的方式,这样的方式可能造成生硬的汉语词语形式。如果把 footboy 直译为“脚孩”或“脚童”,虽然结构上可以比照“脚夫、脚力(旧时指跟体力搬运有关的)、脚镣、脚炉、脚灯”,但显得十分生硬。尽管这样的硬译形成的词语如“热狗”之类已在汉语中通行开来,这样的硬译却是不足取的。

“干啤、干红葡萄酒”中的“干”(gān)与汉语中原有的“干”(gān)没有同一性。“干啤、干红葡萄酒”中的“干”是翻译英语 dry 而来,意思是“不甜的或无果味的”,一般指无糖或低糖的。英语中的 dry 有多个义项与汉语中的“干”(gān)相对应,但偏偏“干啤、干红葡萄酒”中这个“干”的意思是汉语语素“干”(gān)所没有的,如果按照汉语中原有的“干”的意义来理解“干啤、干红葡萄酒”,就会感到格格不入。^②

把英文的 disc jockey(缩略语为 DJ)意译成“唱片骑士”,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有理组合,其实语义组合关系是扭曲的。

“下意识”是对英语 subconsciousness 的仿译。词缀 sub-表示

① 马清华(2000)对“人类基本文化结构对语义的作用规律”进行了讨论。张绍麒(2001)专门讨论了词义的文化标记问题。

② 任何事情都有一分为二的两面。生硬的意译往往造成新的汉语语素。诸如意译英语的 dry 构成的新语素“干”,按照正常的意译是无法出现的。

“在……之下”，于是就仿译出“下意识”。这个词仿译之生硬，使人以为它是来自日语的形译词，^①这就“冤枉”了日语，因为日语中表示这个意义的是“無意識”(むいしき)或“潛在意識”(せんざいいしき)。就字面意义上看，“下意识”让人不解：难道“意识”还有“上”、“下”之分？其实“下”是“在……之下”的意思，但是汉语中表示这一意义的“下”在组合中不能前置，只能后置(如“桌子下”等^②)，所以“下意识”是个生硬的仿译造出的生硬译名。相比之下，从字面上看，日语词“無意識”或“潛在意識”，表义更准确，也更容易理解。《现代汉语词典》(2005)对“下意识”的释义可为佐证：①“潜意识”。②“不知不觉地；没有意识地”。

有的意译词虽然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原词的意义，但是字面意义比较生疏、冷僻，因而也显得生硬，容易导致误解、曲解。如“扬弃”是德语 Aufheben 的汉语意译(音译形式为“奥伏赫变”)，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名词，意思是抛弃其不合理部分，保留合理部分并发扬。但由于字面意义的组合比较生疏冷僻，以至于常常有人产生误解，将其理解为“扬手而弃”。

① 一些形译词难以按照字面意义来理解(如“取缔”等)，这一印象导致人们遇见难以按照字面意义来理解的词语就“下意识”地联想到形译词。也真有把“下意识”当作日源外来词的。

② “下面”作为方位词，与“在……下”的“下”同义。

第五章 音意兼译的外来词

音意兼译的外来词,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1) “音意双关”型

基因(gene)、引得(index)、绷带(bandage)、媒体(media)、乌托邦(Utopia)、弗晰(fuzzy)

(2) “半音译半意译”型

新西兰(New Zealand)、新德里(New Delhi)、南斯拉夫(Yugoslavia)、冰激凌(ice cream)、分贝(decibel)

(3) “音译附加表意成分”型

car 卡+车→卡车、beer 啤+酒→啤酒、pizza 比萨+饼→比萨饼、酒+bar 吧→酒吧

第一节 “音意双关”型

一、“音意双关”型外来词的性质

汉语从外语中借词的方式有音译,也有意译。如果在译借外语词的过程中既注意到原词的声音,选择声音相近的汉字来记写,又在用字表义上兼顾外语词的意义,那么就形成了“音意双关”型外来词。“音意双关”型外来词就是一般称之为“音意兼译”或“音义兼译”的借词。

罗常培(1989, 28 页)把“近代汉语里的外国借字”分为四项,其中“声音的替代”(phonetic substitution)一项中区别于“纯译音”、“译音误作译义”的有两目:“音兼义的”和“音加义的”。“音加义的”一目的借词,包括半音译半意译(如“冰激凌”)和音译成分附加汉语语素(如“卡车”)而形成的词语。本节讨论的“音意双关”型的外来词,大体上属于

罗氏所谈“音兼义的”一目,不过罗氏所谈“音兼义的”许多例词,在我们看来,都只是音译(已在第三章第一节中讨论)。史有为(2000, 105 页)注意到用于“谐音译”的汉语语素的意义“在不同程度上与原词义发生某种联系”,“有的联系很紧密很直接,跟意译差不多”,但认为这样的译词只是音译。

一般而言,“音意双关”的“意”当为“意思”。在音意双关的译借过程中,汉字的字面意义并不一定能够“对译”外语词,词的整体意义也往往只跟外语原词的“意思”相当。如汉语中的外来词“基因”字面意义是“基本因子”,来源于英语 gene 的音译,意义为“生物体遗传的基本单位”,可见意思是基本相当的。^①

纯粹的音译词,单音节音译成分的特点在于音译成分所表示的意义是汉语中所没有的(实际意义不是汉字的字面意义),或者跟汉语中原有的单音节语素同形异义(如 bar 的音译“吧”跟汉语语气词“吧”书写形式相同而意义不同);复音节的(包括双音节和多音节的)音译成分字面上不能形成有意义的汉语单位(词或词组),或者虽有意义,但与原词的意义不相干。因此,“克隆(clone)、沙发(sofa)、朋克(Punk)、巧克力(chocolate)、迪斯科(disco)、歇斯底里(hysteria)、阿司匹林(aspirin)”之类都只是音译词。记写这些词的用字在字面意义上的组合都是无理的。而诸如“可口可乐(coca-cola)、爱斯不难读(Esperanto)”之类的音译词,字面意义是合理组合,显然不同于“克隆、沙发”之类。但是,诸如这样在字面上有意义的外来词也只是音译词,因为其意义跟外语原词的意义不相干。

“图腾”一词是英语 Totem 的音译词。就“图腾”的字面意义看,两个音节之间实际上是一种无理组合,而且字面意义与英语 Totem 的词

① 英语的 gene 译自德语词 gene, 德语的 gene 是 pan(泛)+gen(生长)加词缀而形成 pangenesis(泛生论),又经过缩略而形成的。见刘正琰(1984, 148 页)。

义毫不相干(“图”字似乎还有关联,“腾”的意义为“奔跑或跳跃、升”,则毫无联系),因此不宜看作音意双关型的外来词。^①

sauna 在汉语中的早期译名是音译的“萨乌那”,现在中国大陆有意译的“蒸汽浴、芬兰浴”,也有音译的“桑那(浴)”。台湾地区和东南亚一带则译为“三温暖”。“三温暖”只是音译,但字面意义极易使人产生“三种温暖”的歧解。香港的电台有一种名曰“烽烟”的节目,所谓“烽烟”其实是 phone-in 的音译。“烽烟”节目的特点是听众打进电话,与主持人有问有答。但这个译名总使人想到“烽烟四起”的“烽烟”。“巴榄”又作“芭榄、杷榄”,无论哪个词形,都会使人误以为是一种橄榄,其实是一种杏,“巴榄、芭榄、杷榄”都只是叙利亚阿拉伯语 palam 的音译。

与此类似的外来词在汉语中比比皆是。“福禄”是阿拉伯语 fara 的音译,义为“野驴(野马)”。“福禄”的字面意义是有理组合(与汉语中“福禄寿”的“福禄”是同形关系),其实只是音译,因为字面意义与阿拉伯语 fara 的意义不相干。“马郎”在字面上似乎是有意义的(可以比照的是“牛郎”),但也只是苗语[mɔŋ³³ ɬ a¹³]的音译,苗语[mɔŋ³³ ɬ a¹³]的原义是“苗族男女青年谈情说爱的一种活动”,其意义并不能从汉字的字面意义来理解。“统帕”的字面意义似乎是一种“帕”,但只是傣语[thoŋ³⁵ pa⁵⁵]的音译,原义指一种带子与口袋连成一体、底部常缀以流苏的印花或绣花挂包,与汉语中写作“帕”的语素意义无关。^②

“尸利”是梵语 śrī 音译,又作“悉利、师利、息利、思利、昔利、昔哩、室利、修利、室离、室哩”,意义是“首、尊敬、吉祥”等。^③这个来自梵语的

① 关于“图腾”一词的来源有一说,即“图腾”本是中国古代“饕餮”一词的记音。“饕餮”本是图腾族徽,以后“图腾”义隐晦,“饕餮”成为传说中贪食、残忍的怪兽,并由此引申出“贪吃、残忍”等义。古代印第安人本是上古华北黄种人,经由华北、东北,经过白令海峡的古代陆桥到达北美洲以后形成北美土著居民。在历史迁移中,“饕餮”随之以 Totem 的语音传到美洲后成为当地的“土名”,再经过音译“回归”汉语,成为汉语中的外来词。见游修龄(1992)。

② 例见刘正埏等(1984)。

③ 刘正埏等(1984, 315 页)。

音译词,与汉语中同形的“尸利”没有同一性。汉语本源的词“尸利”,《辞源》的释义是“如尸之只受享祭而无所事事,比喻受禄而不尽职责”(“尸”本义为神像,也指代死者受祭、象征死者神灵的人,又引申为“受享祭”)。在此意义上的“尸利”当为汉语中的动宾复合词,而不是来自梵语的音译词。

用汉字音译外来词,字面上有意义,但又与外语原词的意义无涉,是汉语“意化”外来词的手段。“可口可乐(coca-cola)、爱斯不难读(Esperanto,世界语)”之类的词语,与外语原词有谐音的关系;字面上有意义,但字面意义与外语原词的意义无关。“嘉年华”是英语 carnival 的音译,原意为“狂欢节;狂欢;庆祝;宴会……”;“仙客来”是英文 cyclamen 的音译,是一种樱草类植物,俗称“报春花”。“可口可乐、爱斯不难读、嘉年华、仙客来”在字面上都是有理组合,同时音译用字兼顾了语音上的联系,但是,字面意义都与外语原词的意义无关,因此都只是“谐音别解”。

在音译过程中煞费苦心地选择音译用字,其结果可能使音译的词语在字面上形成有意义的组合,但字面意义与外语原词的意义根本不相干,这就形成了意义上的“别解”。由于本意是音译,用以记音的汉字与所译外语词之间总有或显或隐、或多或少的语音上的联系,也就是谐音的关系,所以“别解”是建立在谐音基础上的。因此,诸如此类的译借外来词的方式可以命名为“谐音别解”。

那么,什么是音意双关的外来词?

汉语中典型的音意双关的外来词有“黑客(hacker)、基因(gene)、引得(index)、绷带(bandage)、媒体(media)、乌托邦(Utopia)、弗晰(fuzzy)、苦力(coolie)”等。这些词不仅在语音形式上与外语原词有联系(当然只是在声音上相近,完全相同是不可能的,有时只是个别音素上有一点联想关系),而且词义也相关。必须指出的是,从单个汉字所表示的意义与外语原词中某个音素或音素组合(往往是没有意

义的纯粹的语音成分)的比较来看,这些词与外语原词没有对应的关系。因此,所谓“音意双关”之“意”与外语原词意义上的相当,只是就词的整体意义上的关联而言,即汉语词整体词义与外语原词的词义基本相当。^①

“媒体”来自对英语 media 的翻译,汉语原本只有“媒人、媒质”等词语,用“媒体”翻译英语 media,其音其“意”与外语原词的音义结合紧密,汉化的面目使人们以为“媒体”是汉语“自产”的词语。英语 hacker 指的是“网络或计算机软件系统的非法侵入者”,这个意义是 hacker 本义的引申义。汉语译名“黑客”不仅在语音上与外语原词相似,而且也间接地反映了“非法侵入者”这个意义。

目前还有些方言色彩的“泊车”之“泊”,是来自英语 park 的音意双关的借词。汉语中原有的“泊”有两义:本义为“船靠岸”,引申义为“停留”。粤方言用“泊”译 park(停车),不仅意义很吻合,而且从粤方言“泊”的读音看,与外语原词的语音联系也是很密切的。

“苦力”又作“咕哩”等,来自英语 coolie 的音译,但“苦力”的字面意义以及词义跟英语原词的意义是相当的(尽管有引申),英语的 coolie 来自印地语,本义是“雇工”。

二、“音意双关”型外来词产生的原因

1. 与汉字的性质有关。

其他语言借用外来词,一般没有所谓“音意双关”或“音意兼译”之说,汉语借用外来词却有所谓“音意双关”或“音意兼译”,原因何在?自然跟用以音译的书写符号有关,也就是跟汉字的性质有关。

从语音形式上讲,用以音译的每个汉字都与一个音节对应,因此用

^① 吴礼权(2006)分析了外来词音译的四种特殊类型,在音义密合型的音译词中有少数例词属于本章所说的音意双关型的借词,如“引得、苦力、乌托邦”等。

汉字音译外来词,实际上是以一个个汉语音节切分外语词的语音结构。但是,汉字中绝大多数单字都是有独立意义的,用以音译的汉字在音译外来词词形中并非只起单纯的记音作用,也就是说,每个单字并不仅仅是一个音节符号。这必须从汉字的性质来认识。因此,有必要再予申说。

汉字是一种语素音节文字。汉字所对应的语言符号的语音形式是音节,因此从汉字的语音形式看,属于音节文字。但是,汉字不同于纯音节文字的日文假名。日文假名虽然也是音节符号,但是单个地看,即从日文假名的符号本身来看,假名只是抽象的音节,没有意义。只有在具体的词中,日文假名才有意义。^①而汉字即使是作为音节符号来用的时候,也是以一个个具体音节的形式出现的,也就是说,汉字作为音译符号来使用,实际上同时也有语素音节的作用。如果所使用的汉字在语音形式上与外语词中的某个语音片段相似,这就有了音译的性质;如果用以音译的汉字在字面意义上的组合恰巧又与外语原词的意义直接或间接地有关联,于是音意都有了联系,这就有了所谓“音意双关”的借词。“音意双关”的外来词,其特征是译词在语音上与外语原词近似,译词的词义与外语原词的意义基本相当。

既要考虑声音上的联系,又要考虑汉字(从所记录的语言符号来说,即语素,包括成词语素和不成词语素)或汉字组合的意义与外语词的意义相关联,音、意两个方面的联系缺一不可,这就很难。单就后者而言,汉语之所以要借用外语词,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外语词所表达的意义是汉语所没有的,否则就可以直接用汉语语素组合造词。所以,汉语中真正的“音意双关”型的外来词是很少的。

2. 与汉语汉字的认知图式有关。

汉字中绝大多数语素都是单音节的,单音节语素的绝对优势造成

① 杨锡彭(2003c, 33—35页)。

了汉语的基本认知图式(cognitive schema),这就是习惯于每个音节(写下来就是每个字)都有意义,没有意义的音节也要变成有意义,就连蝉鸣、布谷鸟啼的拟声词在书面上也要谐音别解为“知了、知了”、“布谷、布谷”。至于书面上的文字,更是极尽音义关联之能事。杨锡彭(2003c, 5 页)曾有分析:“《说文》以形立训,证形索义,功绩厥伟,尚不免受汉字蛊惑,乃有‘匍’为‘手行’、‘匐’为‘伏地’之臆测;《释名》因声求义,考词源辨理据,亦难免音义关联之臆断;‘辘轳使者’观习俗析殊语,成就《方言》大业,仍不免‘美心为窈,美状为窕’之臆说。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从最小音义结合体的特点来说,古今汉语是一致的,这就是绝大多数最小音义结合体是单音节的,单音节的压倒优势使得人们往往把没有意义的音节也看作有意义。就此心理倾向而言,古人、今人都一样,不受其‘惑’也难。”

正因如此,人们对于一连串没有意义关系而仅仅是一串纯粹音节符号的组合是不习惯的。基于这种心理,汉语在音译外来词的过程中,或在历史发展中,往往要对外来语言成分进行改造,常用的方法就是缩略音节。历史上音译梵语的佛教词语,如果采用全音译的话,大都很长,不符合汉语中大多数词的词长特点。因此那些音节很多的音译佛教词语,大都有一些较短的音译形式与较长的全音译形式同时并存。例如,与“僧伽蓝摩”相比,“僧伽蓝”减省了“僧伽蓝摩”末尾的音节;“僧蓝”则选取“僧伽蓝摩”中 1、3 两个音节形成缩略形式;“伽蓝”则选取 2、3 两个音节形成缩略形式。把外来词音节减省为二至三个音节,更符合汉语词在音节数量上的特征。而更多的音译词则竭尽一切可能,力图在音译用字上形成有意义的音节组合,以便于记忆,也便于言说。如把 discothèque 或 discotheque 译成“的是够格”^①(可以有“的确是够格”的理解)等。在这样处心积虑地选择音译用字的情况下,一旦译词

① 刘正琰等(1984, 81 页)。

不仅在语音上与外语原词相近,而且用以音译的汉字在字面意义上的组合恰巧与外语原词的意义基本相当,于是音意两个方面都有了联系,这就有了音意双关的外来词。没有特定的语言文字认知图式(cognitive schema)作为心理基础,就不会有音意双关外来词的出现。

“音意双关”的借词方式是汉语汉字认知习惯的反映,“音意双关”的译词方式是把外来词汉化的重要手段。

第二节 “半音译半意译”型

半音译半意译的外来词在汉语中早已有之。梁晓虹(1994)讨论的“梵汉合璧词”,有许多都属于这一类型,如“佛土、佛事、佛经、禅士、禅让、禅门、禅师”等。

半音译半意译构造的外来词(hybrid word),其“外来”面貌往往不是很清楚,需要仔细辨析。如蛇果特指美国产的一种苹果,“蛇果”一词源自对英语 red delicious apple 的半音译半意译,“蛇”是对英语 delicious 中的语音片段-cious 的音译。red delicious apple 在香港最初的译名是“地厘蛇果”,“地厘蛇”是 delicious 的音译,后简称“蛇果”。“蛇果”之类半音译半意译的外来词在汉语中有不少。这类词语,“外来”的面貌不是很清楚,正说明半音译半意译的借词方式是把外来词从语义上、结构上进行汉化的重要手段。^①

一、构词特点

1. 意译+音译

新西兰(New Zealand)、新德里(New Delhi)、南斯拉夫(Yugoslavia)、冰激凌(ice cream)、草库伦(蒙语 öbsön xüree)、作秀(make show)、文化

^① 参第八章第四节、第五节。

休克(culture shock)、信用卡(credit card)、分贝(decibel)、奶昔(milk shake)、干啤(dry beer)

2. 音译+意译

因特网(Internet)、本票(bank cheque)、侏罗纪(Jurassic Period)、爵士乐(jazz music)、爵士摇滚(jazz rock)、摩托车(motorbike)、呼拉圈(hula-hoop)、迪斯尼乐园(Disney land)、华尔街(Wall Street)

这种借词方式是许多语言都采用的借词方式。例如英语的 fine arts 是从法语的 beaux-arts 来的, 法语的 beaux-arts 是个复合词, beaux-arts 是“美术”的意思, 其中 beaux 的意思是“美丽”, arts 的意思是“艺术”。英语用 fine 意译 beaux, 用 arts 直接音译法语的 arts, 从而形成了 fine arts 这样的译词。^①

从汉语中这类译名的结构看, 由于译名中有音译的音节, 意译部分与音译部分之间结构方式的清晰程度不等。有两种情况:

1. 译名结构比较清晰。

南斯拉夫、冰激凌、草库伦、信用卡、文化休克、呼拉圈、因特网、华尔街、爵士乐、爵士摇滚、迪斯尼乐园、呼啦圈、摩托车、作秀、本票

这类译名内部结构比较清晰, 其中大多数词语的音译部分在现代汉语中都可以独立成词。“华尔街、冰激凌、草库伦”中的“华尔、激凌、库伦”虽然不能独立成词, 但人们对“华尔街、冰激凌、草库伦”的结构认知是比照偏正结构来进行认知的。^②而“本票”这样的半音译半意译外来词, 其中的音译成分“本”(bank)是如此的汉化, 以至于使人对其音译的“身份”习焉不察。

2. 结构关系趋向模糊乃至消失。

分贝、奶昔、新西兰、新德里

① 高名凯、刘正琰(1958, 13 页)。

② 参杨锡彭(2003c, 75 页)。

“分贝、奶昔”的词化程度高,意译成分和音译成分之间的意义关系模糊,以至于如果不了解词源,就很难知道其由两个部分组成。

对于“新德里”和“新西兰”的认知情况比较复杂一些。知道地名“新德里”是相对于“德里”而言的人,可以把“新德里”切分为“新”和“德里”两个修饰和被修饰的部分,但对此不了解的人是把“新德里”看作囫圇一团的地名。“新西兰”的构造与“新德里”相同,由于作为 Zealand 的译名“西兰”未在汉语外来地名中单独出现,在汉语的语素识别中,人们是将其看作非语素音节的。就“新_”的结构模式看,按理说也是应该将其看作偏正结构的。但是,由于地名的特点之一就是内部形式往往是不清楚的,^①其中的音节往往难以追究意义,由于这一原因,往往就倾向于把“新西兰”看作一个整体性的地名而不再深究其结构了。

二、“半音译半意译”型外来词产生的原因

1. 与外语原词的结构自然对应。

半音译半意译的外来词所译借的外语原词大多数是句式复合词(syntactic compound),而且往往是个短语形式,个别的是综合复合词(synthetic compound),^②如“分贝”(decibel)。无论外语原词是句式复合词还是综合复合词,半音译半意译的汉语借词都是按照外语原词的结构,分别采用意译和音译的方式对译而形成的。这一方法最直接因而也最省事,形成的外来词与外语原词的结构自然对应。例如“新西兰(New Zealand)、新德里(New Delhi)”之类的半音译半意译词,就是通过仿照原词的结构直译而成的,只是在直译时,部分意

① 地名因习俗的需要而改换谐音字,如“裤腿胡同”改为“库堆胡同”以后,“库堆”中的单字变为非语素音节,“库堆”的指称意义也消失了,在“库堆胡同”中仅是区别意义的记号。对于这样的地名,人们大都不去追究“库堆”的意义是什么。

② “句式复合词”(syntactic compound)、“综合复合词”(synthetic compound)参见哈特曼、斯托克(1981, 346页、348页)。

译,部分音译。就原词的命名理据而言,之所以是 New(新),是与旧有的 Zealand、Delhi 相对而言的。汉语采用半音译半意译的方式来译借,更确切地反映了原词的命名理据,只是汉语背景的人大多不知道 Zealand、Delhi 的译名“西兰”、“德里”其实也是某一地名的音译而已。

“新西兰”、“新德里”如果改为全音译,词的内部结构就会趋于消失。如“新西兰”在海外华语中的译名“纽西兰”,不联系外语词,已看不出内部结构。但即使联系外语词的结构,也不能把汉语译名“纽西兰”看作偏正结构,因为其一连串的音节已经无法根据意义进行切分,自然也就不能形成结构了。

2. 凸显词义。

音译词由于字面上各个音译字之间缺乏意义联系,因此纯粹音译的词语不能通过字面意义来了解词义。通过意译外语词中的部分成分,可以明确地显示词义。如“冰激凌”(ice cream)中的意译成分“冰”显示了这类食品的特点。“摩托车”是 motorbike 的半音译半意译,其中的“车”指明了词的意义类属。半音译半意译是对外来词词形进行汉化的重要手段。^①

3. 缩短词形。

由于汉语汉字的认知特点,一连串没有意义的音节对于人们来说,是很不适宜的,既不便于记忆,也不便于读。因此,对外语词的部分音节采取意译,有利于缩短词形,也便于表义。以“南斯拉夫”(Yugoslavia)为例,全音译可能有 5 个音节之多(尤各斯拉夫,还可以更多,如“尤各斯拉维亚”)。“斯拉夫”虽然也是音译成分,但早已借入汉语,成为汉语中独立的词,并且作为构词成分构造了“斯拉夫人、斯拉夫学派、斯拉夫字母、斯拉夫语族”等。“斯拉夫”作为一个音译词已经在汉语中扎根,

^① 参第八章第四节。

成为汉语词汇的组成部分。^①就其构成成分的特点而言,“南斯拉夫”几乎与仿译词相同了。

第三节 “音译附加表意成分”型

音译附加表意成分型的借词方式跟音译、半音译半意译一样,是汉语中早已有之的借词方式。音译附加表意成分的借词方式,是把外来词从语义上、结构上进行汉化的重要手段。这一借词方式构成的外来词,比较适应于汉语汉字的认知倾向,因而是古往今来汉语吸收外来词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汉语汉化外来词的重要手段。^②

一、构词特点

1. 音译成分+汉语成分

卡(car)+车→卡车、啤(beer)+酒→啤酒、沙(俄 Царь)+皇→沙皇、比萨(pizza)+饼→比萨饼、胡姬(orchid)+花→胡姬花、沙丁(sardine)+鱼→沙丁鱼、雪茄(cigar)+烟→雪茄烟、苾苾(突厥či)+草→苾苾草、毛瑟(德 Mauser)+枪→毛瑟枪、桑巴(samba)+舞→桑巴舞、圣代(sundae)+冰激凌→圣代冰激凌、香颂(法 chanson)+歌曲→香颂歌曲、湄南(泰 Mae Nam 或 Menam)+河→湄南河

在“音译+汉语成分”这一类型的词中,有一些是把全音译形式减少音节数量后形成的简化形式再附加上汉语成分而构成的。如:

美利坚→美+国:美国

英吉利→英+国:英国

① 犹如“胡同”一词来自蒙语的音译,但在“叮嚀胡同”(城市中流行歌曲的作曲家和出版商聚居的地区,译自英语 Tin Pan Alley)(刘正琰 1984, 83 页),“胡同”则是 Alley 的意译。类似的例子如英语的 fine arts 是从法语的 beaux-arts 来的。英语用 fine 意译 beaux,但英语的 fine 也是较早期从法语中借用的音译词。

② 参第八章第四节、第五节。

俄罗斯→俄+国:俄国

2. 汉语成分+音译成分

酒+吧(bar)→酒吧;蛋+挞(tart)→蛋挞

其中,诸如“酒吧、蛋挞”这样的“汉语成分+单音节音译成分”的构造比较少,大多数是“音译成分+汉语成分”的构造。

诸如“卡车”这样的词语,虽然从语义上讲汉语成分是附加上去的,是附注性成分,造词的方式属于附注造词,但从结构上的理解来说,却是“偏”在前、“正”在后。这是汉语修饰结构的类型特点所决定的。^①

二、结构关系、内部形式的特点

这类借词的结构关系一般都比较清晰,都是修饰与被修饰关系的偏正结构。虽是偏正结构,但与汉语中其他同类词语形式在内部语义关系上不一定相同。以同为“音译成分+汉语成分”构造的词语来说,下面 A、B 两组词语的内部语义关系是有差异的:

A	B
柠檬茶	芭蕾舞
葡萄酒	沙丁鱼
幽默感	比萨饼
桑拿房	雪茄烟

A 组有无附加的汉语成分,意义不一样。这一类包含音译成分的词语,音译成分与汉语成分在语义上是修饰和被修饰、限制和被限制的关系,因此,有无附加汉语语素的部分,意义不同。

B 组有无附加的汉语成分,整个词的意义都不变。这一类型的外来词,音译成分与汉语成分在结构上是修饰和被修饰的关系,但在语义上却是同义互注的关系,更具体地说,汉语成分表示词的意义类

^① 参杨锡彭(2002)。

属,音译成分实际上只是意义类属下的“目”,两者在逻辑上具有上下位的关系。

三、“音译附加表意成分”型外来词产生的原因

1. 单音节音译成分难以独立成词。

汉语中的单音节成分往往是黏着的,难以独立成词,尤其是名词性的单音节词。吕叔湘(1963)说:“现代汉语里有许多单字,像语、言、初、始,等等,不但不能单说,在句子中也难以构成一个句法单位。另外有些单字,像单、独、句、题,等等,在句子里有时候不能不承认它自成一个句法单位,可是很难单说。”这是汉语中的常见现象,也是汉语中节律制约词语功能这一特点的表现。

音译成分在汉语中的功能也自然受到这一规律的制约,诸如“卡(car)、啤(beer)”之类的单音节音译成分,都难以独立成词。“卡(car)”从进入汉语之初词形就是“卡车”,而“啤(beer)”在进入汉语时虽有双音节的音译形式“皮儿”,但附加汉语语素构成的“啤酒”更为通行(另外还有“皮酒、比酒”等形式)。“吧”虽然可以独立成词,但也需要特定的结构环境的支撑,如“泡吧”中的“吧”,有赖于宾语的位置,也就是说,它在与动词的相互联系中,在与动词的同现中,获得相对的独立性。

2. 附加的汉语语素表示意义类属或起修饰说明的作用。

“卡车、啤酒、比萨饼、胡姬花、沙丁鱼、雪茄烟”类,附加的汉语语素表示意义类属。再如“圣代”^①,从字面意义上看,很难看出指称范围,但加上“冰激凌”以后,其词义就明确了。^②诸如“卡车、啤酒、比萨饼、胡姬花、沙丁鱼、雪茄烟、圣代冰激凌”之类的外来词,词义都是通过附加

① “圣代”是 sundae 的音译,又作“三地、新地”,顶上加有压碎的水果、核果或果汁等的冰激凌。可能是 Sunday 变形,因原先只在此日出售而得名。见刘正琰等(1984, 214 页)。

② 在“圣代冰激凌”中,“冰激凌”实际上是作为汉语成分来用的。

表示意义类属的汉语语素得到明确的。

“酒吧、蛋挞”之类，附加的汉语成分对其后的音译成分也有限制性的说明作用。

3. 音译成分的功能发展。

这类外来词中的音译成分，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意义逐渐明确，就完成了汉语化的过程，其特点在于：

① 单音节的音译成分大都作为构词成分发展了结合能力，进一步构造了新的词语。例如：

吧：水吧、茶吧、陶吧、氧吧

啤：黄啤、散啤、冰啤、听啤、罐啤

卡：轻卡（轻型卡车）、重卡（重型卡车）、集卡（集装箱卡车）

其中，“吧”有相对的独立成词的能力，如“泡吧”就是一个动宾式短语，可以有“泡了一晚上的吧”等扩展形式。

② 双音节的大都可以独立成词，如“比萨、雪茄、沙丁、桑巴、芭蕾”；不能单独成词的双音节音译形式，大都因为语用频率低，还不为人们所熟悉。如“圣代”一般不独用（在特定的语境中可以独用，如在冰激凌店的语境中）；“胡姬”在中国一般不单用，在新加坡是可以单用的。

四、音译附加表意成分型和半音译半意译型外来词的辨析

这两类外来词的区别在于跟外语原词的关系不同。举例来说，“冰激凌”译自 ice cream，“冰”意译 ice，“激凌”音译 cream，是半音译半意译型的外来词。“啤酒”译自英语的 beer，“啤”是英语 beer 的音译，“酒”是英语原词所没有的，是译借时加上去的，因此“啤酒”是音译附加表意成分型的外来词。

区分音译附加表意成分型的外来词和半音译半意译型的外来词，必须根据外来词与外语原词的关系，否则就可能混淆不清。这一分辨

看起来是常识,其实有时是很难的,因为涉及词源的追溯。比如“波打酒”是半音译半意译型的借词(跟“冰激凌”同型)还是音译附加表意成分型的借词(跟啤酒同型)?从外语原词来看, port 一词是可以独用的,原指葡萄牙产的一种深红色或白色葡萄酒,但在英语中, port 其实是 port wine 的减缩或代称,而 beer 却不是什么词的减缩或代称。从这一比较可以看出,“波特酒”是 port wine 的半音译半意译借词,而“啤酒”则是音译成分附加汉语语素构成的借词。

这样的辨析有时颇为困难,却也有一定必要的。例如“黑啤”,看起来似乎是用“啤”音译了 beer 之后附加上“黑”而构成的音译附加表意成分型的外来词,^①其实“黑啤”是直接译自英语的 dark beer,是半意译半音译的借词,而不是音译成分附加汉语成分后形成的。因此,“黑啤”一词不能表明“啤”在汉语中发展了组合能力。表明“啤”在汉语中发展了组合能力的应是“黄啤、散啤、冰啤、听啤、罐啤”等词语。

这样的辨析也有助于词语的语义分析和理解。某些汉语成分与音译成分的结合,从汉语的语义构造看是颇为奇特的,它们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必须从词源的角度,也就是从译借的方式才能说清楚。例如“生啤”一词是汉语中所没有。与“生啤”相对的是“熟啤”。“生”“熟”是什么意思?啤酒有“生”、“熟”的区别吗?追究词源可以知道,“生啤”一词是对英语 draught beer 半意译半音译借入的词(不是 beer 的音译附加汉语语素“生”), draught beer(桶装啤酒)相对于 bottle beer(瓶装啤酒)而言,是未经杀菌的啤酒(啤酒的高温杀菌是在装瓶后才进行的),又叫鲜啤酒,风味独特,但是不易保存(还有一种纯生啤酒,不经过杀菌,但是在加工过程中需要进行严格的过滤程序,把微生物、杂质除掉,可以存放几个月不变质); bottle beer 是经过杀菌的啤酒

① 例如不少人说“黑啤”是“啤”作为音译成分参与组合进一步构造出来的新词。

(装瓶后高温杀菌,存放时间较长)。了解这一词源,才可以确切了解“生啤”、“熟啤”中“生”、“熟”的含义,才能了解“生啤”、“熟啤”是采用半音译半意译而形成的外来词,“生”、“熟”与“啤”之所以结合在一起是译借外语词的结果,而不是音译成分“啤”进一步与其他汉语语素进行组合的结果。

第六章 形译与形译词

第一节 形译词的性质和特点

一、形译的性质和特点

通过搬用文字书写形式借入的外来词,一般叫做借形词。这种借词方式一般称之为“借形”。为了形成与“音译、意译”相对称的术语形式,可以把这种借词方式称为“形译”,把通过“形译”的方式借入的词语称为形译词。^①“形译词”这一名称其实并不突兀,查检文献,张永言(1982, 95页)把外来词按照借词方式分为“借词、仿译词、形译词”,所谓“形译词”指的就是“连形带义”从日语中搬到汉语中来的词语。

形译作为语词借用的一种方式,并非汉外语言接触中特有的借词方式。汉语方言借用普通话词语成分或普通话借用方言词,大都采用这一方式。岑麒祥(1953)指出,“广州话从北方汉语搬用词语,往往是只要字,不要音的”。张振江、陆镜光(2001)也指出,广州话从普通话中借词大都采用借形的方式,这“指广州话只借普通话语词的字形、意义,语音则按字面折合成广州话对应语音,按照广州话来发音,这类似于我国民族地区借汉语时的‘汉词×读’、日语的训读。它是最主要的、最基本的方式,绝大多数普通话语词都是按照这种方式进入广州话的”。不论两种不同语言相互接触中发生的“形译”,还是汉语方言借用普通话

① 田惠刚(1993)把这样的外来词称为“外来词形词”;马西尼(1997, 153页)称之为“词形借词”(graphic loan):“我们所说的词形借词是指:既吸收词义又采用了外语词语的书写形式的词。词的语音仍然是按本族语音系统发音的,不去考虑所借语言中那些词的实际语音。词形借词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成为可能:两种语言具有相同的表意文字系统,词的义和形的关系是直接的,不必通过语音来传递。”

词成分或普通话借用方言词成分,只要在书面上使用同一种文字系统,就可能采用“形译”。只是汉语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相互借用语词成分属于同一种语言内部发生的词语借用现象,而一般所讲的作为外来词的形译词,指的是汉语中通过直接搬用日语汉字的书写形式借入的日语词。当然,也包括通过此种方式从朝鲜语/韩语、越南语中借来的词语,前者如“大院君”(旧时朝鲜对由旁系入继王位的国王的父亲的称呼,朝鲜语/韩语读作[tɛ uən kun]),后者如“字喃”(越南语读作 chū nôm)。

印欧语系使用拉丁字母书写的语言,相互借用语词成分时,多以文字的直接照搬为手段。不过,印欧语系语言相互借用语词成分时对文字形式的直接搬用,往往也是语音的“折合、对当”。所以,这样的词语借用实际上借音借义又借形。

印欧语系语言相互借用语词成分时也有借形借义不借音的。赵元任(1999, 147—148 页)说:“……不过英语里头有借词,借古拉丁文,也有间接经过法文借的,现在英语文言里头简直一大半儿都是法文。那么有时候儿还偶尔用些拉丁的词,他也照拉丁那个写法儿写。比方 etc.,本来是 et cetera([et kɛtɛrə]现在念成[et sɛtrə]),可是他借了这个词,借了这个字形,有时候儿啊,就光用这个字形,就不用这个词了,就给它念成英语的词了,所以看见 etc.,他嘴里念‘and so forth’,其实 et 不是 and, cetera 也不是 so forth,完全另外别的词素。又比方 e. g.,现在多数英、美人看见了 e. g.,根本不知道是 exempli gratia 的简写,是‘举例’的意思,可是英文里头碰到‘e. g.’这两个字么,根本就念它‘for example’,没有别的念法了,很少人知道原来是怎么两个字。还有 i. e. (‘就是’的意思),原来也是拉丁字 id est(‘那是’),可是平常总念它 that is,所以是光借了‘字’不借那个‘语’了。在英语里头这种借字,借形的方法是很少很偶尔的。……在日本是大批大批借中国的语文,又借字又借词;可是它同时啊,就像英语有时候儿说 et cetera,有时候儿说

and so forth,可是在英文是例外的,在日文那是经常的事。”^①

历史上日语从汉语中借词有音读和训读两种形式。音读即通过搬用读音来借词(实际上是搬用书写形式并按照汉语的读音读),训读则属于形译,也就是只取书写形式和意义,不取读音。

汉语借自日语的词,大多数是通过形译的方式借入的,这就是将日语词的汉字书写形式直接搬进汉语,读音按照汉语的读音来读。也就是借形(字形)借义不借音。^②在搬用语词的文字书写形式时,汉语汉字与日语汉字往往有一个“折合、对当”,但这种“折合、对当”与语音无关,只是文字形式的“折合、对当”。

二、形译词的性质和特点

形译词是通过搬用语词的文字书写形式而借入的词语。然而,通过形译借入的词语是不是外来词?高名凯、刘正琰(1958)认为把外语中具有本语言所没有的意义的词连音带义搬到本语言里来,这种词才是外来词。形译词是按照词语的书写形式把日语词“连形带义”搬进汉语,似不符合外来词的特征。

语言符号是音义结合物,从这个意义上讲,连音带义搬到本语言里来的外语词才是外来词。高名凯、刘正琰(1958)注意到汉语借用日语词语具有不同于印欧语相互借用语词的特殊情况,所以尽管强调外来词必须具备“连音带义”的特征,但还是把来自日语的形译词看作外来词。因为说到底,形译词的词源在外语,包括整体性的词义和词形都是外来的。

形译词是把日语的词语按照书写形式搬进汉语,那么,是否将日语

① 见赵元任(2002, 147—148页)。

② 借自日语的外来词也有少数音译词,如“奥巴桑”(obasan,在台湾也作“欧巴桑”)等。但是这类音译词极少。近年来又有个别来自日语的全音译词进入汉语,如“萨西米(生鱼片,日语 sashimi)、扒金窟(一种赌博游戏机器, pachinko)”,但还不是很通行。

词按照书写形式搬进汉语就是形译词？提醒我们注意这一问题的是下列中的“御身大切”：

第四师团虽说窝囊，但毕竟是甲种师团，老兵多。由于日军作战损失很大，急需补充老兵，便不时抽调第四师团官兵补充到其他师团。当时，日军各部的临别致词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第二师团，战况较好时就说“武运长久”；情况不妙时就说“九段坂见”（靖国神社在东京九段坂）。然而第四师团的官兵告别时，却常说“御身大切”，翻译过来，即“保重贵体”、“身体第一”，或者干脆就是“保命最重要”。（《二战时日本有个“窝囊废”师团》，《环球时报》2006年8月11日第13版）

上例的表述中，既然说“‘御身大切’，翻译过来，即‘保重贵体’、‘身体第一’，或者干脆就是‘保命最重要’”，显然在作者看来，“御身大切”不是汉语中的词。也确实不能将“御身大切”看作汉语中的外来词，因为其字面意义或词义都是不可理解的。

但是，有一些来自日语的形译词，在汉字字面意义上也是无理组合，如“积极、消极、景气、取缔”等。究竟该如何判别日语词和汉语中的形译词呢？

其实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这样的词语在汉语中是否在整体上有明确的意义，是否已经通行开来。诸如“积极、消极、景气、取缔”之类，尽管字面意义上未必能形成有理组合，但整个词的意义是明确的，并且在汉语中沿用已久。而“御身大切”之类，字面意义不可理解，整个词义也不明确，就只是日语中的成分。

无法按照汉语汉字的字面意义来理解的日语词搬进汉语的交际中，在具有明确的意义并且通行开来后，才能成为汉语中的外来词（形译词）。因此，“大丈夫（‘不要紧’等义）、勉强（‘学习、用功’等义）、手纸（‘书信’义）、怪我（‘受伤’义）、本屋（书屋）”等日语汉字词，如果在汉语交际中出现，即使按照汉语汉字的读音读，也是不能看作外来词（形译词）的。

“物语”这个词,进入汉语已久,现在时有所见,但在汉语交际中的意义晦涩乃至错乱,也跟日语原词的意义无关,当属语码混用,不能算作汉语中的外来词(形译词)。虽然现在“物语”一词随处可见,但迄至《现代汉语词典》(2005)也不予收录,则是审慎的。

日语的“高校生”,从字面上来理解,似是“高等学校的学生”,其实是“高中学生”。在此意义上,即使按照汉语的读音读,也不能认为是汉语词。

但是,应把专名与一般语词区别开来。诸如“大岛贤三、森下英雄、高崎、伊豆、山手”之类的人名、地名,尽管其意义从字面上并不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作为专名,出现在汉语交际中,则应与“御身大切”区别开来,将它们看作形译词。

对于地名、人名等专名只能从整体上理解意义,也就是把日语专名的书写形式借过来当作一个成分用,或独用,或在结构中获得意义,起区别词义的作用,但是都不能按照汉语汉字的字面意义来理解。如日本野尻眼镜公司在上海开设“野尻”眼镜专卖店,“野尻”这一名称被从字面上理解为“野屁股”,因而受到含义不良的指责。其实,“野尻”是日人姓氏,“野尻”一词本是田野尽端的意思。^①“野尻”既是姓氏,就不应当作一般语词来理解,^②要把姓名与一般的语词区别开来,否则,英美人姓名 Rice 就是米饭、稻子, Bird 就是鸟, Fox 就是狐狸, Duck 就是鸭子;中国人姓“牛”的就是耕田的牛,姓“马”的就是马,而日本人姓氏中的“犬”(如“犬养”)、“猪”(如“猪木”)就是狗或野猪了。^③同样的道理,日本人的姓“百目鬼(どびこ)、我孫子(あびこ)”,^④也都不能当作一般语词来理解。

① 史有为(2000, 114页)。

② 地名也是如此,如日本有“利尻岛”(りしりとう)、“奥尻岛”(おくしりとう),千叶县有“我孫子市”(“我孫子”,あびこ)(据《新日汉辞典》),都不应按照一般语词的意义来理解。

③ 汉语的“猪”在日语中是“豚”,日语中的“猪”指野猪。

④ 见(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日本)光村图书出版株式会社合作编写的《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初级上)4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第二节 形译词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一、丰富了汉语词汇

形译词是汉语词汇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日语借用古代汉语的语词或用汉字来译借欧美语言的词语,汉语把这些词语从日语中按照书写上的形式借入汉语,此外还借入了一些日语自创的词语,通过这样的词语引进,既把欧美社会发展之风引入汉语社会,也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

1. 刘正琰等(1984)收录了 890 个日源外来词,为呈现其本面貌,经一一检索,胪列如下(按音序分段排列,有关说明附于词表之后):

安打([日]安打, anda, 棒球中能得分的一击)、安质母尼([日]安質母尼 anchimoni, 娣)、暗示、奥巴桑(obā-san, 大娘、大婶、老太太、老太婆)

霸权、白金、白旗、白热、白夜、百日咳、版画、半径、半旗、饱和、保险、保障、悲观、悲剧、备品(储备待用的机件、工具和物品)、背景、本质、比重、必要、编制、变压器、辩护士(日语原义是“律师”,在汉语中泛指替人辩解的人)、辩证法、标本、标高、标语、表决、表象、病虫害、波长、舶来品、博士、博物、不动产、不景气

才(木材的体积单位)、财阀、财团、采光、参观、参看、参照、苍铅(铋)、曹达(碳酸钠,纯碱,钠碱)、策动、插话、茶道、长波、常备兵、常识、场合、场所、衬衣、成分、成员、承认、乘客、乘务员、呎(英尺)、宠儿、抽象、出版、出版物、出超(对外贸易中出口货物的总值超过进口货物的总值)、出发点、出口(从公共场所出去的地方)^①、出庭、初夜权、处女地、

① export 和 import 的意译“出口、入口”不是来自日语。周振鹤(1998)指出,“出口、入口”作为 export 和 import 的意译是新教传教士创造的译名。郭实猎等新教传教士所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4 年正月一期中即有 import 意义上的“入口”,同年二月《东西洋考》上则有 export 和 import 意义上“出口”和“入口”。此外,周振鹤(1998)有刊物编者附加注释,指出《东西洋考》中有 import 意义上的“进口”一词。

处女作、储藏、储蓄、触媒(催化剂)、传染病、创作、刺激、催眠、催眠术、脾脏(胰,胰腺)、吋(英寸)、错觉

打消(取消、消除)、大本营、大局、大气、大熊座(北斗七星所在的星座)、大正琴(一种发明于大正初年的简单拨弦乐器)、代表、代言人、代议士(议员)、贷方、单纯、单利(只按照本金计算利息)、单位(计算事物多少的标准量)、单行本、单元、但书(法律条文中,“但”字以下的部分,指出本条文的例外)、蛋白质、导火线、道具、德育、登记、登载、等外、低调(音调低)、低能、低能儿、低压、敌视、抵抗、地上水(地面水)、地下水、地质、地质学、电报、电波、电车、电池、电话、电流、电子、丁几([日]丁幾, chinki, 酊剂)、定义、动产、动机、动力、动力学、动脉、动态、动议、动员、独裁、独占、读本、读物、短波、队商(结队到偏远地方行商的人)、对象、对照、吨

二重奏

发明、法律、法人、法庭、法则、番号、反动、反对、反感、反射、反响、反应、泛神论、泛心论(一种唯心主义哲学理论)、范畴、方案、方程式、方式、方针、放射、非金属、分解、分配、分析、分子、雾围气(又作“氛围气”,大气,气氛)、粉饰、风琴、风位(风向)、风云儿(在社会上活跃一时的人物)、封建、封锁、否定、否决、否认、浮世绘(日本德川时代兴起的一种民间绘画)、服务、服用、辐射、附着、复式、复水器(冷凝器、凝汽器)、复员、复制、副官、副食、副手

改编、改订、概括、概略、概念、概算、感性、干部、干事、干线、纲领、高潮、高利贷、高炉、高射炮、高周波、歌剧、歌舞伎(日本戏剧的一种)、革命、工业、攻守同盟、弓道(日本的一种箭术训练方法)、公报、公称、公立、公民、公判、公仆、公认、公诉、公营、公债、共产主义、共和、共鸣、古加乙涅([日]古加乙涅, kokain, 即“可卡因”)、古柯(一种产于南美的药用植物,其干叶可制麻醉剂)、固定、固体、故障、关系、观测、观点、观念、观照、光年、光线、广场、广告、广义、归纳、规范、规那([日]規那, kina,

金鸡纳皮)、规尼涅([日]規尼涅, kinīne, 奎宁)、规则、国际、国教、国库、国立、国事犯(政治犯)、国税、国体、过渡

海拔、寒带、寒流、航空母舰、号外、和服、和文(日本文)、黑死病(鼠疫)、弧光(电极所发出的光)、虎列拉(霍乱, 又作“虎力拉、虎列刺”)、化脓、化石、化学、化妆品、画廊、环境、幻灯、幻想曲、回收、会话、会社(公司)、会谈、混凝土、活跃、火成岩

机关、机关炮、机械、积极、基地、基调、基督、基督教、基质、基准、吉地([日]下駄, geta, 木屐)、集结、集团、集中、计划、记号、记录、技师、加答儿([日]加答兒, kataru, 即“卡他”, 黏膜炎, 尤指咽喉发炎)、加非(即“咖啡”, 又作“加啡、架啡”等)^①、加农炮、假定、假分数、假名、假想敌、尖兵、尖端、坚持、检波器、简单、见习、间接、间歇泉(按周期喷发的温泉)、间歇热、建筑、健质亚那(genchiana, 龙胆, 医药上用作补剂和健胃剂)、鉴定、讲师、讲坛、讲习、讲演、讲座、交感神经、交换、交际、交通、交响乐、胶着语(粘着语)、脚本、脚光、教科书、教授、教养、教育学、酵素、阶级、接吻、节约、结核、解放、解剖、介入、借方、金额、金刚石、金婚式、金牌、金融、金丝雀、紧张、进度、进化、进化论、进展、经费、经济、经济恐慌、经济学、经验、精神、景气、警察、警官、净化、静琉璃(日本戏剧的一种)、静脉、静态、竞技、就任、拘留、巨匠、巨头、巨星、具体、俱乐部、剧场、决算、绝对、觉书(备忘录)、军部、军国主义、军籍、军需品

看护妇(女护士)、看守、抗议、科目、科学、可锻铸铁、可决、克服、客观、客体、课程、肯定、坑木、空间、会计、狂言(日本喜剧的一种)、扩散

浪人、劳动、劳动者、劳动组合、劳作、累减、累进、类型、冷藏、冷藏库、冷战、哩(英里)、理论、理念、理事、理想、理性、理智、力学、立场、立宪、例会、连歌(日本诗歌的一种, 由两人以上分别咏上下句)、量子、了解、列车、淋巴([日]リンパ, rinpa)、临床、领海、领空、领土、流感、流体、

① “咖啡”是出自汉语的译名。

流线型、流行病、流行性感冒、伦理学、论理学(逻辑学的旧称)、论坛、论战、落选

码(英美长度单位,1码等于3英尺)、麦酒(啤酒)、脉动、漫笔、漫画、漫谈(不拘形式地谈话或写作,区别于朝鲜族曲艺名“漫谈”)、盲从、毛细管、媒质、美感、美化、美浓纸(日本美浓地方所产的一种绵纸)、美术、密度、蜜月、糰(厘米)、耗(毫米)、免許(批准、许可)、民法、民主、敏感、明确、明细表、命题、默剧、默示、母体、母校、目(“网眼”等义)、目标、目的

内分泌、内服、内阁、内幕、内勤、内容、内在、能动、能乐(日本的一种古典乐剧)、能力、能率(效率)、拟人法、年度、农作物、暖流

偶然

俳句(日本的一种短诗)、派遣、判决、陪审、陪审员、配电盘、配给、批评、品位、平假名、平面、评价、坪(日本面积单位)

旗手、骑士、企业、气分(气氛、情绪)、气密(不漏气)、气体、气质、汽船、汽笛、契机、牵引车、铅笔、前提、前卫、前线、钱(日本货币单位)、籽(即公里或千米)、脛、强制、侵犯、侵略、勤务、轻工业、清教徒、清算、情报、情操、驱逐舰、取缔、取消、权威、权限、权益

热带、人格、人力车、人权、人文主义、人选、任命、日程、日和见主义(机会主义)、溶媒(溶剂)、溶体(混合气体、溶液、固溶体的总称)、柔道、柔术、肉弹、入场券、入超(对外贸易中进口货物的总值超过出口货物的总值)、入口(进入公共场所的门口)

三味线(日本的一种拨弦乐器)、商法、商业、上水道、少将、少尉、社会、社会学、社会主义、社交、社团、摄护腺(前列腺)、身分、神经、神经过敏、神经衰弱、审美、审判、审问、升华、生产、生产关系、生产力、生理学、生命线、生态学、剩余价值、失恋、失效、施工、施行、時計、时间、时事、时效、实感、实绩、实权、实业、使徒、士官、世纪、世界观、市场、市长、事变、事态、事务员、手工业、手榴弹、手续、受难、输出、输尿管、输入、水成岩

(沉积岩)、水密(不透水)、水素(氢)、水准、私法、私立、思潮、思想、死
角、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素材、素描、素质、速度、速记、随员、
所得税、所有权、索引

他律、塌塌米(或“塌塌咪”,tatami)、台(车辆、机器、设备的单位)、
台车(转向架)、太阳灯、谈判、碳酸加里(碳酸钾)、碳酸瓦斯(二氧化
碳)、探海灯(即“探照灯”)、探险、探照灯、特长、特权、特务、誊写版、体
操、体育、天鹅绒、天主、条件、铁血(喻指“武力”,专用于“铁血政策”)、
通货膨胀、通货收缩(通货紧缩)、同情、统计、投机、投影、投资、图案、图
书馆、退化、退役

瓦(公制重量或质量单位)、瓦斯、外分泌、外勤、外在、唯心论、唯物
论、卫生、味之素(调味品,习称“味精”)、胃溃疡、尉官、温床、温度、温
室、文化、文库、文明、文学、沃度(碘)、沃素(碘)、无产阶级、无产者、舞
台、物理、物理学、物语(童话、故事)、物质、悟性

喜剧、系列、系数、系统、细胞、下水道、纤维、铕铁(生铁、铸铁)、现
金、现实、现象、现役、宪兵、宪法、腺(生物体内能分泌某些化学物质的
组织)、相对、想象、象征、消防、消费、消化、消火栓(即“消防栓”)、消极、
小型、小熊座(最近北天极的星座,七颗主要的星列成斗形,像北斗)、小
夜曲、校训、效果、协定、协会、心理学、新闻记者、信号、信托、信用、兴信
所(接受委托对他人的品行、财产等秘密进行调查并提出报告的一种机
构)、猩红热、刑法、形而上学、性能、虚无主义、序幕、序曲、宣传、宣战、
选举、旋盘(车床)、学府、学会、学历、学士、学位、血色素、血栓、血吸虫、
巡洋舰、训话、训令、训育、讯问

压延(对金属材料的轧制)、压延机、雅乐(日本古典礼乐或宫廷音
乐)、亚铅(锌)、研磨机(磨床,机床的一种)、演出、演说、演习、演绎、演
奏、燕尾服、羊羹(一种以赤小豆、琼脂等制成的甜点心)、阳极、要素、野
兔病(兔热病,传染病的一种)、业务、液体、医学、遗传、义务、议决、议
会、议员、议院、艺术、异物、疫痢(日本儿童在夏季所患的一种与痢疾相

似的急性传染病)、意匠(指用新法为工业品、艺术品设计图案;图案设计)、意识、意义、意译、因子、阴极、音程(两个乐音之间的距离)、银行、银婚式、银幕、银翼(飞机)、引得、引渡、印鉴、印象、营养、影像、优生学、油槽车、游离、游弋、右翼、语源学、预备役、预后(对某种疾病发展过程和最后结果的预测)、预算、元帅、元素、园艺、原动力、原理、原意、原则、原子、原罪(原始罪,指《圣经》中亚当、夏娃因偷吃禁果而犯的罪)、原作、猿乐(日本戏剧的一种)、远足、运动(体育活动)、运动场、运转手(电车、汽车的司机)

杂志、债权、债务、展览会、战线、哲学、真空管(电子管)、阵容、证券、政策、政党、支部、支配、支线、知识、直观、直接、直径、直觉、直流、止扬(扬弃)、纸型(也叫“纸版”)、指标、指导、指数、室扶斯([日]室扶斯, chifusu, 伤寒)、室素([日]室素, chiso, 氮)、制版、制裁、制限(限制)、制御器(控制器)、制约、质量、中将、终点、仲裁、仲裁人、重曹(碳酸氢钠, 小苏打)、重点、重工业、轴接手(联轴器, 连接器)、株式会社(股份有限公司)、烛光(光强度单位)、主笔、主动、主观、主人公、主食、主体、主义、注射、专卖、转炉、资本、资本家、资料、紫外线、自律、自然淘汰、自由、自治领(1947年前英联邦成员国的一种称谓)、宗教、综合、总动员、总理、总领事、组成、组阁、组合、组织、最惠国、左翼、作品、作物、作者、坐药(栓剂, 一种塞入肛门等处的外用药)、座谈

关于上表, 补充说明如下:

① 本表列举的是汉语直接借自日语的词语。借自其他语言包含源自日语成分的语词, 则不列入。如汉语的“米卡多黄”借自英语的 mikado yellow, 尽管英语中的 mikado 来自日语, 但词典标记“米卡多黄”的词源为英语, 因此就不列入日源词语。还有一种情况, 利用源自日语的成分翻译其他语言的语词而形成的词语, 也不记入本表, 如“长吨、公吨”, “吨”是来自日语的译名, 但“长吨、公吨”是 long ton 和 metric ton 的译名, 因此也不列入日源词语。“仙台病毒”译自英语 Sendai

virus, 虽然其中有源自日语的成分(“仙台”为日本地名), 但也不列入日源词语。这些都是一般的通例, 本表也循此通例。

另外, 来自阿伊努语(虾夷语)的词语, 如“腓腓(兽)”(onnep, 海熊或海狗)等, 也不列入本表。

② 异形的音译词如“虎列拉、虎力拉、虎列刺”等, 合为 1 条。日语原词译借西洋语言形成的异名, 如“沃素”是音译, “沃度”是意译, 汉语把这两个词都借入了, 该词典中也予以分立词目, 本表照录; 非音译的异形词“探海灯”(即“探照灯”)与“探照灯”, 该词典分立词目, 本表也分别录出。

③ 为明确词语意义, 适当照录了某些词语的释义, 如“入口、出口”义为“进/出公共场所的地方”, 而非 import、export 的意译, 因此有必要注明。有的词语当今已不用, 意义不明, 因此也照录了词典的释义, 如“才(木材的体积单位)”。有些释义作了变通的表达处理, 如“消防栓”, 原文释义较长, 汉语中也有相应的通用词语, 因此没有照录释义语句, 而是简化为“即‘消防栓’”。此类情况还有“味之素(调味品, 习称‘味精’)”等。

④ 为呈现基本面貌, 少数具有音译性质的日源外来词如“奥巴桑(obā-san)、榻榻米(tatami)”等也一并列出。

2. 刘正琰等(1984)所列日源外来词, 其中有些词语是否来自日语, 还有不同意见。

谭树林(2000)考察了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英国牧师马礼逊历经 13 年心血编纂而成的《华英字典》(澳门 1822 年出版), 指出在《华英词典》中, 下列汉语新词已经出现, 汉语中的这些词语并非借自日语:

apostle 使徒; apostle of Jesus 耶稣的使徒; black lead 铅, blacklead pencil 铅笔; critics of books 善批评书士; digest in the stomach 胃中消化; exchange 换、交换; infect 病过于人、传染; judge 审、审判; law 法、法律、法度; level 平的、水平、水准; natural 自然的; necessarily 必要; organ

风琴;unit 单位;practice 习、习行、演习、习射;radius of a circle 半径线。

戴天(1993)也指出:“当然,凡此中文译名,不一定全由日本人拟造,不少似乎还是日本人取自中土,久而久之,人们不察,便当成由日本来的词。比如摩里逊及麦杜斯特的《英华字典》,即常常成为日本人译外来语及名词之资,像银行、保险等,事实上便是中国学者与西洋传教士的合作成果,与采而用之的日本人无关。”

刘正琰等(1984)所列日源外来词有“保险、电报、电车、电池、地质、地质学、法律、方程、特权、消化、影像”等,马西尼(1997)附录2“十九世纪文献中的新词表”认为,这些词是汉语自创的词语或西洋传教士在翻译中为汉语创造的意译词,并非来自日语。

此外,刘正琰等(1984)所列日源外来词中还有些词语是否来自日语,有不同看法,如“法律、民法、刑法、关系、内阁、天主、基督、基督教”等。史有为(2000, 166—167页)也对“天主、基督”是否属于日源外来词作了讨论。

汉语自创的词语或由西洋传教士创造的译名与日源外来词的分辨异常复杂。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日本人翻译西洋语言借助的是汉语词语,或用汉字来记录,翻译者对于汉语汉字十分精通,以至于翻译的词语与汉语固有的词语难分难解。从汉语与日语的词语构造形式上看,日语的词语除了“宾—动”构造以外(汉语是“动—宾”),其他复合词的构造跟汉语是基本相同的,以至于大多数情况下日语词语与汉语词语无法通过结构差异的比较来区别,^①日源外来词也就与汉语的固有词语难以区别。据马西尼(1997)“附录2”,以“电”构成的词语而言,“电报、电车、电池、电灯、电堆(electric pile)、电机、电缆、电路、电气、电线、电学”是汉语自创的新词(包括西洋传教士翻译的汉语译名),“电话、电信”却是日语词。仅仅从词的形式上是无法将两类词

① 王立达(1958)。

语区别开来的。

还有一些合成词语,词语的部分形式最先出现在甲语言中,但整体词形最先出现在乙语言中,如根据马西尼(1997)“附录2”,“动物、植物、政治”都是汉语自创的词,但“动物学、植物园、政治学”是来自日语的原语汉字借词(指日语用汉字创造的词语或用汉字记录的译自西洋语言的词语);“邮政”是来自日语的原语汉字借词,“邮政局”则是汉语自创的新词。词源关系如此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若非一一考据,实在难以分别。

汉语词与日源外来词难以分辨,也与词语的流通过程复杂有关。周振鹤(1998)指出,西方语言的词语输入到汉语的路径,起初一般人都以为“是走一条由西方到日本再到中国的途径,也就是说,由日本学者将西文语词用汉字翻译出来,再由中国方面接受现成的这些词语”。但是,汉语从西洋语言借用词语“还有另一条途径,那就是从西洋直接到中国,或者从西洋到中国(但在中国没有流行开来)再到日本,而后返回中国。这两条途径有时不易分辨,只能视文献材料而定”。由于这一复杂性,好些词语到底是直接借入汉语还是经过日文的途径进入汉语,其过程往往是不清楚的。

3. 马西尼(1997)附录2“十九世纪文献中的新词词表”所收日源词语,有一些是刘正琰等(1984)未予收录的,包括日语“原语汉字词”(指日语用汉字创造的词语或用汉字记录的西洋语言的译词)和“回归汉字借词”(指日语借自汉语又“回归”汉语的词语,即“汉语→日语→汉语”):

百货店、版权、保释、兵事、博览会、传播、大学、电池、电信、地理学、方法、法学、改进、改良、工场、工厂、工科、公园、固定资本、后备兵、化妆、会员、机会、检查、教育、教员、进步、军事、联络、历史、理科、留学生、陆军、伦理、美术会、马铃薯、民权、农场、农民、农学、平权、普通、全国、扇风机、商店、商会、商务、师范、司法、试验所、特别、投票、团体、微生

物、文法、文科、文凭、无机、宪政、校长、心灵学、行政、学校、医科、意见、营业、邮政、幼稚园、政府、职工、中学、种族、主任、专制

4. 高名凯、刘正琰(1958)中有日源外来词“并发症、放送、复习、复写、公开、公证人、例外、内用、派出所、人生观、特许、特约、突击队、武士道、学龄、一览表、蒸发、蒸馏、沥青”等等,在刘正琰等(1984)中都未予收录。从时间上看,刘正琰等(1984)编著、出版在后,理应对这些词作过考察;未予收录,或许是对这些词语是否日源外来词有了不同的看法,或许不是很确定,出于谨慎未予收录;或仅仅是漏收(如“武士道”)。

5. 另有一些日源外来词,如“福祉、写真、职场、寿司、低迷、人气、铁板烧、人体盛、过劳死、刺身、卡拉 OK、必杀技、整合、新干线、对决、天敷罗(加粉面炸制的荤素食品)、花道、慰安妇”等等,有的早已在汉语书面文本中出现,但通行面不广,如“过劳死、寿司、花道、新干线、刺身”等,近些年来使用面逐渐扩大;“知名度”逐渐提高(“刺身”还是用得比较少,一般以“生鱼片”来称说);有的词语先后进入台湾,近20年中又先后进入大陆,如“原住民、福祉、整合、认知、卡拉 OK”等;有的可能是从日语中直接进入大陆汉语的(如“铁板烧、人体盛”);有的早就在大陆专业领域中应用,但近十几年来扩大了用法,如柔道的“必杀技”(例:聪明婆婆的三大“必杀技”《《扬子晚报》2006年10月10日B8版标题)。

一些日语成分进入汉语作为构词成分,如“屋、族”,在汉语中构成了大批词语。^①至于日语公司名、商品名,则有“松下、丰田、三菱、富士、五十铃、马自达、索尼、柯尼卡、奥林巴斯、尼康、尼康”等。

6. 在刘正琰等(1984)所收日源词语中,有一些现在几乎已成“死词”,不仅一般人很生疏,就连一般词典也不收录,如“奥巴桑、苍铅、曹达、臃脏、大正琴、霁围气、风位、复水器、规尼涅、虎列拉、吉地、加答儿、

^① 参见刁晏斌(2006, 105—106页)。

耗、籽、糰、三味线、水素、旋盘、制御器、室扶斯、室素”等等。有的词语为汉语规范所淘汰,但还时有所见,如“盥、吋、呖、哩”。但是,大多数的词语都已成为汉语常用词,涉及汉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马西尼(1997)所列日源词语,除了“兵事、扇风机、心灵学”等少数词语只是保留在历史文献中,大多数词语仍然活跃在当今社会交际中。其中,“幼稚园”在中国大陆一般不用,但台湾地区一直在用;东南亚的华语社会也一直在用。

总的来看,日源外来词,主要是形译词,^①丰富了汉语词汇,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名凯、刘正琰(1958, 158页)说:“日语词汇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影响很大,是现代汉语词汇中的外来词的主要来源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来源。”史有为(2000, 190—191页)对《现代汉语词典》(1978)中的外来词进行统计,分为借音和借形两个类型,借音类包括音译和含有音译成分的词语(来自日语的音译词归入此类),借形类是日源汉字词。统计的结果是借音类 691 个,借形类 768 个,后者比前者多 77 个。从这一统计来看,日源形译词确实对现代汉语词汇的贡献很大。

二、给汉语增添了双音节语素

汉语是单音节语,这主要是就汉语中绝大多数语素是单音节的这一特点而言的。一般著述、教材谈到汉语中的复音节语素,主要包括三类情况,一是联绵词,如“秋千、踟蹰、彳亍、踌躇、窈窕、逍遥、玛瑙”;二是拟声词,如“哗啦、噼啪、哧溜、咕咚”;三是音译词,如“沙发、咖啡、巧克力、奥林匹克”。其实还有一类复音节语素,这就是来自日语的形译词,如“积极、消极、景气、取缔、取消、寿司、物语(原意为‘童话、故事’)、羊羹(一种甜点心)”等。这些形译词借用的是用汉字写成的日语固有

① 音译词也就是“塌塌米”比较通行,常写作“榻榻米”。另外,“安打”主要用在棒球运动中。

词,表面上看是有结构的,其实无法分解,其中的音节(字)表示的意义不是汉语的,而是日语的。因此,这类形译词是不能按照汉语的结构来分析的,也就是说无法根据汉字来识别语素。这类双音节形译词需要特别指明,因为这些形译词在汉语语素分析中往往造成疑惑,强行分析,总是扞格不入。

这类形译词的词义理解也有特殊性。汉语修辞学研究中的两大分野“积极修辞、消极修辞”,总使人感到别扭,原因就在于“积极、消极”是来自日语的形译词。但是,“消极修辞”中的“消极”意义又与一般语词的“消极”不同。再如“取缔”在日语中本是“管理、监守”的意思,借到汉语中,逐渐变为“明令取消或禁止”。按照汉字表示的汉语语素义分析,怎么也联不上。^①

台湾地区高雄市,原名是“打狗”,由于闽语“打狗”的发音同日语たかお(罗马字注音 takao)相近,日语的たかは日语汉字“高”的训读,お是日语汉字“雄”的音读,因此日本人便将这个地名写为“高雄”。^②可见,“高雄”这个地名也是个来自日语的形译词,是日本人侵占台湾时在汉语中留下的痕迹,其意义并不能按照汉语汉字的意义来理解。

上文提到的日人姓氏“野尻”,词语原义是“田野尽端”的意思。查《现代汉语词典》(2005),有“尻”字:古书上指屁股。所以,望文生义,把“野尻”理解为“野屁股”也并非是没有缘由的。如果理解为“田野的尽端”,也许只能算做日语词。犹如日语中的“猪”是“野猪”,与汉语中的“猪”的意义不同。尽管《楚辞·天问》中有“昆仑悬圃,其尻安在”,但在现代汉语中,“野尻”几乎就是一个无理组合,应看作囫圇一团、不可分解的复音单纯词,等同于“高雄、积极、消极、景气、取缔”之类的形译词,而不能按照单字的意义来理解并把单字的意义组合起来的意义作为整

① 杨锡彭(1993)。

② 伍铁平(1981)。

个词的词义。

三、大量增加了意译新词

王力(1980, 528—529 页)指出,汉语和日语之所以可以共用一个译名,是因为日本人翻译西洋新名词就是用汉字翻译的。汉语的成分在日语里是根深蒂固的,日语用汉字翻译的西洋新名词按照汉语的原意是讲得通的。因此,“日本人创造了一些新词来表达西洋传到日本去的那些新概念,我们只是利用日本的现成翻译,省得另起炉灶罢了”。正因如此,一般教科书所提及的意译词,有许多都是来自日语的形译词,如“蜜月、共产主义”等。就连许多典型的音意双关的借词,其实也是来自日语,如“引得”等。可以说,借助于日本人的翻译,汉语中出现了许多来自日语用汉字写成的意译词。

正因如此,一个意译词最早出现在汉语中还是由日本创造了意译词再输入汉语,往往有不同的看法。例如“铁路”和“铁道”都是对英语 railway 的意译,“铁路”是汉语自创词,这没有疑问,但“铁道”是否由日本创造的译名,则有不同看法。高名凯、刘正琰(1958, 97 页、133 页)认为是日源外来词,马西尼(1997, 243 页)则说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 1868 年创造的译名。

四、增强了“名+动”结构的能产性

“名+动”构造的词语自古有之,不过汉语中这一结构的词语在吸收日语词语的影响下有了显著的增加。尤其是“工具(材料、方式……)+动作”、“受事+动作”两种语义结构关系的词语大量增加,前者如“电话联系、冷水洗澡、小组讨论”等,后者如“教育改革、理论学习、汉语研究、技术改造、心理咨询、民意测验、食品储藏、汽车修理、工作安排、废品回收、电影摄制、会场布置”等。张斌(1998, 7 页)指出:“在古代汉语中,施事名词和受事名词都不直接修饰动词,在现代汉语中,施事名词也不

直接修饰动词,但是受事名词直接修饰动词的现象日渐增多,这也许是受日语的影响。”刁晏斌(2006, 15 页)在概括《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一书的分析时说:“倒宾的现象古已有之,但是多属于句法修辞,后来受到翻译及日语语法的影响而发展成了这一类型的词组,如‘体质上之调查’进一步简化为‘体质调查’,类似的再如‘阶级分析、思想改造、机器制造、机械修理’等。”

这一语义关系的偏正结构词语的大量增加,增强了汉语“名+动”结构的能产性。

五、仿译日语词语使汉语语法单位功能发生变化

受日语词语结构影响而产生的“受事+动作”的“名+动”偏正结构,是汉语名动词产生的重要原因。^①这类“名+动”构造的偏正结构,整体功能是名词性,在整体功能的作用下,其中的动词功能出现变化,形成了所谓“名动词”。向心结构(endocentric construction)是指整体结构与整体结构构成成分之一在功能上一致的结构。向心结构的整体功能有名词性的,也有动词性的。向心结构的整体功能与中心成分(head)的功能到底谁影响谁、谁决定谁,值得研究。但动词出现在“受事+动作”的“名+动”结构中,语义发生趋向“指称”的变化,无疑是动词语法功能发生变化、产生名动词的重要原因。

六、与汉语固有词形成同形异义词

“料理”在汉语中本为“照顾、照料”(《世说新语》:“汝若为选官,当好料理此人。”)、“整理、修理”(《齐民要术》:“……榆生,共草俱长,未须料理。”)等义,日语中的“料理”则为“烹饪;菜肴”等义。此词今已进入汉语,虽然大多只用于“日本料理”、“韩国料理”等固定词语

^① “名动词”见朱德熙(1982, 60 页)。

中,但越来越通行。于是在汉语中有了与“安排、处理”的“料理”同形异义的“料理”。

来自日语的形译词“便当”(义为“盒饭”),与汉语中原有的“便当”(“方便、顺手、简单、容易”等义)不仅书写上同形,而且由于按照汉语汉字的读音读,所以也同音。

七、为汉语词语结构增添了异数

“血吸虫”,按照汉语的构词方式,应为“吸血虫”。“血吸虫”这样的词语的结构方式给汉语的词语结构带来异数,使得汉语词语结构形式复杂化了。

“宅急送”的使用现在虽然还不能说已经普遍化,但用得越来越多,尤其是用作行业机构名,其内部结构的语义关系也有异于汉语既有词语的结构。

八、增加了汉语词语理据的复杂性

有些来自日语的形译词,是日语用汉字意译英语而形成的。这些译词中的汉字意义,是古代汉语的意义,但这些成分的意义在现代汉语中已退化或变异,因此这类词语进入汉语以后,往往已经不能理解。如“机关枪”,“机关”本指机械发动的部分,日语用“机关炮”意译英语的 machine-gun,“机关枪”则是仿造“机关炮”而形成的。其中的“机关”的意义是古代汉语中的意义。但是,在现代汉语中,表示“机械发动的部分”这一意义已主要由“机械”等词语所代替(“机关”的“机械”义还存在于一些固定词组中,如“暗道机关”)。“机关”在现代汉语中的结构已难以理解,其结构分析也往往使人疑惑。

九、真假汉语词搅乱词汇面貌

日语汉字词语与汉语词语在“面目”上的相似,使得日语词与汉语

词或汉语中的形译词往往混淆不清。有的日语词,日语面目很清楚,如国内生产的一种紫菜,包装标签上有日语“味付海苔”的字样,“海苔”与汉语词在“面目”上无异(这类日语汉字词占多数),但“味付”显然是日语词(あじつけ,义为“调味,调味的食品”)。还有一些日语词,“面目”上似是汉语词,从字面意义上看,虽有些别扭,也可以理解。对于这样的日语词,要辨别汉语词和日语词往往就颇费踌躇。如有部电影名为《头文字D》,“头文字”其实是日语词(頭文字,かしらもじ)的搬用。汉语中与之相应的词语是“首字母”。^①这部香港拍的电影,使人误以为“头文字”属于“粤语”,或 *Initial* 的“港译”。日本的一些公共场所写有禁止不良卫生行为的汉字警示牌,有人认为是专门针对中国人的;其实那些警示牌虽然是用汉字写的,却是地道的日语(比如“立入小便禁止”),并不是特意写给中国人看的。^②但是由于日语词语与汉语词语在书写上“面目”的相似乃至相同,造成了误解。

日语用汉字音译英语的词语被借入汉语后,跟汉语用汉字音译英语的词语也有同形混淆的情况,最典型的是“码”。日语用“码”(读作 yādo)音译英语的 yard(3 英尺),汉语用“码”音译英语的 mile(英里),^③两个“码”书写上同形,在汉语中都读 mǎ,但是实际意义不同。《现代汉语词典》(2005)上表示长度单位的“码”是借自日语的“码”,但是,在现代汉语交际中,来自日语的“码”是几乎不用的,而汉语音译英语 mile 的“码”,词典却未收录。《现代汉语词典》(2005)给长度单位的“码”标记了英语符号 yd,但没有说明“码”来自日语对英语 yard 的音译,汉语中的这个“码”其实是照搬日语汉字词的“码”,因此也就难以让人把“码”与 yd 联系起来。

① 就目前的语用情况来看,“头文字”出现在汉语交际中其实也是一种语码混杂。

② 《讲文明不宜太自贬》,《环球时报》2006 年 11 月 7 日第 11 版。

③ “路码表、码表”(里程表)中的“码”也都是英语 mile 的音译,而不可能是表示 yard 的“码”。现在报刊上常有用“迈”记写 mile 之例,表示小时速度,但是往往把“迈”理解为“公里”。

日语词语与汉语词语在“面目”上的相似,使汉语词汇的应用多了一些纠缠不清,也使汉语词汇规范化的头绪更加复杂。在考虑词语规范时,必须注意区别汉语词与日语词。这本身已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如果联系不同言语社区的语用来看,情况就更复杂。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日源词语,如“福祉、整合”,一直在台湾地区使用,后来在大陆也通行开来了。但是,还有一些词语,如“地下铁、都合(方便)、感心(令人钦佩)”,以及“太古车、中古车”等等,^①一直在台湾地区使用,但大陆不用。因此“地下铁、都合、感心、太古车、中古车”等等,都只是社区词。^②

① 见邹嘉彦、游汝杰(2001, 239页)。“太古车”、“中古车”都指二手车。“太古车”指很旧的车,“中古车”指稍新的车。

② 一部香港拍的电影名为《地下铁》,这部电影在内地上映并不表明“地下铁”已经进入内地汉语。从目前内地汉语交际的实际情况来看,“地下铁”是基本不用的。至于社区词与词汇规范的关系,可参看田小琳(1998)、(2002)。

第七章 字母词

第一节 应运而生的字母词

字母词在汉语交际中早已有之。“五四”时期的文本中就有不少字母词。鲁迅小说《阿 Q 正传》写于 1921 年,其中有“阿 Q、阿 Quei、小 D”等含有字母的人名。多年来,在汉语科技文献中,大量的外国人名、科技术语都是字母词形式。但是,近二十多年来字母词在汉语一般交际中广泛而大量地出现,却是一种新趋势。仅举两例:

① 近年来 SPA(水疗)在国内风靡一时。寻根问源,SPA 的老家其实在比利时。从布鲁塞尔向东驱车 100 公里,临近德国边界,沿高速路转入阿登山区蜿蜒起伏的小道,不久便进入一片山谷。青山环抱中是一座闻名欧洲的小城——SPA。……SPA 一词源自拉丁文的 SPARSA,意思是“喷涌的泉水”。据说在古代,这里的泉眼遍地,四季喷涌。从不间断的泉水聚集人气,这里逐步形成小镇,人们索性用 SPA 来命名这个地方。由于 SPA 市的矿泉水质优量多,后来英语里 SPA 一词便成了矿泉或温泉疗养的代名词。(《水疗的故乡在比利时》,《环球时报》2005 年 6 月 13 日第 21 版)

② 百事公司 14 日称,该公司的印度裔首席财务官英德拉·努伊将在今年 10 月 1 日接替现任 CEO(首席执行官)斯蒂芬·雷蒙德的职务,使得百事公司成为女性执掌的最大公司之一。(《百事公司任命印度裔女 CEO》《环球时报》2006 年 8 月 16 日第 15 版)

近年来字母词大量出现,既与社会因素有关,也与语言文字本身的

因素有关。

从社会因素来看,主要原因是:

1. 随着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中外交往日益频繁,大量外来事物、观念涌入,人们已经来不及仔细琢磨如何翻译,且不说意译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让人难以久等,即使是音译也似乎已不能满足国人吸收、使用外来语词的需要。直接采用外文的原文书写,简便而省事。

2. 由于教育的普及,全社会的文化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懂外语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人们接触外来事物的渠道大大增加,也更为方便、迅速。整个社会与外来观念、外来事物的接触,已不再像晚清时代那样,倚赖于极少数人的翻译,而是成了社会大众的活动。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使用外语的几率也大大增加。在社会活动中,涉及外语的场合也越来越多。

从语言文字本身的因素来看,主要原因是:

1. 外来语词难以意译。诸如 SOHO(Small Office, Home Office)、DIY(Do It Yourself)之类的外语形式,在英语中也只是采用缩略的方式构成一个语词形式,如果用汉语既有语素组词或直接采用既有的语词意译,则很困难,难以形成一个词化的单位。迄今为止,这些字母缩略语还没有明确的意译形式,就是明证。

2. 意译的形式过长,不便使用。诸如 WTO、WHO 分别有“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意译形式,但词形过长,不便使用。

3. 外来语词难以音译。且不说音译会形成人译人殊,即便音译,也有难以应付的情况。诸如 WTO、WHO,倘若音译,无论按照汉语拼音字母的读音还是按照英文字母的读音来译,都有困难。

4. 书写上有经济、简便之处。如果音译,书写也颇有不便。汉字笔画多,音译词用汉字记写,费时费力。在电脑书写中,汉字的输入也

比字母输入费事。在电脑汉字输入法中,拼音输入法是最简便易学的,但用拼音输入法打出音译的西方人名、地名,因无“联想”组词之便,“拣”字之累恐怕是人人都有的切身感受。^①尤其在不计声调区别的情况下,汉语的同音字实在太多了。而直接采用字母形式书写,其方便是不言而喻的。

考虑到上述种种因素,字母词在汉语交际中大量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各种语言使用的情况来看,交际中的语码混杂(code-mixing)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要求一个社会的语言交际百分之百地使用单一语码,是不现实的。如果认为语言交际只能使用单一语码,才能保持语言纯洁,则失之狭隘。但是大量语码混杂的现象确实会对语言既有“秩序”形成冲击,使语言形式产生种种变异,在促进语言发展的同时,也会造成语言应用的混乱现象。有人讲了一个“段子”,讽刺滥用字母词的现象:我和几位IT公司的CEO朋友一起预测今年中国GDP的增长趋势,讨论加入WTO后中国城市CBD的发展策略,然后一起去KTV,在那里遇见了几个MBA、EMBA老同学……(IT,信息技术;CEO,首席执行官;GDP,国内生产总值;CBO,中央商务区;KTV,配有卡拉OK和电视设备的娱乐场所;MBA,工商管理硕士;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段子”只是“段子”,不免夸张。但是“段子”所讽刺的滥用字母词的现象,却是近年来时有所见的现象。

然而字母词并非只有消极的一面,字母词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必须对字母词的性质、特点、作用仔细加以研究,才能作出全面、明智的评价和抉择,促进语言交际,促进语言的健康发展。

^① 电脑文字输入中的“联想”是很重要的。例如,互联网上的“斑竹”作为“版主”的谐音,主要是因为“斑竹”是个现成的词,按照拼音输入banzhu,得到的词语就是“斑竹”。而“版主”是个新造词,在电脑字库中没有现成的词的形式,因而需要一一输入,十分不便。

第二节 字母词的范围、性质

一、字母词的范围

刘涌泉(1994)指出:“字母词是指汉语中带外文字母(主要是拉丁字母)或完全用外文字母表达的词,前者如 B 超,卡拉 OK;后者如 CD, UFO”。根据刘涌泉(2001)^①和目前出现在汉语交际中的字母词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① 英文字母词,包括英语词和英语首字母缩略语。如 Office(电脑软件名)、Windows(电脑软件名)、Internet(互联网)、E-mail(电子邮件)、CD(激光唱盘)、VCD(激光压缩视盘)、CT(计算机体层成像)、EQ(情商)、WC(盥洗室,厕所)、vs(表示比赛等双方的对比)、EMS(邮政特快专递)、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UFO(不明飞行物)、DNA(脱氧核糖核酸)、WTO(世界贸易组织)、WHO(世界卫生组织)、VIP(要人、贵宾)、DIY(自己动手做)、AIDS(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即“艾滋病”)、SOHO(小型家居办公室)、MTV(音乐电视)、BBS(电子公告牌系统)、GPS(全球定位系统)、3G 技术(现多特指“第三代移动通讯技术”)、X 光、 α 射线、B 超(B 型超级诊断)、IBM 公司(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VCD 机、ATM 机(银行的自动柜员机)、PC 机(个人计算机)、POS 机(销售点终端机,用于信用卡消费的机器;商场电子收款机),等等。

从上例可以看出,英文字母词并不一定是独立成词的外文字母词,而可能是外文字母形式参与构造的汉外混合同,如“X 光、 α 射线、IBM 公司、VCD 机”。为了表述方便,我们概以字母词统称,即包含着英文

① 共收拉丁字母词和少量的希腊字母词 2 000 余条,正文后附《著名 IT 企业》、《国家、地区域名简表》可供查检,并附刘涌泉(1994)一文。

字母的词。

② 汉语语词的汉语拼音字母缩略形式。如:GB(“国家标准”的缩略语“国标”的拼音首字母缩略形式)、RMB(“人民币”的拼音首字母缩略形式)、HSK(“汉语水平考试”的拼音首字母缩略形式)。

③ 以字母表形的字母词,如 T 恤衫、S 形弯道、M 形山、C 形缺口、H 形框架,等。

汉语语词的拼音字母缩略形式,如 HSK、GB、RMB 之类,其中的字母甚至不是汉语原词语的声母(“汉语水平考试”按声母缩写应该是 HSHK,用汉字记写可以是“贺试克”),作为特定的标记符号,具有特定的用途。但是,这类标记符号,读音是英文字母的读音(GB、RMB 之类不可能按照汉语拼音字母的读音读。如果读作 guóbīāo、Rénmínbì,则是“国标、人民币”的读音,而不是 GB、RMB 的读音),意义却是按照汉语拼音字母所标记的汉语成分来理解,因此只是特定的标记符号而已,并无太多的研究价值。

至于以字母表形的“T 恤衫、S 形弯道”之类,其中的“T、S”,形体就是意义,似有象形文字的特点,但读音是英文字母的读音,性质、作用等同于一一般的图形符号。这类字母词,性质类似“△形、形”之类包含非语言符号成分的语词形式,^①因此研究价值也不大。

②、③两类字母词不必多加讨论。讨论字母词,应主要讨论①类字母词,包括英文字母词和英文字母成分和汉语成分组合而成的词语。本文讨论的字母词,主要就是这类词语。

关于字母词的性质,目前大都倾向于把字母词看作汉语词,如刘涌泉(1994; 2002)、周健等(2001)、李明(2002)、俞品、祝吉芳(2003)等。而于根元等(2003)则认为“外文原型或简缩形式如 IT、MTV”是外语

① “△、”都不是语言符号,△虽然可以念作 sānjiǎo,但是 sānjiǎo 并不是△的读音,而是“三角”的读音。

词,汉语拼音的简缩形式(如 RMB)和有外字母又有汉字的字母词是汉语词。

对字母词的性质,需要进一步讨论。

二、字母词的性质

“Office(电脑软件名)、Windows(电脑软件名)、Internet(互联网)、E-mail(电子邮件)、CD、VCD、IBM、WTO、WHO、VIP、DIY、AIDS、SOHO”之类的全英文字母词是英语词。

英文字母成分和汉语成分组合而构造的词,包括两类:一类是“X光、 α 射线”之类;一类是“IBM公司、VCD机”之类。表面上看起来,“X光、 α 射线”与“IBM公司、VCD机、3G技术”是不一样的,因为“X光、 α 射线”有确定的汉字书写形式与之并行(爱克斯光、阿尔法射线),“IBM公司、VCD机”没有确定的汉字书写形式与之并行,其实性质都一样,都是汉外混合词。这类汉外混合词可以看作准汉语词。

1. 全英文字母词

赵元任(2002, 619页)讨论过说本族语时夹杂外语词的现象:“还有一个现象近似借语而跟借语不同的,就是说本国话的时候当中夹杂了纯粹用外国口音的外国语词进去。这种现象在一个国家里少数民族当中用本来的语言时候常会有的。例如住在美国的中国人说中国话的时候,常常会搀些英文语词在中文的句子里头,可是仍按原来英文的音来读,并不改成中文的音位。比方我常听见人说——我自己有时候也说——‘我下午在我 office 里等你’。这里头 office 这个字完全是用英文的音位来读,并且有些音的地位也是中文里不见的,例如用-s 收尾的字。记得以前耶鲁大学金守拙(George A. Kennedy)听见我们这样说话就笑我们说:‘中文里难道就没有 office 这个词吗?我当时听他这么一问还有点不好意思,可是后来细想想,的确是没有确确当当的词,因

为一个教授的 office 也不纯粹是个书房,也不是什么办公室,因为大半时间也不在那儿办什么公。所以结果我就让它 office office 去罢。”^①

这种“说本国话的时候当中夹杂了纯粹用外国口音的外国语词”的现象,其实就是当今汉语交际中出现的外文字母词现象。当今汉语交际中出现的 Office、Windows、Internet、E-mail 之类的英语词,以及 CD、CT、VCD、IBM、WTO、WHO、VIP、DIY、AIDS、SOHO 之类的英文首字母缩略语,都属于交际中的语码混用。这些词出现在汉语交际中,并不能说明它们就是汉语词汇中的成分。^②

把 Office、Windows、Internet、E-mail、CD、CT、VCD、IBM、WTO、WHO、VIP、DIY、AIDS、SOHO 等看作外语词其实是无须证明的。一个不懂英文的中国人是不可能懂得这些字母词中意思的。现在英文比较普及,英语词、英文缩略语一般人都会读、会写,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英文字母词的外语性质。其实,诸如“克格勃”的英文字母书写形式 KGB 与俄文字母书写形式 КГБ 的性质是一样的。КГБ 不可能被看作汉语词,又有什么理由认为 KGB 是汉语词呢?高名凯、刘正琰(1958, 10 页)早就明确辨析过外语词和外来词的不同,指出“尽管‘幽默’是从英语 humour 转到汉语里来的外来词,但是 humour 却仍然是英语的词,不是汉语的词;只有‘幽默’才是汉语的外来词”。胡明扬(2002)则把 WTO、CD 称之为“原装外文缩略语”,因为它们“从文字书写到读音完全是外文外语原来的形式”。这些分析都是切中肯綮的,但

① 似乎擅长外语的人都偏爱字母词。“当年罗家伦在北大读书时,在英文课上因不能回答问题受到辜鸿铭的训斥,罗家伦为自己辩解,辜鸿铭大怒,拍着桌子说:‘罗家伦!不准你再说话!如果你再说,你就是 WPT!’什么是 WPT?罗家伦不明白,问了许多人,乃至问了胡适,也都不得其解。后来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机会,趁辜鸿铭高兴时间 WPT 是什么意思。辜鸿铭答道:‘你连这个都不明白?WPT,就是王、八、蛋!’”(《辜鸿铭骂罗家伦 WPT》,《作家文摘》2005 年 4 月 8 日第 11 版)

② 有的文章称交际中英文字母词的应用是“直用原文”(杨挺 1999),意思是准确的,但把英文字母词纳入“现代汉语外来语”。应明确其为外语词。有的文章把在汉语交际中应用的字母称之为“现代汉字系统中的外来字母”(刘建梅 2002),则需要斟酌,尤其是 WTO、Windows98 之类都只是外语词,字母也都是外文字母,不能因为在汉语交际中出现就看作进入了“现代汉字系统”。

是,似乎没有引起重视。

判断是否汉语中的成分,形式上一般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读音;二是书写。任何一种语言中的外来词,都用本民族语言的语音结构方式对外语词作了语音改造。改造的结果,在口头上采用本民族语言的语音形式读,在书面上也采用本民族文字书写或改为本民族语言的拼写形式。书写形式并不仅仅是个文字字形问题,而是一种语言的语音系统在书面上的反映。

比较一下音译词和字母词,就可以看出书写和读音对于区别汉语词和外语词的重要性。“沙发”是汉语中借自英语的外来词。说“沙发”是外来词,是就“沙发”这个词的来源说的,毫无疑问,“沙发”是个汉语词,尽管它是外来的;sofa 就只是外语词。这并不仅仅是个文字的问题,而是语音结构的问题。写作“沙发”,意味着它的读音是汉语的,“沙发”自然有汉语词的身份。写作“梳化”,就意味着是汉语方言中的外来词,属于粤方言词,尽管从来源上讲,也是外来词。卡塔尔首都 Doha,如果按照英语的读音读作[¹douhə],就只是英语,读作 Duōhā,写作“多哈”或 Duōhā,才是汉语中的外来词。所以,是不是用汉字书写,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个文字问题,其实文字书写直接跟语言有关,用汉字书写,读起来才会是汉语的语音结构。汉语的成分必须具有汉语的语音结构。

因此,字母词 DINK 是英文缩略语,而 DINK 的音译“丁克”则是音译的外来词。字母词 AIDS 是英文缩略语,“艾滋(病)”则是汉语词。“沙斯”、“沙士”或“萨斯”都是汉语词,但 SARS 只是英文缩略语。cool 是英语词,cool 的汉语音译形式“酷”则是汉语中的音译外来词。

Carrefour(法国跨国零售商名)是法语词;写作/读作“家乐福”,是汉语词,写作/读作카르푸,是韩语词。“家乐福”和“카르푸”分别是汉语和韩语中的音译外来词。这并不仅仅是书写形式的不同,不同的书写形式记录的是不同语言的语音结构形式。

韩国泡菜김치(Kimchi)到了日语中变成了キムチ(kimuchi)。韩语的 Kimchi 是两个音节,即 kim(김)、chi(치);但到了日语中,一个音节的 kim 变成了两个音节的 kimu。这是因为日语中没有 kim 这样的音节结构。Kimchi 如果在日语中出现,就只是外语词;写作/读作 kimuchi 或キムチ,则是日语词。

韩语的남경是对英语 shop 的音译转写,남경是韩语中的音译外来词,shop 则是英语词。写作“南京”,念作 Nánjīng,是汉语;写作/念作 남경,是韩语中的音译外来词;用韩语汉字写作“南京”、念作 Namkyong,也还是韩语词。

日语汉字书写的日语词,到了汉语中,书写形式上可能没有变化,但按照日语词的语音读,就只是日语词;按照汉语汉字的语音读,才是汉语词:“大阪”读作 Osaka,是日语词;读作 Dàbǎn,则是汉语词。

马来语 bas sekolah 是借自英语的音译词,bas 来自英语 bus 的马来语音译转写,sekolah 是英语 school 的马来语音译转写。读作/写作 bas,是马来语;读作/写作 bus,则是英语。读作/写作 sekolah,是马来语;读作/写作 school,则是英语。读作/写作 school bus,是英语;读作/写作 bas sekolah,是马来语。

马来语的 kopi(咖啡)借自英语的 coffee,读作/写作 kopi 是马来语,读作/写作 coffee 是英语。^①

下面的例子,表面上看仅仅是一种民族语言保护政策,实际上也反映了一种语言借用外来词的基本规律:

继 1992 年 6 月在宪法第二条中加注“共和国的语言是法语”的附加条款后,法国议会在 1994 年颁布了“杜蓬法”,规定公共场所的所有标语、公告牌必须用法语书写,即使原文是外语,也要翻译成法语,而且法语字母不能小于原文。违反上述规定的个人和企业将被处以 5 000

① 马来文与英文书写形式相同的,则须看读音。

法郎到 2.5 万法郎不等的罚款。(《环球时报》2003 年 11 月 5 日第 7 版)

所谓“原文是外语,也要翻译成法语”,主要就是改为反映法语读音的书写形式,例如意大利语和法语虽然同属拉丁语族,但语词读音(在书面上表现为拼写形式)也不相同,因此法语从意大利语借词,要对借入的词语在书写上作出反映语音变化的修改。其中,意大利语进入法语的词,往往要省去最后一个音节或者把最后一个音节变成弱化音 e,如:artigiano→artisan(手工业者),disgrazia→disgrâce(失宠),gabella→gabelle(盐税),sacco→sac(包),capitone→capiton(废丝),等等。^①

在历史上,日语借用汉语词,在书写上采用汉字,在读音上有音读和训读两种形式,但不管是音读还是训读,都对汉语词进行了语音改造。完全按照汉语原来的读音读不仅不可能,而且也不可能把汉语词“日语化”。“椅子”在汉语中念作 yǐzi,在日语中念作いす(isu)。念作 yǐzi 是汉语词,念作 isu 则是日语词。从书写上说,假如都用罗马字拼音的话,写作 yǐzi,是汉语词;写作 isu,则是日语词。

其实,不仅一种语言借用外语词是这样,共同语借用方言成分、方言借用共同语成分或一种方言借用另一种方言中的成分,也要在读音上加以改造。汉语交际中的外来字母词如果没有文字(汉字或汉语拼音)作为语音定型的标志,这些外来字母词就只是外语词,不是汉语词。

如果把“Office、Windows、Internet、E-mail、CD、CT、VCD、IBM、WTO、WHO、VIP、DIY、AIDS、SOHO”之类的字母词看作外语词,如何解释汉语书面交际和口头交际中字母词的应用呢?既然这些字母词既出现在汉语的书面交际中,也出现在口头交际中,难道不能认为它们是汉语成分吗?

文炼(1991)指出:“在平时的说话和写作中,我们除了使用语言符

① 参曹德明(1994:175 页)。

号,也使用非语言符号,特别是书面语中更是如此。例如标点符号,是书写形式和意义的结合,当然不属于语言符号。许多科学上的符号是不可发音的,或者是没有固定的发音的,也不属于语言符号。”

既然我们在说话和写作中可以使用非语言符号,那么,使用外语成分就更不值得奇怪了。英语词(包括英文首字母缩略语)在汉语交际中的出现,实际上都是语码的混用(code-mixing)。

汉语交际中语码混用的现象其实是很常见的。使用 A 方言交际时混杂了 B 方言的语词成分,并不能说 B 方言的语词成分就成了 A 方言的语词成分;使用普通话交际时混杂了方言语词成分,并不能说方言的语词成分就成了普通话的语词成分;使用方言交际时混杂了普通话的语词成分,并不能说普通话的语词成分就成了方言的语词成分。能不能成为某种方言或普通话的语词成分,要看混杂进来的语词成分能否最终融入该方言或普通话的系统,具有该方言或普通话语词成分的性质、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形式标志就是读音。

2. 英文字母和汉语成分组合而成的词语

英文字母成分参与构造的词,无论是“X 光、 α 射线”之类,还是“IBM 公司、VCD 机”之类,都是汉外混合词,属于准汉语词。

把“X 光、 α 射线”看作汉外混合词,是因为“X 光、 α 射线”虽然有确定的汉字书写形式与之并行(X 光/爱克斯光、 α 射线/阿尔法射线),但 X、 α 并不是标记汉语读音的文字符号,虽然可以读作 āikèsī、ā'ěrfǎ,但是 āikèsī、ā'ěrfǎ 只是“爱克斯”、“阿尔法”的读音,而不是 X、 α 的读音。否则,类此推导,我们也可以承认“△形、形”中的“△、”是记录语言成分的书写符号,因为“△、”分别可以读作 sānjiǎo(三角)、dàosānjiǎo(倒三角)。但是,sānjiǎo、dàosānjiǎo 分别只是“三角、倒三角”的读音,而不是“△、”的读音。虽然“X 光、 α 射线”中的“X、 α ”与“△、”的性质并不完全相同,“X、 α ”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不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但是“X 光、 α 射线”中的“X、 α ”并不具

备汉语语音结构的读音,因此不能看作记录汉语成分的书写符号。所以,把“X光、 α 射线”中的“X、 α ”看作非汉语成分,这与把“△形、 形”中的“△、 ”看作非语言符号道理上是一样的。

把“IBM公司、VCD机”之类看作准汉语词,也是因为其中的字母都是按照英文字母的读音读的。与“X光、 α 射线”这样有汉字音译形式(爱克斯光、阿尔法射线)与之并行的词语相比,更不具备汉语成分的语音形式,而只是汉外混合词、准汉语词。如果把IBM公司、VCD机看作汉语词,却把IBM、VCD看作外语词,则必然导致一种逻辑,即只要与汉语成分结合在一起,就“摇身一变”成了汉语中的成分。殊不知出现在语言交际中的各种符号并不一定都是语言符号,出现在汉语交际中的符号也并不一定就是汉语符号。在汉语交际中与汉语符号结合的符号既有非语言符号,也有非汉语符号。

不过,毕竟还是要把“X光、 α 射线、IBM公司、VCD机”看作准汉语词,这是因为其中的字母(或字母组合)在词语结构中的作用与音译成分相当,也就是说“X、 α 、IBM、VCD”可以比照汉字音译形式来理解,即“X光、 α 射线、IBM公司、VCD机”相当于“爱克斯光、阿尔法射线、爱比莫公司、维西递机”之类的词语。比照“X光/爱克斯光、 α 射线/阿尔法射线、IBM公司/爱比莫公司、VCD机/维西递机”之类的结构,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在这样的结构形式中,字母部分具有“别义”的作用,是整个词表达词义所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应当把这样的字母与汉语成分的组合看作一个词,尽管是混合词、准汉语词。

但是,不能简单化地把这类词语认定为汉语词,因为其中包含非汉语成分。这似乎是矛盾的,其实也不难理解。书面交际中可能出现非语言符号与汉语符号结合而成的词语形式,如“△形”、“ 形”,其中都含有非语言符号的图形成分;至于不同语码的组合形式,就更不值得奇怪了。

对于外文字母和汉字混合记录的词语,客观地承认其中的外文字母成分是外语成分,总比给汉语添加许多莫须有的语音结构形式显得更合理。《现代汉语词典》(1978)收录的“阿 Q”注音为 Ā Qiū,另一个读音为“Ā kiū”;《现代汉语词典》(2005)的注音是“Ā Q”,Q 没有注声调。这个 Q 应是英文字母。如果按照《现代汉语词典》(1978)的注音,Q 读作 Qiū,这是汉语拼音字母的读音,但这个读音与“阿 Q”的实际读音是不相符的。把“阿 Q”读作 Ā kiū,则意味着汉语普通话中增添了一个新音节 kiū。由此推开,英文字母的读音将给汉语增加多少个只有读英文字母时才会有的音节?

给英文字母加上汉语的读音,表面上看可以把字母的读音规范化,但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汉语的语音系统因此就被搅得混乱不堪。也许正是因为有这种两难的情况,《现代汉语词典》(2005)放弃了对 Q 的声调标注,等于直接使用原文,也就是按照英文字母的读音读。这一情况体现了源自英文字母的成分在汉语交际中的尴尬地位。从外来语言成分汉化的角度看,这类字母词中的字母部分只有采用具备汉语语音结构特征的文字书写形式作为语音定型的标志,才能成为真正的汉语成分,整个词才能成为真正的汉语词。

对于汉语交际中的英文字母词,仅仅因为其在汉语交际中出现,就予以“收编”,认定为汉语成分,这是失之简单化的。这样的“收编”不仅对汉语的健康发展没有好处,还会“鼓励”语码混用,导致语码混用的泛滥。既然外语词出现在汉语交际中就成为汉语成分,那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

在各种语言交际中,语码的混杂都是很自然的客观现象。在汉语科技文献中,语码混杂是早已被接受的事实。因此与其急急忙忙将其“收编”,不如坦率承认字母词的使用是汉语交际中的语码混杂现象,这并不有损于汉语的性质和“形象”,因为这样的现象在各种语言的交际中都是存在的。而且,明确指出这一现象为语码混用,还可以在学理上

阻止字母词的泛滥,有利于汉语的健康发展。

不过,从汉语交际中的英文字母词现象,倒是可以得到前所未有的启示,这就是语言交际中的符号现象是纷繁复杂的,并不那么单一、纯净。因此必须深化对语言符号系统复杂性的认识,对符号学一般原理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在此基础上,才能对汉语交际中的英文字母词之类的“语码混杂”的现象作出正确的评价和抉择。

三、字母词与语词借用中的“借形”

近年来有一种看法,认为汉语中出现的英文字母词属于借形词。^①字母词确实是直接搬用了外语词的书写形式,自然就有“借形”之说。俞品、祝吉芳(2003)把汉语交际中出现的字母词称为“原形借词”。如果把“原形借词”理解为汉语交际中出现的外语词,“原形借词”这一名称倒是可以表达这类词语的性质和特点的。

但是,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汉语交际中的英文字母词与通过搬用书写形式借入的日源外来词还是不同的。英文字母词是借形借义又借音(至于汉化的读音,虽然有种种尝试,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还难以确定),而通过搬用书写形式借入的日源外来词则是借形(字形)借义不借音。这一差异决定了它们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按照书写方式搬到汉语中来的日源词语按照汉语汉字的读音读,具有汉语的语音结构形式,因此是汉语词汇系统中的成分;而字母词因为不具备汉语语音结构形式的读音,只是出现在汉语交际中的外语词。

第三节 字母词的价值和应用

对于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那样的双语乃至多语社会,多

① 邵敬敏主编(2001:139页),杨锡彭(2003:79页),刁曼斌(2006:255—256页)。

语混用的社会交际是普遍现象。字母词在中国大陆的汉语交际中的大量增加,给汉语和汉语交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影响,其中有利有弊,需要仔细分析。

一、为更加便捷地吸收外来词提供了新手段

在外来事物、现象、观念大量涌入的情况下,对于一时来不及音译或意译的外语词语直接采用字母形式书写,可以满足交际需要。其中有些字母词可能通过音译、意译或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式转化为汉语成分,成为汉语中的外来词,从而丰富汉语的词汇。那些暂时不能被汉化并且真正进入汉语词汇系统的字母词,也可以暂时先用起来,只要社会需要,就是有价值的,而且是汉语新词语的潜在来源。那些始终不能成为汉语词汇成员的字母词,也可以弥补汉语词汇的某些不足,是有一定益处的。例如“CT、CD、VCD、DVD”等字母词,迄今也看不出有被音译形式或意译形式取代的迹象,但正在广泛地被使用着,可以满足一定的交际需要,因此也是有价值的。

一般而言,一种语言交际中夹杂着其他语言的语词是很常见的现象,英语词典甚至把英语社会交际中常用的其他语言的语词也予以收录。例如一般的英语词典都收录了 *coiffeur* (“发式、发型”义), *coiffeur* 其实是法语词(与之同义的、并行使用的英语词是 *hairstyle*, 老式的词语是 *hairdress*), 因此英语词典大都注以 *F.* 之类的符号,表示“法语”。

附带要说明的是,国内编纂、出版的英汉词典对 *coiffeur* 注以“〈法〉”,却在体例说明中注明〈法〉这样的标记表示词源。其实“词源”之类的表述是模糊而不确切的: *restaurant* (餐馆)的词源也是法语,英语中借自法语的词语是很多的,但词典并未同样注明词源, *Tsugaru* (津轻海峡)、*tsunami* (海震、海啸)、*Tsushima* (对马岛)、*tsutsugamushi* (恙虫病)都来自日语,英汉词典也都不标明词源,为什么偏偏把 *coif-*

feur 这样的词语注以“〈法〉”这样词源标记呢？其实，仔细分析即可知道，coiffeur 在读音上和拼写上都具有非英语的特征，这样的词语与已经完全“英语化”的法源英语词 state(国家)、nation(民族)、people(人民)、govern(治理、管理)、parliament(国会)、peace(和平)、enemy(敌人)等不同，与在书写上还带有一定法语痕迹的 restaurant 之类的词语也不同，因此英语词典要予以注明。一般英汉词典都不注明 state、nation、people、govern、parliament、peace、enemy、restaurant 等词的法语词源，也把 restauranteur(餐馆老板)看作英语词，但都要把 restauranteur(餐馆老板)加注标记〈法〉。其实，restauranteur 的标记符号〈法〉就应该理解为“法语”，而不应是模糊的“词源”之说。这类问题在国内编纂、出版的英汉词典中普遍存在，这与理论上的概念模糊是有关系的。出现在英语社会交际中的语词并不都是英语语词，出现在英语词典中的语词也并不都是英语语词，即使是逐渐“英语化”的外语语词，只要读音、拼写还没有真正实现“英语化”，只要英语社会在心理上还没有将其看作英语词，就只是外语词。这跟来自日语的“物语”在当前汉语中的情形一样。并不因为“物语”出现在汉语交际中，“物语”就成了汉语词。

二、为书面书写提供了新手段

字母词在书面上可以用汉字音译代替，如“X光”也可以写作“爱克斯光”。有些原先的字母词在现在的汉语交际中书写已以音译形式为主，如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缩略语现在大多写作“克格勃”。“丁克(DINK)、艾滋(AIDS)”也都是以汉字音译形式为主。但是，由于字母形式在书写上比较方便，目前在交际中还有不能取代的作用。特别在同一篇文章中，一旦采用汉语意译形式给予了明确的注释以后，人们大多乐于采用字母词形式。例如：

部队编制方面，美空军在 2007 年要做的事情也非常多，尤其是组

建全球攻击特遣部队(GSTF)的工作将异常繁重。GSTF打破空军联队按照机型来划分的传统,同时包含战斗机、攻击机、预警机和无人机在内的多种空中平台。据报道,美空军计划在2007年对驻远东、中东和欧洲的空军部队进行GSTF概念的编组,并可能投入实战运用。(《2007年,美军要忙四件大事》,《环球时报》2006年12月29日第8版)

需要提及的是,英语词(包括英文首字母缩略语)在汉化为汉语成分并得到普遍应用之前,字母形式的书写和称说对于海内外大汉语圈的交际来说,也是有一定益处的。

三、词形确定

不论是音译还是意译,词形都会产生歧异。因此,音译或意译都需要有关部门在社会用例的基础上规定词形。但是规范工作是审慎的,特别在对一个外来词是否需要确定词形以及确定什么样的词形作出明确判断并具体规范词形之前,音译或意译的纷乱是不可避免的。在海内外大汉语圈的范围内,外来词的歧异迄今仍是一个亟须协调的工作。

与音译或意译的歧异相比,字母词由于采用原词书写的形式,词形基本是确定的,虽然也有一些字母大小写的分歧,但实际上都是有既定写法的,例如CD(光碟)、Cd(元素“镉”的符号)、cd(光学强度单位名称“坎(德拉)”的符号)^①。

四、词形短

与意译形式相比,英文缩略语字母词往往要短得多,例如《作家文摘》(2006年12月19日第6版)上有篇文章的标题是:中国加入WTO这五年。如果用“世界贸易组织”替代“WTO”,至少多三个字。词形的长短对于报刊编辑来说,是很“计较”的。尤其是在报刊标题中,词形

^① 刘涌泉(2002)。

长,不仅不简洁,版面也难以安排。英文缩略语字母词能够在汉语书面交际中生存,这一特点不可忽视。

五、适度控制

上述字母词的价值和在汉语交际中的作用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字母词的价值、作用与字母词的使用者有关,对懂得英文的人来说,字母词自然有其特定的作用,但是从社会大众的交际方面来说,目前中国的整体教育水平、文化程度决定了字母词还远远不能达到畅行无阻地使用的地步。

英文字母词从根本上讲是与汉语汉字的认知特点、认知习惯不相适应的。一些英文字母词虽然指称的事物很常见(如“CD、VCD、DVD”),在实际使用中人们也都知道这些字母词的所指是什么,但要明确说出其意思,还是有困难的。有些字母词的意义带有较强的专业性,如CT指“计算机体层成像”;IDC指“因特网信息提供商”;CEPA是英文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的缩写,现在经常用于表达“(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这些英文缩略语都涉及专业知识,汉译原文也很长,一般人根本无法记住,所以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往往是连讲都讲不清楚的“乱七八糟”的符号。

至于说字母词便于书写,其实也要看具体情况。符号简单,书写就简便,这是一种意义上的好写。但是还有一种意义上的好写、不好写,这就是记得住记不住意义上的好写、不好写。AIDS译名“艾滋(病)”大家都知道,但是能写出AIDS的人到底有多少?尽管汉字音译形式的“艾滋(病)”笔画多,可是在记得住记不住的意义上,还是比AIDS好写,因为知道写什么、怎么写。对于汉语大众来说,AIDS的字母组合意思不清楚,理据不明白,只靠硬记未必记得住;记不住,就不好写。

字母词现象属于语码混杂的语言交际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常的,但是对字母词应用纷乱的现象应该加以疏导和制约。字母词的应

用应根据语域(Register)^①的要求来予以引导和制约,以避免字母词的泛滥成灾。当前,除了一般人比较熟悉其所指的,如“CD、VCD、DVD、CT、X光、卡拉OK、B超”等,英文字母词在大众传播媒体上出现时,应该要求有相应的汉语表达形式(如意译的词语形式,或解释性的词语、语句)与之共现,而且最好是字母词在正文中首见时就同时出现。这主要还是语言交际传递信息的需要,也就是“交际到位”的要求。^②诸如MMS(磁共振成像)、OEM(原始设备制造商)、CIMS(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之类的专业性较强、一般人感到很陌生的英文首字母缩略语,《现代汉语词典》(2005)已经收录,但总不能让人在看一般书报时也不停地翻词典。而GSLV(“地球同步轨道运载火箭”的英文首字母缩略语)和ASLV(“加大推力运载火箭”的英文首字母缩略语)之类的英文首字母缩略语,不仅《现代汉语词典》(2005)没有收录,恐怕在一般的辞书上也是难以查到的。其实,即使在英语社会中,除了众所周知的常见缩略语以外,缩略语的应用一般也必须有原词语形式与之共现于一个交际语境中。

缩略语的理解是通过还原为原词语来实现的。汉语中缩略语的使用,除了一般人都很熟悉的以外,稍微生僻一点的缩略语在文章中出现时必须要有相应的原词语的对照,否则就可能引起理解困难。汉语缩略语的基本构成成分是语素,理解起来尚且需要一定条件,英文缩略语的基本构成要素只是并不直接表义的字母,在汉语中使用时就更加需要有相应的汉语解释。当然,这样的要求主要是从大众语言生活的角度而言的,在专业领域内,专业术语的字母书写形式就不一定要求这么做。但是,专业工作面向社会大众时(比如家用电器的说明书),与字母

① 语域(Register),指具有某种具体用途的语言变体(Variety)或语言变体的某些特定使用范围,如根据题材可以区分出各种行话;根据话语方式区分正式出版物、书信、电话、网络等传递中介;根据正式程度把话语区分为正式体、随便体、亲密体等。可参看哈特曼、斯托克(1981, 294页)“Register(语域)”。

② 于根元等(2003)。

词意义相应的汉语表达的词语应是必不可少的。

其实,即使在专业领域内,专业术语也不允许随意采用缩略语形式,更不能随意省略。例如生物学对生物种类的命名规则是“双名法”(Binomial nomenclature),每个物种的名称由两部分构成:属名和种加词。如果在一篇文章中多次提到某一个属,第一次提及时必须全写,在以后出现时可将属名缩写,但绝不能省略,例如 *Homo sapiens* 可以写为 *H. sapiens*。在个别物种已经广为人知、缩写形式已经约定俗成的情况下,属名才可以只采用缩写形式,如 *Escherichia coli*(大肠杆菌)可以缩写成 *E. coli*。专业领域术语规范的这些做法,值得借鉴。

六、字母词的规范

目前,学界正在探索对字母词本身进行规范。^①比如字母词的字母读音,刘涌泉(2002)认为“来自外语的字母词一律按照英文字母读,因为这些字母都是通过英文传入的。至于来自汉语的字母词如何读,目前尚无定论。不过,现在人们都趋向于用英文字母读法来读”。李小花(2002)对字母词的读音问题做了社会调查,指出:“当前存在的字母词读音差异基本上还是属于中国人拼读外文字母主要是英文字母的差异,是英文字母读音的内部差异,是标准音与非标准音读音的差异;也就是说大众倾向于用英文字母音读字母词,即使一些意义来源于汉语的字母词,如‘HSK’,人们尽管知道是指‘汉语水平考试’,仍然采用英语字母音,并未采用汉语拼音。”这一调查结论是符合实际的。

葛本仪(2001, 11—12页)对字母读音汉化进行了积极尝试,但注音与实际读音有些距离(如VCD读作 *wēi sēi dí*, MTV读作 *āi · mu tí vī*),有的音节(如 *sēi*)是汉语中所没有的音节。作者是很审慎的,所以申明:“这类词的读音有待于进一步约定俗成和标准化。”郭熙(2006)则

① 如周健等(2001)、刘涌泉(2002)、刘建梅(2002)、俞品、祝吉芳(2003)等。

认为可以按照英文字母的读音读,“也可以按照本方案 4.2 中根据汉语音位系统的实际作出适当调整后的字母表读”。从该文所列字母表的读音来看,既不是拉丁字母的标准读音,也不是汉语语音(有许多汉语所没有的音段结构,如 êks、al 之类),“人工性”比较强。

其实,外文字母的读音是无法另加汉语读音规范的,因为既没有学理基础,也不具备现实可行性。诸如 WTO、CD、VCD 之类的字母词本质上是外语成分,就只能按照英文字母的读音读;按照汉语拼音字母的读音读,与实际读音相差较大,而且也有无法用汉语拼音字母读音读的情况;汉外结合地加以改造,因为没有现实语音基础,也就难以定型。

字母词的汉语读音规范只有在汉字音译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当然亦可用汉语拼音记录),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汉字书写使之具有汉语的音节结构形式,真正汉化为汉语中的成分以后,才能实现汉语的读音规范。通过确定的汉字书写,既规范了词的书写形式,又规范了读音。

第八章 外来词的汉化

第一节 外来词规范化与外来词汉化

一、外来词规范化

外来词进入汉语,往往会对已有的汉语词语规范造成冲击,但经过“沉淀”,存优汰劣,可以丰富汉语的词汇。因此,应对吸收外来词持积极的态度。即使因吸收外来词而引起这样那样的一时纷乱,或者形成一些长期的纷扰,也不必过虑。汉语词汇的发展历史表明,汉语词汇系统只会在吸收外来词语的过程中丰富、发展,而不会因吸收外来词语而衰败。相反,如果没有外来词语的冲击和激励,汉语的词汇系统就发展乏力。没有 19 世纪后半叶开始的外来词语的冲击,就没有五四时期汉语词汇的新面貌;没有“五四”以来对外来词语的吸纳,绝不会有今天丰富多彩的词汇景观。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促进了汉语对外来词的吸收,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汉语的词汇系统。

为了汉语词汇的健康发展,为了促进汉语交际,必须做好外来词规范化工作。外来词规范化不是限制、妨碍吸收外来词,恰恰相反,外来词规范化是为了更好地吸收外来词、应用外来词。只有形成引进、应用外来词的正常秩序,才能减少纷乱,形成良性循环,保持吸收外来词的渠道畅通,促进汉语词汇的健康发展。

从当代社会外来语词引进的情况看,有三个倾向、三个特点值得注意。

三个倾向是:

① 意译“快餐化”。“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已成明日黄花。“囫囵吞枣”的意译导致产生生硬的意译词,比较极端的例子之一是把 DJ 意译为“唱片骑士”。

② 音译“娱乐化”(如“伊妹儿、伊媚尔”等)、“个性化”(如不愿袭用已经流行的“博客”,另造“勃客”)。

③ 语码使用随意化。“不择手段”,随意搬用字母词。

三个特点是:

① 汉语外来词在全球范围内大量涌现,迅捷进入中国境内的汉语。由于互联网的普及、电视和电子报刊的传播以及境内外人员的频繁交往,当今时代,必须从全球化的视野观照汉语的发展。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汉语的发展已不仅仅是中国境内汉语的孤立发展,海外汉语的发展对中国境内汉语的发展具有直接而迅捷的影响。汉语外来词的发展也不仅仅是中国境内的汉语外来词发展,而是全球范围的汉语外来词发展。海外汉语中的外来词大量涌现,传播便捷、迅速,使中国境内外来词大量增加。

② 歧异外来词传播便捷。海内外汉语交流日益活跃,在活跃的语词交流中,海内外不同地区各自创造的同源异形的外来词,借助大众传播媒介、通讯手段和人员交往,十分便捷、迅速地传播开来。

③ 书写歧异增多。电脑书写普及,基于拼音的文字输入增加了外来词同音异形的歧异(如“伊妹儿、伊妹尔”)。

当代社会外来词语引进的这三个倾向、三个特点,使得原本就很复杂、“人译人殊”的外来词译借进一步增加了复杂性,纷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外来词规范化工作并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十分必要的。

作为汉语词汇规范化工作的内容之一,语文政策层面上的外来词规范化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行政”决策,即依据国家的社会文化导向和语文政策,由负责语文规划工作的行政部门对外来词的吸收、

使用提出或原则性的或细化的、具体的决策,或由某些专业部门或行业组织来确定领域外来词语的规范,等等。行政决策应有语用和学理研究这两个方面的依据。

词汇规范化的一般原则应是“评价与抉择”,^①在考虑词语规范时,要把习性原则与理性原则结合起来。^②外来词的规范化也应如此。因此外来词规范的“行政决策”应有两个方面的考虑:

1. 语用。

在考虑异形外来词规范问题时,应注意异形词语的不同表义特点、语用功能和词形色彩,考虑语用因素,因此不必限制过严。应允许异形外来词的存在,以适应不同的语用需要。但是对于确实毫无必要的词形歧异,应加以规范。

例如“互联网”这样的意译词最中规中矩,适应的语用范围最广。但有了“互联网”,还能不能接受“因特网”?这应由社会应用来决定。既然“因特网”已经在社会中通行开来,强行禁止,不仅无益,也无用,而且也没有必要。从学理上讲,应根据高名凯、刘正琰(1958, 181—183页)提出的“二并原则”中的“异格并用”的原则(不同风格的词语可以并行使用)允许并存。^③因为虽然很难辨析“互联网”与“因特网”之间有何表义差异,但是一则语用的力量很强大,难以令行禁止,二则两者的风格色彩也是有差异的——“因特网”的词形带有明显的外来色彩。“电子邮件”与“伊妹儿”也是这样,“伊妹儿”作为俗称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应允许它与“电子邮件”并存。

高名凯、刘正琰(1958, 179—181页)提出的“三一原则”(即“一词一音一字”),应主要应用于毫无语用表达差别的异形音译词或异形意

① 戴昭铭(1998, 14页)。有关外来词的规范问题,可参于根元、王铁琨、孙述学(2003)、苏宝荣(2004)等。

② 关于“理性原则和习性原则”,可参邹韶华(2001)。

③ “二并原则”之一的“异形并存”并不是一般理解的“异形词”的“异形”,而是两个不同的词,如 motor 的两个音译形式“摩托”和“马达”,是意义不同的两个词。

译词之间的选择、规范(如“互联网”和“互连网”、“因特网”和“英特网”),以减少歧异,既促进交际效率的提高,也促进语言的健康发展。这种选择、淘汰,应根据使用上的普遍性。《现代汉语词典》(2005)只收录了“互联网”和“因特网”,不收“互连网”和“英特网”,体现了规范词典的“导向”。

也有一些外来词,“模样”并不周正,“表现”也不好,总是很别扭,但有语用的需要,就不宜当头棒喝,阻碍其生存与发展,而应由语用来调适。如 plaza 的意译“广场”(“大型购物中心”义),“歪瓜裂枣”的模样,但既不应该急于承认(例如规范词典收录时要慎重),也不宜立即禁止(实际上也难以禁止),可以让语用来调适,而语用调适的结果很可能为“广场”增添新义,或增加一个与汉语原有的“广场”同形的新词,这对于词汇的发展是有益的。

对于外来词的语用调适,语言文字工作当然不是无所作为的,借助于规范词典体现导向就是途径之一。^①但是,外来词的规范导向一定要建立在学理基础上,建立在学理基础上的语文政策才能真正发挥导向的作用。

2. 学理。

外来词的规范化工作必须基于语言文字本体规律的认识,充分发挥学理导向的作用。

一些音译词,词形虽有特点,但并不理想,一旦通行开来,也就难以调整,强行改变,效果也不一定好,但在学理上可以予以制约,形成学理基础上的语用导向。如“伊妹儿”,《现代汉语词典》(2005)收录了,但又注明是“俗称”,这就从学理上指明了这个词的语用范围限制。“俗称”一

① 也要鼓励应用型词典广泛搜罗外来词,以积累词汇,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促进语言应用。第三章第四节曾提到有些非全民性的、非通用语词的音译词无处查询,这类外来词应收入应用型词典以备查。此外,一些已经使用得很普遍的音译词,如“香格里拉”(Shangri-La)、“斯诺克”(snooker,斯诺克台球,一种台球运动,又称“英式台球、落袋台球”),即使是规范词典也应收录。

词,体现的就是学理。学理导向是语言文字应用导向的重要形式和基础。

汉语交际中出现的英文字母词,本质上属于语码混用。不能仅仅根据其在汉语交际中出现,就将其“收编”为汉语词汇的成分。这种“收编”只会“鼓励”语码混用,无益于汉语的健康发展,也无益于促进交际。尽管英文字母词在交际中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学理上不承认其具有汉语的身份,英文字母词的使用就必然有所顾忌,也必然受到社会的制约,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英文字母词的泛滥。

因此,必须加强语言文字本体意义上的外来词规范的研究,为外来词规范化工作提供学理基础,提供决策依据。

二、外来词汉化与外来词规范化

外来词的汉化不等于外来词规范化,汉化的外来词也不等于规范的外来词。例如意译词“互联网”、“互连网”毫无疑问都是汉化的,但有词形歧异,歧异形式并无语用差别,因此需要加以规范。音译词只要有明确的意义和明确的汉语语音结构形式,也就是汉化的外来词,因此“因特网”和“英特网”都是汉化的音译外来词。但是,“因特网”和“英特网”之间的词形歧异,并无语用表达上的差别,就应加以规范,减少歧异,这是有利于提高交际效率的。

词汇规范化有不同层次、不同语域用途的标准,因此,即使是汉化的外来词,从基于语域特点的规范标准方面考虑,不一定就是规范的外来词。“伊妹儿”是汉化的外来词,但“俗称”的特点决定了其使用上的局限性。当然不能说只有“电子邮件”才是规范的,“伊妹儿”不是规范的,但是如果基于语域的考虑,就必须明确语用范围,使之各尽其用。在明确的语用范围内各尽其用,也是一种规范。

外来词汉化不等于外来词规范化,但是外来词的汉化是外来词规范化的基础。例如汉语交际中出现的英文字母词,在尚未通过汉字音译等形式使之汉化前,就谈不上汉语词汇基础上的规范化。从汉语的

词汇系统看问题,字母词只有汉化为汉语成分后,才有规范化的起点或基础。

从语言文字本体的层面看外来词规范化工作,首先应研究外来词的汉化,包括语音的汉化、语义的汉化、语法形式的汉化以及书面词形的汉化。要根据语言文字本体的规律、特点,分析外来词汉化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形式,评价外来词的汉化程度,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考虑外来词的规范化。

外来词规范化在语言文字本体意义上的学理基础是外来词的汉化规律和汉化特点,学理并不一定就能决定外来词的规范标准,因为习性原则往往与理性原则不一致,理性原则也不一定能压倒习性原则。但是,没有学理基础,外来词规范化的标准就更加难以真正建立起来。没有基于学理基础的科学认识,评价就没有标准,就不免主观、随意或僵硬、教条,抉择也就难以做到科学、理性。不讲学理的规范化研究是危险的,因为其特点是有很大的任意性,使研究流于俗见和大众化。基于学理的规范化研究即使不那么完美,即使有缺点、有失误,但毕竟可以在“试错”(trial and error)中不断逼近科学真理。不讲学理的规范化,最终的结果是使规范“化”了(化解了规范),规范根本无从谈起。

第二节 外来词的汉化与汉化的外来词

一、外来词的汉化

高名凯、刘正琰(1958)讨论了创造外来词的一般原则以及外来词语音上的创造方式(如语音对应规律的分析)、词汇上的创造方式(外来词与外语原词的语义范围比较、“音义兼顾”的外来词创造法、文字意指指明词义类属、“半音半义”地译借)、语法上的创造方式(构词成分的对应、音译附加汉语构词成分构成复合词、音译或“音义兼顾”的形式再加

汉语的构词成分)。这些“创造外来词”的方式,既是汉语吸收外来词的方式,也是外来词的汉化方式。史有为(2000, 192—195 页)从语言文字的特点看外来词的走向,讨论了涉及外来词走向的语言因素、文字因素以及汉语“单语素构成和复合构成占有更大的优势”对汉语吸收外来词的影响(“这是意译词以及日语汉字词大行其道的深层原因之一”)。所谓“外来词的走向”其实谈的也是外来词汉化。

必须指出,高名凯、刘正琰(1958)采用“创造外来词的方式”的说法是十分科学的,因为如果把外来词看作汉语中源自外语词的语词,外来词是相对于外语词而言的,是汉语的成分,因此只能说“创造外来词的方式”,而不宜说“外来词的汉化”。尽管作为汉语语词成分的“外来词”也有进一步汉化的问题(如结构、意义等方面的汉化)。但是,如果说外来词是汉语的词汇成分,就必然具备汉语语词的性质、特点(有确定的汉语语音形式和确定的意义),就已经是汉语的成分,因此不宜笼统地说“外来词的汉化”。不过,出于方便,一般也可以说“外来词的汉化”或“汉化的外来词”,其中的“外来词”是“外来的词语”的意思(并不就已是汉语的成分)。类此,“汉语吸收外来词”之类的说法也是十分通俗、方便、普遍的。如果仅仅把“外来词”看作源自外语语词的汉语词语,这样的说法也就不能成立了。

从语言文字本体的角度看外来词的汉化,涉及的因素非常复杂。

从语音方面来说,按照语音对应规律译借外语词,是把外语词从语音上汉化为外来词的重要方式,但不同语言的语音系统不同,语音对应规律往往是捉襟见肘的,因此有时必须根据汉语的语音系统,采取汉译法(见本章第三节),把外语词变成汉语中的外来词。这种方式往往超出了谐音的语音对应范围。

从语义方面来说,外来词作为外来的词汇成分,往往与汉语原有语词成分形成竞争,其结果或者是外来词的词义范围、语义色彩与外语原词有异,或者导致汉语词汇语义系统作出调整。意译的过程自然是汉

化的过程,但意译并不等于就是汉化。意译的词语往往也需要在语用中逐渐适应汉语的语义系统和社会文化的语境,需要在语用中逐渐完成汉化的过程,如“性感、广场(plaza的音译)”正在当今社会的语用中逐渐改变人们对这两个词原有词义的理解。

从语法方面来说,仿译形成的外来词结构可能是汉语中既有的,也可能是汉语原来所没有的。在仿译过程中,把与汉语既有结构不同的外语词结构变成汉语的既有结构,就完成了外来词的汉化过程。但是,也有一些仿译词的结构保留了与汉语既有结构不同的外语词结构,这就使汉语词语结构系统中出现种种“异类”(如“雅虎中国”之类),甚至导致汉语的结构系统发生变异,也就是产生新的词语结构形式。外来词导致汉语产生新的词语结构的过程,也是汉化的过程,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汉化过程(即转变为汉语既有的结构),而是给汉语带来了新的结构形式。新的外来词语结构形式被汉语社会接受的过程,是外来词“汉化”的另一种表现。

研究外来词的汉化,既是语言文字本体意义上的外来词研究所应有的内容,也是“通过外来词的研究阐明语言词汇发展的规律性,说明词汇中发生的现象及其原因,揭示个别词语的历史、语言的历史和人民的历史三者之间的关系”^①的需要。

二、汉化的外来词

张永言(1982, 96页)按照外来词在汉语中的同化程度把外来词分为两类:

(1) 完全的同化词,即在音节构造、词形方面已经完全符合借方的语文规范的外来词。这些词一般人已经把它们当作本语言固有的词而不觉得是外来的了。其中有些词甚至进入了语言的基本词汇,可以用

^① 张永言(1982, 94页)。

来构成新的复合词或派生词了。例如：狮(子)、葡萄、苜蓿、菠(菜)、玻璃、菩萨、尼(姑)、佛、塔、劫、魔、幽默、逻辑。

(2) 未完全同化的外来词，即在音节构造、词形方面带着明显的外语特点、面貌还很不像本语言的词的那些外来词。例如：塞颇胝迦或颇黎、壁琉璃或吠瑠璃、菩提萨埵、苾刍尼或比丘尼、浮屠或佛陀、窣堵波、劫波、魔罗、奥伏赫变、布尔乔亚、普罗列塔利亚、歇斯底里、阿司匹林、卡路里、卡通、拷贝、蒙太奇、布尔什维克、康拜因、喀秋莎、布拉吉。

张著还指出，“外来词同化程度的不同决定于借用时间的长短，常用性的大小，是通过口头还是书面传入的”。

汉化的基本标志是有确定的汉语语音结构和确定的意义，在书面上，凡是有确定的汉字书写形式(或记录了汉语音节结构成分的汉语拼音形式)和确定的意义的外来词，其实都是汉化的外来词。但是，联系汉语汉字本身的特点和社会因素来看，外来词的汉化程度既涉及语言文字的本体因素，又涉及语词的社会使用，情况十分复杂。

汉化的外来词既要具备汉语的语音结构，又要符合汉语的词形特点要求(如音节数量不能过多，这是从认知要求方面来讲的；单音节外语词在汉语中往往要变成复音节词，这是从汉语语词双音节化的倾向来讲的)，更要表义明确。而表义是否明确，既与词面形式有关(如字面上是否有意义，字面意义是否跟词的实际意义有关，字面意义是否对词义的理解有“导引”作用，字面意义有无不良用意，音译用字是否确定，是否易读易写的常用字，有无异读，等等)，又与内部结构(意译词是否符合汉语词的结构特点)有关，还与语义是否适合基于汉语文化背景的理解有关。此外，语言使用者的文化程度、语言知识、社会历史知识以及外来词社会使用的普遍性都对外来词的汉化程度有决定性的影响。

综上所述，外来词的汉化方式和汉化特征还需要进一步细致分析。

第三节 语音汉化

语音汉化包括音节数量的简化或繁化,以及音素及音节结构的汉语化。

一、音节数量的汉化

1. 音节数量的简化。

音节数量的简化作为汉化的手段,主要指音译多音节外语词时只选取部分音节,也就是节译,或全音译后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经济、简便”的需要选取其中的一、二个音节独立成词或作为构词成分与汉语成分组合成新词。音译词音节数量的简化是音译词在汉语中“扎根”的重要方式,也可以创造新的语素,乃至新的单义词(单音节自由语素)。把音译词音节数量的简化看作音译词的汉化,主要原因是:

① 音节数量过多的音译词与汉语中词的一般形式不合。

汉语中词的音节数量一般不超过三个音节,其中双音节词和单音节词占大多数。四个音节以上的词汇单位,主要是成语等熟语性质的单位。音译外来词如果音节数量太多,在交际中使用频率又很高,就会被缩减为两到三个音节,甚至简化为一个音节。同时,音译词中的音节符号是纯粹的音节符号,一连串没有意义的音节组合很不符合汉语汉字的习惯,不便称说,也不便理解,语义认知的习惯促使音节数量过多的音译词削减音节数量,缩短词形。

② 适应构词的需要。

由于汉语词的音节数量大都不超过三个音节(类乎词的单位固定词组,音节可以达四个音节),所以音译的外来成分如果参与构造新词,必须缩短形式,减少音节数量。

音译词缩短词形以符合构词需要,在音译成分作为构词成分参与

组合的合成词中,其理解要通过还原到原词语的形式,如“大巴”,要理解“巴”是什么意思,必须把“巴”还原为“巴士”。这就加强了“巴士”在汉语中的基础性。所以,多音节音译词减少音节数量以便参与构词,有利于音译词在汉语中的“扎根”。

多音节音译词简化音节而形成的单音节音译成分参与构词,不仅有助于加强所由减缩的多音节音译词在汉语中的基础性,也可以使单音节音译成分的语素化程度得到提高,由粘着语素(bound morpheme, 标记为 B)转化为自由语素(free morpheme, 标记为 F),促使单音节音译词的产生。

苏新春(2003)指出,单音节外来成分在构词中的复现率是一个语素形成的重要指标。就语素化的过程来看,外来音译成分在词结构的作用下,可以表达意义或区别意义,就已实现了语素化,^①但在构词中的重复使用,有助于单音节外来音译成分“自由化”,也就是由粘着语素转化为自由语素,独立成词。倘若不在构词中重复使用,就始终只是粘着语素,如“菠菜”之“菠”、“苹果”之“苹”,很难进一步独立成词。

一般而言,外来复音节语素简化成单音节后,首先是参与构词,在词结构中,单音节音译成分首先作为词结构中的“剩余成分”,语义表达有赖于原来的复音节音译词,或借助于词结构起表义、别义作用。在词结构的作用下,单音节音译成分的语素化程度逐渐提高,其形式表现为词结构的离子化,^②逐渐形成介于复合词和词组之间的结构(也可能最初就是离子化的形式)。随着结构离子化的程度提高,单音节音译成分的语素化程度也逐渐提高,最后就能独立成词,其结构形式的变化表现为 FB 或 BF→FF。这个过程的界限并不很清晰,因为汉语中语素的粘着与自由的界限原本就不是很清晰的。^③

① 参杨锡彭(2003, 45—50 页)。

② “离子化”指词结构的有限扩展。参赵元任(1979, 200 页)。

③ 参杨锡彭(2003c)第六章第三节。

把音译外来词音节数量的简化看作汉化,并不意味着音节数量繁多的音译外来词就不是汉化的。诸如“布尔什维克、斯堪的那维亚、布宜诺斯艾利斯”之类音节数量繁多的音译词,也是汉化的音译词,其特征是具有确定的汉语语音结构形式、确定的书写形式和确定的意义。

把音节数量的简化看作汉化手段,主要是就汉语吸收外来词的“倾向”和汉语中词的一般形式而言。音译词音节数量繁多与汉语汉字的认知习惯不合,汉语中绝大多数词的音节数量在三个音节以内,音译词音节数量的简化有利于使用,有利于作为构词成分构造新词,有利于增强成词功能。从这些方面看,音节数量简化的音译外来词更符合汉语词的一般形式,更容易褪去外来色彩,与汉语的词语打成一片。

2. 音节数量的繁化。

印欧语的大多数语词都是多音节的,多音节的印欧语语词全音译到汉语中,也是多音节的。多音节音译词不符合汉语词形的一般特点。因此讨论外语词的语音汉化的,大都提及音译外来词音节数量的削减。但是,印欧语也有单音节词,单音节词到了汉语中往往变成双音节的,如英语的 *gene*[dʒi:n] 在音译中被分化为两个音节“基因”。这是与音节数量的简化方向相反的音节繁化。人名 *Beulah*(比尤拉),其中的 *Beu*[bjʊ:], 汉化为 *bǐ* 和 *yóu* 两个音节,也是汉读法形成的音节数量的繁化。

音节数量的简化是外来词语音汉化的表现,音节数量的繁化同样是外来词语音汉化的表现。

二、音素、音素组合及音节结构的汉化的

1. 语音对应法和汉读法。

不同语言的语音系统是不一样的。因此,音译实际上都有个语音上的“折合”或对应。音译的主要方法是“语音对应法”,即根据语音对应规律进行谐音音译。

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因此在对外语词的音译过程中,一般不考虑声调的不同。此外,汉语中除了少数轻声音节以外,词重音一般不起区别词义的作用,因此外语词的词重音在汉语音译中一般也不予考虑。从语音对应规律看语音的汉化,主要是把外语词的音素或音素组合用汉语的音素或音素组合加以折合或对应,也就是说只是外语词的音段单位在汉语音译过程中的处理。其中有不同的情况。

有的外语中的音素,汉语也有,但是汉语中这样的音素不能自成音节,无法用汉字标记,因此需要采用发音相似的音节与之对应,如用自成音节的 a 音节字或 ai 音节字来标记[æ](如“Abigail, 阿比盖尔; Atherton, 阿瑟顿/艾瑟顿”);有的外语中的音素是汉语所没有的(如[ɔ]、[ɔː]),需要用与之近似的音节字来记录,例如“奥斯卡(Oscar)、奥尔登(Alden)”中的 ao 音节字;有的外语中的音素组合是汉语中所没有的,需要用近似的汉语音素的组合来表示,如用 ji 音节字标记[ki](Kidd, 基德);或重新划分音节界线,以求得译名与外语原名的语音相似,如 Sophia[sə'faɪə]中的[faɪə]在汉译中被分解为 fei 和 ya 两个音节——索菲娅。

汉语音译外语词,除了语音对应法以外,还经常采用“汉读法”,也就是把外文字母改换为汉语拼音字母的读音读,并转化为汉语的音节形式,尤其是结合外语词音节的切分和汉语译名的音节表达,而不管外文字母在原文里是否独立记录了语音,也不管外文字母在原文里读什么音。Troy 的译名为“特罗伊”,在音译中,Tro-被切分为 T-和 ro 两个部分,并分别汉化为 tè 和 luó 两个音节。

“语音对应法”和“汉读法”都是把外来词语音汉化的手段,两种方法是互相补充的,也各有利弊。

一般来说,音译者都倾向于采用尽量谐音的语音对应法音译,因为译名比较接近外语原词的语音形式。但是,不同语言的语音系统不同,语音对应也只是个程度问题,所谓谐音或语音对应,其实最多也就是相

似而已。深究起来,即使“相似”,也往往差得很远。Greenwich 过去在中国大陆通行的译名是“格林威治”,“汉读法”把 Greenwich 中不发音的字母 w 按照汉语的零声母 w_音节字来读,即把 wi 汉化为“威”这个音节(有人说这是误译,“误译”之说恐怕是误解);现在通行的译名是“格林尼治”,采用的是语音对应法,尽量谐音。似乎语音对应法比汉读法更好。其实就“格林尼治”与 Greenwich 的语音对应程度来说,也是很有限的。倘若把“格林尼治”说给不懂汉语的英美人听,能从“格林尼治”的读音联想到 Greenwich 的人恐怕寥寥无几。当年我去韩国之初,在庆州市大街上用不标准的韩国话问路找“化妆室”(即“厕所”),韩国话“室”的末尾卷舌音缀没有说出来,就这么一点点差异,当地人硬是听不懂。相比而言,“格林尼治”和 Greenwich 的语音差异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

再举一个例子。汉语中有少数音译的日源外来词,与日语原词语音形式上比较对应,读音非常相似,似乎比较容易还原为日语原词。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曾对短期修学的初级班日本学生进行过测试,尽管“榻榻米”或“榻榻米”作为たたみの音译,语音十分相似,但因“榻榻米”或“榻榻米”的音节高低变化与たたみの“音调型”有差异,日本学生竟然也很难把“榻榻米”或“榻榻米”联系起来并且还原为たたみ。在预先说明是日语词的汉语音译的前提下,10 多个学生中也仅有个别人能把“奥巴桑”还原为おばさん(对母亲辈妇女的尊称),却无法还原为おばあさん(对祖母辈老年妇女的尊称),因为日语中おばあさん和おばさん有长短音的对立,但用汉字记写为“奥巴桑”,“巴”字的读音体现不出おばあさん中的长音ばあ。

其实,即使是说日语,一个词的读音,即使音段的读音是准确的,只要音调型不对,日本人都一定不能听懂。说汉语也一样,一个词的读音,即使音段组合形式是正确的,但只要声调不对,就未必能听懂。曾经在报上读过一篇文章,说篮球运动员姚明在美国名气很大。在上海,一位美国人上了出租车后,兴奋得不断喊“要命”。司机很纳闷,直到最

后顺着美国人的示意看过去,看到路旁不断闪过的广告牌上的巨幅姚明像,才明白“要命”其实是“姚明”的讹读。^①

这些实例都说明,不同语言的语音差异是很大的。因此,音译中的所谓谐音或者语音对应虽然是有一定规律的,但就语音上的相同或相似来说,实在只是“马马虎虎”的事。

有的译名,似乎是谐音音译,但是使人很难理解其语音理据。例如“贾尔斯”作为 Giles[dʒailz]的译名,在语音上比较对应,而译为“詹理斯”,把 Giles 切分为 Gi、le、s 三段,分别以“詹、理、斯”对应,其中用“詹”译 Gi[dʒai]的理据就很难理解,似乎只是抓住一点(把[dʒ]与汉语的 zhan 联系起来),不及其余。当然可能与方言口音的音译有关,例如北京话的 an 韵母字在北部吴语(如苏州话)中读作[E]韵母字,北京话的 ai 韵母字、uai 韵母字在苏州话中也有一部分[E]韵母字与之对应。^②由此可以看出用“詹”译 Gi[dʒai]的语音理据。但汉语方言之复杂,要找到语音理据的确切所在,实在不是一件易事。

有时虽然知道某一译名与某一方言语音有联系,但要确指,又有什么依据说某个译名就是某一方言口音的音译产物呢?更何况方言内部也是有语音分歧的,说某种读音是某种方言的口音,但一个大方言中各个地点方言的读音并不相同;某种语音特征也并不是某一地点方言所特有的,而是几个地点方言口音所共有的(例如苏州话、上海话中的[E]韵母字都与北京话 an 韵母字之对应)。除非找到这个译名的最早出处,确认了译者的方言背景。但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③

因此,根据语音对应规律进行音译,用以音译的语音系统应是共同语的语音系统。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译名已经约定俗成,只能保留,但新

① 新华网 2007 年 1 月 9 日“体育频道·篮球特区”也有报道:“吃不准汉语发音的美国人,在模仿中国人呼喊姚明时,听上去像喊‘要命’”。

② 袁家骅等(1989, 73 页)。

③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词库建设通讯》建立了“汉语外来概念词库”;黄河清(1996)建议建立“词汇年表”并且做了尝试,很有价值,可惜这一工作因该刊 2002 年停刊而中断了。

的译名一定要以共同语的语音系统为基准。音素、音素组合及音节结构的汉化基础应是普通话的语音系统。

语音对应法译成的音译词与外语原词有语音相似的关系,但做到仅仅相似的语音对应也不那么容易。不同语言的语音系统是不同的,因此在实际音译的过程中,语音对应法总有捉襟见肘之处,所以需要汉读法来弥补。例如[dr-]这样的辅音,采用语音对应法是有困难的,比较适宜采用汉读法。从音译实例来看,一般都是如此。(见下一小节)

[tr-]的音译既可以采用语音对应法,也可以采用“汉读法”。例如 Patrick 译成“帕特里克”,采用的是汉读法,而把其中的 tri 译成汉语的 qu 音节(派屈克),采用的是尽量谐音的语音对应法。但是,诸如 Strong、Strachey、Strauss、Trench 之类的姓名就很难采取语音对应法来音译,而采用汉读法译为“斯特朗、斯特雷奇、斯特劳斯、特伦奇”,则很方便。地名如利比亚首都 Tripoli([ˈtrɪlɪpəli])的译名“的黎波里”也是如此形成的。

英国地名“伯明翰”所译原词是 Birmingham,读作[ˈbɜːmɪŋəm],其中的字母 h 是不发音的。采取“汉读法”译成的“伯明翰”,是将 Birmingham 切分成 Bir/ming/ham 三个段落,把其中不发音的字母 h 变成了汉语的声母 h,并与其后的 am 拼合,进而汉化成 hàn 音节(翰)。这样处理,自然比谐音的语音对应法更为方便。

但是汉读法也有弊病,除了语音“失真”以外,有时还画蛇添足,把外语原词中不具有读音的字母也音译出来,毫无必要地增添了音节。

尽管有种种缺点,汉读法仍是汉语音译外来词的重要方法。不了解汉读法,就不了解许多译名产生的原因,就不了解译名歧异的由来。例如人名 Matthew 的译名,既有“马休”,又有“马太”。前者语音比较对应,容易找到音译的理据,后者则很难找到语音对应关系。究其原因,在于前者以汉语的声母 x 对应英语的 th[θ]而形成译名“休”(xiū),

采用的是语音对应法;后者把 $th[\theta]$ 变成汉语的声母 t , 并汉化为“太”音节, 采取的是汉读法。^①

用汉语的声母 t 来译英语的 $th[\theta]$, 有一个典型例子, 这就是往往使人大惑不解的译名“雅典”。“雅典”是 $Athens[{}^l\text{æ}\theta\text{ins}]$ 的译名, “典”这个音译音节的形成, 就是用汉语的 t 声母字音译 $-then(s)$ 的结果。当然, 其中也有方言口音的色彩和缘故。

2. 应着眼于音节结构的切分。

高名凯、刘正琰(1958)、齐冲(2006)等对现代汉语音译外来词的对音规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汉语音译外来词的音读符号是汉字, 汉字在语音形式上与音节对应。因此用汉字作为音译符号使用时, 实际上是用一个个的整体音节符号切分外语词。从汉化的角度看, 音译中最主要的是要考虑如何用汉语的音节切分外语词的音节结构。因为从语音对应规律来看, 对应的音素在各自与其他音素组合以后, 可能变得不对应了。例如英语的 $[h]$, 从语音对应关系来看, 汉语的声母 h 与之最为对应, 但是在 $Hubert$ 、 $Hilton$ 、 $Hill$ (均为人名)的汉语音译中, 却要用声母 x 来对应其中的 H (休伯特、希尔顿、希尔), 因为汉语普通话中没有 $[hju:]$ 、 $[hi]$ 这样的音段形式。因此, 从汉语音节切分英语词的语音结构来看, 最重要的是要考虑音节的对应。

对于英语的音节, 有不同角度的分析。从发音语音学或声学语音学的角度看, 音节是发音器官肌肉一个张弛周期的结果。从音位学的角度看, 所谓音节是语言中由一组音位构成的最小的语音使用单位。^② 这个“最小的语音使用单位”, 其实是包含了形态在内的最小的有意义

① 采用汉读法把 $-tthew$ 译成“太”音节, 也与方言“太”的读音有关。英语 $th[\theta]$ 的汉读法音译也可能与误读有关。在英语等语言的语词书写中, 字母 h 每每有不发音的情况(例如人名 $Chatham[{}^t\text{t}\text{æ}\text{t}\text{əm}]$), 因此就会产生把 th 读作 t 的误读。此外, $[\theta]$ 是许多语言中没有的辅音, 因此常被改换为其他的音素。例如印度口音的英语就以把 $[\theta]$ 念作 $[d]$ 为常。

② 何善芬(2002, 24页)。

的语言单位的语音形式。从音位学的角度看,英语的音节结构有四种基本类型,即:①V。②CV。③VC。④CVC。这四种类型可以扩展成不同的音节结构。在扩展的音节结构中,一个音位学意义上的音节可能包含几个发音语音学意义上的音节。例如 fresh 从音位学的角度看是 CCVC 结构的一个音节,从发音语音学看, fresh 则包含了三个音节,也就是说在 fresh 的发音过程中发音器官的肌肉有三个张弛周期。从音位学角度看, meats 是 CVCC 结构的一个音节,从发音语音学角度看, meats 却是发音器官肌肉两个张弛周期的结果,也就是两个音节。

汉语的音节与英语的音节结构有很大不同,汉语固有的最小的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绝大多数在发音语音学上都是一个音节(联绵词、拟音词是例外),并且没有表示不同语法意义的形态变化。因此汉语中音位学意义上的音节与发音语音学意义上的音节是一致的。在汉语的书面书写形式上,一个汉字所对应的语音形式也是发音语言学意义上的一个音节。因此,在汉语音译外来词的过程中,所谓音节对应主要应是指发音语音学意义上的音节对应。

从音译中音节对应的实例来看,有各种复杂的情况:

① 外语词一个音节可能被分化为两个音节,这是汉化的需要。

例如:

Boone[bu:n]在汉语音译中被分化为 bu 和 en 两个音节——布恩。

Jim[dʒim]的译名分化为 ji 和 mu 两个音节——吉姆。

② 同一个语音组合,独立成“名”时,往往要分化为两个音节:Queen→奎因;而在多音节人名中,为了减少音节数量,常常处理成一个音节,如:Queensberry→昆斯伯里。这也是适应汉语词形特点的汉化需要。

③ 外语词的一个辅音往往在汉化中成为一个独立的音节,因为汉语的每个音节都有元音,辅音一般不自成音节。①例如:

① 也有把鼻辅音 n 看作独立音节的,如“n、ń、ň、ñ”。

Cram(克拉姆),词首的辅音 C([k])汉化为一个独立的音节。

Johns(约翰斯),词末的音缀-s 在音译中独立成为一个音节。

Bancroft(班克罗夫特),-t 在汉化中独立自成一个音节。

④ 外语词的书写形式中不单独发音的字母,也就是实际上不独立记录语音成分的字母,在汉译时可以采取汉读法处理成一个音节或一个音素。

[dr-]这个音素在音译中难以采用语音对应的方法处理,所以一般都是采用汉读法来音译。“德累斯顿”([¹drezdən])是 Dresden 的音译,Dresden 读音中的[dr-]在汉语中分别按照字母 d 的汉语读音变成 dé 音节,把字母 r 转化为汉语的 l 声母,所以就形成了“德累斯顿”中“德”和“累”两个音节。

[tr-]在音译中大都被用两个汉语音节或音素所切分,英语字母 t 汉化为 te 音节,英语字母 r 转化为汉语的 l 声母,例如:

Trevelyan, 特里维廉; Beatrice, 比阿特丽斯; Partridge, 帕特里奇; Trollop, 特罗洛普; Troy, 特洛伊; Truddy, 特鲁迪; Trent, 特伦特; Trench, 特伦奇

Zenger, 读作[¹zeŋə],在音译中根据原文的字母书写形式,平添了一个 g 声母字,形成译名“曾格”。Lange[¹læŋə]的译名“兰格”和 Langland[¹læŋələnd]的译名“兰格兰”,都在音译中根据原文的字母书写形式平添了 g 声母字。

⑤ 外语词的语音结构段落被重新划分,改变音节界限,以应用汉字切分的需要。

Los Angeles 的汉语译名是“洛杉矶”,汉字(实际上也就是汉语的音节)把英语原词的音节结构重新划分界线,形成 Lo/san/ge/(les),分别用“洛、杉、矶”记写(省略了词尾的 les)。

Los Alamos,如果按照原词语音的实际结构音译,有“洛斯阿拉莫斯”的译名;按照口语中的连读,则有“洛萨拉莫斯”的译名。目前这两

个译名都在报刊上出现。

⑥ 一音两用。例如 Anita[ə'ni:tə](安妮塔), [ə]为词首的次音节,并不与其后的 n 相拼。汉译改变原词的音节界线,把其中的 n 一音两用,也就是用 [ə] 与其后的 [n] 拼合为 [ən], 并且汉化为 an 音节字,再用 [n] 与其后的元音相拼,组合成音段 [ni], 并且汉化为 ni 音节,于是就有了“安妮塔”的译名。类似的还有:

Manuel['mænjuəl]→[mæn](曼)+[njue](纽)+[-l](尔):曼纽尔

Mayer(s)['meiə(z)]→[mei](梅)+[iə](耶)+[z](斯):梅耶(斯)

Jean(n)ette[dʒi'net]→[dʒin](珍)+[ne](尼)+[t](特):珍妮特

Tennyson['tenisn]→['ten](坦)+[ni](尼)+[sn](森):坦尼森

Annette[ə'net]→[ən](安)+[ne](妮)+[t](特):安妮特

Fanny['fæni]→[fæn](范)+[ni](妮):范妮

Penny['peni]→[pen](彭)+[ni](妮):彭妮

Cumming(s)['kʌmiŋ(z)], [m]后属,译成“卡明(斯)”,如果根据原词的字母书写形式,把 Cumming(s)切分为 Cum/ming/(s),则有“坎明(斯)”或“康明(斯)”等形式,也是一音两用。

这类音译词的形成,与外语词文字书写形式很有关系。如果外语词中有两个辅音字母连续出现,即使两个字母只代表一个音(在发音中,这样的辅音对前后两个音段也是有实际影响的),在音译中大多采取一音两用,既把这个辅音作为前一音节的韵尾,又作为后一音段开头的声母,如 Annette 译为“安妮特”、Fanny 译为“范妮”、Penny 译为“彭妮”、Tennyson 译为“坦尼森”。

⑦ 相同的读音因韵律的原因汉化成不同的音节。例如:Dent(登特)和 Denton(丹顿)其中的 Den-都读[dən], 但一个汉化为 deng 音节(登),一个汉化为 dan 音节(丹)。Denton(丹顿)中的 Den-不采用 deng 的音段形式,显然是为了避免与其后的 ton 的汉化音节 dun 连用而造成韵律上的不协调。

⑧ 同一个音,组成不同的音节后,需要用不同的汉语音素来对应,例如英语的塞擦音[dʒ],汉语中的声母j与之较为对应,但[dʒ]组成的不同音节,在音译中需要以不同的辅音声母来与之对应。例如:

Lodge/洛奇、Madge/马奇、Jeans/琼斯、Georgia/乔安娜、Jordan/乔丹、Jude/裘德、George/乔治、Georgina/乔治娜——与[dʒ]对应的汉语声母是q。

Giauque/吉奥克、Geoffrey/杰弗里、Giles/贾尔斯、Gerald/杰拉尔德、Justin/贾斯廷——与[dʒ]对应的汉语声母是j。

Jennifer/詹妮弗、James/詹姆斯、Jeanne/珍尼、Jewett/朱厄特、Julian/朱利安、Juliet/朱丽叶——与[dʒ]对应的汉语声母是zh。

Joseph/约瑟夫、Josephine/约瑟芬、Johnny/约翰尼、Johns/约翰斯、Jacob/雅各布——与[dʒ]对应的是零声母y_音节字。

因此,从汉化的角度看,也就是从音译中如何用汉语的音节处理外语语词的语音结构看,音素或音节结构的汉化很值得研究。

汉语可供音译的音节只有430多个(不考虑声调的区别)。本书附录对汉语音译英语的音节结构处理原则进行了分析,所揭示的音译基本原则和方法与目前音译的实际通例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具有较大的普遍性。

三、语音汉化不是“洋泾浜”

对于外来词的语音汉化,尤其是采取汉读法形成的音译译名,很容易被误解为“洋泾浜”(Pidgin)。其实,用本民族的语音系统同化外语词的语音,是把外语词同化为本民族语言成分的需要,是各种语言接受外来词的一般通例,因此,不能把语音汉化的外来词与外语原词语音上的差异以及采用汉读法音译而成的外来词看作“洋泾浜”,因为作为汉语中的外来词,必须具备汉语的语音结构的读音,而不是按照外语词的读音来读。

例如把 Troy 译为“特罗伊”，就不是什么“洋泾浜”。“特罗伊”源自对英语 Troy 的音译，但每个音节的结构都是汉语的，正因如此，“特罗伊”才能成为汉语中的外来词。如果按照 Troy 的英语语音读，就只是在说汉语时夹杂着英语词。

第四节 语义汉化

一、词义和附加色彩的变化

外来词与外语原词的意义（包括附加色彩）相比，往往有一些差异。吸收外来词是为了汉语所用，外来词是因应汉语的语用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可以把外来词与外语原词在意义上、附加色彩上的差别看作外来词语义汉化所致。

1. 词义缩减。

词义的缩减大都是在借词过程中产生的。最常见的情况是一个外来词只记录了某个外语词多个义项中的一个义项，例如 humour 音译到汉语中形成的译名“幽默”，只有“有趣或可笑而意味深长”这样一个义项，humour 的其他义项，如“脾性、情绪、心绪；（动物）体液、（植物）的汁液；古怪的念头”等，音译词“幽默”都不具备。“蔻”是英文 cute 的音译，cute 的原义既有“聪明伶俐的、漂亮的”这样的褒义义项，也有“装腔作势的、做作的”这样的贬义义项；“蔻”则多指年轻女孩的聪明、漂亮、出众。

外来词比外语原词的语义范围小，主要原因在于外来词是在具体语境里对某个外语词的翻译中产生的，所译借的外语原词是具体语境中的语词，具体语境中外语原词的意义不可能是该词的全部意义，^①因此，不管是音译还是意译所形成的外来词，词义范围一般都比外语原词小；除非外语原词是单义词，译借单义外语词所形成的外来词，语义范

① 参张旭（1995）。

围才会跟外语原词一致。

有的外来词具有外语原词多个义项中的两个以上的义项乃至全部义项,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义项的吸纳不可能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多次引介的结果。因为外来词是在具体语言活动中通过翻译吸收进来的,而不是一次性地通过翻译外语词典中的某个词的全部意义而借入的。一般而言,需要把外语词的全部义项都引进的情况是比较少的。因此,外来词比外语原词的意义范围小,是外来词词义汉化的基本特点之一。外来词义项的多少取决于汉语交际的需要,以为我所用为据,有所选择,这正是外来词语义汉化的表现形式之一。

在语境中译借词语造成外来词词义缩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某个义项上的所指范围的缩小。例如汉语的“卡车”是英语 car 的译借,英语的 car 可泛指任何 motor-car 或 tran-car,汉语中的“卡车”专指用于运输货物的载重汽车。汉语的“卡(车)”语义所指范围比英语的 car 语义范围小。^①

2. 词义扩大。

有的外来词比外语原词的语义范围大,表现为外来词某个义项比外语原词同一义项的所指范围大,或者增加了外语原词所没有的义项。

① 义项所指范围的扩大。

有的外来词在某个义项上的所指范围比外语原词大,如英语的 sofa 只指一种长的、可以坐几个人的“沙发”,而在汉语里单人坐的“沙发”也叫“沙发”。^②这样的语义差异大概在译借过程中产生的。沙发与中国传统坐具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沙发是一种装有弹簧的软坐具;至于长的、短的或单人坐的、多人坐的,并不是本质区别,想必不会在意。在汉语中一般把几个人坐的沙发叫做“长沙发”,而单人坐的沙发

① 孟伟根(1996)。

② 张永言(1982, 97 页)。

往往叫做“小沙发”(大都是在对比着说的情况下如此表达)。从对“沙发”的这一理解来看,把“沙发”与 sofa 所指范围的差异看作译借过程中发生的差异,应是可以理解的。

② 增加新义项。

外来词义项的增加,往往是通过一个义项所指范围的扩大而产生的。

有的外来词在某个义项上的所指范围比外语原词大,是在汉语的交际中通过构造新的词语而逐渐扩大所指范围的。例如英语中“酒吧”义的 bar,汉语音译为“吧”,最初也专指“酒吧”,但是随着“陶吧、网吧、水吧、茶吧、氧吧”等新词语的出现,“吧”就不再专指“酒吧”了,“吧”也用以泛指“从事各种休闲活动的小型场所”,这就增加了义项。

有的外来词在某个义项上的所指范围比外语原词大,是在借指或引申中发生的语义变化。例如“紧张”是来自日语的形译词,日语原词“紧张”仅有“精神兴奋不安”、“激烈或紧迫,使人紧张(如‘工作紧张’)”义,都与人的精神紧张有关。在汉语的语用中,“紧张”衍生出“供应不足”义(电力紧张、供应紧张)。^①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语中,“紧张”都没有这个意义。此外,“低调”的“不张扬”义也是在汉语的语用中引申出来的。日语原词“低调”只有“音调低”、“不热烈、不活泼”、“水平(质量)低”这样一些意义。

英语 model 在汉语中的音译词“模特儿”也在语用中产生了词义引申现象,衍生出新的义项。汉语中的“模特儿”除了用来指英语的 model 所指的“雕塑家和画家所用的人体模特”以及“时装模特儿”外,还可以指商店内陈列服装用的人体模型,表达后一意义的英语词是 manequin,而不是 model。^②这就增加了义项。外来词的词义引申和所

① 日语表达这个意义的词语是“手詰まる”。

② 孟伟根(1996)。按:英语的 manequin 还有“时装模特儿”义。

指范围的扩大,是外来词增加新义项的重要方式。

3. 引义独立成词。

所谓引义,指的是引申外语词的意义或引借外语词的意义。

① 引申外语原词的词义产生新词。

例如“劫”是梵语 kalpa 的音译(“劫波、劫簸、劫跛”)的简缩, kalpa 原义是“极久远的时节”。根据古代印度神话,梵天的一个白天是一个“劫”,等于人间的四十三亿二千万年(一说四百三十二万年)。“劫”后有“劫火”出现,烧毁一切,然后又重创一切。^①“劫”传入汉语后引申出“大灾祸”的意思。^②两个“劫”虽有被引申和引申的关系,但实际上已是两个词,前者存在于佛教教义中,后者是一般语词。

② 引借外语原词的不同义项,产生不同的外来词。

例如英语中的 motor 有“内燃机、发动机、电动机;机动车、汽车”等多个义项, motor 音译为汉语,用了两个不同的词形来记录:“马达”、“摩托(车)”。由于汉语中这两个形式不能互相替代或替换(不能说“马达车”,也不能用“马达”指称摩托车;“马达”专指电动机),^③实际上已是两个词。

③ 引借外语原词的意义,转义成词。

英语原词 mosaic 并不指铺在地面上的小型瓷砖,也不指用瓷砖铺成的图案。 mosaic 在汉语中的音译词“马赛克”一般指一种小型瓷砖。^④“马赛克”通过引借 mosaic 的原义(镶嵌细工、镶嵌工艺品、镶嵌图案)而转义成词。

还有一种转义成词。汉语用“码”音译英语的 mile(英里),汽车速度以每小时多少“码”来称说。现在常以公制计量,但是沿用“码”这一

① 刘正埏(1984, 160页)。

② 张永言(1982, 97页)。

③ 高明凯、刘正埏(1958, 182页)。

④ 孟伟根(1996)。

译名,“码”(也用“迈”)往往就被理解为“公里”了。

4. 附加色彩的变化。

音译词就字面上看,往往只是音节串构成的一个译名而已,因此外语原词原有的与词义有关的文化色彩不能从词面上得到反映。如Nike的原义是“胜利女神”,汉语把这种 Nike 导弹译为“奈基导弹”,“奈基”词面上仅仅是双音节的别义符号,不再具有原名的意义,也就失去了 Nike 原有的文化色彩。又如外语原词人名“约翰”在汉语中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西方人名而已,但在英语文化中,John 具有特定的文化色彩,基督教《圣经》中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名叫 John,因此 John 这个名字具有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①“穆罕默德”在汉语中是很常见的阿拉伯人的名字,似乎也没有特别的意味,但在伊斯兰文化的国家(如埃及),这个名字却有特定的宗教文化色彩。Muhammad 本是伊斯兰教先知的名字,^②普通人取名 Muhammad(穆罕默德),是为了表示对先知的敬仰。在埃及,其他一些常见的名字,如“易卜拉欣、穆萨”等,也都源自宗教名人。^③

有的外语词本无褒贬等附加色彩,但译为汉语词时,通过构词成分增加了词义的附加色彩。例如英语 vision 的原义只有“视觉、视野、梦幻、幻想”等中性词义,汉语的意译“愿景”,通过词的构成成分的意义表达了感情色彩,整体词义也就成了“所向往的前景”。

“可口可乐”、“奔驰”(汽车)等译名,音译用字的意义造成的词面意义都有外语原词所没有的感情评价色彩。

二、语义虚化和重新分析

上述词义和附加色彩的分析主要是从整体词义来讨论的。如果从

① 这两个词例引自孟伟根(1996)。

② 穆罕默德(Muhammad,约570—632),伊斯兰教创立者。伊斯兰教徒公认的亚伯拉罕诸教的最末一位先知。他统一了阿拉伯的各部落,并奠定了后来阿拉伯帝国的基础。

③ 见《环球时报》2007年2月25日第9版。

基于汉语汉字特点的认知特点以及基于词结构的语义变化来看,外来词的语义汉化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 语义虚化。

音译形成的外来词,从汉语汉字的认知方式来看,字面上往往看不出词义,或不能形成语素音节的语义组合,因此音译成分的意义往往是虚化的。例如 *chanson* 译为“香颂”,从字面意义上看不出词义具体所指,因此在语用中往往要附加汉语成分以明确词义,构成“香颂歌曲、香颂音乐”。在这样的组合中,“香颂”只是区别词义的成分,其意义是虚化的。即使“香颂”作为中心成分构造词语时,人们仍然是连带着汉语成分的意义来理解,例如对于“法国香颂”的理解是“法国香颂歌曲、法国香颂音乐”。而在“湄南河”中,“湄南”的泰语原词的“河”义已经不复存在,只是区别词义的一个成分。

2. 重新分析。

重新分析(reanalysis)有三种情况:

① 外语词借入汉语后,外语词原有的结构消失了,外语词原有构成成分的意义也消失了。例如“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源自的外语原词是有结构的,但在汉语中,“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了囫圇一团的整体,已不具有内部结构,外语词构成成分的意义在汉语音译词中消解了。*Greenland* 在汉语中的音译“格陵兰”也消解了外语原词的结构,三个音节只表示一个最小的意义,原词中有意义的音节 *Green* 和 *land* 的意义都消失了。人名也是如此。英美姓氏 *Younghusband* 的音译“扬哈斯本”、*Longstreet* 的音译“朗斯特里特”都消解了英语原名中隐含的结构。这与印欧语相互借用词语时的情况很不一样。印欧语通过搬用书写形式的方式音译外来词,外语词的结构在外来词中基本上是保持不变的。

② 音节的意义化。原本是单纯词的外语词,在汉语中分化出结构来,外语原词中本没有意义的音节到了汉语中都变成了有意义的音节。

这主要是在音意双关的译借过程中发生的语义变化。例如 bandage 引进汉语后被分化,成为两个语素构成的复合词“绷带”,gene 在汉语中的音译译名“基因”是两个有意义的音节。外语原词中的没有独立意义的音节在汉语中被赋予了意义。

③ 意义别解。Coca-cola 译为“可口可乐”,Benz 译为“奔驰”,字面上都产生了与词的实际意义无关的意义,也就是字面意义发生了“别解”现象。

三、词义竞争

外来词词义汉化的过程也是汉语接受外来词的过程,其中往往有外来词与汉语原有词语的词义竞争。

用汉语既有词语翻译外语词,或用汉语语素组合成词表达外语词的意义,外来词与同形的汉语原有词语可能形成词义竞争。这种竞争过程其实也是汉化的过程。诸如“游戏规则”这样的意译词,往往是“职业规则”、“行业规则”的意思。但人们对意译而来的“游戏规则”的理解,一般是按照汉语原有的“游戏规则”的意义来理解的。这主要是由于汉语原有的“游戏规则”先行“占位”,^①因此意译而来的“游戏规则”一时还难以替代汉语中原有的“游戏规则”,或使汉语原有的“游戏规则”增加义项、扩大使用范围。

译自 game rules 的“游戏规则”要保持原来有的词义范围,有待于汉语原有的“游戏规则”扩大语义范围,产生新义。表面上看,是脱胎于 game rules 的外来词“游戏规则”企图同化汉语原有的“游戏规则”,使汉语原有的“游戏规则”在不改变词形的情况下变成与英语的 game rules 语义范围、语义色彩相同的“游戏规则”,但这样的“同化”其实也是被汉语语义系统接受的过程,因此也是脱胎于 game rules 的“游戏规

^① “占位”说参见于根元(1996)。

则”的汉化过程。

类似的例子是英语 soft 的意译“软”，在汉语中形成的词语有“软包装、软饮料、软磁盘、软广告、软环境、软件、软科学、软盘、软水、软通货、软武器、软着陆、软资源、软安全”等，例如：

中国公司和公民在软安全方面也存在缺陷。阎学通说，一些中国公民在海外往往以追求利益为最高目的，没有考虑道德与经济利益的平衡，建立自己的安全环境。（《绑架事件警示中国人》，《环球时报》2007年2月6日第1版）

意译的“软”扩大了汉语原有的“软”的意义范围。汉语原有的“软”扩大语义范围的变化，实际上也是译自英语 soft 的“软”的汉化表现。

汉语中原有的“强人”义为“强盗”，译自英语 strongman 的“强人”是“强有力的人，坚强而有能力的人”。在词义竞争中，外来的“强人”显然已经占据了主要的语用位置，使得汉语中原有的“强人”退为次要的语用位置。这个过程主要与人们习惯于用字面意义的加合来理解整个词义有关，更与“强盗”义的“强人”在现代汉语中的语用“衰落”有关。

来自日语的形译词“台”（量词，车辆、机器、设备的单位），在汉语中落地生根，沿用已久，以至于使人不察其外来面貌。《现代汉语词典》（2005）未将这一量词的“台”与汉语中原有的“台”字分立词条，说明这一量词已经完全汉化，以至于让人难以觉察其外来身份。

四、词义渗透

半音译半意译型的外来词和音译附加汉语表意成分型的外来词，词语模式有利于外来成分的汉化。这两类形式的词语，由于带有汉语成分，表义相对比较清晰，使得整个词形具有汉化的特点。

不仅如此，这两类词语中的音译成分，在与其结合的汉语成分的词

义渗透下,^①也会逐渐脱去外来色彩,形成与汉语固有成分并无二致的面貌来,其标志是独立成词,或作为构词成分参与构成新词。例如“卡车”一词是音译附加汉语表意成分而形成的,由于“车”的词义渗透,“卡”逐渐有了“卡车”的意义,因而可以作为构词成分参与构造“轻卡、重卡”等词语。

通过音译附加表意成分的“啤酒”的应用,音译外来成分“啤”逐渐受到词义渗透,获得“啤酒”一词的意义和功能,构造了“黄啤、罐啤、散啤、听啤”等词语。“霓虹”作为 neon 的音译,在与汉语成分“灯”的结合中,受到“灯”的词义渗透,也就有了作为“霓虹灯”的代称而参与构造的词语(如“霓虹管、霓虹字、霓虹时钟、霓虹效果、霓虹招牌、霓虹广告、霓虹发光片”)以及独立成词之用例(如“霓虹闪烁”)。在与汉语成分的结合中,借助于汉语成分的词义渗透而逐渐获得独立的意义、功能,是外来音译成分语义汉化的重要途径。

五、翻译与外来词词义汉化

在翻译中,如何准确传达原文的意义,并且保持原文的文化意味,历来是翻译家不懈的追求。曾有人因把英语的 the Milky Way 直译为“牛奶路”而贻笑大方。其实就传达外语原词的意义而言,“银河”未必就比“牛奶路”更合适。^②对英语社会的人来说,Milky Way 的命名没有

① “词义渗透”这个术语借自孙雍长(1985),意思是:“如果甲词与乙词核心意义相同或相近,那么,甲词(或乙词)的某一其他意义就有可能渗透到乙词(或甲词)的涵义范围,从而使乙词(或甲词)也具有这一意义。”这里借用的词义渗透的解释不太一样。“音译成分附加意译成分”的外来词,音译部分本来是有意义的,但因认知的关系,人们并不明确理解其意义,在诸如“比萨饼”中,对于“比萨”的理解不过是把它当作一个区别词义的部分,至于其意义是什么,并不一定明确,犹如“阳春面”中的“阳春”的意义是什么人们并不明白的情形是一样的。音译成分附加汉语成分的外来词用多了,人们对于诸如“比萨”的意义就比较明确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词义渗透”。这样的词义渗透实际上是外来成分的汉化过程。

② 王艾录、司富珍(2002, 263页):“又,汉语叫做‘天河、银河’,英语却叫做 Milky Way。古希腊人认为,天河是天上的一条道路,是泼在那里的牛奶形成的,所以称它为 galacticos,意思是‘牛奶的’。”关于 Milky Way 的语源,在希腊神话中有多种说法。其中一说是, Milky Way 是天后赫拉洒落的乳汁(形成的“路”)(见《神话辞典》311页, [苏]鲍特文尼特等编,黄鸿森、温乃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什么可奇怪的。如果把“银河”直译为英语 Silver River, 英语社会的人或许也会感到奇怪的。这其中并无孰优孰劣的问题。汉语社会接受“银河”, 不接受“牛奶路”, 只是基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命名, 并不是因为“银河”更符合 Milk Way 的原义。

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信、达、雅”, 分别指的是: 意义不背离原文; 不拘泥于原文形式, 力求原意明显; 古雅。在翻译过程中, 三者往往难以兼顾。追求准确传达原文意义, 往往不适应汉语的社会文化背景, 有碍理解和接受; 变通转换以适应汉语社会之用, 却往往与原文意义相去甚远, 也难以反映原词所具有的文化色彩; 追求古雅, 难以通俗, 不适应当代社会生活的语用。所谓“翻译难”就是指这样的尴尬。

通过“意译”的方法从外语中借词, 并不等同于翻译。^①意译当然要尽量准确地传达外语原词的意义, 反映外语原词的文化色彩。但是, 意译的目的是把外语词借来为汉语表达所用, 所以意译的词语为了适应于汉语的词汇语义系统而在语用过程中发生的意义上的“失真”(指与外语原词的意义有差别或词义范围发生变化)、“变义”(改变人们对于用以意译的汉语词语的原有理解)、“变色”(改变或消解外来词所具有的外语文化色彩或改变用于意译的汉语词语原有的附加色彩), 都属于外来词的词义汉化。

外来词的语义、附加色彩在汉语交际中的调适过程, 也是汉化的过程。意译本身就是汉化的过程, 但意译也不等于汉化的全部。意译的词语往往带有外语原词的语义特点和附加色彩, 因此意译的词语往往也需要在使用中逐渐适应汉语的语义系统和社会文化语境。例如表示“大型商业场所”的意译词“广场”(plaza 的意译), 现在正在逐渐改变人们对汉语中原有“广场”一词的理解, 这个被汉语社会接受的过程, 实际上也是外来词语义汉化的过程。

① 例如用“银河”对应 the Milky Way 就只是翻译, 而不是意译借词。因为“银河”的概念是汉语中原来就有的, “银河”这个词也不是因为意译 the Milky Way 而产生的。

某些意译外来词的词义理据是建立在特定外语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带有特定的外语文化的语义特点,与汉语原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合,需要在汉语社会的语用中逐渐调适。如“性感”一词,外语原词并无贬义色彩,但在汉语中,“性感”原来具有“色情的、引起色欲的”等意义和色彩。从汉语现阶段的语用情况看,“性感”一词正在逐渐褪去贬义色彩,但也还不能说完成了这个过程,人们对这个词的使用还是小心翼翼和有所顾忌的,并不敢在外语原词意义的基础上大胆使用。所以,意译词“性感”迄今还处在汉化的过程中。

第五节 语法形式汉化

一、形态减省

汉语的词没有印欧语词结构中那样的表示语法范畴的语法形式,因而外来词也都抹去了外语原词的形态。例如英语的名词有“数”的语法范畴,foot 和 feet 是通过内部屈折构成的不同词形,但是 foot 和 feet 的汉语意译词只有一个“英尺”,英语中的两个不同的词形到了汉语中合而为一。英语中有表示名词“复数”的词缀-es,区别于名词的单数形式,但是这样的附加形式到了汉语中都消失了,不管外语原词是单数还是复数,外来词都以同一个词形表示。即使音译中把这样的形态成分用语音形式表达出来,也没有表示语法意义的作用,而只是纯粹的记音成分。例如新加坡把 DINKS 译为“丁士”,中国大陆把 DINK 译为“丁克”。从原文看起来,DINKS 包含复数的语尾,DINK 则不包含这样的语法形式。^①但是汉语中的译名“丁士”和“丁克”都只是纯粹的音读形式,都不具备原词的语法形式。

汉语是一种缺少狭义形态的语言,但汉语中也有表达各种语法意

^① 黄河清(1994b)。

义的手段。目前网络语言中出现的汉语词语成分上附加英语形态成分的现象,如“郁闷 ing”,看似新颖、简约,其实只是语言游戏。汉语是一种缺乏形态的语言,但并不意味着汉语中缺乏语法范畴,只是不用词形变化来表示而已。以“时态”而言,英语的句子以动词的各种形式变化表示各种时态,汉语的句子虽然不以动词的形式变化表示时态,但也通过各种显性的或隐性的方式来表达“时间”,形成以说话时间为参照点的时界,使句子具备时间因素。^①因此,即使“郁闷”一个词独立成句,在具有时间参照点的时界中,也可以表达所谓“郁闷 ing”的意义。

外语词借用到了汉语中,抹去了表示各种语法意义的形态,并不只是书写上、读音上的变化,而是外来词受到汉语系统的制约从而在语法形式上实现汉化的表现。外来词抹去了外语原词表示各种语法意义的形态,但并不意味着这些词语与外语原词的功能毫无关系,或根本失去了外语原词的语法功能。只要外来词与外语原词的词义内核基本一致,其语法功能就不会有根本的改变,而只是不再用词形变化来体现这些功能而已。从词义与词的语法功能的关系来看,词的语法功能的基础是词义,看起来词的功能与词义并不总是一致的,其实功能变化是以词义变化为基础的,或者说功能变化必有词义变化与之相适应。

从仿译词的实际情况看,仿译而来的词语一般都会把外语词的功能来带到汉语中来,例如仿译词“黑板”、“足球”、“篮球”的英语原词 blackboard、football、basketball 只有名词的功能,仿译词也就只有名词的功能;英语词 subconsciousness、subconsciously 分别是名词和副词,仿译词“下意识”在汉语中的用法就兼有名词和副词两类功能。不仅词语的借用是这样,用汉语既有语词翻译外语语句,汉语的既有语词也会因而具有与之意义相对应的外语词的功能。例如汉语中原有的“批判”和“历史”分别是动词和名词,在“批判地看待这一问题”“历史地

① 参竟成(1996)。

分析这一问题”等句子格式中,“批判”、“历史”出现在状语的位置上,不能不说与翻译外语有关。在英语中,history 是名词,historic/historical 是形容词,historically 是副词;criticize 是动词,criticism 是名词,critical 是形容词,critically 是副词。汉语用“批判”、“历史”对译这些不同词形、不同功能的英语词,就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批判”、“历史”的原有分布(distribution),使汉语原有的“批判”、“历史”具有了新的句法分布位置。汉语词类中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包括词类与句法成分的复杂关系,与吸收外来词或翻译外语语句不无关系。

二、词语结构形式的汉化

汉外复合词的结构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来自英语的意译词,如“代沟(generation gap)、马力(horsepower)、黑板(blackboard)、蜜月(honey month)、足球(football)、篮球(basketball)、热线(hotline)、热狗(hotdog)、圆珠笔(ballpoint pen)、软件(software)、硬件(hardware)”等,意译词与英语原词的内部结构是相同的,因此是直接仿译。但是也有少数仿译词需要在结构上加以汉化,如“猎头”这个词来自于英语词 headhunting 的仿译,构成成分的次序按照汉语的方式做了调整(比照“猎人、猎枪、猎户”)。美国西雅图市有个 Lake Washington,翻译成汉语,则需按照汉语的结构规则改变内部成分的次序,译为“华盛顿湖”。

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有座三宝山,三宝山又叫“中国山”。山坡上除了汉字书写的“三宝山”以外,还用马来文写着 BUKIT CHINA,^①如果

① 原书写形式即如此。应写作 BUKIT CINA(CINA 是马来文对英文 China 的转写,按马来语的读音读)。南京大学中文系马来西亚中文硕士班雷贤淇同学告知,根据 1981 年出版的 Daftar Ejaan Rumi Bahasa Malaysia(马来西亚语罗马化拼音表)和 1991 年出版的 Daftar Umum Sebutan Baku Bahasa Melayu(马来语普及标准发音表),中国国名马来文写作 China(与英文 China 书写相同,但按照马来语的读音读,与 Cina 的读音相同);Cina 义为“中国的”,也用以表示与马来西亚华人、华文、华族文化有关的名称,如 Bukit Cina(马六甲的“中国山”)、Laut Cina Selatan(南中国海)、Tahun Baru Cina(华人农历新年/中国新年)。

要仿译这个词语,必须调整构成成分的顺序,译为“中国山”,而不是按照马来语原结构形式直译为“山中国”。马来西亚 Pulau Pinang 不能照原文译为“岛槟榔”,历史上的汉译为“槟榔屿”(Pulau 为马来语,义为“岛”,Pinang 即“槟榔”的马来语原词,也有写作 Penang 的。^①pinang 即常绿乔木槟榔树的马来语原词)。所以仿译往往要对成分组合形式、词语的结构加以调整。调整的过程,就是汉化的过程。

本书第四章讨论过从属构造的领属性偏正结构。从属构造的领属性偏正结构在汉语中也有汉化的过程。汉语中领属关系的短语形式是“领属成分+从属成分”,而仿译英语而形成的名词短语,如“助理国务卿、助理导演、助理制片”之类,其形式为“从属职位+领属职位”。这类形式的词语有的已经完成了汉化,如“助理研究员”之类,其特征表现为由从属关系转变为限制关系。而“助理教授、助理导演、助理制片、助理国务卿、助理教练”之类,目前就一般人的认知来看,似乎还是一种介于从属关系和限制关系之间的语义构造。这类组合的语义认知往往取决于有关的知识。这类从属关系的词语一旦在人们的认知中转化为限制关系,就完成了汉化。

诸如英语等印欧语是多音节语言,而汉语是单音节语言。这意思主要是指印欧语中的语素大都是多音节的,而汉语中的语素大都是单音节的。在汉语的固有词语中,除了历史上留下来的连绵词和拟声词以外,复音词一般都是合成词。汉语词语结构的这一主要形式使汉语对外来词的吸收倾向于把外来复音节词“重新分析”(reanalysis),分解出内部包含两个以上语素的合成词。因此,把印欧语的复音节词分解为包含两个以上语素的汉语复合词,是外来词结构汉化的一个重要特点。音意双关的借词,就是这类典型现象。音意双关的借词过程,实际

① Pinang 在历史上的汉译还有“庇能”等形式。孙中山先生等人 1910 年在马来西亚 Pinang(今称槟城)召开策动广州黄花岗起义的会议,史称“庇能会议”。

上就是把外来词的结构“重新分析”的过程,也是对外来词进行结构汉化的过程。诸如“基因 gene、引得(index)、绷带(bandage)、媒体(media)、乌托邦(Utopia)、弗晰(fuzzy)”等音意兼译的外来词,在音意双关的译借过程中,本无内部结构的外语词分解出内部结构,从而使复音节外语词变成了汉语的复合词。

半音译半意译型的外来词和音译附加表意成分型的外来词,借词方式本身就是把外来词的结构进行汉化的手段。半音译半意译型外来词大都是通过仿译而形成的,仿译的结果,形成了结构清晰程度不等的词形。即使结构若隐若现,也比全音译形式的外来词在结构上更加汉化,比较“新西兰”和“纽西兰”即可看出这一点。而相对于毫无内部结构关系的全音译外来词而言,音译附加表意成分型的外来词有清晰的结构,显然更符合汉语中绝大多数复音节词都是合成词这一结构倾向。

还有不同于一般所说的外来词结构汉化的表现形式,这就是外来词并没有被汉语的既有结构方式所“同化”,而是给汉语带来了新的词语结构。受日语影响产生的语义关系为“受事+动作”的偏正结构(如“理论学习、食品储藏)就是日源外来词带来的新的词语结构形式。而仿译英语产生的“乡村中国、城市中国、文化中国、魅力中国、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派”之类的词语,也大有普遍化或得到普遍应用的趋势。这类外来词语结构方式逐渐融入汉语,是一个逐渐被汉语社会所接受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当然也是一种“汉化”过程,只是不同于被汉语既有结构方式“同化”的“汉化”而已。

第六节 书面词形的汉化

一、显性汉化

显性汉化指赋予外来词词面以明显汉化的特征,具体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利用音译用字的原有意义形成字面上有意义的组合。

音译外来词中的单字是作为音节符号使用的,但是单字原有的意义可能在外来词词面上形成有意义的组合,这样的词面意义虽与词义并无关系,但能适应汉语汉字的认知特点。这类外来词字面意义具有“聚性”的特点,^①也就是音译用字的单字之间的字面意义可以形成合理的语义组合。例如“太妃糖”(奶糖)中的“太妃”只是英语 taffy(也作 toffee)的音译,虽然是“谐音别解”,但更便于记忆。现在报刊上常见“粉丝”(fans 的音译)、“血拼^②、瞎拼”(shopping 的音译),表面上看是谐谑之作,其实也反映了汉化的特点。音译外来词中,最典型的“聚性”外来词是音意双关的借词,字面意义与词的实际意义相似,最具有汉化的特点。

2. 用语素字的意义增加音译词的语义显著度。

音译附加汉语表意成分型的外来词(如“卡车、酒吧”之类)和半音译半意译的外来词(如“冰激凌、草库伦”之类),其中的汉语单音节语素都有增加外来词语义显著度的作用。这两类外来词的内部结构是汉语既有的,音译成分和附加的汉语成分之间可以形成合理的结构关系。此外,诸如“巨无霸”之类的“散性”词,音译用字的字面意义也是外来词汉化的重要手段。“巨无霸”是英语词 jumbo 的音译,jumbo 本指一种大型客机,并有“巨大的、特大的”等引申义。从“巨无霸”音译用字之间的联系来看,无法形成合理的语义组合和结构关系,但其中处于离散状态的“巨”和“霸”却使人可以断“词”取义地了解“巨无霸”的意义,使得“巨无霸”具有了汉化的特征,这类音译词字面上的意义有助于显示词的实际意义,便于人们“望文生义”地理解词的实际意义。

“祖母绿”是来自阿拉伯语 zumunrud 的音译,历史上有“助木刺、

① 外来词词义的“聚性”和“散性”,见史有为(2000, 120—121)。

② 例:“‘shopping’,中文意思为‘购物’,人们常常把疯狂购物巧译为‘血拼’。”(《中国人在全球“血拼”》,《作家文摘》2005年8月23日第7版)

助木绿”等多种词形。^①尽管“祖母绿”纯粹是个音译词,但其中的“绿”凑巧是“祖母绿”这种宝石的颜色(“祖母绿”的确是翠绿色的)。近年来新出现的外来词“皮卡”(轻型卡车)是 pickup 的音译,其中的“卡”凑巧与“卡车”的“卡”音义都沾边。“客里空”是俄语 крикун 的音译(крикун 原意是“爱叫喊的人”,引申为“饶舌家”、“空谈家”),крикун 是苏联戏剧《前线》中一个捕风捉影、捏造事实的新闻记者。汉译的“客里空”用来指新闻报道中不尊重事实的坏作风。这个音译词字面上的“空”字对这个词义具有隐喻和导引的作用。诸如此类的音译词,音译用字的本来意义都有助于音译词意义的了解。

3. 利用汉字字符的表意性增加语义显著度。

汉字字符中的意符具有表意性,特别是可以表示词义类属,因此音译词常常用意符表示词的意义类属。诸如“葡萄、茉莉”等外来词就是如此。虽然这类外来词字面意义属于“散性”的,也就是音译用字的单字在字面意义上不能构成一个合理的意义组合,但意符使整个词的形式具有明显的汉化特征。

汉字的字符对音译词的汉化具有重要作用,这方面有个有意思的例子。日本释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十七日,夜半,得岚风,上帆,摇舡行。”“岚风”一词,有释者说是从山岳地带向平地或海面吹去的强烈的风。何亚南(1999)根据汉译佛经文献的材料指出,“岚风”就是“大风”,“岚”是梵语(或巴利语)的汉语音译词“随蓝、旋蓝”之“蓝”的同音替代字。“随蓝、旋蓝”的汉化过程“是以‘岚’字的产生为契机的”,“‘岚’与‘蓝’同音,从字形上说,用它来作梵语‘迅猛风’义的音译,比‘蓝’字更有优点,因为它除了表音之外还能表意(从风)。”^②

① 罗常培(1989, 27 页)。

② 查刘正琰等(1984, 274 页)“毗蓝”,暴风。又作“随蓝、吠蓝、鞞蓝、旋蓝、旋岚、毗蓝婆、随蓝婆、旋蓝婆、鞞蓝婆、吠蓝婆、吠岚婆、毗岚风、毗楼那”。梵 vairambbia。

4. 文字改换。

文字改换指的是把日语词的书写词形转换为汉语的书写词形,其中主要是用字的转换。

来自日语的形译词,是通过直接搬用词的书写形式借用进来的。日语汉字词的书写本来就是借用汉字写成的,因此很多原词在汉语直接搬用后形成的词形与原词书写是一致的。但是也有一些日语原词用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改造了字形而形成的,或是自创的字,或是汉语已废弃了的字形,因此不适用于汉语。从改换实例来看,其中或是因为同样的字在汉语中表示的是不同的语素(如“弁証法”中的“弁”),或是与现行标准字形有差异(如“表決”的“決”,“財団”的“団”等),或是通行汉字中没有的字(如“反応”的“応”、“伝染病”的“伝”、“手続”的“続”),等等。因此,汉语在借用时对词的书写形式做了转换:^①

弁護士(日)/辩护士(汉)	弁証法(日)/辩证法(汉)
表決(日)/表决(汉)	財団(日)/财团(汉)
失効(日)/失效(汉)	出発点(日)/出发点(汉)
景気(日)/景气(汉)	保険(日)/保险(汉)
変圧器(日)/变压器(汉)	単行本(日)/单行本(汉)
仮定(日)/假定(汉)	仮名(日)/假名(汉)
転炉(日)/转炉(汉)	専売(日)/专卖(汉)
軽工業(日)/轻工业(汉)	反応(日)/反应(汉)
低圧(日)/低压(汉)	伝染病(日)/传染病(汉)
低能児(日)/低能儿(汉)	芸術(日)/艺术(汉)
経済(日)/经济(汉)	手続(日)/手续(汉)
冷蔵庫(日)/冷藏库(汉)	労作(日)/劳作(汉)

① 日语汉字与汉语繁体字相同的情况,不在分析之列,如“電子、情報”等。

图案(日)/图案(汉)

絶対(日)/绝对(汉)

広場(日)/广场(汉)

気体(日)/气体(汉)

二、隐性汉化

隐性汉化指外来词在使用中的逐渐普遍化或普遍地使用。这是从社会使用的普遍性来判断。社会使用的普遍性越大,外来词融入汉语的程度就越深。社会使用的普遍性是个隐性条件,所以使用上的普遍性是外来词隐性汉化的表现。

史有为(2000, 4 页)指出:“在汉语中,一般来说,外来词是指在词义源自外族语中某词的前提下,语音形式上全部或部分借自相对应的该外族语词、并在不同程度上汉语化了了的汉语词;严格地说,还应具备在汉语中使用较长时期的条件,才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外来词。”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外来词,可以理解为完全汉化了的外来词。使用时间越长,社会的语词认知程度越高,融入汉语的程度就越深,汉化的程度也就越高。那些在交际中偶一使用的外来词,或个人言语中临时借用的外来词,都没有实现真正的汉化。例如“碗豆腐”(wonderful)、“耐斯”(nice)、“三克油”(thank you)、“顾得白”(good-bye)之类的外语词的音译,都属交际中的临时借用。再如:

中国是苏丹的老朋友。早在 1964 年,周恩来总理就曾访问苏丹。在随后的数十年中,中国先后为苏丹援建了友谊宫会议中心、恩图曼友谊医院等多项标志性建筑。无论在机场还是酒店,即使双方素不相识,苏丹人见到中国人也会亲切地打招呼说:“绥尼,索迪格,塔玛穆”(阿拉伯语“中国,朋友,好”的意思)。(《苏丹,巨变中的非洲大国》,《环球时报》2006 年 12 月 21 日第 7 版)

诸如“绥尼、索迪格、塔玛穆”这样偶然用到的音译词,或者说临时借用的音译词,还不能算是汉语词汇系统中稳定的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算是真正的外来词。

真正意义上的外来词应具有在汉语中使用较长时间的条件,但使用时间的长短不太容易明确把握,因为时间的长短是个相对而言的概念。从语词的传播和使用情况来看,由于某种因素,比如反映社会热点现象的新造词,由于社会大众的关注,在传播媒体频繁使用的情况下,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得全民皆知(例如“非典”之类),迅速成为常用词,迅速得到普遍化的使用。从使用和传播的角度看外来词的汉化,也是如此。“愿景”(Vision 的意译)一词,本在台湾和东南亚一带使用,在 2005 年春夏之交海峡两岸交流的重大事件中,“愿景”一词写入“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新闻公报,这个词迅速在大陆传播开来,《现代汉语词典》(2005)及时将这个词语补收进来,甚至 2006 年天津市的高考作文也以此出题。所以,从社会使用的角度看,外来词的汉化可以表述为“普遍地使用或逐渐地普遍化”。

1. 书面上已经形成确定的词形。

例如 good-bye 的音译形式既有“顾得白”,又有“古得拜”,且用例都不多,因此都还不能认为完成了汉化。AIDS 的音译形式原来是从台湾传入大陆的“爱滋(病)”,由于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将音译形式确定为“艾滋(病)”,这个词形迅速得到广泛传播,在大陆通行开来,自然属于完全汉化的外来词。药名 VIAGRA(枸橼酸西地那非片)的译名由“伟哥”改为“万艾可”,也是如此。

书面上已经形成确定的词形是就某一言语社区范围而言的,至于同一个外来词在不同言语社区具有不同的词形,不影响某一言语社区范围内的外来词词形是否确定的判断。如“的士”(taxi)在海外华人言语社区(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词形是“德士”,不影响中国大陆把“的士”看作 taxi 的确定音译形式。“爱滋(病)”在新加坡的词形是“爱之(病)”,不影响“艾滋(病)”在中国大陆是确定的音译词形式。反之,也一样。

2. 有普遍的用例。

邢福义主编的《现代汉语》把全国“东、西、南、北、中”各地都使用的

用例看作现代汉语中的“一般用例”，^①这一观点可以用来判断外来词的隐性汉化的程度。全国都已普遍使用的同一词形的外来词，自然属于汉化程度高的外来词。而异形外来词在使用普遍性上的差别，可以看作是汉化程度的差别。

意译词的汉化，主要是语义的汉化，即适应汉语词汇的语义系统和语用表达，以及是否具有语用的普遍性。就词形上看，意译词与音译词不存在汉化程度的比较问题，例如“电子邮件”是汉语的语词材料构造起来的，当然是汉化的，但是“伊妹儿”有确定的读音、确定的意义，因此也是汉化的。当然，“电子邮件”可以使用于各种交际场合和语体，“伊妹儿”一般只用于俗称，^②如果在两者中选择一个作为规范词，自然应选择“电子邮件”，因为电子邮件的普遍性更大。随机用“百度”搜索一下，含有“电子邮件”的文本有 31 700 000 篇，含有“伊妹儿”的文本有 434 000 篇。显然，“电子邮件”的普遍性要大得多，应以“电子邮件”作为正式词形。但是，不能因此说“伊妹儿”不是汉化的外来词。“伊妹儿”有明确的意义、明确的汉语读音，没有什么理由说它不是汉化的外来词。

那些历史已久的音译外来词（如“沙发、咖啡”等）自然是完全汉化的外来词，而诸如“的士、因特网、互联网、蹦极、克隆”等音译外来词，即使在汉语中出现的时间不算太长，也是汉化的外来词。这些音译外来词有确定的书写形式，有明确的意义，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外来词汉化程度的差异，主要是在同一借词类型的异形外来词（包括异形意译词、异形音译词）之间进行比较。而这种比较，主要是使用普遍性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可以通过语用频率的差异来反映。语用频率的差异实际上是外来词的词形被接受程度的差异，因而也是外来词

① 邢福义主编（1986，305页）。

② 见《现代汉语词典》（2005）。

汉化程度的反映。

例如“伊妹儿”和“伊妹尔”都用汉字书写,都有确定的汉语语音结构,因此都是汉化的外来词。至于说哪一个汉化程度高,从词形本身无从判别。虽然“伊妹儿”似乎形成了“聚性”的词面意义,但是词面意义显然与实际词义无关。因此,判断“伊妹儿”和“伊妹尔”的汉化程度的差别,只能从使用的普遍性上来考察。“百度”一下,含有“伊妹儿”用例的文本有 434 000 篇,含有“伊妹尔”用例的文本只有 2 800 篇(还不排除其中有误植之例)。这个随机统计说明“伊妹儿”被接受的程度高得多,自然也就可以认为汉化的程度要高得多。再如“因特网”和“英特网”在词形上有差异,随机搜索一下,含有“英特网”的文本有 215 000 篇,是一个有相当多用例的词形,但含有“因特网”的文本更多,达到 4 280 000 篇。就词形被接受的程度来看,“因特网”的普遍性显然更大一些,因而可以认为汉化程度更高一些。如果出于减少歧异的规范考虑,保留一个淘汰一个,自然应保留“因特网”,淘汰“英特网”。

附录 英美姓名音译汉化示例分析

一、说明

(一) 英美姓名音译汉化示例分析所用材料是《新英汉词典》(1985)附录一“常见英美姓名表”。我们把该“姓名表”与世纪版《新英汉词典》(2000)附录二“常见英美姓名音译表”作了比较,发现所列英美姓名实例和译名实例是一致的,只是在注音方式上略有不同。虽然两版词典都说明采用了宽式注音法,但实际上宽严有别,因此所用音标符号略有不同。两相比较,《新英汉词典》(1985)的注音与当前学术期刊和一些新近出版的学术著作、教材等都是一致的,显然更符合目前语言学界的一般通例,所以决定采用《新英汉词典》(1985)附录一“常见英美姓名表”作为音译汉化示例的依据。

据史有为(2000, 222页),20世纪50年代初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拟订了几项音译原则:(1)以北京语音为标准;(2)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译音,但是沿用已久的人名、地名即使在译音上有些出入也不另译;(3)人名按照同名同译、同姓同译、同音同译的原则译音;(4)译音用字采用常见易懂的字,不用冷僻的字。以后这项工作由新华通讯社的译名室负责,基本上沿用了上述原则,并明确或补充了一些规定:避免选用有贬义的汉字;女子的姓名尽量选用具有女名特征的汉字;音译需音似与形似相结合;沿用历史上用惯的名称;外国人自己起的汉名要尊重照用。^①

^① 周定国(1994)介绍了中国地名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和新华通讯社编纂的外国人名译名手册。

把“常见英美姓名表”对译名的实际处理与上述原则对照起来看,就会发现一致性是很强的,而且也符合当前语用中的译名通例。这说明该表中的音译方式具有很强的规律性和很大的普遍性,所以用来作为音译汉化的示例是很有代表性的。

(二) 汉化实例的音节切分原则已在第八章第三节中讨论,即主要按照发音语音学意义上的音节概念来考虑音节的切分。有的词语的语音形式虽然在发音语音学上不一定可以看作一个音节,可是结合紧密,形成一个整体音段,从汉化的语音对应角度考虑,也当作一个音节来考虑音译的汉化。

(三) “常见英美姓名表”每条姓名下一般只收一个通常的汉语译名,也酌收其他译法或习惯译法。“其他译法”或“习惯译法”与通常的汉语译名形成的异名,在“姓名表”中并不多,但原因很复杂。“姓名表”中音译译名产生歧异的原因具有普遍性,既是异形译名产生的一般规律,也涉及音译的一般方法,因此值得分析。

1. 方言口音差异形成的异名。

严格地说,这种差异大多是后起的普通话语音的译名与历史译名的差异(历史上的译名有许多都是在方言口音的背景下产生的),或方言音译的译名通过书面流通开来以后,用普通话的读音读而产生的差异。

英语中的[t]用普通话音译,一般以声母t对应(音译用字为“特”),但在方言背景下的译音往往以声母d对应(音译用字为“德”),例如 Dutt[dʌt]词尾的音缀“特”和“德”的差别(达特/杜德)。

Smith译为“史密斯”,跟“史”在方言中读成平舌音声母有关(“斯大林”就有“史大林”的异名)。Sullivan的音译异名“萨利文/沙利文”,后者用声母为sh的“沙”字音译原名开头的S; James的音译异名“詹姆斯/詹姆士”,后者用声母为sh的“士”字来音译原名的词尾-s,都是这个原因。

Truman(杜鲁门)是采取汉读法译成的,开头的字母 T 汉化为 d 声母字(杜),也与方言语音有关。^①

Pitt 有“皮特”和“庇特”的异名,后者把 P 读作汉语中的 b 声母字,也是汉语方言语音特点所致。

上述音译特点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闽南话背景的方言音译中有太多的实例,可为佐证。当然,上述译音的语音特点在其他方言中也有迹可寻,如吴方言。虽然不能确凿无疑地具体确定何种地点方言的口音造成了上述译名的差异,但与方言口音有关,则是无疑的。

至于 Park[pɑ:k]的音译异名“帕克”和“派克”,后者用“派”音译[pɑ:],应与吴方言(如上海话读[p'a³⁴])口音有关。

2. 因谐音的不同而形成异名。

谐音的选择往往是因人而异的,这就会导致不同的音译词的词形,例如:

Mendelssohn,门德尔森/门德尔松

McCormack,麦考马克/麦科马克

Smedley,斯梅德利/史沫特莱

Ulysses,尤利塞斯/尤利西斯

Maltz,莫尔茨/马尔茨/马尔兹

Richardson,理查森/理查逊

Kingsley,金斯利/金斯莱

Macaulay,麦考利/麦考莱

Saroyan,塞罗扬/萨洛扬

Reading,雷丁/里丁

Ryea,丽亚/雷亚

^① 此外,英语中的[d]在方言口音的音译中也有译成普通话读作 t 声母字之例,如 State of Delaware → 特拉华州。

3. 因同音字的选择不同而造成异名。

同音字一般是指声韵调都相同的字,但是,汉语音译过程中一般不考虑声调,因此音译中的同音字也包括只是音段结构相同的同音字:

Phil(l)ips, 菲利普斯/菲力普斯

Felix, 菲利克斯/费利克斯

Gershwin, 格什温/格什文

Defoe, 迪福/笛福

Keats, 基茨/济慈

4. 全译与节译造成的不同译名。

MacDowell, 麦克道威尔/麦克道尔

Joseph(或 Josef), 约瑟夫/约瑟

Lindbergh, 林德伯格/林伯

Richard, 理查德/理查

Jacob, 雅各布/雅各

Lough, 洛夫/洛

5. 谐音既不同、全译节译也不同而造成的译名。

Gladstone, 格拉德斯通/格莱斯顿

Rutherford, 拉瑟福德/卢瑟福

Sargent, 萨金特/沙尔金

6. 因音节划分的不同而造成的译名。

Hawthorne, 霍索恩/霍桑。“霍索恩”把 Hawthorne 切分为三个音节,“霍桑”把 Hawthorne 切分为两个音节。

McKenna[mə'kenə]有“麦肯纳”和“麦克纳”两个译名,前者把 McKenna 切分为 M/cKen/na,后者把 McKenna 切分为 M/cKe/nnā。

7. 语音理据不同而造成的译名。

采取语音对应的方法,尽量谐音,因而按照英国口音的英语与按照美国口音的英语的译名不同。

Fillmore, 菲尔墨(英)/菲尔墨尔(美)

Morgan, 摩根(英)/摩尔根(美)^①

8. 因原词的字母组合不同而形成的译名。

读音相同,但原词的字母组合不同,因而采取不同的汉语音段形式与之对应。其中有原名完全同音而译名形式不同的情况,也有原名中部分同音的音节在汉语中的译名有歧异的情况。

前者如:

Marian 和 Marion 都有两读,在[ˈmæriən]的读音上,因原词词尾的字母组合形式不同,译名一为“玛丽安”(-an,安),一为“马里恩”(-on,恩)。

后者如:

Dalton(多尔顿)和 Dawson(道森),开头的音素组合都读[dɔː],但因 Da- 和 Daw-在拼写上的差异,前者汉化为 duo(多),后者汉化为 dao(道)。

Hoover(胡佛)和 Houdini(豪迪尼)开头的音素组合都读[huː],但因 Hoo- 和 Hou-的拼写形式不同,前者汉化为 hu(胡),后者汉化为 hao(豪)。

Defoe(迪福)和 Durward(德沃德),开头的音段都读[də],但因 De- 和 Dur-的拼写不同,De-汉化为 di(迪),Dur-汉化为 de(德)。

Service 和 Sophia 开头的音段都是[səː],但因原文的字母书写不同,一个汉化为 se(Service,塞维斯),一个汉化为 suo(Sophia,索菲娅)。

9. 按照汉读法音译和按照语音对应法音译造成译名不同。

John 和 Jon(John 的异体)都读[dʒɒn],但因 John 中有个并不发音的字母 h, John 汉化为“约翰”,Jon 汉化为“乔恩”,前者是按照汉读法音译,后者是按照语音对应法音译。

Bush 的译名有“布什”和“布希”,“什”和“希”的差异在于前者是汉读法译成的,后者是语音对应法译成的。

Dutt[dʌt]有“达特”和“杜德”两个译名,“达”是语音对应法的音

① 如果都是基于美国口音的音译,则是节译和全译的差别。

译,“杜”是汉读法的音译,即比照汉语的 du 音节来音译。

Young[jʌŋ]有两种译名,一为“扬”,是用语音对应法译成的;一为“扬格”,是用汉读法译成的。“扬格”这一译名的形成,是把本不代表音素的字母-g 按照汉语拼音的读法汉化成一个音节。

Isaia[ai'zaiə],采用语音对应法的谐音音译,则有“艾赛亚”;采用汉读法的音译,则有“以赛亚”。

Vance,万斯/范斯,前者是语音对应法造成的译名,后者是汉读法形成的译名^①。

Matthew,马休/马太,前者以声母 x 对应 th[θ]而译成 xiū(休),是语音对应法;后者把 th[θ]当作声母 t,读成“太”,是汉读法。

Milo['mailou],迈洛/米洛,前者是语音对应法,后者是汉读法。

Rayleigh,雷利/瑞利,译名的差异在于前者是汉读法译成的,后者是语音对应法译成的(Ray→rui)。

Buck[ʌk],巴克/布克,“巴”、“布”的差异在于前者是用语音对应法译成的,后者是用汉读法译成的。

10. 原名异读,因此译名有异名。

Fenwick,一读['fenik],一读['fenwik],因此译名一为“芬尼克”(['fenik]),一为“芬威克”(['fenwik])。

Gerald,一读['dʒerɑ:d],一读[dʒə'rɑ:d],由于词重音的位置不同,因此译名一为“杰拉德”(['dʒerɑ:d]),一为“杰勒德”([dʒə'rɑ:d])。

Louis 有两读,一读['lu(:)is],一读['lu(:)i],因此有异名“路易斯”['lu(:)is]和“路易”['lu(:)i]。

Joule,一读[dʒu:l],一读[dʒoul],因此有异名“朱尔”[dʒu:l]和“焦尔”[dʒoul]。

Home,一读[houm],一读[hju:m],因此而有“霍姆[houm]”和“休

① “范斯”亦有可能是方言口音的谐音音译,如吴方言中有读“范”为 V 声母的。

姆[hju:m]”的异名。

(四) 对于一些与历史人物译名有关的异名,则根据《辞海》等有关资料适当补充了人物简介。“其他译法”或“习惯译法”的人名异名并不等于仅仅是这些历史人物姓名的译名,但这些历史人物姓名的译名显然是这些异形译名存在的重要原因。

(五) 音译汉化示例分析是按照“常见英美姓名表”循序进行的,编制例表时作了大致的归置、排列。

(六) “常见英美姓名表”中的音节组合是十分有限的,但从音译例词可以看出汉语音译的汉化基本规律。因是示例分析,所以“姓名表”中同类的姓名实例和译名实例未予全部收录,而不同类别的实例则有多有少,并不平均。

(七) “例析”中各种异名形成的原因上文已予归类分析,因此“例析”中只对少数异名形成的原因附加了简短的分析和说明。

二、例 析

[i], 汉化为 yi, 用 yi 音节字标记^①, 例如: Ian, 伊恩; Ickes, 伊克斯; Yvonne, 伊冯; Yvette, 伊维克。

[i:], 汉化为 yi, 用 y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Enid, 伊妮德; Enoch, 伊诺克; Eva, 伊娃; Eads, 伊兹; Eaton, 伊顿。

[in], 汉化为 in 或 ying, 用 yin 音节字或 yi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Menuhin, 梅纽因; Inness, 英尼斯。^②

[in], 汉化为 ying, 用 yi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Ingrid[ˈingrid], 英格

① 汉语的每个音节都有声调,但在选择音译用字时,声调的不同一般不加考虑。因此,为表述方便,本表概以“音节”来称说 yi、hui、zhan 等各种音段形式。

② Inness 读作[ˈinis],在译名“英尼斯”中,用字“英”与方言口音有关。可资参考的是,在吴方言中,鼻音韵尾大都只有[-ŋ],而无[-n],如“斤”、“京”在上海都读[teŋ⁵³];苏州音系中,有[-n],但[-n]韵尾不太固定,有的人读作[-ŋ]。见詹伯慧(1985, 114 页、119 页)。

丽德; Ingersoll ['ɪŋɡəsəl], 英格索尔; Ingram (s) ['ɪŋɡrəm (s)], 英格拉姆(斯)。

[ju:], 汉化为 you, 用 yo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Eugene, 尤金; Eugenia, 尤金妮亚; Eunice, 尤妮斯; Euphemia, 尤菲米亚; Eustace, 尤斯塔斯; Youmans, 尤曼斯; Udell, 尤德尔; Ulysses, 尤利塞斯(尤利西斯)。

[ju:ə], 汉化为 you, 用 yo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Urey, 尤里。

[jæ], 汉化为 ye, 用 y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Yalding, 耶尔丁。

[jɜ:], 汉化为 ye, 用 y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Yerkes, 耶基斯。

[-jə], 汉化为 yi 和 er, 分别用 yi 音节字和 er 音节字标记, 例如: Goodyear, 古德伊尔。

[ju(:)ə], 汉化为 you 和 er, 分别用 you 音节字和 er 音节字标记, 例如: Dewar, 迪尤尔(杜尔、杜瓦)。^①

[jɔ:], 汉化为 yue, 用 yu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York(e), 约克。

[jou], 汉化为 yue, 用 yu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Yost, 约斯特。

[jei], 汉化为 ye, 用 y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Yeats, 耶茨; Yale, 耶尔(耶鲁)。(“耶尔”的“尔”应是语音对应法译成的, “耶鲁”的“鲁”应是汉读法译成的。)

[jʌŋ], 汉化为 yang, 用 ya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Young, 扬; Younghusband, 扬哈斯本。[jʌŋ] 独立成词时, 有汉化为 yang 和 ge 两个音节之例, 分别用 yang 音节字和 g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Young, 扬格。

[ɛə], 汉化为自成音节的 ai, 或分化为 ai 和 er, 分别用 ai 音节字, 或 ai 音节字和 er 音节字标记。前者如: Aaron 艾伦。后者如: Earhart, 埃尔哈特。

[ɑ:], 汉化为 a, 用 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Arbuthnot, 阿巴斯诺特;

① “迪尤尔”与“杜尔、杜瓦”的差异与音节的不同切分有关, “杜尔、杜瓦”的译名差异与语音的不同有关, 其中译音“瓦”的形成与汉读法有关。

Archer, 阿切尔; Achibald, 阿奇博尔德; Ardell(e), 阿黛尔; Arden, 阿登; Arlen, 阿伦; Ardis, 阿迪斯; Arkwright, 阿克赖特; Arlene, 阿琳; Arlo, 阿尔洛; Armand, 阿曼德; Armstrong, 阿姆斯特朗; Arnold, 阿诺德; Arden, 阿登; Arvid, 阿维德; Arthur, 阿瑟(亚瑟)^①。

[ɑn], 汉化为 a 和 en, 分别用 a 音节字和 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Arne, 阿恩。

[ai], 汉化为 ai, 用 a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Ida, 艾达; Ina, 艾娜; Ives, 艾夫斯; Irene, 艾琳; Isaac, 艾萨克; Isaia, 艾赛亚(以赛亚)^②。

[aiə], 汉化为 ai, 用 a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Iris[¹aiəris], 艾丽斯。

[ain], 汉化为 ai 和 yin, 分别用 ai 音节字和 yi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Einstein, 爱因斯坦。

[aiən], 汉化为 ai 和 en, 分别用 ai 音节字和 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Ironside, 艾恩赛德。

[æ], 汉化为 a 或 ai, 用 a 音节字或 a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Abigail, 阿比盖尔; Alick, 阿力克; Ally, 阿莉(Alice 的昵称); Appleton, 阿普尔顿; Aster, 阿斯特; Astrid, 阿斯特丽德; Atkins, 阿特金斯; Atherton, 阿瑟顿(艾瑟顿); Attlee, 阿特利(艾特利; 艾德礼)。“亚当(Adam)”, “亚”字按普通话读是 yà, 但是“亚”应是作为 a 的记音字来用的。

[æn], 汉化为 an, 用 a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Ann, 安; Anton, 安东; Andrew, 安德鲁; Andrews, 安德鲁斯; Angelina, 安吉利娜; Antonia, 安东尼娅; Antomio, 安东尼奥。

[æŋ], 汉化为 an, 用 a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Angus, 安格斯。

[ʌ], 汉化为 e(厄), 用 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Upton, 厄普顿; Ubbelohde, 厄布洛德。

① “亚”当作 A 的记音字来用, 应是方言的因素。在闽南话等方言里, “亚”读 a, 历史上的译名如“亚洲”(Asia)的用字“亚”就是与方言口音有关的译音。

② “艾赛亚”是语音对应法译成的, “以赛亚”是汉读法译成的。

[ʌn], 汉化为 an, 用 a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Underwood, 安德伍德。

[e], 汉化为 ai, 用 a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Eddy, 埃迪; Eddgar, 埃德加; Eldon, 埃尔登。

[en], 汉化为 en, 用 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Enders, 恩德斯。

[ei], 汉化为 ai, 用 a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Abe, 艾贝; Abel, 艾贝尔; Amis, 艾米斯。

[ein], 汉化为 an, 音译用字为 an 音节的字, 例如: Angell, 安吉尔。

[ə-], 汉化为 a, 用自成音节的 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Adele, 阿黛尔; Alicia, 阿莉西亚。

[-ə], 汉化为 er, 用 er 音节字标记, 例如: Decker, 德克尔; Blair, 布莱尔; Cocker, 科克尔; Fisher, 费希尔; Dewar, 迪尤尔。

[ən], 汉化为 an, 用 a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Antonia, 安东妮亚。如果 [ə] 后有鼻辅音音缀 n, 尽管 [ə] 为次要音节, 并不与其后的 n 相拼, 但可以改变音节界线, 把 n 一音两用, 即用 [ə] 与其后的 n 拼为 [ən], 再用 n 与其后的元音相拼; [ən] 汉化为 an, 用 an 音节字标记。例如: Anita, 安妮塔。

[ə-], 汉化为 ou 或 e, 用 ou 音节字或 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Ervin, 欧文; Ernest, 欧内斯特; Irvin, 欧文; Irving, 欧文; Urqohart, 厄克特; Ubbelohde, 厄布洛德; Ursula, 厄休拉。

[ɑ:], 汉化为 ao, 用 a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Alden, 奥尔登; Ogden, 奥格登。

[ɔ], 汉化为 ao, 用 a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Occam, 奥克姆; Oscar, 奥斯卡; Oppenheim, 奥本海姆; Olga, 奥尔加; Olive, 奥莉夫; Oliver, 奥利弗。

[ɔn], 汉化为 ang, 用 a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Léon, 莱昂。

[ou], 汉化为 ao, 用 a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Oates, 奥茨; O'Neil, 奥尼尔; Leo, 利奥; Giauque, 吉奥克。

[oun], 汉化为 ang, 用 a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Leona, 利昂娜。

[b-], 出现在辅音字母前, 汉化为 bu, 用 b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b(l-)]:Black, 布莱克; Blair, 布莱尔。

~[b(r-)]:Brooks, 布鲁克斯; Braun, 布朗; Brenda, 布伦达; Brian, 布赖恩。

[-b], 汉化为 bu, 用 b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Kemble, 肯布尔; Krebs, 克雷布斯; Vanbrugh, 范布勒; Velblen, 维布伦; Jacob, 雅各布; Jeb(b), 杰布; Job, 乔布; Rob, 罗布; [-b]有汉化为 bei 音节的, 例如: Abe[eib], 艾贝。与“Job(乔布)、Rob(罗布)”对照, 这一译音的形成似与原文拼写形式(-be)有关, 可为参照的是写作 be、读作[be]的Bell的译名“贝尔”、Bellamy的译名“贝拉米”, Be 都是用 bei 音节字(贝)标记。

[bi], 汉化为 bi, 用 b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Bill, 比尔; Biddle, 比德尔; Billie, 比莉; Billy, 比利; Mosby, 莫斯比。

[bi:], 汉化为 bi, 用 b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Beadle, 比德尔。

[biə], 汉化为 bi 和 er 两个音节, 分别用 bi 音节字和 er 音节字标记, 例如: Beard, 比尔德。或汉化为 bi 和 a 两个音节, 分别用 bi 音节字和 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Beatrice, 比阿特丽斯。

[bæ], 汉化为 ba, 用 b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Babitt, 巴比特; Babington, 巴宾顿; Barrie, 巴里; Barry, 巴里; Basham, 巴沙姆。

[bæn], 汉化为 ban, 用 ba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Banks, 班克斯; Bancroft, 班克罗夫特。

[bei], 汉化为 bei, 用 be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Bach(e), 贝奇; Bailey, 贝利。

[bein], 汉化为 bei 音节和 en 音节, 分别用 bei 音节字和 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Bain, 贝恩。

[bɑ:], 汉化为 ba, 用 b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Bader, 巴德; Barber, 巴伯; Barclay, 巴克利。

[bɔː], 汉化为 bao 或 bo, 用 bao 或 b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Boris, 鲍里斯; Boniface, 博尼费斯。

[bɔː], 汉化为 bao 或 bo, 用 bao 音节字或 b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Baldwin, 鲍德温; Ball, 鲍尔; Bird, 伯德。

[bə], 汉化为 ba 或 bo, 用 ba 音节字或 b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Baruch, 巴鲁克; Barber, 巴伯。Baruch 和 Barber 中的 [bə], 因原词拼写不同而有译音“巴”、“伯”的不同。

[bɜː], 汉化为 bo, 用 b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Berger, 伯杰; Bernard, 伯纳德。

[bæn], 汉化为 bo 和 en, 分别用 bo 音节字和 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Byrne(s), 伯恩(斯)。

[be], 汉化为 bei, 用 be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Bell, 贝尔; Bellamy, 贝拉米。

[ben], 汉化为 ben, 用 b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Ben, 本; Benjamin, 本杰明。

[bʌ], 汉化为 ba 或 bu, 用 ba 音节字或 b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Buck, 巴克/布克(“布克”之“布”的译音与汉读法有关); Buddy, 巴迪。

[bʌn], 汉化为 ben, 用 b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Bunch(e), 本奇。

[bʌŋ], 汉化为 bang, 用 ba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Bunker([ˈbʌŋkə]), 邦克。

[bou], 汉化为 bo 或 bao, 用 bo 音节字或 ba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Beaufort, 博福特; Bowen, 鲍恩; Bowman, 鲍曼。

[bjʊː], 汉化为 bi 和 you 两个音节, 分别用 bi 音节字和 yo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Beulah, 比尤拉。

[bu], 汉化为 bu 或 bo, 用 bu 音节字或 b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Bulwer, 布尔沃; Bush, 布什; Boleyn, 博林(汉化为 bo 音节应与原词的字母书写形式有关)。

[buː], 汉化为 bu 或 bo, 用 bu 音节字或 b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Booth, 布思; Bovey, 博维。

[buən], 汉化为 bu 和 en 两个音节, 分别用 bu 音节字和 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Boon(e), 布恩。

[baɪə], 汉化为 bai, 用 ba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Byron, 拜伦(“伦”音节是把原文中的字母 r 汉化为声母 l 并与其后的 -on 拼读并汉化而形成的)。

[baɪn], 汉化为 bai 和 yin, 分别用 bai 音节字和 yi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abine, 萨拜因。

[-tʃ], 汉化为 qi, 用 q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Welch[weltʃ], 韦尔奇; Hitchcock, 希契科克; Krutch, 克鲁奇; Quiller-Couch, 奎勒-库奇; Church, 丘奇; Fitch, 费奇; Goodrich, 古德里奇; Hench, 亨奇; Lynch, 林奇; March, 马奇; Trench, 特伦奇。

[tʃæ], 汉化为 cha, 用 ch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Chaplin, 查普林(卓别麟^①); Chapman, 查普曼; Chatham, 查塔姆; Chatterton, 查特顿。

[tʃai], 汉化为 cai, 用 ca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Child(e), 蔡尔德。

[tʃei], 汉化为 cai, 用 ca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Chase, 蔡斯。

[tʃeim], 汉化为 zhang 或 qian, 用 zhang 音节字或 qia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Chamberlain, 张伯伦; Chambers, 钱伯斯。

[tʃɑ:], 汉化为 cha, 用 ch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Charles, 查尔斯; Charley, 查利。

[tʃɑ:], 汉化为 qiao, 用 qia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Chaucer, 乔塞(乔叟^②)。

[tʃe], 汉化为 qie 或 che, 用 qie 音节字或 ch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Chester, 切斯特; Chesnut(t), 切斯纳特; Chesterfield, 切斯特菲尔德; Chesterton, 切斯特顿; Cherry, 彻丽。

① 卓别麟(Charles Chaplin, 1889—1977), 今多写作“卓别林”, 英国电影艺术家, 后在美国、瑞士等国从事电影活动, 编导并主演《淘金记》、《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凡尔杜先生》、《舞台生涯》、《一个国王在纽约》等影片。

② 乔叟(Geoffrey Chaucer, 约 1340—1400), 英国诗人, 代表作有《坎特伯雷故事集》等。

[tʃə], 汉化为 qiu, 用 qi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Church, 丘奇; Churchill, 邱吉尔。

[tʃə], 汉化为 qie 和 er, 分别用 qie 音节字和 er 音节字标记, 例如: Archer, 阿切尔; Mitchell, 米切尔。

[ʃən], 汉化为 xing, 用 xi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Patience, 佩兴斯。

[tʃi], 汉化为 qi, 用 q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Chitty, 奇蒂; Acheson, 艾奇逊。

[tʃou], 汉化为 qiao, 用 qia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Choate, 乔特。

[d-], 汉化为独立的音节 de, 用 d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Dwight, 德怀特。

[-d], 汉化为 de, 用 d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Villard, 维拉德; Dudley, 达德利; Underwood, 安德伍德; Ingrid, 英格丽德; Bird, 伯德; Bernard, 伯纳德; Beard, 比尔德; Goodyear, 古德伊尔; Macleod, 麦克劳德; Conrad, 康拉德; Quintard, 昆塔德; Chesterfield, 切斯特菲尔德; Dodd, 多德; Biddle, 比德尔; Cudworth, 卡德沃斯; Caldwell, 考德威尔; Baldwin, 鲍德温。

[dɔ], 汉化为 duo 或 dao, 用 duo 音节字或 da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Dodd, 多德; Dorothy, 多萝西; Doris, 多丽丝; Dominic(k), 多米尼克; Dodge, 道奇; Dobson, 道布森。

[dɔ:], 汉化为 duo 或 dao, 用 duo 音节字或 da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Dalton, 多尔顿; Dora, 多拉; Dorr, 多尔; Dawson, 道森。

[dɑ:], 汉化为 da, 用 d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Darwin, 达尔文。

[dɑ:n], 汉化为 da 和 en, 分别用 da 音节字和 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Darnley, 达恩利。

[di], 汉化为 di, 用 d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Dill, 迪尔; Dillon, 狄龙; Disney, 迪斯尼; Dick, 迪克; Dickens, 狄肯斯(狄更斯^①); Depew, 迪普;

①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英国作家, 著有长篇小说《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荒凉之屋》、《双城记》等。

Dirac, 迪拉克。

[di:] , 汉化为 di, 用 d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Deland, 迪兰; Delia, 迪莉娅。

[di:n] , 汉化为 di 和 an/en, 分别 di 音节字和 an/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Dean, 迪安; Deane, 迪恩。

[də] , 汉化为 di 或 de, 用 di 音节字或 d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Defoe, 迪福(笛福^①); Durward, 德沃德。

[dɜ:] , 汉化为 de, 用 d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Dirksen, 德克森。

[dɛn] , 汉化为 deng 或 dan, 用 deng 音节字或 da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Dent, 登特; Denton, 丹顿(采用 dan 音节字应主要与音节的协调有关, 即避免相近韵母字连用)。

[dju] , 汉化为 du, 用 d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Durant(e), 杜兰特。

[dju:] , 汉化为 du, 用 d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Du Pont(或 DuPont), 杜邦; Du Bois, 杜波依斯; Du Maurier, 杜莫里埃; Dewey, 杜威。

[dou] , 汉化为 duo, 用 du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Dole, 多尔; Dougherty, 多尔蒂。

[dʌ] , 汉化为 da, 用 d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Duff, 达夫; Dufferin, 达弗林; Dudley, 达德利。有的据原词的书写形式汉化为 dao 或 du, 用 dao 音节字或 d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Douglas(s), 道格拉斯; Dulles, 杜勒斯。这些译名的形成与汉读法有关。亦有因采用谐音和汉读两种方式而有 da、du 两种汉化音节形式, 因此有两种译音, 例如: Dutt, 达特/杜德。

[dʌn] , 汉化为 deng, 用 de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Dunbar, 邓巴; Dundas, 邓达斯; Dunmore, 邓莫尔。如果[dʌn]独立成词, [dʌn]可分化为 deng 和 en, 分别用 deng 音节字和 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Dunne, 邓恩。

① 笛福(Daniel Defoe, 约 1660—1731), 英国小说家, 著有《鲁滨孙漂流记》等。

[dau], 汉化为 dao, 用 da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Dowson, 道森; Doughty, 道蒂。

[dɔi], 汉化为 duo 和 yi, 分别用 duo 音节字和 y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Doyle, 多伊尔。

[dai], 汉化为 dai, 用 da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Dyce, 戴斯。

[-dl], 汉化为 de/dai 和 er, 分别用 de/dai 音节字和 er 音节字标记, 例如: Tyndall ['tindl], 廷德尔; Tyndale ['tindl], 廷代尔。(“廷德尔”与“廷代尔”的差异应与分化同音的原名有关。)

[-dn], 汉化为 deng, 用 de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Arden, 阿登。

[-dr-], 汉化为 de 和 (r→)l, 分别用 de 音节字和 l-音节字标记, 例如: Drake, 德雷克; Draper, 德雷珀; Drayton, 德雷顿; Dreiser, 德莱塞。

[-dz], 汉化为 zi, 用 z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Reynolds, 雷诺兹; Wordsworth, 沃兹沃思(华兹华斯^①)。

[-dʒ], 汉化为 qi,^②用 q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Lodge, 洛奇; Pege, 佩奇; Wedgwood, 韦奇伍德; Madge, 马奇; Coolidge, 库利奇; Dodge, 道奇; Partridge, 帕特里奇; Ridge, 里奇; Rutledge, 拉特利奇; Sedgwick, 塞奇威克; Rutledge, 拉特利奇; Partridge, 帕特里奇; Wedgwood, 韦奇伍德。

[dʒi], 汉化为 ji, 用 j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Giauque, 吉奥克; Girard, 吉拉德; Margie, 玛吉。

[dʒi:], 汉化为 ji, 用 j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Jekyll, 吉基尔。

[dʒi:n], 汉化为 qiong, 用 qio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Jean, 琼; Jeans, 琼斯。也可汉化为 ji 和 en 两个音节, 分别用 ji 音节字和 en 音节字标

①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英国诗人, 湖畔派的代表, 著有长诗《序曲》等。

② “奇”有一读音为 jī(如“奇数”), 与[dʒ]的读音更为接近。也许最早采用“奇”音译[dʒ]的译者就是这么考虑谐音的, 但是现在“奇”的最常用读音是 qí。即便如此, 也当引以为诫, 就是音译用字应避免选择多音字; 如果选择了多音字, 在考虑谐音时, 应注意选择多音字中最常用意义上的读音。当然, 如果把“奇”的读音 jī 作为谐音的考虑, 也可能与方言有关(吴方言上海话、苏州话“奇”的声母为 [dʒ], 可参考)。但按照“奇”字的最常用意义上的普通话读音读, 这样的谐音联系就差了不少。

记,例如:Jean,吉恩;Jeans,吉恩斯。或汉化为 zhen、n-两个音节,分别用 zhen 音节字和 n-音节字标记,例如:Jeanne,珍妮。

[dʒim],汉化为 ji 和 mu 两个音节,分别用 ji 音节字和 mu 音节字标记,例如:Jim,吉姆。如果后接元音,[dʒi]独立自成音节,[m]划归后面的音节,例如:Jimmy,吉米。

[dʒai],汉化为 jia,用 jia 音节字标记,例如:Giles,贾尔斯(詹理斯^①);Regina,丽贾纳。

[dʒə],汉化为 jie,用 jie 音节字标记,例如:Geoffrey,杰弗里;Gerard,杰拉德(杰勒德);Gerald,杰拉尔德;Geraldine,杰拉拉丁;Jeb(b),杰布;Jeremiah,杰里迈亚;Jeremy,杰里米;Jerrold,杰罗尔德;Jerry,杰丽;Jesse,杰西;Jessica,杰西卡;Jessie,杰西;Jevons,杰文斯;Jefferson,杰弗逊;Jeffers,杰弗斯;Jeffrey(s),杰弗里(斯)。亦有个别汉化为 ji、用 ji 音节字标记的,例如:Genevieve,吉纳维夫。

[dʒen],汉化为 zhan,用 zhan 音节字标记,例如:Jenkin(s),詹金(斯);Jenner(s),詹纳(斯);Jennifer,詹妮弗;Jennings,詹宁斯;Jenny,詹妮。

[dʒɔ:],汉化为 qiao,用 qiao 音节字标记,例如:George,乔治;Georgia,乔治娅;Georgina,乔治娜;Jordan,乔丹。

[dʒɔ],汉化为 qiao,用 qiao 音节字标记,例如:Josh,乔西;Joshua,乔舒亚;Joy,乔伊;Joyce,乔伊思;Jonathan,乔纳森。

[dʒɔn],汉化为 yue 和 han 两个音节,分别用 yue 音节字和 han 音节字标记,例如:John,约翰^②;Johnny,约翰尼;Johns,约翰斯;Johnson,约翰逊(约翰生^③);Johnston,约翰斯顿。[dʒɔn]的另一汉化方式是汉

① 此例分析见第八章第三节“二、音素、音素组合及音节结构的汉化的”。

② 词中不发音的 h,采取汉读法,汉化为 h 声母字,在汉化中增添了一个辅音,因此而形成 John ([dʒɔn])的译名“约翰”。

③ 塞缪尔·约翰生(Samuel Johnson, 1709—1784),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创办《漫游者》杂志;编纂第一部《英语词典》;编注《莎士比亚戏剧集》,并作序言。创作有诗歌《伦敦》、《人类欲望的虚幻》,小说《拉塞勒斯》,评传《诗人传》,等。

化为 qiao 和 en 两个音节,例如:Jon(John 的异体),乔恩。

[dʒæ], 汉化为 jie 或 jia, 用 jie 音节字或 jia 音节字标记, 大多用 ji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Jack, 杰克; Jackson, 杰克逊; Jacqueline, 杰奎琳; Jasper, 贾斯珀。

[dʒæn], 汉化为 jian, 用 jia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Jan, 简。

[dʒei], 汉化为 ya 或 jia, 用 ya 音节字或 ji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Jacob, 雅各布(雅各); Jacques, 雅克; Jaques, 贾克斯; Jason, 贾森。另一汉化方式是把[dʒei]汉化为两个音节,[dʒe]汉化为 jie, [-i]汉化为 yi, 分别用 jie 音节字和 y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Jay, 杰伊。

[dʒeim], 汉化为 zhan 和 mu, 分别用 zhan 音节字和 m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James, 詹姆斯(詹姆士)。

[dʒɜ:], 汉化为 jie, 用 ji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Jervis, 杰维斯。

[dʒə], 汉化为 jie 或 qiao, 用 jie 音节字或 qia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Jerome, 杰罗姆; Margery, 玛杰里; Marjorie, 玛乔里。([dʒə]的译名差异显然与原名的拼写不同有关)

[dʒu:], 汉化为 zhu, 用 zh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Jewel(l), 朱厄尔; Jewett, 朱厄特; Jules, 朱尔斯; Julia, 朱莉娅; Julian, 朱利安; Juliana, 朱莉安娜; Julien, 朱利恩; Juliet, 朱丽叶; Julius, 朱利叶斯; Juta, 朱塔; 个别的汉化为 qiu, 用 qi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Jude, 裘德。

[dʒu:n], 汉化为 qiong, 用 qio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June, 琼。

[dʒou], 汉化为 qiao 或 yue, 用 qiao 音节字或 yu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Joe, 乔; Joanna, 乔安娜; Job, 乔布(约伯); Joel, 乔尔; Jonah, 乔纳(约拿); Josephine, 约瑟芬; Joseph, 约瑟夫(约瑟)。^①

① 按照对音规律, 英语原词中的塞擦音[dʒ]一般汉化为声母“zh、q、j”, “约瑟夫/约瑟”作为 Joseph (或 Josef) 的译名, 显然是把原词中的字母 J 读作半元音[j-], 所以形成了零声母字 yue。这一汉读法音译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的译音中很常见。印度尼西亚首都 Jakarta, 读音以[dʒ]开头, 汉语译名是“雅加达”, 也是如此译法。

[dʒoun], 汉化为 qiong, 用 qio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Jon(n), 琼; Jones, 琼斯。

[dʒʌ], 汉化为 jia, 用 ji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Judd, 贾德; Justin, 贾斯廷; Justus, 贾斯特斯。

[ʒei], 汉化为 rui, 用 ru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Roget, 罗瑞。

[f-], 汉化为 fu, 用 f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f(l-)] Flag, 弗拉格; Flanagan, 弗拉纳根; Fleetwood, 弗利特伍德; Fletcher, 弗莱彻; Flint, 弗林特; Florence, 弗洛伦斯; Flora, 弗洛拉; Flynn, 弗林。

~[f(r-)] Francis, 弗朗西斯; Frances, 弗朗西丝; Francisco, 弗朗斯科; Franck, 弗兰克; Franklin, 富兰克林; Freeman, 弗里曼; Frost, 罗斯特; Frick(e), 弗里克。

[-f], 汉化为 fu, 用 f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Duff, 达夫; Joseph, 约瑟夫; Daphne, 达夫妮; Bancroft, 班克罗夫特。

[fəə], 汉化为 fei 和 er, 分别用 fei 音节字和 er 音节字标记, 例如: Fairbank(s), 费尔班克斯。

[fe], 汉化为 fei, 用 fe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Felton, 费尔顿; Fettes, 费蒂斯。

[fei], 汉化为 fei, 用 fe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Faith, 费思; Fay(e), 费伊。

[fæ], 汉化为 fa, 用 f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Farrell, 法雷尔; Farrar, 法勒; Faraday, 法拉第。在 [fæni] 中, [n] 一音两用, 既作为前一音节中的音缀, 又与后面的元音相拼, 例如: Fanny, Fan 汉化为 fan, -ny 汉化为 ni, 分别用 fan 音节字和 ni 音节字标记: 范妮。

[fə], 汉化为 fa, 用 f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Farley, 法利。

[fɔ:], 汉化为 fu, 用 f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Faulkner, 福尔克纳; Fawkes, 福克斯; Ford, 福特; Forbes, 福布斯; Forster, 福斯特。

[fi], 汉化为 fei, 用 fe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Fillmore, 菲尔墨尔(菲尔

墨); Fitzroy, 菲茨罗伊; Phoebe, 菲比; Fitch, 费奇; Fish, 费什; Fisher, 费希尔; Murphy, 墨菲。

[fi:], 汉化为 fei, 用 fe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Felix, 菲利克斯(费利克斯); Field, 菲尔德; Fielding, 菲尔丁; Phyllis, 菲莉斯; Phillpotts, 菲尔波茨; Phil, 菲尔; Phl(l)ip, 菲利普(菲力普); Phil(l)ips, 菲利普斯(菲力普斯)。

[fin], 汉化为 fei 和 en, 分别用 fei 音节字和 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Finn, 费恩。

[fɜ:], 汉化为 fu, 用 f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Fergus, 弗格斯; Fergus(s)on, 福格森(福开森)^①; Furness, 弗内斯; Furnival(l), 弗尼瓦尔。

[fɔ], 汉化为 fu, 用 f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Focke, 福克; Forest, 福雷斯特; Forester, 福雷斯特; Foster, 福斯特; Fox, 福克斯。

[fou], 汉化为 fu, 用 f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Foley, 福利(弗利)。

[fau], 汉化为 fu, 用 f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Fowler, 福勒。

[fu], 汉化为 fu, 用 f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Fuller, 富勒; Fulton, 富尔顿。

[fʌŋ], 汉化为 fen 或 feng, 用 fen 音节字或 fe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Funk, 芬克(丰克)。

[faɪə], 汉化为 fei 和 ya, 分别用 fei 音节字和 y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ophia, 索菲娅。

[g-], 汉化为 ge, 用 g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g(l-)] Gladstone, 格拉德斯通(格莱斯顿); Gladys, 格拉迪斯; Glass, 格拉斯; Gloag, 格洛格; Glyn, 格林。

~[g(r-)] Grace, 格雷斯; Grant, 格兰特; Green, 格林; Greenland, 格林兰; Grey, 格雷; Grote, 格罗特; Grove(s), 格罗夫(斯)。

[-g], 汉化为 ge, 用 g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Gloag, 格洛格; Kellogg,

① 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 1866—1945), 美国人, 1886 年来中国传教, 1888 年在南京成立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的前身之一), 任监督。1897 年任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督学。

凯洛格; Kornberg, 柯恩伯格; Flagg, 弗拉格; Douglas(s), 道格拉斯; Ogden, 奥格登; Wagner, 瓦格纳; Zangwill[ˈzæŋgwɪl], 赞格威尔; Ingrid[ˈɪŋɡrɪd], 英格丽德。

[geɪ], 汉化为 gai 或 jia, 用 gai 音节字或 jia 音节字标记, 以 gai 音节字为多, 例如: Gates, 盖茨; Gaitskell, 盖茨克尔; Gage, 盖奇; Geilen, 盖伦; Gabriel, 加布里埃尔。若[geɪ]自成音节, 则汉化为两个音节, 一为 gai, 一为 yi([i]独立自成音节 yi), 例如: Gay, 盖伊。

[geɪn], 汉化为两个音节, [geɪ]汉化为 gai, [-n]汉化为 en, 分别用 gai 音节字和 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Gaines, 盖恩斯。

[gæ], 汉化为 gai 或 jia, 用 gai 音节字或 ji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Gallup, 盖洛普; Garret(t), 加勒特; Garrison, 加里森。

[ɡɔː], 汉化为 gao 或 ge, 用 gao 音节字或 g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Galsworthy, 高尔斯沃西(高尔斯华绥^①); Galt, 高尔特; Galton, 高尔顿(哥尔登)。

[ɡɒ], 汉化为 ge 或 gao, 用 ge 音节字或 ga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Goddard, 戈达德; Godman, 戈德曼; Goss(s), 戈斯; Gough, 高夫。

[ɡɑː], 汉化为 jia, 用 ji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Garcia, 加西亚; Garden, 加登; Gardiner, 加德纳; Gardner, 加德纳; Garland, 加兰; Garner, 加纳。

[ɡɑːn], 汉化为 jia 和 en, 分别用 jia 音节字和 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pingarn, 斯平加恩。

[ɡeə], 汉化为 jia, 用 ji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Gary, 加里。

[ge], 汉化为 ge, 用 g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Gerry, 格里。

[ɡɪ], 汉化为 ji, 用 j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Gibbs, 吉布斯; Gibson, 吉布森; Gibbon(s), 吉本(斯); Gill, 吉尔; Gilman, 吉尔曼; Gilmer, 吉尔

① 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 1867—1933), 英国作家, 著有《岛国的法利赛人》、《福尔赛世家》等小说和戏剧作品。

默; Gillingham, 吉林厄姆; Girard, 吉拉德; Gissing, 吉辛。

[gou], 汉化为 ge, 用 g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Golden, 戈尔登; Golding, 戈尔丁。

[gə], 汉化为 ge 或 jia, 用 ge 音节字或 ji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Go-lightly, 格莱特利; Godolphin, 戈多尔芬; Olga, 奥尔加。

[gə:], 汉化为 ge, 用 g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Gershwin, 格什温; Gertrude, 格特鲁德。

[gu], 汉化为 gu, 用 g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Goodyear, 古德伊尔; Goodrich, 古德里奇。

[gu:], 汉化为 gu, 用 g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Gould(e), 古尔德。

[gʌn], 汉化为 gang 或 gen, 用 gang 音节字或 g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Gunther, 冈瑟(根室); Gunter, 冈特。

[gai], 汉化为 gai 和 yi, [-i]既作为前一音节中的音素, 又独立自成音节, 分别用 gai 音节字和 y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Guy, 盖伊。

[gi], 汉化为 ji, 用 j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Peggy, 佩吉。

[hæ], 汉化为 ha, 用 ha 音节字, 例如: Hadley, 哈德利; Hadow, 哈多; Hal, 哈尔; Hallam, 哈勒姆; Halley, 哈利。

[hæm], 汉化为 ha 和 mu, 分别用 ha 音节字标记和 m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Hamlin, 哈姆林。亦可汉化为 han 音节, 用 han 音节字标记, 以减少整个译名的音节数量, 例如: Hampton, 汉普顿; Hampden, 汉普登。如果[hæm]后有元音或含有元音的音素组合, 可将[hæ]汉化为 ha, 用 ha 音节字标记, [m]与其后的音素组合拼合, 例如: Hammond, 哈蒙德。[m]还可一音两用, 既作为前一音节的音缀(汉化为-n尾), 又以[m]音与后接元音拼合, 例如: Hamilton, 汉密尔顿。

[hæn], 汉化为 han, 用 han 音节字记, 例如: Hand, 汉德; Handel, 汉德尔; Hanna, 汉纳; Hans, 汉斯; Hansen, 汉森; Hansom, 汉萨姆。

[hei], 汉化为 hei 或 hai, 用 hei 音节字或 ha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Haes, 黑斯; Hale(s), 黑尔(斯); Haman, 海曼(哈曼)^①; Hay, 海; Hayes, 海斯; Hays, 海斯; Haywood, 海伍德。

[hɔ:] , 汉化为 huo, 用 hu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Hale, 霍尔; Halstead, 霍尔斯特德; Hawk(e), 霍克; Hawkins, 霍金斯; Hawthorn(e), 霍索恩(霍桑)^②。

[hɔ:n] , 汉化为 huo 和 en, 分别用 huo 音节字和 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Hornby, 霍恩比。

[hɔ] , 汉化为 huo 或 hao, 用 huo 音节字或 ha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Hobbes, 霍布斯; Hocking, 霍金; Hogg, 霍格; Hogben, 霍格本; Hollis, 霍利斯; Holman, 霍尔曼; Hopkin(s), 霍普金(斯); Hopkinson, 霍普金森; Horace, 霍勒斯(贺拉斯^③); Hoyle, 豪伊尔; Hoyt, 豪伊特。

[hɑ:] , 汉化为 ha, 用 h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Harcourt, 哈考特; Harding, 哈丁; Harden, 哈登; Harley, 哈利; Hart(e), 哈特(赫德); Harvey, 哈维; Harper, 哈珀。

[hi:] , 汉化为 xi, 用 x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Heber, 希伯; Healy, 希利。

[hi] , 汉化为 xi, 用 x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Hicks, 希克斯; Hickok, 希科克; Higginson, 希金森; Hilary, 希拉里; Hill, 希尔; Hillman, 希尔曼; Hilton, 希尔顿; Hitchcock, 希契科克。

[hju:] , 汉化为 xiu, 用 xi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Hewlett, 休利特; Hubert, 休伯特; Hugh, 休; Hughes, 休斯(休士)^④; Hume, 休姆(休谟)^⑤。

① “哈曼”应是按照汉读法形成的译名。

② 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 美国小说家, 著有长篇小说《红字》等。

③ 贺拉斯·曼(Horace Mann, 1786—1859), 美国教育家, 推行公共教育制度, 主张国民教育必须是普及性的、免费的、世俗化的, 对美国各州国民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

④ 休士(Langston Hughes, 1902—1967), 美国黑人作家, 著有诗集《疲倦的歌》、小说《不是没有笑的》、剧本《混血儿》等。

⑤ 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 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 著有《人性论》、《论审美趣味的标准》等。

曾有[hju:]汉化为yu的,例如:Hugo,雨果。

[hæ:],汉化为he,用he音节字标记,例如:Herbert,赫伯特;Hersey,赫西;Herter,赫脱;Hurley,赫尔利;Hurst,赫斯特。

[he],汉化为he或hai,用he音节字或hai音节字标记,例如:Hector,赫克托;Heming,赫明;Herrick,赫里克;Helen,海伦;Helena,海伦娜;Hemingway,海明威。

[hen],汉化为heng,用heng音节字标记,例如:Henry,亨利;Hench,亨奇;Henderson,亨德森;Henley,亨利。

[hou],汉化为huo,用huo音节字标记,例如:Holt,霍特;Holtham,霍瑟姆;Holman,霍尔曼;Holme(s),霍姆(斯)/霍尔姆(斯);Homer,霍默(荷马);Home([houm]),霍姆。Home另有一读[hju:m],汉化形式为xiu,用xiu音节字标记,Home则为“休姆”。

[hu],汉化为hu,用hu音节字标记,例如:Hood,胡德;Hooker,胡克。

[hu:],汉化为hu或hao,用hu音节字或hao音节字标记,例如:Hooton,胡顿;Hoover,胡佛;Hoodini,豪迪尼;Hooston,豪斯顿。

[hau],汉化为hao或huo,用hao音节字或huo音节字标记,例如:Howe,豪;Howse,豪斯;Hoosman,豪斯曼;Howard,霍华德。

[hʌ],汉化为he或ha,用he音节字或ha音节字标记,多用he音节字,例如:Hudson,赫德森;Hull,赫尔;Hutt,赫特;Huxley,赫克斯利(赫胥黎^①，“胥”为字母x的汉读法译音);Huggins,哈金斯。

[hʌn],汉化为heng,用heng音节字标记,例如:Hunt,亨特;Hunter,亨特;Huntington,亨廷顿。

[hʌm],汉化为han,用han音节字标记,例如:Humphr(e)y,汉弗莱。

[hai],汉化为hai,用hai音节字,例如:Hyde,海德。

[haiə],汉化为hai,用hai音节字标记,例如:Hiram,海勒姆。

①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英国博物学家,是第一个提出人类起源问题的学者。

[heə], 汉化为 hei 和 er, 分别用 hei 音节字和 er 音节字标记, 例如:

O'Hare, 奥黑尔。

[hwɔ:], 汉化为 wo, 用 w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Wharton, 沃顿。

[hwi:], 汉化为 hui, 用 hu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Wheatley, 惠特利(惠特莱); Wheeler, 惠勒。

[hwi], 汉化为 hui, 用 hu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Whipple, 惠普尔; Whistler, 惠斯勒; Whitman, 惠特曼; Whitney, 惠特尼; Whittaker, 惠特克; Whittier, 惠蒂尔(惠梯尔)。

[hwai], 汉化为 huai, 用 hua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White, 怀特; Whitefield, 怀特菲尔德; Whitehead, 怀特黑德。

[-k-], 出现在别的辅音字母前, 汉化为独立的音节 ke, 用 k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k(ɪ)]: Clinton, 克林顿; Clare, 克莱尔; Claudia, 克劳迪娅; Klaus, 克劳斯。

~[k(r-)]: Cram, 克拉姆; Crick, 克里克; Christie, 克里斯蒂;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 Krebs, 克雷布斯; Kreisler, 克赖斯勒; Kroll, 克罗尔; Krutch, 克鲁奇。

[-k-], 汉化为独立的音节 ke, 用 k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McClellan, 麦克莱伦; McClure, 麦克卢尔; McDonald, 麦克唐纳; McDowell, 麦克道尔; McFee, 麦克菲; McMillan, 麦克米兰。

[-k], 汉化为独立的音节 ke, 用 k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Crick, 克里克; Black, 布莱克; Birkbeck, 伯克贝克; Belloc, 贝洛克; Remarque, 雷马克; Mark, 马克。

[-ks], 汉化为 ke 和 si, 分别用 ke 音节字和 s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Felix, 菲利克斯; Fox, 福克斯; Huxley, 赫克斯利; Wilcox, 威尔科克斯; Beatrix, 比阿特丽克斯; Saxton, 萨克斯顿; Rex, 雷克斯; Vaux, 沃克斯; Max, 马克思。

[kæ], 汉化为 ka 或 kai, 用 ka 音节字或 ka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Cabell, 卡贝尔; Calvert, 卡尔弗特; Calvin, 卡尔文; Carol, 卡罗尔; Catherine, 凯瑟琳; Kathleen, 凯思琳; Kathy, 凯茜。

[ke], 汉化为 kai, 用 ka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Kelland, 凯兰; Kellogg, 凯洛格; Keller, 凯勒; Kell(e)y, 凯利; Keppel, 凯普尔。

[ken], 汉化为 ken, 用 k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Ken, 肯; Kenny, 肯尼; Kennedy, 肯尼迪; Kenneth, 肯内思; Kent, 肯特。

[kem], 汉化为 ken, 用 k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Kemble, 肯布尔。

[kei], 汉化为 kai, 用 ka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Cade, 凯德; Cable, 凯布尔; Kate, 凯特; Kay(e), 凯。

[kein], 汉化为 ka 和 en, 分别用 kai 音节字和 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Kane, 凯恩。

[kɔ:], 汉化为 kao 或 ke, 用 kao 音节字或 ke 音节字标记, 以 kao 音节字为多, 例如: Calder, 考尔德; Caldwell, 考德威尔; Kaufman(n), 考夫曼; McCormick, 麦考密克; McCormack, 麦考马克/麦科马克; Cora, 科拉。

[kɔ:n], 汉化为 ke 和 en, 分别用 ke 音节字和 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Kornberg, 科恩伯格。

[kɔ], 汉化为 ke, 用 k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Cocker, 科克尔; Coffey, 科菲。

[kɔ:n], 汉化为 kang, 用 ka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Constance, 康斯坦斯; Conrad, 康拉德; Constantine, 康斯坦丁; Connie, 康妮。

[kəə], 汉化为 kai 或 ka, 用 kai 音节字或 k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Carey, 凯里; Cary, 卡里。

[kə-], 汉化为 ka, 用 k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Camilla, 卡米拉。^①

① “常见英美姓名表”中, Columbus[kə'lʌmbəs](哥伦布), [kə]的汉化合音为 ge, 这应是保留的历史译名。[kə]汉化为 ge 应与方言音译有关。广州话“哥”的读音为平声[kə], 可为参考。

[-kə], 汉化为 ke 和 er, 分别用 ke 音节字和 er 音节字标记, 例如:

Dekkeer, 德克尔。

[kə:] , 化为 ke, 用 k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Curme, 柯姆; Kirk, 柯克;

Kermit, 克米特。

[kə:n], 汉化为 ke 和 en, 分别用 ke 音节字和 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Kern, 柯恩。

[kɑ:], 汉化为 ka, 用 k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Carl, 卡尔; Karl, 卡尔;

Carmen, 卡门; Carnegie, 卡内基; Carpenter, 卡彭特; Carter, 卡特。

[kou], 汉化为 ke, 用 k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Cody, 科迪; Cocke, 科

克; Cohen, 科恩; Cole, 科尔。

[kʌ], 汉化为 ke 或 ka, 用 ke 音节字或 k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Currer, 柯勒; Curry, 柯里; Cudworth, 卡德沃斯; Culross, 卡尔罗斯。

[kʌm], 汉化为 kan, 用 ka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Cumberland, 坎

伯兰。

[kʌn], 汉化为 kang 或 kan, 用 kang 音节字或 kan 音节字标记, 例

如: Constable, 康斯特布尔; Cunningham, 坎宁安。^①

[ki:], 汉化为 ji, 用 j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Keats, 基茨(济慈^②);

Keble, 基布尔; Keith, 基思。

[ki:n], 汉化为 ji 和 en, 分别用 ji 音节字和 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Kean(e), 基恩。

[ki], 汉化为 ji, 用 j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Kidd, 基德; Kilmer, 基尔

默; Kitty, 基蒂; Kissinger, 基辛格; Kipling, 基普林; Becky, 贝基; Laski,

拉斯基; Leakey, 利基; Willkie, 威尔基。

① Cunningham[ˈkʌniŋəm], [n]一音二用, 分别汉化为 kan 音节和 ning 音节, 用 kan 音节字和 ning 音节字分别标记为“坎”、“宁”; 坎宁安。

② 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 英国诗人, 所作抒情诗最为著名, 如《夜莺颂》、《秋颂》、《希腊古瓮赞》等。还有以希腊神话为题材的长诗《恩底弥翁》、《赫披里昂》。

[kin], 汉化为 jin, 用 ji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Kinkaid, 金凯德; Kinsey, 金西。又: Aiken['eikin], 艾肯, [-kin] 汉化为 ken(肯), 是汉读法译成的译名。

[kiŋ], 汉化为 jin, 用 ji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King, 金; Kingsley, 金斯利(金斯莱)。①

[ku], 汉化为 ku, 用 k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Cook(e), 库克; Kusch, 库什。

[ku:], 汉化为 ku, 用 k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Coolidge, 库利奇; Cooper, 库珀。

[kuə], 汉化为 ku 和 er, 分别用 ku 音节字和 er 音节字标记, 例如: Kurt, 库尔特。

[kwei], 汉化为 kui 和 yi, 分别用 kui 音节字和 y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Quay, 奎伊。

[kwein], 汉化为 kui 和 en, 分别用 kui 音节字和 yi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Quain, 奎因。

[kwi], 汉化为 kui, 用 ku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Quick, 奎克; Quiller, 奎勒; Quiller-Couch, 奎勒-库奇; Quilter, 奎尔特; Quitman, 奎特曼。

[kwin], 独立的[kwin]汉化为 kui 和 yin, 分别用 kui 音节字和 yi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Quin(n), 奎因。[kwin]位于多音节词中, [kwin]可汉化为 kun, 用 ku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Quinault, 昆纳尔特; Quinc(e)y, 昆西; Quintard, 昆塔德。

[kwin], 独立的[kwin]汉化为 kui 和 yin, 分别用 kui 音节字和 yi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Queen, 奎因。[kwin]位于多音节词中, 汉化为 kun, 用 ku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Queensberry, 昆斯伯里。

[kwen], 汉化为 kun, 用 ku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Quentin, 昆廷。

① 金斯莱(Charles Kingsley, 1819—1875), 英国作家, 著有长篇小说《酵母》、《阿尔顿·洛克》, 历史小说《西去》、儿童读物《小婴孩》等。

[kwaɪə], 汉化为 kui 和 er, 分别用 kui 音节字和 er 音节字标记, 例如: Quirey, 奎厄里。

[-l-], 汉化为 er, 用 er 音节字标记, 例如: Alden, 奥尔登; Eldon, 埃尔登; Bulwer, 布尔沃; Calder, 考尔德; Kilmer, 基尔默; Galsworthy, 高尔斯沃西(高尔斯华绥); Galt, 高尔特; Galton, 高尔顿(哥尔登); Jules, 朱尔斯; Hamilton, 汉密尔顿; Gilman, 吉尔曼; Gilmer, 吉尔默; Golden, 戈尔登; Golding, 戈尔丁; Holman, 霍尔曼; Dalton, 多尔顿。但[-l-]也可以省略不译, 例如: Baldwin[ˈbɑːldwin], 鲍德温。

[-l-], 汉化为 er, 用 er 音节字标记, 例如: Abel, 艾贝尔; Abigail, 阿比盖尔; Adele, 阿黛尔; Angell, 安吉尔; Ingersoll, 英格索尔; O'Neil, 奥尼尔; Bill, 比尔; Biddle, 比德尔; Ball, 鲍尔; Kroll, 克罗尔; Gill, 吉尔; Jekyll, 吉基尔; Jewel(1), 朱厄尔; Joule, 朱尔(焦耳^①); Joel, 乔尔; Handel, 汉德尔; Caldwell, 考德威尔; Carl, 卡尔; Karl, 卡尔; Constable, 康斯特布尔。

[læ], 汉化为 la, 用 l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Ladefoged, 拉迪福吉德; Larry, 拉里; Laski, 拉斯基; Lattimore, 拉铁摩尔。

[læm], 汉化为 lan, 用 la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Lampson, 兰普森; Lambert, 兰伯特。Lamb 有音译异名“兰姆”和“拉姆”, 前者是把[-m]一音两用, 既作为前一音节的韵尾(汉化为-n 韵尾), 又作为后一汉化音节的声母; 后者是把[læm]汉化为音节 la 和音节 mu。

[læn], 汉化为 lan, 用 la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Landon, 兰登; Landor, 兰道; Lanny, 兰尼。

[læŋ], 汉化为 lan, 用 la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Langley, 兰利; Langmuir, 兰米尔; Langton, 兰顿; Lankester[ˈlæŋkɪstə], 兰克斯特。亦

① 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James Prescott Joule, 1818—1889), 英国物理学家, 测定了热的功当量, 为建立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做出了贡献。他的名字被用以命名功、热和能量的国际单位制单位。

有采取汉读法的音译,即把[læŋ]汉化为lan和ge,分别用lan音节字和ge音节字标记,例如:Lange[læŋ],兰格;Langland,兰格兰。

[læ],汉化为lai和er,分别用lai音节字和er音节字标记,例如:Laird,莱尔德;Claire,克莱尔;Clare,克莱尔;Clara,克莱拉。[læ]亦有采取汉读法汉化为lai和ya两个音节之例,例如:Layard[læd],莱亚德。

[le],汉化为lai,用lai音节字标记,例如:Lesley,莱斯莉;Leslie,莱斯利;Lester,莱斯特。

[lei],汉化为lai,用lai音节字标记,例如:Lake,莱克;Leon,莱昂。

[lein],汉化为lai或en,分别用lai音节字和en音节字标记,例如:Lane,莱恩。

[lə],汉化为la,用la音节字标记,例如:Lamar,拉马尔;Lanier,拉尼尔。

[-lən],汉化为lun,用lun音节字标记,例如:Arlen,阿伦。

[lɑ:],汉化为la,用la音节字标记,例如:Larkin,拉金;Lardner,拉德纳。

[lɑ:n],汉化为lan,用lan音节字标记,例如:Lance,兰斯;Lancelot,兰斯洛特。

[lɔ:],汉化为lao,用lao音节字标记,例如:Law,劳;Laura,劳拉;Lawes,劳斯;Lawson,劳森。

[lɒ],汉化为lao或luo,用lao音节字或luo音节字标记,例如:Laurel,劳雷尔;Laurence,劳伦斯;Lock(e),洛克;Locker,洛克;Lockhart,洛克哈;Lodge,洛奇;Lorenzo,洛伦佐。

[lɔi],汉化为lao和ai,分别用lao音节字和ai音节字标记,例如:L(l)oyd,劳埃德。

[li:],汉化为li,用li音节字标记,例如:Lee,李;Leigh,利;Le(i)la,莉拉;Leith,利思;Leakey,利基;Leland,利兰;Lever,利弗;Leta,利塔;Lisa,莉萨;Leacock,利科克。

[lin], 汉化为 lin, 用 li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Aileen, 艾琳。

[li], 汉化为 li, 用 l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Lily, 莉莉; Lil(l)ian, 莉莲; Lyly, 利利(李利); Lilienthal, 利连撒尔; Liddel(l), 利德尔; libby, 利比; Lip(p)man(n), 李普曼; Lipton, 李普顿; Little, 利特尔; Littleton, 利特尔顿; Lizzie, 莉齐; Lytton, 利顿(李顿)。又: Wheatley ['hwitli], 惠特利/惠特莱; Macaulay [mə'kɔ:li], 麦考利/麦考莱^①, “莱”应是以汉读法译成的。

[lin], 汉化为 lin 和 en, 分别用 lin 音节字和 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Lynn, 林恩。

[lin-], 汉化为 lin, 用 li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Lynd, 林德; Lynch, 林奇; Lindsay, 林赛; Linda, 琳达; Lindbergh, 林德伯格(林伯)。

[ljə], 汉化为 li 和 ia, 分别用 li 音节字和 i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Delia, 迪莉娅。

[liə], 汉化为 li 和 er, 分别用 li 音节字和 er 音节字标记, 例如: Lear, 利尔(李尔)。

[liən], 汉化为 lian, 用 lia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Trevelyan, 特里维廉; Lilienthal, 利连撒尔。

[lju(:)], 汉化为 liu, 用 li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Lewes, 刘易斯; Lewis, 刘易斯。

[lju:], 汉化为 lu, 用 l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Luce, 卢斯(“卢”应是汉读法形成的音节)。

[lin], 汉化为 lin, 用 li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Lincoln, 林肯; Linklater, 林克莱特。

[lou], 汉化为 luo, 用 lu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Logan, 洛根; Lois, 洛

① 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Baron Macaulay, 1800—1859), 英国历史学家, 作家。著有《詹姆士二世登极后的英国史》、《古罗马歌曲》等。

伊丝; Lowell, 洛厄尔; Lowes, 洛斯。

[lʌ], 汉化为 luo, 用 lu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Lough, 洛夫; Lovell, 洛弗尔; Lover, 洛弗。也有 [lʌ] 汉化为 lu 的个别情况: Ludwig, 路德维格。

[lʌn], 汉化为 lun, 用 lu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London, 伦敦。

[lɒŋ], 汉化为 lang, 用 la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Long, 朗; Longfell-
low, 朗费罗; Longman, 朗曼; Longstreet, 朗斯特里特。

[lɒn], 汉化为 lang, 用 la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Lonsdale, 朗斯代尔。

[lau], 汉化为 lao, 用 la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Klaus, 克劳_斯; Macleod, 麦克劳_德。

[lu:], 汉化为 lu, 用 l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Lucy, 露_西; Lucia, 露_西
娅; Lucas, 卢_卡斯; Lucretia, 卢_克丽霞; Louie, 路_易; Louis, 路_易斯;
Louisa, 路_易莎; Louis, 路_易丝。

[lim], 汉化为 lin, 用 li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Lympany, 林_帕尼。

[lai], 汉化为 lai, 用 la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Lyle, 莱_尔; Lyman,
莱_曼。

[laiə], 汉化为 lai, 用 la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Lyell, 莱_尔。

[laiən], 汉化为 lai 和 ang, 分别用 lai 音节字和 ang 音节字标记, 例
如: Lyon(s), 莱_昂(斯)。

[-m], 汉化为 mu, 用 m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Occam, 奥_克姆; Op-
penheim, 奥_本海_姆; Basham, 巴_沙姆; Cram, 克_拉姆; Chatham, 查_塔姆;
Gillingham, 吉_林厄_姆; Jim, 吉_姆; Jerome, 杰_罗姆; Hallam, 哈_勒姆;
Hansom, 汉_萨姆; Hume, 休_姆; Holtham, 霍_瑟姆; Home, 霍_姆; Hiram,
海_勒姆; Lamb, 兰_姆; Beecham, 比_彻姆; Barham, 巴_勒姆; Blom, 布_洛姆;
Hamlin, 哈_姆林; Plimsoll, 普_利姆索_尔; Ramsay ['ræmzi], 拉_姆齐;
Ramsden, 拉_姆斯登; Remsen, 雷_姆森; Romney, 罗_姆尼; Samson, 萨_姆
森。

[mæ], 汉化为 mai 或 ma, 用 mai 音节字或 ma 音节字标记, 以 mai

音节字为多,例如:MacAdam,麦克亚当;MacArthur,麦克阿瑟;Macaulay,麦考利(麦考莱);MacCracken,麦克拉肯;MacDonald,麦克唐纳;MacDowell,麦克道尔(麦克道威尔^①);Mac(k),麦克;Mackay(e),麦凯;Maclaren,麦克拉伦;Maclean(e),麦克莱恩;Macleish,麦克利什;McIntosh,麦金托什;Macleod,麦克劳德;MacMillan,麦克米伦;MacPherson,麦克弗森;Macready,麦克里迪;McCarthy,麦卡锡;McClellan,麦克莱伦;McClure,麦克卢尔;McCormack,麦考马克(麦科马克);McCormick,麦考密克;McDonald,麦克唐纳;McDowell,麦克道尔;McFee,麦克菲;McKenna,麦肯纳(麦克纳);McKinley,麦金利;McMillan,麦克米兰;Malone,马隆;Maria,玛丽亚;Marina,玛丽娜。

[mə],汉化为 mo,用 mo 音节字标记,例如:Mercedes,默西迪斯;Merlin,默林;Merton,默顿;Mervin,默文;Myrtle,默特尔;Murphy,墨菲。

[mæ],汉化为 mai 或 ma,用 mai 音节字或 ma 音节字标记,例如:MacDonnell,麦克唐奈;Mackintosh,麦金托什;McIntyre,麦金太尔;McNamara,麦克纳马拉;Madeline,马德琳;Madge,马奇;Maggie,马奇;Malan,马伦;Malcolm,马尔科姆;Malory,马罗礼;Malthus,马尔萨斯;Massine,马辛;Masson,马森;Matthew,马修(马太);Matthews,马修斯;Maturin,马图林;Max,马克思;Maxwell,马克思韦尔。

[mæn],汉化为 man,用 man 音节字标记,例如:Manfred,曼弗雷德;Mann,曼;Manning,曼宁;Mansfield,曼斯菲尔德;Manson,曼森;Manuel,曼纽尔。

[mɔ],汉化为 mo,用 mo 音节字标记,例如:Maurice,莫里斯;Morris,莫里斯;Morrison,莫里森;Molly,莫莉;Motley,莫特利;Mott,

① 麦克道威尔(Edward MacDowell, 1861—1908),美国作曲家,裔出克尔特族。作有交响诗《兰斯乐与艾伦》等三部、组曲两部(第二部为《印第安》)、钢琴协奏曲两部、钢琴奏鸣曲四部(第四部为《克尔特》)以及钢琴曲、歌曲等。

莫特。

[mɔː], 汉化为 mo, 用 m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Morgan, 摩根(摩尔根^①); Morley, 莫利; Morse, 莫尔斯^②; Morton, 莫顿; Malts, 莫尔茨(马尔茨、马尔兹)。独立成词的[mɔː]有汉化为 mo 和 er 之例, 例如: More, 莫尔。

[mɒn], 汉化为 meng, 用 me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Mond, 蒙德; Monsarrat, 蒙萨拉特; Montagu(e), 蒙塔古; Monte, 蒙蒂。

[mɒm], 汉化为 mo 和 mu, 分别用 mo 音节字和 m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Maugham, 莫姆/毛姆^③(“毛姆”是不同的谐音选择而造成的)。

[mʌ], 汉化为 ma 或 mo, 用 ma 音节字或 m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Muller, 马勒; Murray, 默里。

[mɑː], 汉化为 ma, 用 m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Mass, 马斯; March, 马奇; Marcia, 马西娅; Marcus, 马库斯; Marlin, 马林; Mark, 马克; Markham, 马克姆; Marlene, 马琳; Marlowe, 马洛; Marshall (1), 马歇尔; Martin, 马丁; Marva, 玛瓦; Marvin, 马文; Martineau, 马蒂诺; Margaret, 玛格丽特; Mara, 玛拉; Martha, 玛莎; Margery, 玛杰里; Margie, 玛吉; Marie, 玛丽; Margot, 玛戈; Marguerite, 玛格丽特。

[meɪ], 汉化为 mei, 用 me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Mabel, 梅布尔; Mailer, 梅勒; Mamie, 梅米; Maitland, 梅特兰; May, 梅; Mayer(s), 梅耶(斯)。

① 刘易斯·亨利·摩根(Le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 美国民族学家, 原始社会史学家。民族学进化学派的先驱者, 著有《易洛魁联盟》、《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古代社会》等著作。托马斯·亨特·摩根(Thomas Hunt Morgan, 1866—1945), 美国实验胚胎学家、遗传学家, 对遗传学的发展有卓越的贡献。在孟德尔定律的基础上, 创立了基因学说。著有《基因论》、《实验胚胎学》等。

② 莫尔斯(Samuel Finley Breese Morse, 1791—1872), 美国发明家, 电报发明者。

③ 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 英国作家, 文艺批评家。著有自传体小说《人类枷锁》、长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寻欢作乐》、《刀锋》等, 还写有《圆圈》等三十多部剧本和短篇小说集《全在一起》以及文艺评论。

[me], 汉化为 mei, 用 me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Maynard, 梅纳德; Mellon, 梅隆; Melva, 梅尔瓦; Melba, 梅尔巴; Melville, 梅尔维尔; Melvin, 梅尔文; Menuhin, 梅纽因。

[meŋ], 汉化为 men, 用 m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Mencken, 门肯。

[men], 汉化为 men, 用 m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Mendelssohn, 门德尔森(门德尔松)。

[mein], 汉化为 mei 和 en, 用 mei 音节字和 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Main, 梅恩。

[mɛə-], 汉化为 ma, 用 m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Mary, 玛丽; Maryann, 玛丽安。

[mi:], 汉化为 mi, 用 m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Mead(e), 米德; Michel(le), 米歇尔。

[mi], 汉化为 mi, 用 m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Michelson, 米切尔森; Michener, 米切纳; Mickey, 米基; Middleton, 米德尔顿; Mildred, 米尔德里德; Milford, 米尔福德; Mill, 米尔; Millais, 米莱; Millard, 米勒德; Millay, 米勒; Millicent, 米莉森特; Millie, 米莉; Millikan, 米利肯; Milne, 米尔恩; Milner, 米尔纳; Milton, 米尔顿(弥尔顿^①); Mirabel, 米拉贝尔; Miranda, 米兰达; Miriam, 米丽亚姆; Mitchell, 米切尔; Mitford, 米特福德。当 [mi] 后接 [n-], 书写形式上有两个 n 连写时, 可把音节重组为 [min] 和 [n-], 分别汉化为 ming 音节和 n- 音节, 例如: Minnie, 明妮。

[mai], 汉化为 mai, 用 ma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Michael, 迈克尔; Milo, 迈洛(米洛, “米”应是汉读法形成的音节); Minot, 迈洛特。

[maɪə], 汉化为 mai, 用 ma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Myra, 迈拉; Myron, 迈伦; Meyer, 迈耶(迈尔)。

① 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 英国诗人、政论家, 主要作品有三部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等。

[mou], 汉化为 mo, 用 m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Moses, 摩西; Moulton, 摩尔顿; Mona, 莫娜。

[mən], 汉化为 men、meng 或 man, 用 men 音节字、meng 音节字或 ma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Monro (e), 门罗; Montgomery, 蒙哥马利; Bowman, 鲍曼。

[muː], 汉化为 mu, 用 m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Moody, 穆迪; Mooney, 穆尼。

[muə], 汉化为 mu/mo 和 er, 分别用 mu/mo 音节字和 er 音节字标记, 例如: Moore, 穆尔(摩尔)。

[mɑːn], 汉化为 man, 用 ma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Mander, 曼德。

[maʊn], 汉化为 meng, 用 me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Mountbatten, 蒙巴顿。

[mjuə], 汉化为 mu, 用 m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Muriel, 穆丽尔(应是汉读法的音译)。

[mʌm], 汉化为 mang, 用 ma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Mumford, 芒福德。

[nə-], 汉化为 na, 用 n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Nabarro, 纳巴罗; Nathaniel, 纳撒尼尔。

[-nə], 汉化为 na, 用 n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MacDonald, 麦克唐纳。

[nei], 汉化为 nei, 用 ne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Nahum, 内厄姆; Naomi, 内奥米; Nathan, 内森; Neva, 内瓦。

[næ], 汉化为 na, 用 n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Nash, 纳什。

[næn], 汉化为 nan, 用 na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Nancy, 南希。

[ne], 汉化为 nei 或 na, 用 nei 音节字或 na 音节字标记, 以 nei 音节字为多, 例如: Nedra, 内德拉; Ned, 内德; Nelda, 内尔达; Nell, 内尔; Nellie, 内莉; Nettie, 内蒂; Nevins, 内文斯; Nelson, 纳尔逊。

[niː], 汉化为 ni, 用 n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Neil, 尼尔; Nina, 尼娜。

[ni], 汉化为 ni, 用 n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Nicholas, 尼古拉斯;

Nichol(s), 尼科尔(斯); Nicholson, 尼科尔森; Nick, 尼克; Nicol(l), 尼科尔; Nicolson, 尼科尔森; Nimitz, 尼米兹; Nixon, 尼克松。

[nju], 汉化为 niu, 用 ni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Newbolt, 纽博尔特; Newell, 纽厄尔; Newman(n), 纽曼; Newton, 牛顿。

[nai], 汉化为 nai, 用 na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Nye, 奈; Nigel, 奈杰尔; Nightingale, 奈廷格尔(南丁格尔^①); Niles, 奈尔斯。

[nou], 汉化为 nuo, 用 nu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Noah, 诺亚; Noble, 诺布尔(诺贝尔^②); Noel, 诺埃尔; Nola, 诺拉; Nolan, 诺兰; Nona, 诺娜; Martineau, 马蒂诺; Snow, 斯诺。

[nɔ:], 汉化为 nuo, 用 nu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Nora(h), 诺拉(娜拉^③); Norbert, 诺伯特; Norma, 诺玛; Norman, 诺曼; Norton, 诺顿; North, 诺思; Northcliffe, 诺思克里夫。

[nɒ], 汉化为 nuo, 用 nu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Norris, 诺里斯; Noyes, 诺伊斯。

[njə], 汉化为 ni 和 ya, 分别用 ni 和 ya 音节字标记: Virginia, 弗吉尼亚; Tanya, 塔尼亚。

[njə], 汉化为 ni 和 er, 分别用 ni 音节字和 er 音节字标记, 例如: Lanier, 拉尼尔。

[p-], 汉化为 pu, 用 p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p(l-)]: Plimsoll, 普利姆索尔。

~[p(r-)]: Pratt, 普拉特; Prescott, 普雷斯科特; Prestige, 普雷斯特奇; Preston, 普雷斯顿; Prevost, 普雷沃斯特; Price, 普赖斯; Pride, 普赖德; Priestley, 普里斯特利(普里斯特莱); Prior, 普赖尔; Priscilla, 普

① 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 英国女护士, 欧美近代护理学创始人。

② 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le, 1833—1896), 瑞典化学家、工程师。根据其遗嘱, 以其遗产的大部分作为基金, 设置了“诺贝尔奖金”。

③ 《娜拉》(又名《玩偶之家》), 话剧剧本,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所作。

丽西拉; Pritt, 普里特; Proust, 普鲁斯特; Prudence, 普鲁登斯; Prynne, 普林。

[-p], 汉化为 pu, 用 p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Kipling, 基普林; Chaplin, 查普林; Chapman, 查普曼; Phil(l)ips, 菲利普斯(菲力普斯); Hampton, 汉普顿; Hampden, 汉普登; Hopkin(s), 霍普金(斯); Hopkinson, 霍普金森; Lampson, 兰普森; Lip(p)man(n), 李普曼; Lipton, 李普顿; Phl(l)ip, 菲利普(菲力普); Gallup, 盖洛普; Sharp, 夏普。

[pei], 汉化为 pei, 用 pe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Page, 佩奇; Paley, 佩利; Pater, 佩特; Patience, 佩兴斯。

[pein], 汉化为 pei 和 en, 分别用 pei 音节字和 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Payne, 佩恩。

[pɔ:], 汉化为 bo, 用 b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Paula, 波拉; Pauline, 波琳; Pauling, 波林; Porter, 波特; Portal, 波特尔; Portia, 波西娅; Portland, 波特兰。

[pɑ:], 汉化为 pa, 用 p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Park, 帕克(派克^①); Parkman, 帕克曼; Palmer, 帕尔默; Parley, 帕利; Parnell, 帕内尔; Parr, 帕尔; Parson, 帕森; Partridge, 帕特里奇; Palmerston, 帕默斯顿; Palgrave, 帕尔格雷夫。

[pæ], 汉化为 pa, 用 p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Passe, 帕斯; Paris, 帕里斯; Pamela, 帕梅拉; Pat, 帕特; Pattison, 帕蒂森; Patty, 帕蒂; Patrick, 帕特里奇。

[paŋ], 汉化为 pan, 用 pa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Pankhurst, 潘克斯特。

[peə], 汉化为 pei 和 er, 分别用 pei 音节字和 er 音节字标记, 例

① “派克”的译名与方言有关。吴方言“派”的读音可为参考。

如: Pare(s), 佩尔(斯)。

[pə], 汉化为 pa, 用 p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Patricia, 帕特里夏。

[pi:], 汉化为 pi, 用 p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Peabody, 皮博迪; Peacock, 皮科克; Peal, 皮尔; Peel(e), 皮尔; Pegram, 皮格勒姆(佩格勒姆, 译音“佩”的形成, 应与字母拼写形式 Pe 有关, Peg[peg] 译为“佩格”和 Peggy[‘pegi] 译为“佩吉”, 可为参照); Pete, 皮特; Petrie, 皮特里。个别的汉化为 bi, 例如: Peters, 彼特(斯), 应与方言口音的音译有关。

[pi], 汉化为 pi, 用 p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Pearson, 皮尔森; Pickering, 皮克林; Picket(t), 皮克特; Pierce, 皮尔斯; Pigou, 皮古; Pinero, 皮尼罗; Pitman, 皮特曼; Pitt, 皮特(庇特)。①

[piŋ], 汉化为 ping, 用 pi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Pinckney, 平克尼; Pinkerton, 平克顿。

[pe], 汉化为 pei, 用 pei 音节字, 例如: Peg, 佩格; Peggy, 佩吉; Pepys, 佩皮斯; Perry, 佩里; Petty, 佩蒂。

[pen], 独立的[pen]汉化为 pei 和 en 两个音节, 例如: Penn, 佩恩。多音节词中的[pen]汉化为 peng, 用 pe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Pennell, 彭内尔。当[pen]后接元音时,[n]一音两用, 既作为前一音节的音缀, 又与后接元音拼合, 例如: Penny, 彭妮。

[pou], 汉化为 bo, 用 b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Polk, 波尔克; Pope, 波普; Poupart, 波帕特; Poe, 波(坡)。有因原名拼写不同而汉化为不同音节之例, 例如当书写形式是 Pow 时(读作[pou]), 汉化为 bao, 用 ba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Powel(l), 鲍威尔。

[pɔ], 汉化为 bo, 用 b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Pol(l)itt, 波利特(波利

① [pi]在汉语中通常用送气清塞音声母的 pi 标记, 用不送气清塞音声母的 bi 音节字标记, 与方言口音有关, 如闽南话口音的音译就是如此, 这在东南亚一带的地名音译中很常见。

得); Pollock, 波洛克; Polly, 波莉。

[pɒn], 汉化为 pang, 用 pa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Pons, 庞斯。

[pau], 汉化为 bo, 用 b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Pownall, 波纳尔。

[pu], 汉化为 pu, 用 p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Pulitzer, 普利策(帕利策^①); Pullman, 普尔曼。

[pə:], 汉化为 po, 用 p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Purcell, 珀塞尔; Purchas, 珀切斯; Percy, 珀西; Pearl, 珀尔; Perkin(s), 珀金(斯); Pershing, 珀欣。

[pjʊ:], 汉化为 pu, 用 p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Pusey, 普西。

[pai], 汉化为 pai, 用 pa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Pike, 派克; Pyle, 派尔; Pye, 派伊。

[pim], 汉化为 pi 和 mu, 分别用 pi 音节字和 m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Pym, 皮姆。

[rei], 汉化为 lei 或 la, 用 lei 音节字或 l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Rae, 雷; Ray, 雷; Rachel, 雷切尔; Rayleigh, 雷利; Raymond, 雷蒙德; Ralgh, 拉尔夫; Rafael, 拉斐尔。

[rae], 汉化为 la, 用 l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Radcliffe, 拉德克利夫; Raglan, 拉格伦。

[raem], 汉化为 la 和 mu, 分别用 la 音节字和 m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Ramsay, 拉姆齐; Ramsden, 拉姆斯登。

[raeŋ], 汉化为 lan 或 lun, 用 lan 音节字或 lu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Randal, 兰德尔; Randy, 兰迪; Ransom, 兰塞姆; Randolph, 伦道夫。

[rʌ], 汉化为 la、luo 或 lu, 用 la 音节字、lu 音节字或 lu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Rush, 拉什; Rusk, 腊斯克; Ruskin, 拉斯金(罗斯金^②); Rus-

① Pulitzer 译为“帕利策”，有可能是当初的误译，即把开头的 Pu-读作[pʌ]。

② 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英国政论家、艺术评论家、画家。著有《近代画家》、《建筑的七盏明灯》、《威尼斯之石》、《芝麻与百合》、《野橄榄花冠》等。绘画以水彩画为主。

sell, 拉塞尔(罗素^①); Rutledge, 拉特利奇; Rutherford, 拉瑟福德(卢瑟福^②); Runyon, 鲁尼恩。Lu 音节字的形成应与汉读法有关; Luo 音节字的形成应与方言口音的汉读法音译有关, 如吴方言苏州话“罗”读作[ləu]。

[rɑ:], 汉化为 la, 用 la 音节字, 例如: Raman, 拉曼。

[rɑ:n], 汉化为 lan, 用 lan 音节字, 例如: Rance, 兰斯。

[rə], 汉化为 lei, 用 le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Ramon, 雷蒙; Ramona, 雷蒙娜; Remarque, 雷马克。

[re], 汉化为 lei, 用 le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Reading, 雷丁(里丁, “里”音节的形成应与汉读法有关); Redmond, 雷德蒙; Rene, 雷内; Rex, 雷克斯; Reginald, 雷金纳德; Remington, 雷明顿; Remsen, 雷姆森; Reynold, 雷诺; Reynolds, 雷诺兹。

[ri:], 汉化为 li, 用 l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Reba, 丽巴; Read(e), 里德(李德); Reid, 里德; Reese, 里斯; Rena, 丽娜; Rhys, 里斯; Rita, 丽塔。

[ri], 汉化为 li, 用 l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Rebecca, 丽贝卡; Regina, 丽贾纳; Revere, 里维尔; Ricardo, 里卡多(李嘉图^③); Richard, 理查德(理查); Richards, 理查兹; Richardson, 理查森(理查逊); Ridge, 里奇; Ridley, 理德利; Ridpath, 里德帕斯; Ripley, 里普利; Ripman, 里普曼; Ritchie, 里奇。

[riə], 汉化为 li 和 ya, 分别用 li 音节字和 y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Rhea, 丽亚。亦有汉化为 lei 和 ya 的, 例如: Rhea, 雷亚。

[-riən], 汉化为 li 和 en/an, 分别用 li 音节字和 en/a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Marian, 玛丽安; Marion, 马里恩。

① 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

② 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 1871—1937), 物理学家, 生于新西兰, 后定居英国, 研究原子结构和放射性现象有重要成就。

③ 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 英国经济学家,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 著有《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

[ren], 汉化为 lei 和 en, 分别用 lei 音节字和 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Wren, 雷恩。

[ru:], 汉化为 lu, 用 l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Reuben, 鲁本; Ruben, 鲁宾; Ruby, 鲁比; Rudolph, 鲁道夫; Rudy, 鲁迪; Rufus, 鲁弗斯; Rupert, 鲁珀特。

[rɔ:], 汉化为 luo, 用 lu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Rawlinson, 罗林森。

[rɔ:], 汉化为 luo, 用 lu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Rob, 罗布; Robbins, 罗宾斯; Robert, 罗伯特; Roberts, 罗伯茨; Roberson, 罗伯逊; Robin, 罗宾; Robinson, 罗宾逊(鲁宾逊, 鲁宾孙^①); Rockefeller, 洛克菲勒; Rockingham, 罗金厄姆; Roderic(k), 罗德里克; Rodgers, 罗杰斯; Rodney, 罗德尼; Rodger, 罗杰; Roget, 罗瑞; Rogers, 罗杰斯; Rodney, 罗德尼; Roger, 罗杰; Rogers, 罗杰斯; Rolf(e), 罗尔夫; Rollin, 罗林; Romney, 罗姆尼; Ronald, 罗纳德; Ross, 罗斯; Rosalie, 罗莎丽; Roscoe, 罗斯科;

[rɔi], 汉化为 luo 和 yi, 分别用 luo 音节字和 y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Royal(l), 罗伊尔; Royce, 罗伊斯。

[rɔn], 汉化为 lang, 用 la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Ronda, 朗达。

[rai], 汉化为 lai, 用 la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Rice, 赖斯; Ryder, 赖德; Ryland, 赖兰; Riley, 赖利; Wright, 赖特; Arkwright, 阿克赖特。

[rain], 汉化为 lai 和 yin, 分别用 lai 音节字和 yi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Rinehart, 赖因哈特(莱因哈特)。

[rou], 汉化为 luo, 用 lu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Rhoda, 罗达; Rhodes, 罗兹; Roberta, 罗伯塔; Robertson, 罗伯逊; Robeson, 罗伯逊; Robins, 罗宾斯; Rochelle, 罗谢尔; Romanes, 罗马尼斯; Roosevelt, 罗斯福; Rosa, 罗莎; Rose, 罗斯; Rosebery, 罗斯伯里; Rosemary, 罗斯玛丽; Rosetta, 罗泽塔; Rowley, 罗利。

① 《鲁宾孙漂流记》，英国小说家笛福所作。

[s-], 汉化为 si, 用 si 音节字标记,^①例如:

~[s(k-)]:Schofield, 斯科菲尔德; Schuyler, 斯凯勒; Scott, 斯科特(司各特; 司各脱^②); Scripps, 斯科里普斯; Skeat, 斯基特; Skelton, 斯克尔顿。

~[s(l-)]:Slater, 斯莱特; Sloan, 斯隆; Slocum, 斯洛克姆。

~[s(m-)]:Smedley, 斯梅德利(史沫特莱^③); Smith, 史密斯^④。

~[s(n-)]:Snow, 斯诺; Snowden, 斯诺登。

~[s(p-)]:Spalding, 斯波尔丁; Sparks, 斯帕克斯; Spenser, 斯潘塞(斯宾塞^⑤); Spingarn, 斯平加恩; Springhall, 斯普林霍尔。

~[s(t-)]:Stan, 斯坦; Standish, 斯坦迪什; Standley, 斯坦德利; Stanford, 斯坦福; Stanley, 斯坦利; Stanton, 斯坦顿; Stark(e), 斯塔克; Steed, 斯蒂德; Steinbeck, 斯坦贝克; Stella, 斯特拉; Stephen, 斯蒂芬; Stephens, 斯蒂芬斯; Sterling, 斯特林; Sterne, 斯特恩; Stewart, 斯图尔特; Still(e), 斯蒂尔; Stilwell, 斯迪威; Stoddard, 斯托达德; Stoke, 斯托克; Stone, 斯通; Stormonth, 斯托蒙思; Stimson, 斯迪森(史汀生^⑥); Story, 斯托里; Stoughton, 斯托顿; Stow(e), 斯托; Strafford, 斯特拉福德; Steve, 史蒂夫; Steven, 史蒂文; Stevenson, 史蒂文森。

- ① 有的译名用 sh 声母字与之对应, 应与方言口音的音译有关, 如“Steve 史蒂夫、Stevenson 史蒂文森、Straus(s) 施特劳(斯)”, 在许多方言中, “史、施”的声母都是 s。汉语中的许多早期译名都有方言口音的背景。
- ② 司各特/司各脱(Walter Scott, 1771—1832), 英国诗人, 历史学家。
- ③ 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 1890—1950), 美国女作家, 新闻记者, 著有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和记述朱德生平的《伟大的道路》及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短篇小说、杂文集《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攻》、《中国的战歌》等。
- ④ Smith(史密斯)这一沿用已久的常见译名, 开头的 S 用翘舌音声母字记录当与方言语音有关, 在许多方言中, 诸如“史”之类的翘舌音声母是读成平舌音的。例如在新加坡, SARS 曾有的译名是“沙士”(现在一般写为“沙斯”), “沙士”二字在闽南口音的华语中都是念平舌音声母 s 的。
- ⑤ 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 1552—1599),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人。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ser, 1820—1903), 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
- ⑥ 史汀生(Henry Lewis Stinson, 1867—1950), 曾任美国国务卿。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 时任国务卿的史汀生提出了“史汀生主义”, 亦称“不承认主义”, 重申美国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 不承认日本独占中国东北为“合法”, 不承认中日签定的任何损及美国在华权益的条约或协定。

~[s(tr-)]: Strachey, 斯特雷奇; Straus(s), 斯特劳斯(施特劳斯^①)。

[-s], 汉化为 si, 用 s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Forster, 福斯特; Constance, 康斯坦斯; Constantine, 康斯坦丁; Chester, 切斯特; Chesnut(t), 切斯纳特;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 Forest, 福雷斯特; Houston, 豪斯顿; Lesley, 莱斯莉; Ernest, 欧内斯特; Oscar, 奥斯卡; Christie, 克里斯蒂;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

Amis, 艾米斯; Enders, 恩德斯; Ickes, 伊克斯; Inness, 英尼斯; Ulysses, 尤利塞斯(尤利西斯); Iris, 艾丽斯; Banks, 班克斯; Boris, 鲍里斯; Boniface, 博尼费斯; Beatrice, 比阿特丽斯; Klaus, 克劳斯; Culross, 卡尔罗斯; Chase, 蔡斯; Douglas(s), 道格拉斯; Dyce, 戴斯; Francis, 弗朗西斯; Phyllis, 菲莉斯; Fergus, 弗格斯; Phyllis, 菲莉斯; Fawkes, 福克斯; Forbes, 福布斯; Jevons, 杰文斯; Hicks, 希克斯。

[sæ], 汉化为 sa, 用 s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abin, 萨宾; Sabine, 萨拜因; Sackville, 萨克维尔; Saxton, 萨克斯顿; Savage, 萨维奇; Sammy, 萨米。亦有个别的[sæ]汉化为 se, 例如: Samuel, 塞缪尔。

[sæm], 汉化为 sa 和 mu, 分别用 sa 音节字和 m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am, 萨姆; Samson, 萨姆森。[sæm]后接唇音时, [sæm]汉化为一个音节 sa, 用 sa 音节字标记, 以避免与其后的双唇音不协调, 例如: Sampson, 萨普森。

[sæn], 汉化为 sang, 用 sa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andberg, 桑德伯格; Sandford, 桑福德; Sandra, 桑德拉。

[sæŋ], 汉化为 sang, 用 sa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anger ['sæŋgə], 桑格。

① 约翰·施特劳斯(Johann Strauss, 1825—1899), 奥地利作曲家, 所作圆舞曲 400 余首, 以旋转舞步的快速律动为特征, 世称“维也纳圆舞曲”, 著名作品有《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艺术家的生涯》、《春的气息》等。又作有《蝙蝠》、《吉卜赛男爵》等轻歌剧及各种舞曲。其父(同名, 1804—1849)亦作有大量圆舞曲及各种舞曲。

[sei], 汉化为 sai, 用 sa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adie, 塞迪; Sage, 塞奇。

[sein], 汉化为 sai 和 en, 分别用 sai 音节字和 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ainsbury, 塞恩斯伯里; 或汉化为 sen, 用 s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ainsbury, 森茨伯里。

[sə], 汉化为 sa 或 se, 用 sa 音节字或 s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apir, 萨皮尔; Saroyan, 萨罗扬(萨洛扬); Sassoon, 萨松; Spenser, 斯潘塞; Spencer, 斯潘塞。(译音“塞”的形成应与根据字母拼写形式的汉读法有关。)

[sə:], 汉化为 se 或 suo, 用 se 音节字或 su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ervice, 塞维斯; Sophia, 索菲娅。

[sɑ:], 汉化为 sa, 用 s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argent, 萨金特(沙尔金)。

[sɔ:], 汉化为 suo, 用 su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aul, 索尔; Sawyer(s), 索耶(斯)。

[sɔ:n], 汉化为 sang, 用 sa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aundra, 桑德拉。

[si:], 汉化为 xi, 用 x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eashore, 西肖尔; Seaborg, 西博格; Seeger, 西格; Senior, 西尼尔; Seward, 西沃德; Seymour, 西摩。

[si], 汉化为 xi 或 se, 用 xi 音节字或 s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igmund, 西格蒙德; Sigrid, 西格丽德; Silvia, 西尔维亚; Simon, 西蒙; Sisley, 西斯利; Sybil, 西比尔; Sebastian, 塞巴斯蒂安; Cicely, 西瑟莉; Cissy, 锡西; Cecily, 塞西莉; Cecilia, 塞西莉亚。(译音“塞”的形成应与 Ce 的书写形式有关)

[siə], 汉化为 si 和 er, 分别用 si 音节字和 er 音节字标记, 例如: Landseer, 兰西尔。

[sim], 汉化为 xin, 用 xi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impson, 辛普森。

[siŋ], 汉化为 xin, 用 xi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inclair, 辛克莱; Singer [ˈsiŋə], 辛格(“格”是把本来不单独发音的字母 g 分化出来作为辅音与

后接音素组合而成的音节)。独立成词的[siŋ]汉化为 xin 和 ge, 分别用 xin 音节字和 g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ynge, 辛格。

[se], 汉化为 se, 用 s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elden, 塞尔登; Selma, 塞玛; Sedgwick, 塞奇威克; Seth, 塞思; Cecil, 塞西尔。

[sai], 汉化为 sai, 用 sa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ymington, 赛明顿; Sykes, 赛克斯。又, Simon, 作为姓氏, 有两读, 一读['saimən], 一读[si'moun]。译名“西蒙”是读音[si'moun]的语音对应法的译音, Simon 作为男子名, 读作['saimən], 译名“西蒙”是采用汉读法译成的。

[sou], 汉化为 suo, 用 su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off, 索夫; Sonia, 索妮娅; Sophia, 索菲娅。

[sa], 汉化为 sa, 用 s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ullivan, 萨利文(沙利文); Sully, 萨利; Summer, 萨默; Surry, 萨里。

[sʌm], 汉化为 sa 和 mo, 分别用 sa 音节字和 m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umner, 萨默纳。

[sau], 汉化为 suo, 用 su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outh, 索斯; Southey, 索塞(骚塞^①); Southwell, 索斯韦尔。

[sju:], 汉化为 xiu, 用 xi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ue, 休。

[-sn], 汉化为 sen, 用 s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Benson, 本森; Manson, 曼森; Mawson, 莫森; Michelson, 米切尔森; Morison, 莫里森。

[f-], 汉化为 shi, 用 sh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chwabe, 施瓦布; Schwann, 施沃恩; Schnabel, 施纳贝尔。

[-ʃ], 汉化为 shi, 用 sh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Bush, 布什; Kusch, 库什; Fish, 费什; Nash, 纳什; Rush, 拉什; Standish, 斯坦迪什; Walsh, 沃尔什; Mackintosh, 麦金托什; Gershwin, 格什温。

① 骚塞(Robert Southey, 1774—1843),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著有长诗《克哈马的诅咒》、歌谣《贝克莱老妇》等。

[ʃiː], 汉化为 xi, 用 x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heila, 希拉; Shelia, 希莉亚。

[ʃɪŋ], 汉化为 sheng, 用 she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Washington, 华盛顿。

[ʃɔː], 汉化为 xiao 和 er, 分别用 xiao 和 er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eashore, 西肖尔。

[ʃɔːn], 汉化为 xiao 和 en, 分别用 xiao 音节字和 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ean, 肖恩。

[ʃuː], 汉化为 shu, 用 sh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chuman(n), 舒曼; Shute, 舒特。

[ʃʊː], 汉化为 shu 和 er, 分别用 shu 和 er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churz, 舒尔茨。

[ʃæ], 汉化为 sha, 用 sh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harkleton, 沙克尔顿。

[ʃɑː], 汉化为 xia 或 sha, 用 xia 音节字或 sh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harp, 夏普; Charlotte, 夏洛特(夏洛蒂^①); Shaftesbury, 沙夫茨伯里。

[ʃeɪ], 汉化为 sha, 用 sh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

[ʃə-], 汉化为 xia 或 xue, 用 xia 音节字或 xu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hapiro, 夏皮罗; Chevalier, 薛瓦利埃(同样的读音用不同的音节对应, 显然与词的字母书写形式有关)。

[-ʃə], 汉化为 xi 和 er, 分别用 xi 音节字和 er 音节字标记, 例如: Fisher, 费希尔。

[ʃəː], 汉化为 she, 用 sh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herwin, 舍温; Sherwood, 舍伍德。

[ʃeə], 汉化为 sa, 用 s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ara(h), 萨拉; Saralee,

① 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Brontë, 1816—1855), 英国女作家, 著有长篇小说《简·爱》等。

萨拉莉(sa 音节字应采用汉读法形成的)。

[fe], 汉化为 xie, 用 xi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helby, 谢尔比; Shelley, 谢利(雪莱^①); Shelley, 谢莉; Shephard, 谢泼德; Sherriff, 谢里夫; Sheridan, 谢里登(谢立丹); Sherrill, 谢里尔; Sherrington, 谢灵顿; Sherry, 谢丽。

[fen], 汉化为 shen, 用 sh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henstone, 申斯通。

[-t], 汉化为 te, 用 t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Portland, 波特兰; Quitman, 奎特曼; Fleetwood, 弗利特伍德; Golightly, 格莱特利; Maitland, 梅特兰; Rutledge, 拉特利奇; Ernest, 欧内斯特; Babbitt, 巴比特; Bancroft, 班克罗夫特; Beaufort, 博福特; Calvert, 卡尔弗特; Kent, 肯特; Kate, 凯特; Kurt, 库尔特; Quinault, 昆纳尔特; Chesnut(t), 切斯纳特; Dwight, 德怀特; Dent, 登特; Dutt, 达特(杜德^②); Frost, 弗罗斯特; Tout, 陶特; Forest, 福雷斯特; Grant, 格兰特; Garret(t), 加勒特; Galt, 高尔特; Jewett, 朱厄特; Hoyt, 豪伊特; Harcourt, 哈考特; Herbert, 赫伯特; Hurst, 赫斯特; Hewlett, 休利特; Hubert, 休伯特; Holt, 霍特; Hutt, 赫特; Galt, 高尔特; Lambert, 兰伯特; Lancelot, 兰斯洛特; Margaret, 玛格丽特; Newbolt, 纽博尔特; Norbert, 诺伯特; Pratt, 普拉特; Prescott, 普雷斯科特; Prevost, 普雷沃斯特; Priestley, 普里斯特利; Pritt, 普里特; Proust, 普鲁斯特; Pat, 帕特; Pankhurst, 潘克赫斯特; Pitman, 皮特曼; Rupert, 鲁珀特; Rinehart, 赖因哈特; Skeat, 斯基特; Yost, 约斯特。

[tæ], 汉化为 ta, 用 t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Taft, 塔夫脱; Tanya, 塔尼亚; Tarring, 塔林; Tatiana, 塔蒂安娜。

[tə], 汉化为 te, 用 t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Tamara, 特玛拉; Teresa,

① 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著名诗篇《西风颂》、《云雀颂》的作者, 著有《致英国人民》、《1819年的英国》、《专制魔王的化妆游行》等诗篇, 还有理论著作《诗辩》。

② 译音“德”的形成应与方言口音的音译有关。

特丽萨。有把词首次音节的[tə]汉化为 tuo 之例,例如:Tobias [tə'baɪəs],托拜厄斯。译音“托”的形成显然与根据字母书写形式的汉读法有关。

[tei],汉化为 te 或 ta,用 te 音节字或 ta 音节字标记,例如:Taylor,特勒; Tate,塔特; Tatum,塔特姆。(译音“塔”显然是汉读法音译形成的。)

[tɒ],汉化为 tuo,用 tuo 音节字标记,例如:Thomas ['tɒməs],托马斯。

[tau],汉化为 tao,用 tao 音节字标记,例如:Tout,陶特; Taussig,陶西格。

[te],汉化为 te,用 te 音节字标记,例如:Ted,特德; Tedder,特德; Teddy,特迪; Teller,特勒; Terence,特伦斯; Terrell,特雷尔; Terrill,特里尔; Terry,特丽。又,Tennyson ['tenɪsn]的译名“坦尼森”(丁尼生^①),其中的[n]一音两用,既与前面的[te]拼合为[ten],又与其后的元音拼合为[nɪ]。

[tem],汉化为 tan,用 tan 音节字标记,例如:Temple,坦普尔。

[tʌ],汉化为 ta,用 ta 音节字标记,例如:Tuttle,塔特尔。

[ti:],汉化为 di,用 di 音节字标记,例如:Teasdale,蒂斯代尔; Tina,蒂娜。

[ti],汉化为 te,用 te 音节字标记,例如:Theresa,特丽沙。

[tin],汉化为 ting,用 ting 音节字标记,例如:Tyndall,廷德尔; Tyndale,廷代尔。

[tim],汉化为 di 和 mu,分别用 di 音节字和 mu 音节字标记,例如:Tim,蒂姆。

[tai],汉化为 tai,用 tai 音节字标记,例如:Titus,泰特斯。

[taɪə],汉化为 tai 和 er,分别用 tai 音节字和 er 音节字标记,例如:McIntyre,麦金太尔。

① 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英国诗人,著有诗作《公主》、《毛黛》、《国王之歌》等。

[tu], 汉化为 tuo, 用 tu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Tone, 托恩; Tony, 托尼; Toni, 托妮。

[tɒm], 汉化为 tang 和 mu, 分别用 tang 音节字和 m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Tom, 汤姆。

[tuə], 汉化为 tu 和 er, 分别用 tu 音节字和 er 音节字标记, 例如: Tours, 图尔斯。

[tauə], 汉化为 tuo 和 er, 分别用 tuo 音节字和 er 音节字标记, 例如: Tower(s), 托尔斯。

[taun], 汉化为 tang, 用 ta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Town(e), 汤; Townes, 汤斯。

[toin], 汉化为 tuo 和 yin, 分别用 tuo 音节字和 yi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Toynbee, 托因比。又 [toin] 汉化为 tang 和 yin, 分别用 tang 音节字和 yi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Toynbee, 汤因比①。

[trei], 汉化为 te 和 lei, 分别用 te 音节字和 le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Tracy, 特蕾西; Strachey, 斯特雷奇。

[træ], 汉化为 te 和 la, 分别用 te 音节字和 l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Travis, 特拉维斯。

[tri], 汉化为 te 和 li, 分别用 te 音节字和 l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Tree, 特里; Longstreet, 朗斯特里特。

[tren], 汉化为 te 和 lun, 分别用 te 音节字和 lu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Trent, 特伦特; Trench, 特伦奇。

[tri], 汉化为 te 和 li, 分别用 te 音节字和 l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Trevelyan, 特里维廉; Beatrice, 比阿特丽斯; Beatrix, 比阿特丽克斯; Partridge, 帕特里奇; Patrick, 帕特里克; Patricia, 帕特里夏。

① 汤因比(Arnold Jeseeph Toynbee, 1889—1975), 英国历史学家, 历史形态学派主要代表, 代表作有《历史研究》十二卷。

[trɔ], 汉化为 te 和 luo, 分别用 te 音节字和 lu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Trollop, 特罗洛普; Troy, 特罗伊。

[trau], 汉化为 te 和 lao, 分别用 te 音节字和 la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traus(s), 斯特劳(s)斯。

[tru:], 汉化为 te 和 lu, 分别用 te 音节字和 l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Truddy, 特鲁迪; Gertrude, 格特鲁德。又, [tru:] 汉化为 du 和 lu, 分别用 du 音节字和 l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Truman, 杜鲁门。^①

[tə:], 汉化为 te, 用 t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Turner, 特纳。

[tən], 汉化为 te 和 en, 分别用 te 音节字和 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terne, 斯特恩。

[tu:], 汉化为 tu, 用 t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Tussaud, 图索。

[twi:], 汉化为 te 和 wei, 分别用 te 音节字和 we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Tweed, 特威德。

[-tn], 汉化为 dun, 用 du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Morton, 莫顿。

[-ts], 汉化为 ci、ce、zi, 用 ci 音节字、ce 音节字或 z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Oates, 奥茨; Schurz[furts], 舒尔茨; Watts, 瓦茨; Pulitzer, 普利策(帕利策); Nimitz, 尼米兹(译音“策”、“兹”的形成应与原词拼写形式有关)。

[-ðə], 汉化为 se, 用 s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Withers, 威瑟斯; Rutherford, 拉瑟福德。

[-ði], 汉化为 se, 用 s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outhey, 索塞(骚塞)。

[-θ], 汉化为 si, 用 s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Keith, 基思; Booth, 布思; Kenneth, 肯内思; Faith, 费思; Leith, 利思; North, 诺思; Northcliffe, 诺思克里夫; Stormanth, 斯托蒙思; Seth, 塞思; Woolworth, 伍尔沃思; Wordsworth, 沃兹沃思。

① [tr-]在汉译中分化为两个部分, 其中的 t 用汉语中声母为 d 的音节字标记, 应与历史上的方言音译有关。在新加坡、马来西亚, 闽方言口音的音译大都是如此译法。

[θæ], 汉化为 sa, 用 s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Thad, 萨德; Thaddeus, 萨迪厄斯。

[θə], 汉化为 se, 用 s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Thelma, 塞尔玛。

[θi], 汉化为 xi, 用 x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Theron, 西伦; Kathy, 凯茜。

[θiə], 汉化为 xi 和 ao, 分别用 xi 音节字和 a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Theobald, 西奥博尔德; Theodore, 西奥多(译音“奥”的形成应与原字母书写形式有关)。

[θɔ:], 汉化为 suo, 用 su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Thoreau, 索罗(梭洛^①)。

[θɔ:n], 汉化为 sang, 用 sa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Thorndike, 桑代克(桑戴克^②)。

[θɜ:], 汉化为 se, 用 s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Thurber, 瑟伯; Thurman, 瑟曼; Thurston, 瑟斯顿。

[θə], 汉化为 se, 用 s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Arthur, 阿瑟(亚瑟); Catherine, 凯瑟琳; Katharine, 凯瑟琳; Gunther, 冈瑟; MacArthur, 麦克阿瑟。

[θəm], 汉化为 se 和 mu, 分别用 se 音节字和 m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Holtham, 霍瑟姆。

[-v], 汉化为 fu, 用 f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teve, 斯蒂夫。

[væ], 汉化为 wa, 用 w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Val, 瓦尔; Valentine, 瓦伦丁。

[væn], 汉化为 fan, 用 fa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Van, 范; Van Allen, 范阿伦(范艾伦); Vanbrugh, 范布勒; Vanburen, 范布伦; Vancouver, 范库弗; Vandegrift, 范德格里夫特; Vandenberg, 范登堡; Vanderbilt, 范德比尔特; Van Doren, 范多伦; Vandyke, 范德克; Van Fleet, 范弗利特(范佛里特); Vansittart, 范西塔特。个别异名是把[væn]汉化为 wan, 用

① 梭洛(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 美国作家, 著有散文集《华尔腾, 或林中的生活》等。

② 桑戴克(Edward Lee Thorndike, 1874—1949), 美国心理学家, 美国教育心理学的奠基人, 著有《教育心理学》、《学习原理》、《人性与社会秩序》等。

wan 音节字标记,与汉化为 fan 音节的译名形成异名,例如:Vance, 范斯/万斯。

[vein],汉化为 wen,用 wen 音节字标记,例如:Vein,文。

[vaɪə],汉化为 wei 和 ao,分别用 wei 音节字和 ao 音节字标记,例如:Viola,维奥拉;Violet,维奥莱特。

[vou],汉化为 wo,用 wo 音节字标记,例如:Vaudin,沃丁;Vogt,沃格特。

[vɔ:],汉化为 wo,用 wo 音节字标记,例如:Vaux,沃克斯。

[vɔ:n],汉化为 wo 和 en,分别用 wo 音节字和 en 音节字标记,例如:Vaughan,沃恩。

[von],汉化为 feng,用 feng 音节字标记,例如:Yvonne,伊冯。

[ve],汉化为 wei,用 wei 音节字标记,例如:Velblen,维布伦;Velma,维尔玛。

[vi:],汉化为 wei,用 wei 音节字标记,例如:Vida,维达。

[vi],汉化为 wei,用 wei 音节字标记,例如:Veronica,维朗妮卡;Vicki,维基;Victor,维克托;Victoria,维多利亚;Villard,维拉德;Vivian,维维安。

[vin],汉化为 wen,用 wen 音节字标记,例如:Vinson,文森;Vincent,文森特;Marvin,马文。

[viə-],汉化为 wei,用 wei 音节字标记,例如:Vera,维拉(“拉”音节系字母 r 汉化为声母 l 并与其后的 a 拼合而成)。

[-viə],汉化为 wei 和 er,分别用 wei 音节字和 er 音节字标记,例如:Revere,里维尔。

[væ:],汉化为 fu,用 fu 音节字标记,例如:Verner,弗纳;Vernon,弗农;Virgil,弗吉尔。

[væn:],汉化为 fu 和 en,分别用 fu 音节字和 en 音节字标记,例如:Vern(e),弗恩。

[və-], 汉化为 fu, 用 f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Virginia, 弗吉尼亚。

[-və], 汉化为 wa, 用 w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Melya, 梅尔瓦。

[-vn], 汉化为 wen, 用 w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teven ['stivn], 斯蒂文。

[wei], 汉化为 wei, 用 we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Wade, 韦德; Wakefield, 韦克菲尔德。

[wæ], 汉化为 wa, 用 w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Wagner, 瓦格纳; Waksman, 瓦克斯曼。

[wɔ], 汉化为 wo, 用 w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Walker, 沃克; Walkley, 沃克利; Walmsley, 沃姆斯利; Walpole, 沃波尔(渥尔波)^①; Walsh, 沃尔什; Walter, 沃尔特; Walton, 沃尔顿; Warner, 沃纳; Waters, 沃特斯; Warton, 沃顿。亦有把[wɔ]汉化为 hua 音节的, 因而有 wo 音节和 hua 音节并行的异形, 例如: Ward, 沃德/华德; Waterman, 沃特曼/华特门。

[wɔ], 汉化为 wo、hua 或 wa, 用 wo 音节字、hua 音节字或 w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Warren, 沃伦; Waller, 沃勒; Wallis, 沃利斯; Wanamaker, 沃纳梅克; Warwick ['wɔrik], 沃里克; Watson, 沃特森; Watterson, 沃特森; Waugh, 沃; Wallace, 华莱士; Washington, 华盛顿; Watson, 沃森(华生)^②; Watt, 瓦特; Watts, 瓦茨。

[wɒn], 汉化为 wang, 用 wa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Wanda, 旺达。

[wein], 汉化为 wei 和 en, 用 wei 音节字和 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Wayne, 韦恩。

[we], 汉化为 wei, 用 we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Webb(e), 韦布; Webster, 韦伯斯特; Wedgwood, 韦奇伍德; Welch, 韦尔奇; Weldon, 韦尔登;

① Walpole 的译名“沃波尔”和“渥尔波”的差异是对原词音节的不同切分所致。Walpole 切分为 Wa(l)/po/le, 形成译名“沃波尔”; Walpole 切分为 Wa/l/po(le), 形成译名“渥尔波”; 其中还有选择不同的音译用字、音素省略不译等原因。

② 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 1878—1958), 美国心理学家, 行为主义创始人, 主张心理学是研究行为的自然科学, 主要著作有《行为: 比较心理学绪论》、《行为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等。

Weller, 韦勒; Welles, 韦尔斯; Wellesley, 韦尔斯利; Wellington, 韦林顿(威林顿); Wells, 韦尔斯(威尔斯); Wesley, 韦斯利(卫斯理^①); West, 韦斯特; Westcott, 韦斯科特。

[wen], 汉化为 wen, 用 w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Wendy, 温迪; Wendell, 温德尔。

[wi:], 汉化为 wei, 用 we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Weber, 威伯(韦伯); Weekley, 威克利; Weeks, 威克斯。

[wi], 汉化为 wei, 用 we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Wilber, 威尔伯; Wilberforce, 威尔伯福斯; Wilbert, 威尔伯特; Wilbur, 威尔伯; Wilburn, 威尔伯恩; Wilcox, 威尔科克斯; Wilda, 威尔达; Wilford, 威尔福德; Wilfred, 威尔弗雷德; Wilkes, 威尔克斯; Wilkinson, 威尔金森; Will, 威尔; Willa, 威拉; Willard, 威拉德; Willcox, 威尔科克斯; William, 威廉; Williams, 威廉斯(威廉士); Williamson, 威廉森; Willie, 威利; Willie, 威莉; Willis, 威利斯; Willkie, 威尔基; Wilma, 威尔玛; Wilmer, 威尔默; Wilmot(t), 威尔默特; Wilson, 威尔逊; Wilton, 威尔顿; Wister, 韦斯特。

[wia], 汉化为 wei 和 er, 分别用 wei 音节字和 er 音节字标记, 例如: Weir, 威尔(韦尔)。

[wim], 汉化为 wei 和 mu, 分别用 wei 音节字和 mu 音节字标记, 例如: Weems, 威姆斯; Wemyss, 威姆斯。

[wai], 汉化为 huai, 用 hua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Wilda, 怀尔德(王尔德^②); Wilder, 怀尔德; Wise, 怀斯; Wiseman, 怀斯曼; Wyld(e), 怀尔德。亦有因采用不同的音译方式而形成 huai、wei 两种汉化音节形式之例, 例如: Wiley, 怀利/威利。

①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 美国人, 基督教新教卫斯理宗创始人之一。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 1707—1788), 基督教新教卫斯理宗创始人之一, 基督教圣诗作家, 约翰·卫斯理之弟。

② 王尔德(Oscar Wilde, 1856—1900), 英国作家, 著有童话《快乐王子集》, 剧本《理想的丈夫》、《莎乐美》、《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 小说《陶连·格雷的画像》, 等。

[waɪə], 汉化为 huai 和 er, 分别用 huai 音节字和 er 音节字标记, 例如: Wyat(t), 怀尔特。

[wɑː], 汉化为 wa, 用 wa 音节字标记, 例如: Schwabe, 施瓦布。

[wu], 汉化为 wo, 用 w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Wollaston, 沃拉斯顿。

[wəː], 汉化为 wo, 用 wo 音节字标记, 例如: Wordsworth, 沃兹沃思; Werner, 沃纳。

[-z], 汉化为 si, 用 s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Keynes, 凯恩斯; Waters [ˈwɔːtəz], 沃特斯; Weems, 威姆斯; Wemyss, 威姆斯; Wise, 怀斯; Wiseman, 怀斯曼; Wolseley, 沃尔斯利; Wells, 韦尔斯(威尔斯); Walmsley, 沃姆斯利。

[zæŋ], 汉化为 zan, 用 za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Zangwill [ˈzæŋgwɪl], 赞格威尔。

[zeɪn], 汉化为 zan 和 en, 分别用 zan 音节字和 e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Zane, 赞恩。

[ze], 汉化为 ze, 用 ze 音节字标记, 例如: Zelda, 泽尔达。

[zeŋ], 汉化为 zeng, 用 zeng 音节字标记, 例如: Zenger [ˈzeŋə], 曾格。(译名中的“格”是把原文书写形式中不发音的字母-g 采用汉读法译成的。)

[ziː], 汉化为 qi, 用 q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Ziegler, 齐格勒。

[zi-], 汉化为 qi, 用 q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Zimmerman, 齐默尔曼。

[-zi], 汉化为 se 或 xi, 用 se 音节字或 x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Joseph, 约瑟夫(约瑟); Josephine, 约瑟芬; Susie, 苏西(“瑟”、“西”的差异显然与原文的书写形式不同有关)。也有汉化为 qi 音节的, 例如: Ramsay [ˈræmzi], 拉姆齐。

[zin], 汉化为 jin, 用 jin 音节字标记, 例如: Zinsser, 津泽。

[zou], 汉化为 zuo 和 yi, 分别用 zuo 音节字和 yi 音节字标记, 例如: Zoe, 佐伊。

参 考 文 献

一、论文、著作类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1989)汉语方言字汇(第2版)[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曹聪孙(1995)汉语外来词的结构变化取向[A].词汇学新研究[C].北京:语文出版社.

曹德明(1994)现代法语词汇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岑麒祥(1953)从广东方言中体察语言的交流和发展[J].中国语文,(4).

常敬宇编著(1995)汉语词汇与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秀兰(1999)也考“岚风”[J].中国语文,(4).

陈 原(1983)社会语言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

陈中绳(1997)汉语外来词随想录[J].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词库建设通讯,(13).^①

戴 天(1993)说汉字译名[J].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词库建设通讯,(1).

戴昭铭(1998)规范语言学探索[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刁晏斌(2006)现代汉语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方龄贵(2001)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冯志伟(1994)关于“犹太”民族的译名用字问题[J].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词库建设通讯,(5).

①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主办的《词库建设通讯》期数标记均为总期数,(13)即“总13期”。

高名凯、刘正琰(1958)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M]. 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葛本仪(2001)现代汉语词汇学[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高增良(1979)若干借词探源[J]. 语言教学与研究(试刊,第4集).

古德明(1993)也谈“黄色”[J].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词库建设通讯,(1).

郭熙(2006)字母词规范设想[A]. 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三)[C]. 北京:商务印书馆.

何善芬(2002)英汉语言结构对比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何亚南(1999)释“岚”[J]. 中国语文,(4).

赫德森(1990)社会语言学[M]. 丁信善等译,林书武校.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胡明扬(2002)关于外文字母词和原装外文缩略语问题[J]. 语言文字应用,(2).

胡新化(1999)关于辞书选收外国汉字问题[J].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词库建设通讯,(20).

胡裕树主编(1995)现代汉语[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黄庆萱(1993)翻译的游戏规则[J].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词库建设通讯,(2).

黄河清(1994a)汉语外来词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词库建设通讯,(3).

黄河清(1994b)汉语音译外来词中所蕴涵的语法现象[J].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词库建设通讯,(5).

黄河清(1995a)汉语外来影响词[J].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词库建设通讯,(7).

黄河清(1995b)讨论1[J].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词库建设通讯,(7).

黄河清(1996)词汇年表[J].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词库建设通讯,(8).

黄河清、姚德怀(1997)pilot[J].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词库建设通讯, (11).

黄友平(2006)新加坡地名研究[D]. 南京大学硕士论文.

嵇南、吴克尧(1996)锡伯族[M]. 北京:民族出版社.

锦文·斯坦博格(1997)现代化和外来语[J].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词库建设通讯, (12).

景德祥(2005)从“默克尔”谈起——小议德语人名的音译[N]. 中华读书报, 5月12日.

竞 成(1996)汉语的成句过程和时间概念的表达[J]. 语文研究, (1).

老 卒(1993)橡黄素——信息湮灭在汉字译名里[J].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词库建设通讯, (2).

李葆嘉(2003)中国语言文化史[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李 明(2002)也谈字母词语的问题[J]. 语言文字应用, (4).

李锐华(1996)Internet 该怎样翻译? [J].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词库建设通讯, (8).

李小华(2002)再谈字母词的读音问题[J]. 语言文字应用, (3).

梁晓虹(1994)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M].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刘建梅(2002)现代汉字系统中外来字母规范浅议[J]. 语言文字应用, (1).

刘叔新(1985)汉语复合词内部形式的特点与类别[J]. 中国语文, (3).

刘涌泉(1994)谈谈字母词[J]. 语文建设, (10).

刘涌泉(2002)关于汉语字母词的问题[J]. 语言文字应用, (1).

刘中富(2001)关于《现代汉语词典》收释外来词的几个问题[A].

李如龙、苏新春编. 词汇学理论与实践[C]. 北京:商务印书馆.

鲁国尧(1996)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等著作与元代语言[J]. 南京大学学报, (4).

- 鲁国尧(2005)创造新词的心路历程[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
- 陆俭明(2004)确定领属关系之我见[A]. 南大语言学(第1编)[C].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1963)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J]. 中国语文, (1).
- 吕叔湘(1982)中国文法要略[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罗常培(1989)语言与文化[M]. 北京:语文出版社.
- 马清华(2000)文化语义学[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马西尼(1997)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的形成[M].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孟伟根(1996)汉语外来词的词义汉化及其回译[J].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词库建设通讯, (9).
- 潘文国(1997)汉英语对比概要[M].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齐 冲(2006)现代汉语音译词的对音规律[A]. 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三)[C]. 北京:商务印书馆.
- 钱乃荣(1990)现代汉语的特点[J]. 汉语学习, (4).
- 裘锡圭(1985)汉字的性质[J]. 中国语文, (1).
- 邵敬敏主编(2001)现代汉语通论[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沈孟璠(1999)现代汉语理论与应用[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石 琪(1993)反对炎黄子孙用“扫黄”[J].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词库建设通讯, (1).
- 史有为(1991)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M].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 史有为(2000)汉语外来词[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史有为(2004)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苏宝荣(2004)论当前汉语外来词规范的原则[A]. 苏新春、苏宝荣编. 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二)[C]. 北京:商务印书馆.

苏新春(2003)当代汉语外来单音语素的形成与提取[J]. 中国语文, (6).

孙常叙(1956)汉语词汇[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孙雍长(1985)古汉语的词义渗透[J]. 中国语文, (3).

索绪尔(1982)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译, 岑麒祥、叶蜚声校注. 北京:商务印书馆.

谭树林(2000)《华英字典》与现代汉语新词的创制[J].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词库建设通讯, (22).

田惠刚(1993)汉语“外来词”概念界定献疑[J].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词库建设通讯, (2).

田小琳(1998)由社区词谈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J]. 语文建设, (11).

田小琳(2002)社区词与中文词汇规范之研究[J]. 世界汉语教学, (1).

王艾录、司富珍(2003)语言理据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 力(1954)论汉族标准语[J]. 中国语文, (6).

王 力(1979)白话文运动的意义[J]. 中国语文, (3).

王 力(1980)汉语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

王立达(1958)从构词法上辨别不了日语借词[J]. 中国语文, (9).

王忠亮(1995)哈尔滨地区使用的中俄洋泾浜[J].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词库建设通讯, (6).

文 炼(1991)与语言符号有关的问题——兼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J]. 中国语文, (2).

吴礼权(2006)汉语外来词音译的四种特殊类型[A]. 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三)[C]. 北京:商务印书馆.

吴世雄(1997)也谈“clone”的汉语译名[J].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词

库建设通讯,(14).

伍铁平(1981)大不列颠是什么意思?[A]. 于根元、张朝炳、韩敬体编. 语言漫话[C].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伍铁平(1994)论词义、词的客观所指和构词理据[J]. 现代外语,(1).

武氏春蓉(2002)汉越词研究[D]. 南京大学硕士论文.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1993)“外来概念词词库”总说明[J].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词库建设通讯,(1).

邢福义主编(1985)现代汉语(卫星电视教育、中学教师培训教材)[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徐朝华(2003)上古汉语词汇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

许余龙(1992)对比语言学概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杨挺(1999)直用原文——现代汉语外来语运用中的一个新趋势[J]. 中国语文,(4).

杨锡彭(1993)语素的定义及其他[J]. 淮北煤师院学报,(1).

杨锡彭(2002)论复合词结构的语法属性[J]. 南京大学学报,(1).

杨锡彭(2003a)汉语外来词:音译与音意兼译[A]. 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C].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杨锡彭(2003b)关于词根与词缀的思考[J]. 汉语学习,(2).

杨锡彭(2003c)汉语语素论[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杨锡彭(2004)关于汉字性质的研究[A]. 南大语言学(第1编)[C]. 北京:商务印书馆.

姚德怀(1997)《申报》及其他[J].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词库建设通讯,(14).

姚德怀(1998)《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与郭实猎[J].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词库建设通讯,(15).

野村雅昭(2004)日本制汉语词的构词功能[A]. 苏新春、苏宝荣编. 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二)[C]. 北京:商务印书馆.

印晓红、黄河清(1994)“几何学、几何”[J].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词库建设通讯,(5).

游修龄(1992)农史研究和历史语言及外来词[J]. 中国农史,(4).

于根元(1986)说“友”[J]. 语文建设,(3).

于根元、王铁琨、孙述学(2003)新词新语规范基本原则[J]. 语言文字应用,(1).

俞品、祝吉芳(2003)原形借词——现代汉语吸收外来语的新发展[J]. 中国语文,(6).

俞忠鑫(1995)Malaya[J].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词库建设通讯,(6).

袁家骅等(1989)汉语方言概要[M]. 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詹伯慧(1985)现代汉语方言[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张 斌(1998)汉语语法学[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张清常(1978)漫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J]. 中国语文,(3).

张绍麒(2001)词义的文化标记及其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策略[A]. 李如龙、苏新春编. 词汇学理论与实践[C]. 北京:商务印书馆.

张 旭(1995)解释与翻译[A]. 词汇学新研究[C]. 北京:语文出版社.

张永言(1982)词汇学简论[M]. 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张永言(1988)语源探索三例[J]. 中国语言学报,(3). 北京:商务印书馆.

张振江、陆镜光(2001)语词接触的经验基础[A]. 李如龙、苏新春编. 词汇学理论与实践[C]. 北京:商务印书馆.

赵 杰(2000)东方文化与东亚民族[M].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赵世开(1995)翻译和语境[J].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词库建设通讯,(7).

赵元任(1979)汉语口语语法[M]. 北京:商务印书馆.

赵元任(1999)语言问题[M]. 北京:商务印书馆.

赵元任(2002)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C]. 吴宗济、赵新那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周定国(1994)谈汉语音译外来词规范化[J]. 语文建设, (10).

周定一(1962)“音译词”和“意译词”的消长[J]. 中国语文, (10).

周 荐(1991)汉语外来成分译借方式之我见[J]. 香港: 语文教育学院学报, (8).

周 荐(1997)从高丽语(Korean)由汉语借入的成分谈外来成分的某些性质和特点[A]. 语言研究(第七辑)[C]. 北京: 语文出版社.

周健、张述娟、刘丽宁(2001)略论字母词语的归属与规范[J]. 语言文字应用, (3).

周有光(1959)外来词的拼写法问题[J]. 中国语文, (2).

周玉琨(1997)也谈“回归词”[J].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词库建设通讯, (14).

周振鹤(1998)《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创制汉语新词方面的作用[J].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词库建设通讯, (15).

周振鹤、司徒(1998)汉译西洋地名的两个系统[J].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词库建设通讯, (17).

周振鹤、游汝杰(2006)方言与中国文化(第2版)[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祖谟(1959)汉语词汇讲话[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邹韶华(2001)语用频率效应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朱建颂(1999)ice lolly(英语)popsicle(美语)[J].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词库建设通讯, (21).

朱 原(1998)外来语和词典[J].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词库建设通讯, (17).

邹嘉彦、游汝杰(2001)汉语与华人社会[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

社;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二、辞书类

岑麒祥(1990)汉语外来语词典. 北京:商务印书馆.

陈 刚(1985)北京方言词典. 北京:商务印书馆.

哈特曼、斯托克(1981)语言与语言学词典. 黄长著、林书武、卫志强、周绍珩译,李振麟、俞琼校.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胡行之(1936)外来语词典. 上海:天马书店.

刘正琰、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1984)汉语外来词词典.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刘涌泉(2001)字母词词典.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徐世荣(1990)北京土语词典. 北京:北京出版社.

朱广祁、俞阳、顾志芹(2000)港台用语和普通话新词手册.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辞海》(1989,缩印本).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辞源》(1988,合订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

《汉语大词典》(1997,缩印本).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现代汉语词典》(1978). 北京:商务印书馆.

《现代汉语词典》(1983). 北京:商务印书馆.

《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 北京:商务印书馆.

《现代汉语词典》(2005). 北京:商务印书馆.

《新日汉辞典》(1988).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新英汉词典》(1985,增补本).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新英汉词典》(2000,世纪版).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后 记

前几年写作《汉语语素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2004年5月第2次印刷),涉及外来词的一些问题。当时虽有不少想法,但因书稿主题和格局的限制,未能全面、深入、细致地展开讨论。2004年下半年,我以“汉语中的外来词研究”为题,申报并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基金项目。两年多来,此事一直念念不忘在心,看了不少文献,也写了一些片段,但因各种意外因素的干扰,研究工作时断时续,一直未能总括其成。随着时间流逝,压力倍增,每念及,夜不成寐。于是集中精力、时间,潜心钻研,终于如期完成了立项项目的研究。这本书就是在结项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补充而形成的。

由于有多年的想法和材料的积累,写作进展还是很快的,但是不仅不能说顺利,而且简直举步维艰,有时甚至到了跬步难行的境地。不过,长期的专注和终日的殚精竭虑之中,往往就有灵感迸发,这种愉悦,实在难以言表。

从该项目的立项到书稿写竣,得到李开教授、段业辉教授的支持和帮助。汪维辉教授提供了不少文献,郑庆君教授在英语方面多有指教和帮助。邢福义教授、鲁国尧教授也惠示了有关资料。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感谢陈光博士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书稿的部分章节曾请陈光博士看过,承他提出了坦率而富有价值的意见。

感谢卞觉非教授、吴淮南教授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读全稿,他们的意见让我受益匪浅,不仅促使我拾遗补缺,避免失误,更加准确地细致地分析有关问题,而且激励了我的思维,产生进一步探讨的兴趣,

从而为书稿增添了不少亮点。

感谢恩师张斌先生始终不渝的鼓励和支持。

感谢学科带头人柳士镇教授对本书的写作、出版所给予的指教和切实的帮助。

感谢中文系主任丁帆教授所给予的鼎力支持和帮助。

杨锡彭

改定于丁亥元夜子时